

斯特朗文集

*China's Million
—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from
1927 to 1935*

*Why I Came to China
at the Age of 72*

2

斯特朗文集

千千万万中国人

郭 鸿 沈士杰 严 格 译

李 寿 葆 校

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来到中国

陈 裕 年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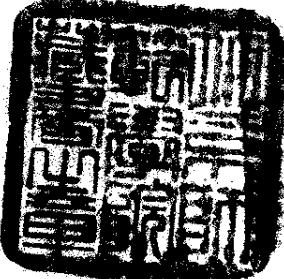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55965

2

新华出版社



1155955

DE 38/

出版前言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八八五——一九七〇)是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和作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诚挚的朋友。她一生追求进步，坚持真理，以犀利的笔为武器，始终不渝地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尤其热情讴歌了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

斯特朗一八八五年生于美国中西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在父母的影响下，她自幼刻苦学习，年仅二十二岁，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赢得了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的学位。为了追求公正和自由，她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进步事业。斯特朗积极参加过反对美国加入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运动，参加过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参加过工人总罢工运动，创办过美国西部第一份支持十月革命的报纸。

年轻的斯特朗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她二十多岁就出版了三部诗集和一部诗剧。为了鼓动劳苦大众参加社会变革，在她编《西雅图工会记实报》时，就创造性地开辟了一个叫《安妮丝》的打油诗专栏，每天发表一首她写的诗。以诗论政，以诗讽刺社会，激励青

年，一直持续了两年，共写了六百首诗。这些诗被传抄到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斯特朗因为鼓动工人罢工而被捕了。她的一个同事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责备她说：“你的所有的老朋友都抛弃了你。有什么人站在你一边吗？”她回答说：“有！有拥有七千会员的锅炉制造人工会，有锻工，码头工人，机械师，电机工人和许多别的人。我们只要团结起来就能赢得胜利。”从此以后，对她来说：不是自由主义的良心，而是群众的行动才是有希望的改变世界的动力。

斯特朗出狱后，更以旺盛的精力投入了劳工工作。她在二十年代发表的一首诗《辞旧迎新》，就宣告了她对人类新时代的春天必将来临的信念：

旧时代行将过去，
新时代定要来临。
枯萎腐烂的落叶，
终将埋入孕育新生命的沃土中。

现在是奔向春天的时候了！

虽然还要经受无数严冬的风暴。

人民的力量象熊熊的火焰，

在每个民族的上空闪耀。

笼罩人间的乌云在渐渐消逝，

灿烂的光辉将慢慢把大地普照。

一九二一年，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斯特朗来到了列宁的俄国。她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她长期与苏联人民同过艰苦生活。在那里安家落户，结婚。她不仅写了大量作品赞美“人的新世界与新世界的人”，而且亲自组织美国专家去苏联工作，亲自募捐和运

送物品给伏尔加河灾区儿童。特别是为数万名在苏联帮助建设的美国工程师及技术人员，创办和主编了《莫斯科新闻》英文报。工作很出色。据说，她受到过列宁、斯大林的称赞。斯大林曾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请斯特朗列席，讨论她改进报纸工作的批评和建议。后来，她被错误地诬为“间谍”，被驱逐出苏联，蒙受不白之冤达六年之久，但她始终冷静思考，坚信真理，顾全大局，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通向人类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

斯特朗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她曾六次来中国访问。一九二五年她首次来华，大部分时间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中心地广州。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她见到宋庆龄和其他许多进步人士、群众领袖。一九二七年，她访问了墨西哥之后，再次来到中国。在武汉和其他一些地方，她不仅报道了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和反对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军阀的国内战争，也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背叛而导致的多少人流血牺牲的革命失败。她写道：中国的未来“存在于被捣毁了的农会之中，存在于那些千千万万农民的希望和经验之中。”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斯特朗第三次来华。她专程到晋西北访问了朱德将军的司令部，继而访问了华北各战场。她英姿焕发，穿梭于斗争激烈的敌后各条战线之间。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波兰女作家伊丽娜·拉尔夫·苏埃斯对斯特朗作过这样的描述：

“她既有当年乘‘五月花号’船去美洲的先驱者的坚定性，又具有一粒革命历史学家的清晰头脑。在她严峻、坚毅的脸上一双冷酷的淡蓝色眼睛，使我感到敬畏。……当她谈论她感兴趣的问题——苏维埃俄国、中国、工人运动时，我们为她的激情所吸引，倾听着她如何以严密的逻辑、惊人的清晰和非凡的远见一下子就深入到一

些最复杂的问题的实质。她讲话象机关枪开火一样：客观、不动感情，而且深刻。事实和数字都说明问题。”

一九四〇年底，斯特朗第四次访华。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僵持不下的阶段。日本侵略者已占领大部分大城市，并诱使蒋介石投降。在国民党内部再次掀起反共、投降的声浪，反动派则加紧策划消灭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罪恶活动。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向斯特朗介绍了这一形势，说明日益增长着的再一次分裂的危险，远比一九二七年那次还糟，因为民族生存受到了威胁。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斯特朗即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及时准确地揭露了国民党这一阴谋。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国际进步舆论和一些国家政府对蒋施加压力，才使这次危机没有进一步扩大。

一九四六年六月，斯特朗对中国进行了第五次访问。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她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当时蒋介石不顾战后签订的协议，正在美国的援助下准备打全面内战。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她，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斯特朗相信这一理论是正确的，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经过她的报道，“纸老虎”的论断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地传播。后来，她在回忆延安的文章中写道：那儿“没有奢侈豪华的东西，也很少舒适安逸的生活……而有的却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思想敏锐，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放眼世界。我感觉到……我自己的胸襟在不断开阔……在这儿，我仿佛终于认识到人类在艰难困苦中前进的历史是可信的。”

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当她七十二岁的时候，决定晚年定居中国，直至一九七〇年她安然长眠。她和翻身后的

中国人民一起度过了十二个春秋。

斯特朗热爱中国，写中国，无限信赖中国人民。半个世纪以来，斯特朗的名字，与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密切相联。她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友谊，为我国广大群众所熟悉与铭感。她同我国老一辈革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结成了深厚的友谊。邓颖超说：“斯特朗生于美国，死于中国，她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骄傲，又是两国人民的友谊象征。”

斯特朗八十五岁逝世。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追求真理的一生。她曾走遍世界许多地方，经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经历了个人的严峻考验。但她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向往革命，从不向命运低头，对人类的进步和前途充满信心。她放弃舒适生活，不顾个人安危，哪里燃起斗争火焰，她就奔向那里，就在那里战斗。她总是站在时代的前线、险峰。她的一生，几乎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她的故乡美国度过的，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度过的，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她称之为“理想的归宿地”中国度过的。她还到过西班牙、越南、朝鲜、柬埔寨、墨西哥、波兰等许多国家，在那里，留下了她的战士的足迹。

斯特朗终生以笔为武器，用她那敏锐的洞察力，引人入胜的笔调，反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传播各国人民的友谊。她一生孜孜不倦，直到晚年走路持杖的情况下，仍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旺盛的活力。当她七十四岁高龄的时候，为了了解西藏人民推翻农奴制后的新生活，她还坚持要求去海拔三千六百公尺的拉萨采访。由于她惊人的勤奋和智慧，一生中写了上千篇作品，出版了四十多部著作。她的作品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影响着千百万读者。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杰出的作家和

新闻记者，为了学习斯特朗一生追求真理，向往进步和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新华出版社决定出版《斯特朗文集》。这套文集含三卷，主要搜集了斯特朗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内容是：

第一卷《换了人间》(I Change worlds, the Remaking of an American)。一九三七年曾由纽约加登城出版公司出版。这是斯特朗于一九三五年写的一部自传体著作。本书详细描述了她前半生(一八八五——一九三五)的生活、成长过程和在苏联、中国的经历等。从中可以了解她是如何从资本主义的美国来到社会主义的苏联，如何从一个天真幼稚的姑娘成长为一名支持革命的进步记者，如何从信仰宗教转为信仰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这对研究斯特朗世界观的形成甚有帮助。

第三卷收有《千千万万中国人》(China's Millions,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From 1927 to 1935) 和《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来到中国》(Why I came to China at the Age of 72)两部著作。

《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详细介绍了一九二七——一九三五年的中国革命斗争。其中主要记述了武汉革命政府蜕变成反动的军事独裁政权；记述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白色恐怖下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记述了中国红色政权的崛起。书中还讲述了斯特朗与引退回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乘车横跨中国大西北和蒙古沙漠，最后回到莫斯科的情景。作者以纪实的方法，通过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材料，介绍了在中国大地上所进行的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

《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来到中国》，是斯特朗于一九四七年离开延安到一九五八年重返中国的经历。主要介绍了她是如何于一九四九年在苏联被捕的，又如何以“间谍”罪名被驱逐出境的。她回

到故乡后打算与美共取得联系，但徒劳未成。后来又迁往洛杉矶，她一方面为她无故被驱逐出境进行申辩，另一方面也一天不忘对新中国进行宣传。一九五五年苏联政府为她进行平反。此时美国政府又百般阻挠斯特朗访华，她又为此与美国当局进行斗争，直至她的夙愿实现。

第三卷收有《人类的五分之一》(One Fifth of Mankind---China Fight to Freedom)和《中国人征服中国》(The Chinese Conquer China)两部著作。

《人类的五分之一》是一九三七年斯特朗来华进行了大量采访活动后撰写的。作者讴歌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不屈不挠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并坚信中国抗战必胜。

《中国人征服中国》是斯特朗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利用“军调部的方便”，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以及东北解放区进行采访的纪实。在延安，她访问中共总部，毛泽东主席向她发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她根据所见所闻生动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展望未来，她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两种命运的决战充满无限的信心。她看到了革命力量正在发展，她预祝一个延安式的新中国即将在烈火中诞生。作者文笔锋利，这是一本既有重要历史价值而又饶有兴趣的书。

斯特朗和斯诺、史沫特莱一样，都是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记者。她的作品文字优美，论理透彻，清新感人，堪称世界报告文学的巨著。作为记者，她采访深入，高瞻远瞩，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她在中国的采访活动，描绘出一幅幅时代的巨大画面，闪烁动人的异彩。她的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史料丰富，是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的文献。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版

这套文集，不仅对新闻文化界是需要的，而且对全国人民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愿斯特朗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新华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八月

目 录

千千万万中国人

- 中国革命选集作者自序 (3)
广州的革命序幕 (18)

第一卷 华中地区的群众暴动

- 一、在上海停留 (28)
二、溯扬子江而上 (37)
三、汉口的红色力量 (45)
四、进入战区 (57)
五、将领们在郑州会晤 (67)
六、工人们在汉口集会 (80)
七、中国的劳工领袖 (91)
八、争取妇女权利的斗士 (103)
九、中国新女性存在的问题 (114)
十、王素贞为自由献身 (129)
十一、湖北的学生和农民 (139)
十二、反动派镇压下的“红色”湖南... (151)

十三、永丰的革命	(164)
十四、革命片段	(175)

第二卷 橫跨大西北

一、礼别汉口	(188)
二、冯总司令接待我们	(194)
三、通往西安府之路	(210)
四、穿越陕西山区	(221)
五、甘肃与黄河	(233)
六、盼望已久的宁夏	(244)
七、穿越戈壁	(260)
八、在戈壁滩继续前进	(269)
九、革命党和活佛为争夺蒙 古而斗争	(279)
十、光荣圣殿	(290)
十一、新蒙古的建设者	(301)
十二、维尔克—武丁斯克—鄂	(316)

第三卷 八年的历史

一、南京政权的衰落	(325)
二、赤色地区的崛起	(336)
三、帝国主义者	(348)

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来到中国

前言	(357)
一、离开延安	(361)
二、在莫斯科被捕	(371)
三、监狱里的五天	(383)
四、被驱逐出境	(392)
五、在美国东部	(403)
六、回到西海岸	(416)
七、美共对我的抵制和打击	(426)
八、意外的平反	(439)
九、重游莫斯科	(453)

千千万万中国人



中国革命选集

作者自序

我一生中经历了三种文明——美国文明、俄国文明和中国文明。这三种文明构成了并且正在继续影响着我们的时代。我曾作为社会工作者、展览会专家、记者、编辑、讲解员和作家在这几种文明中生活 and 工作过；开始时在家乡西雅图，后来在莫斯科住了将近三十年，现在已八十岁了，住在北京。

在西雅图，人们认为我们是“上帝的国度”、世界民主的先驱，为争取更完美的民主而斗争。我们在民主斗争中赢得了许多形式上的胜利，但却眼看着自己的国家变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凶恶的帝国主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震撼了世界和激励了进步人类，我也被它所吸引，便去莫斯科，在那里住了近三十年，把它作为我中年生活和工作的中心。我写的三十多本书中多数是关于苏联的。

在莫斯科，我逐渐注意到正在东方兴起的一场新的革命。于是就在几次返美途中访问了中国。这是在一九

二五年国共两党在广州合作时期，那时我四十岁。在六次访问中，我对中国的兴趣不断增长。因此，甚至在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之前，我就已决定到中国定居。中国革命的胜利突破了帝国主义对苏联的长期包围，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并开始激励全世界范围的反帝革命。

现在，我的中国朋友们为了庆祝我的八十岁生日，正在出版我写的中国革命著作的选集。这些著作可能是我的所有写作中最具有生命力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在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今日中国，有许许多多聪明热情的读者，而且，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作为本世纪伟大的反帝革命，它的失败和胜利为当代反帝革命提供了最宝贵的经验教训。

因此，我必须回顾我在美国，在苏联，以及几次访问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我在中国的几次访问把我吸引到北京来居住，并写下了即将重版的六本书。

一八八五年我出生在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很久以前，我就开始了自己的生涯。一九〇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家乡西雅图。这时父亲已在母亲死后搬到这里。我和父亲创办了“认识你讲座”，把演讲、讨论和参观结合起来。通过这些活动，使西雅图的市民们得以熟悉这个城市的生活，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刚从东部各州迁移来的。后来我被邀请到西部其他城市举办类似的讲座。这些讲座所受到的欢迎使我能参加在纽约举行的一次盛大的儿童福利展览会。此后几年中，我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举办儿童福利展览会，成为这类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唤起市民们对全市儿童的生活条件和需要的关注，了解学校、卫生、运动场地和福利等方面的情况，从而通过公众要求，推动新法律的制订和新设施的建立。

当我感觉到通过各种委员会的正确组织和通过展览，市民的觉悟和意识有所提高和发展，从而促使各地为人民建立新的设施和制订新的法律，我认为自己正在促进美国民主。我的这种感觉是一个积极信念的组成部分，这个信念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民主的先驱者。很久前，我们就在独立宣言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后来，各族人民远渡重洋来到我们的国土寻找自由。我们仍向自由移民开放的西部国土是“世界的最后边疆”。当然，我们常常不得不和“利益集团”作斗争，就是那些从纽约来的垄断势力，要强加在我们身上。他们甚至企图控制我的展览会，但我觉得我们仍然是独立的。

在堪萨斯市举办的第三次展览会，我第一次担任高级行政负责人。那个展览会一结束就得辞退工作人员，而他们很少有机会再找到工作。这件事真叫我发愁。我想了一整夜未能入睡，终于断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无法纠正这种现象，是这个制度本身“完全错误”。唯一适当的制度是把所有的职业，所有的工作和企业都置于公有制之下。这我知道叫做社会主义。因此我必须做一位社会主义者。等我知道如何把“阶级斗争”适用于这些问题上，那是以后的事情。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正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为全国妇女卫生协会举办儿童福利展览。总督的妻子阿伯丁夫人是该协会主席。我作为她的客人住在总督官邸。后来，我乘一艘快船回美国，一路上灯火管制，以防德国潜艇袭击。我回到美国时，新成立的华盛顿美国儿童局的一个职位已等着我这位“展览专家”了。当时我还不到三十岁，似乎要在联邦政府终身任职了。

我很快发现华盛顿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官僚机构，在那里我几乎闷得喘不过气来。一九一五年，我为旧金山世界博览会组织了

一次儿童展览会。后来又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举办另一次“儿童兴趣”展览会，还写了一本如何组织儿童福利展览会的小册子（该册已由联邦政府出版）。完成这些工作后，我就辞职回到家乡西雅图。那里生气勃勃的海滨生活吸引着我，我很快被作为“进步分子”选入西雅图市教育委员会，成为该委员会中任职数年的第一名妇女。

西雅图是一个“进步城市”。在每次激烈的选举斗争中，人民总是击败了“利益集团”，即给我们施加压力的来自纽约的垄断企业。西雅图取得了电力系统和一个市属码头的所有权，最后又把私营的有轨电车线也买了过来。我们把这些看为是民主管理的扩大化，甚至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开始。我们却没有看到，每次“人民所有制取得胜利”后，私人大企业的利润都增加了。当“市电”公司承担了向散布在几平方里山区的市民家庭供电的任务后，这却使私营西雅图通用电气公司得以解脱，以较低的价格和较高的利润把电力卖给工业集中的市区。当我们把市内有轨电车线买过来后，原来的股东从市公债券中得到了比以前从电车线路股票得到更高、更可靠的收入。

当我们认识到“人民力量的胜利”并不是完全的胜利时，就死抱着一种信念：“进步不可避免地会到来”，它有一天会给人民带来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是我青年时代，人们对美国民主的最深信念。

一九一六年底，我们开始发现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正把美国推向欧洲战争。我们深信，这是违背美国人民的意愿的。因此我一次又一次帮助组织防止美国被卷入战争的和平运动。我们认为当我们在“他使我们不被卷入战争”的口号下，把伍德罗·威尔逊选为总统后，我们是胜利了。我们走上街头，征集了成千上万的签名

(全国签名总数达几百万)，证明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的人民反对参战。我几乎每天用电报把结果报告华盛顿，以表示“对总统的支持”。美国人的幻想一直延续到现在林登·约翰逊当政的时代。

人民要和平而资本家要战争的美国，终于大踏步地参与了欧洲战争。在我一生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比这件事更震动了我的灵魂。“我们的美国”完了，永远完了！军国主义者任意强奸民意。我再也不能象许多人那样，欺骗自己说：这是一场“保卫世界民主的战争”。我看不见民主在宣战中就遭到破坏。我不知道从哪里重新开始、如何开始。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我和许多美国进步分子所具有的关于美国有和平和民主的独特性的信念，我们也得到了补偿，我们也成了世界革命的共同继承人。当十月革命的雷声震醒了世界时，在遥远美国西北部的我们，也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信息，它穿越了战火熊熊的欧洲战线和两大洋、两大洲。

世界各地的记者涌向各个战场，涌向凡尔赛和平会议，涌向莫斯科（如果能得到护照的话）。我羡慕他们，并为他们在西雅图安排演讲，但那时我还没有自己想去苏联的念头。这是一场世界革命，它从莫斯科开始，正向世界各地传播，而且会把我们也卷进去。我的战斗岗位在西雅图。我组织的和平运动被美国的宣战所破坏，只存下信奉和平主义的父亲和工会的左翼会员还谈论着反对战争。那时，我已开始以志愿者身份为一家新办的革命小报《西雅图每日号角》写稿。这家报纸靠借债和捐款度过了九个月，后来被一群流氓所捣毁。接替这家报纸的是一家较强大、较受尊重“体面”的工人报纸《西雅图工会纪事报》。这是第一份由美国地方劳工理事会办的日报。我成为该报编辑之一，并且还作为该报新闻写作者工会参加西雅图中央劳工理事会的一个代表。那里，我

们常常坐到半夜，听访问过莫斯科的人演讲，或关于世界各地革命斗争兴起的报告。我们听说过，在德国，工厂被夺取；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苏维埃纷纷成立；法国水兵在敖德萨叛变；朝鲜人身穿白长袍不带武器在街头宣布独立。

看来，全世界工人都纷纷起来，以各种方式夺取政权。这一切对我们来讲是正当的，是走向进步的必然，也必将在我们这里发生。但我们对夺权涉及的问题一无所知。我们甚至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英国工党希望通过选举执政，手无寸铁的朝鲜人在街头被击毙，这一切大体上都朝着同一个总方向前进。

在这种混乱思想中爆发了西雅图总罢工。资本家们称它为“西雅图革命”。此后书本上也一直以同样名义称呼它。但它不是任何革命尝试，虽然一个报童事后失望地说：“我还以为我们就要去夺取工厂”，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想法。这次行动基本上是一次与造船工人团结的罢工，以及反对华盛顿暗中干涉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的抗议。这次罢工效力很高，由十五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掌管了这座城市三天。他们只“允许”市长“掌管市电力公司以防止流氓捣乱”，发给垃圾车执照“仅仅为了卫生缘故，搬运含水分的垃圾”，通过仓促组成的志愿机构向市民供应膳食，向儿童供应牛奶。当第四天取消总罢工时，我们认为这是一次胜利。

后来华盛顿通过取消合同关闭了造船厂。我们的工人漂泊到别的城市去寻找工作。年轻的、胆大的和有革命精神的人走了，而拖家带口和有财产作抵押的年岁较大的人不能轻易离开。我们强大的工人运动从内部开始萎缩了。劳工理事会成了人匠、管道工争夺工作的场合。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工会纪事报》随风使舵，适应广告的要求。“同志”间互相辱骂，诬蔑对方是叛徒。我们的“工人政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就是我去莫斯科的原因：我想去看看俄国工人是怎样的。我们失败了而他们却成功了。我首先向报社告了假，为美国公谊会服务队去苏联，后来西雅图劳工理事会委派我作为观察员出席一九二二年赤色职工国际会议。最后，我在莫斯科安了家，一住三十年。那个时期，我即为资产阶级报刊，也越来越多地为正向全世界发展的工人报刊写稿，介绍俄国革命。我还以别的方式帮助苏联革命。我在美国公谊会服务队工作的九个月中，把第一批汽车运输的外国粮食送到苏联，救济一九二一年在伏尔加流域萨马拉发生的饥荒，后来又帮助组建一所农场，收容伏尔加沿岸无家可归的儿童。三十年代初期，美国工人和工程师来苏联参加五年计划建设时，我筹办了《莫斯科新闻》^①为他们服务。开始是周刊，后来发展成为日报。大约就在此时，我和一位苏联共产党员结了婚。他也是一位编辑和作家。他并没有改变我的工作，而是给予我鼓励和帮助。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在乌拉尔山区。那时我在美国。

每隔一两年我去美国作巡回演讲。我在返美旅途中，访问了德国、墨西哥、西班牙和中国等革命国家。在那些年代里，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我几乎采取一切可能的路线在苏联旅行，通过芬兰、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乘船直达西部的列宁格勒，通过南方的黑海，乘火车沿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道旅行或采取更吸引人的路线在东部旅行。有一次，当希特勒封锁了所有往西去的道路时，我从苏联中亚地区的阿拉木图乘飞机去重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我乘租借法案运输机，从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飞

① 不是现在的《莫斯科新闻》，而是以前的，那时我是该报的编辑之一。
——著者注

越北极地区。在那里，我发现了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在一次旅行中，在苏联北极地区的第一站停留时所亲手种下的经过精选的蔬菜种子。早些时，在一九二七年武汉革命失败后，我曾和鲍罗廷以及几位离职的俄国人从汉口到莫斯科，乘汽车穿越中国的西北部和蒙古沙漠，旅行三千公里。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的那些岁月里，莫斯科一直是我的活动中心。在那里，我写了苏联革命和世界其他各地的革命。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一九二五年末，正是我四十岁的时候。我一共访问了中国六次，每次都选择在革命发生重要变化而又有可能接触上的时机。一九二五年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有迹象表明南方将发生变化，孙逸仙博士在广州成立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的新革命政府。在这个政府支持省港大罢工时，我去了中国接触了这个政府。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二七年，我从上海溯扬子江而上，去访问了武汉革命政府。我在那里一直待到武汉政府背叛革命，而且开始镇压工人和农民。那就是我和迈克尔·鲍罗廷以及几位苏联顾问，乘汽车越过中国西北部和蒙古沙漠回到莫斯科。在武汉逗留期间，我还到过湖南。那里的革命曾经是“最红”的，但也遭受了镇压。许多故事，甚至从革命敌人所谈的情况，也说明了中国工人和农民群众所掀起的新兴力量的性质和强大。

我在头两次访问中国时，得到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素材。这本书着重写武汉和湖南的革命。这本书曾以不同方式在几个国家出版。在苏联，分成两本书出版：一本写“华中地区的群众起义”，另一本写“从汉口到莫斯科”。美国和英国的版本把这两本书合起来，取名为《千千万万中国人》。而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版本，有的是一本，有的分成两本。本版选集采用了第一本书的内容，另外补充了从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广州革命序幕”一章，删去了和中

国革命关系不大的返回莫斯科的旅行。

武汉革命政权失败以后，我十年没有重访中国。我对南京蒋介石政权不大感兴趣，因为它只不过是中国军阀政府的翻版，被一个又一个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而越来越多的是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国“苏区”正在江西和其他地区兴起，但外国人无法去访问。后来，南方各省的革命失败，便开始了中国红军的长征，改由毛泽东领导，极为壮观的把革命基地向西北转移。它激励了全中国并把共产党人推向全国抗日斗争的前列，再一次与蒋介石结成了统一战线。蒋的政府在上海和南京失败后迁移到武汉。

一九三七年末，我再次去中国，从意大利乘船去香港，从那里乘飞机去武汉。在临时的特殊情况下，我得以从汉口乘山西军阀阎锡山的专用列车，到著名的八路军司令部。在那里，共产党人在朱德总司令领导下，已经制定了今天人们称之为“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我参加了在山西南部山区的司令部里举行的军事会议。林彪、贺龙和刘伯承三位师长越过日本战线也来参加这次会议。

那时，也就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他们已经在三十个县城里重新建立了中国政府，并且每天接到来自华北各地的无线电战报。在这些地方每天发生两三次小战斗。他们正在取得胜利，因为他们得到中国农民的全力支持。中国农民们过去一直恨当兵的。但是共产党的部队是一支新型军队。他们不奸淫掠夺，尊重农民并帮助他们收庄稼，特别是教导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并告诉他们如何战斗和赢得胜利。

我报道了朱德的预言：“我们相信，中国得救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华北的游击部队。老部队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必须发展新部队。”大批学生、教授和医生正克服艰难险阻，向日军包围地区进

发。在那里，他们在八路军保护下，教农民读书、写字、讲卫生、学习政治、保卫家乡。我在去前线的火车上，遇见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了解到一些关于他们的情况。我写了一本叙述此次旅行的书：《人类的五分之一》。

国共合作的美景不长。那些担心共产党会通过组织农民抗日的胜利在华北赢得越来越高的声望的国民党将军们，开始从后方进攻共产党部队。在华北，许多蒋介石的将军投降了日本，成了傀儡与共产党作战。但这种情况得到重庆方面的纵容；他们美其名曰：“曲线救国”。

一九四〇年末，我本打算从莫斯科去美国，但发现希特勒已封锁了一切通过欧洲的路线。于是，我从阿拉木图乘飞机到了蒋介石撤退时的首都重庆，并从那里飞越日本战线到达香港。在重庆我第一次会见了蒋介石。他拘谨地笑了笑，说：“是，是”，没有任何意义。我也会见了一九三八年曾在汉口见过面的周恩来。他作为名义上仍属于蒋介石部队的八路军的代表住在重庆。据说他能比其他共产党人更安全地待在重庆，因为西安事变中他救过蒋介石。然而，他并不十分安全；他深夜在一个偏僻地方接见我。

我了解到，共产党在华北和华东的部队已经有五十万人。北面他们与东北义勇军已联系上，在北京附近切断了铁路并把标语贴到城里；东面，他们伸展到山东海岸，并控制了烟台港一段时间，使供应物资能由此进口。这种“肆意扩张”虽然打击了日本，却惹恼了不能守住自己城池的国民党将军们。从一九三九年起，各色各样的国民党部队向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进攻，甚至向日本飞机发信号示知共产党部队的驻地。周恩来对我详细地介绍了这些情况，并告诉我：在得到他的通知以前，不要发表。

他说：“目前双方对这些冲突仍保持沉默。我们不愿意增加磨

擦，蒋介石也不希望他的美国支持者知道中国存在着任何不团结的现象。但是如果武装冲突加剧，我们希望这些消息能对外国发表。”

一九四一年一月，我乘的船接近旧金山时，一位国民党将军发动了对新四军后卫部队和医院的血腥屠杀。我到达纽约时，接到一份电报：“发表你所了解的情况。”同时接到一份附加的文件，那是中国共产党关于重组新四军、待命继续抗日并“严防后方亲日汉奸”的正式命令。那时，也就是大屠杀发生后的一个月，美国人还相信，屠杀只不过是对中国共产党所纵容的、不听指挥的部队的整肃纪律的行动。这是重庆新闻检查所允许发表的唯一说法。

我在纽约报纸上以大标题登出：蒋介石不再统治一个统一的中国，不再能指挥一支统一的军队。这样，给蒋介石以财政援助的人就了解了这一情况。我又在美亚杂志上发表了更为详细的报道。这些报道将在本选集中发表。我无法知道我的揭露产生了什么效果。也许效果不大。那些与美国政府的联系比我更好的人，如控制对中国援助的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和史迪威将军，告诫华盛顿，蒋介石不是一个可靠的抗日盟友。但史迪威将军在蒋的要求下被召回，而那些国务院的专家后来也被麦卡锡清洗了。一九四五年初，在美国驻华代表全然了解的情况下，甚至在抗日战争还在进行的情况下，蒋介石开始使用美国装备打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起的二十年中，华盛顿明知蒋介石已经失去了中国，却继续给他财政支援。

战胜日本后，我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乘改装的无座美国军用飞机从旧金山到上海，对中国作第五次访问。这时正是人们所知道的马歇尔调停时期。蒋介石公开与中国共产党交战而无法取胜。马歇尔将军企图以调停的方式，把中国共产党从他们所解放了的日本占领地区挤走。就象现在华盛顿企图在越南所做的那样。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时，被日军对湖南的最后攻势所挫败的蒋介石，陷在中国西南部，没有美国帮助就不能赶到华北和沿海地带。而共产党的“解放区”从扬子江向北延伸到哈尔滨，从蒙古沙漠延伸到大海，只被日本和投降日本的汉奸、前国民党将军们所守住的铁路线和城市所分隔。蒋介石迅速重新给予那些投降了日本的将军以国民党军职，并命令他们守住阵地不让共产党前进。同时，美国武装部队命令日本军队，不向任何“非正规”的中国军队投降，并要他们守住阵地，等待蒋介石和美国军队的到来。在此期间，美国空军把蒋介石军队和政府官员空运到北方城市，并命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要夺取新土地，当然他们并没有服从。

“夺取城市，夺取铁路线”，这是朱德通过无线电从延安向华北和华东解放区发出的命令。乡村包围城市是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战略。它今天已成为“人民战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月中旬，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在华北占领的县城增加了一倍，并且正逼近上海。他们本可以在工人的配合之下夺取这个城市，但为了避免和美国发生冲突而克制了自己。华盛顿在没有能通过空运使蒋介石控制华北以后，派马歇尔将军来谈判。马歇尔在北京建立了一种名叫“执行总部”的太上皇政府，国共双方派同等人数代表参加，由美国人担任主席。在大约四十个争夺中的据点城市中，成立了“调停小组”，也是由国共双方代表参加，美国军官任主席。调停小组通过美国飞机与执行总部联系。这些飞机也运送给养、邮件和希望作战事报道的新闻记者们。

这一机构理应为双方安排停火，但实际上却不断把土地送给蒋介石。这里我暂且不谈这一点，也不评论美国飞行员拍摄华北和华东的详细地图，我只提请注意，这是所有认可的通讯社的记者第一次能够到中国境内所有争议地点旅行，甚至可以免费。

我立即决定，这种形势持续多久，我就在中国待多久，并尽可能访问更多的共产党解放区。

根据马歇尔一九四六年一月发出的“停战令”中所列举的数字，各解放区共有土地八十三万五千平方英里，人口一亿四千万，组成八个解放区。这些地区有共同的政策和邮政系统，但和外界没有接触。九个月中，我乘飞机访问了这些解放区，在延安住了几个月；还在蒋介石攻占前，访问了张家口；又去了刘伯承的中原四省和林彪的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的东北地区。

毛泽东根据对中国农民需要的分析，天才地制定了关于政府、经济、战略和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惊人有效政策：关于土改的策略转变；以适应新的形势，但始终坚持最终目标；关于可以让出城市以消灭蒋军有生力量的军事战略；关于政府的自给自养以及领导干部要在业余时间生产他们自己所需的部分粮食以及其他许多创造，这些我将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叙述。

历史上哪有一百万人的军队能从敌人那里补充兵源和军需品，从而能在二十年中不断壮大？毛笑着对我说：“蒋军士兵是很好的士兵。他们只需要一些政治训练。”在别人只能看见敌人的地方，毛在敌人内部看见了必须结为朋友的中国雇农。

一九四七年初，我随最后一批美国飞机离开了延安。“你必须立即离开，否则你就可能被切断退路，”毛告诫我说。“你不能去我们要去的地方。但是你现在已经掌握了我们的全部材料，并可以告诉全世界。当我们与外界再次取得联系时，你可以回来。”他认为这“大约需两年时间”。

当我离开延安时，我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我要度过后半生的地方。这里有许多原因，不可能在一篇序言中说清楚，但我希望能在以下几本书中说明。基本上是由于在延安的多次讨

论中，我觉得自己的思想开阔了；而在过去几年中我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在莫斯科受到束缚，变得僵硬。我说：俄国人现在正集中精力建设大俄罗斯，但俄国不是我的国家。中国人仍然在考虑世界革命，而我是属于世界革命的。因为世界包括并超越我的国家。

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动身回中国。当时我想这次可能是永久住在中国了。但我在途中却走了十年。

首先打扰我行程的是，在莫斯科等待出境许可证去中国东北达五个月之久。后来，俄国人把我当作“间谍”逮捕了，并通过波兰送我回国。此后六年，世界上没有任何共产党人愿意和我打交道。一九五五年莫斯科宣布我无罪，说以往对我的指控没有根据。于是，我重新与中国联系，并得到邀请，但美国国务院却拒绝给我护照。甚至为离开美国就打了三年官司。一九五八年八月我终于到达了北京。我是在十年以前就启程的。

在北京，我找到了我来中国所要做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向我的美国同胞介绍中国革命——特别是给参加反对当今威胁全人类的美帝侵略战争的新的、不断斗争的美国人以及给世界上一切对中国革命感兴趣的人。这些人的数目看来大大增加了，因为我正在以六种文字将我编写的《中国书信》送往我今后永远也不会访问的国家，送给越来越多我从不认识的各国人们。我还找到了生活和旅行的物质及社会条件，使我甚至八十岁还能亲自搜集材料并进行写作。我找到了曾经在延安时代激励过我的同志感情和清醒头脑。

除此之外，我找到了我未曾预料到的东西：我过去从未有过的广泛的读者，其中有些人生活在我几乎没有听说过的国土上，那里，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人民要了解“中国的道路”，因为中国也是世界的中心。

当我向中国朋友提出待在北京的要求时，我说：“我认为中国人民比任何人更知道人类要走的道路。我要学习和写作。”我仍在学习和写作，并且希望能继续下去。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广州的革命序幕

一九二五年秋

萧红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二五年末，我在莫斯科到温哥华途中访问了中国。我成了描写革命变革的作家，住在莫斯科，经常去美国演讲，并在途中停留，访问我感兴趣的国家。几年来，革命的力量振荡着中国：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推翻了北京的一届内阁；一九二五年上海的一次游行示威中，英国人枪杀了中国工人；同年发生了广州和香港的大罢工和对香港的抵制。于是，我决定去中国。

当我连日乘火车越过西伯利亚平原和大森林，沿兴安岭南下，到达哈尔滨、沈阳、北京时，我发现在苏俄的四年生活（在那里我负责把物资送到苏联，救济一九二一年伏尔加流域饥荒的灾民，后来又为无家可归的儿童组织农场）给了我一种能力，使我能认识亚洲，而这是一个普通美国人所认识不到的。我没有注意由神殿和古代皇宫构成的异国文化和奇怪的风俗、法律和宗教——那些使多数西方人感叹为“不可理解的东方”。我所看到的是许多民族组成的广大农民——俄罗斯人、布里亚人、朝鲜人、中国人。他们之间很相似，而他们与美国农民却不同。

由于原始生产方法，无法对付旱灾，广大农村受到饥荒的侵

袭；但农民们仍处于一家一户的老一套生产方式束缚下，多少世纪以来没有改变。从他们中间产生了大批工人移居到新建的工厂。在那里他们住工棚，没有家庭生活。所有这些条件都是原始生产方式造成的。现在这个生产方式正在这个地球的古老文明大陆上崩溃。铁路、工厂、西方工业文明，正无情地进入亚洲。它们以两种方式来到那里：一种是世界帝国主义在南方的赤裸裸的剥削，另一种是北方的俄国革命，而在这两种形式之间是不可调和的战争。

中国没有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政府。各省都有暂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军阀。北京实际上不是首都，而是强权国家外交活动的所在地。它也是一个又一个军阀加冕登上皇帝宝座的场所。如果伦敦或东京要一块中国土地，他们便在北京贿赂一位官员，取得他的签署。如果这样做不起作用，他们就扶植一名军阀上台，并控制北京政府一段时间，从而签订一项条约。这样就使侵占中国土地的行为在国际上“合法”了。

至于中国人怎么想，没人去问他们。他们有一句俗语！“政令不出北京城。”

在那个时代，三个军阀包围北京，并轮流执政。他们是张、冯、吴。日本的傀儡张作霖住在沈阳，过着人们称为“东方式的”豪华生活，意思是有很多小老婆和大量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他在用填制的老虎和价值五十万元的珠宝装饰的宝殿中，接见觐见者。我没有亲自去看过。

美国人对占据西北贫瘠地区的冯玉祥很感兴趣。美国传教士称他为“基督教将军”，并且赞赏他禁止鸦片和注重部队的纪律。因此，我去西北蒙古沙漠中冯玉祥部队的营地访问了两天。旅途中，一场暴风雪使我在没有暖气的火车上冻得要死。我见到了冯玉祥，一位沉着魁梧的人。他以令人厌烦但有礼貌的语调；背诵他的

工作纲领：“中国的第一大需要是推行教育，做到每个人都会读书写字。第二大需要是修筑公路和铁道。”冯玉祥让他的士兵成天忙于修路和整修土地。他把蒙古的土地划给士兵们作农田，作为劳动报酬。我还见到冯玉祥的妻子李德全。她后来成了北京的卫生部长。我们见面时，她还偶尔谈到四十年前在蒙古沙漠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冯玉祥所宣布的纲领使他本人在西方开明人士中很受欢迎。但老的“中国通们”风趣地谈论关于冯“背叛”盟友以及也被盟友所背叛的轶事。他们还谈到了他给政敌们致奉承阿谀的信件，称冯是“典型的中国人”。北京人嘲笑冯玉祥曾打电报给他的政敌张作霖说，如果张“需要人办事”，他愿把部队借给他。我问冯，他的部队能控制几个省。他得体地回答说：“我治理一省尚感经验不足。”实际上他手里抓着三四个省。尽管如此，冯玉祥是三位军阀中唯一对以后的历史起过作用的人。这方面情况我将在本书中作些介绍。

北京有许多学生。它是一座拥有几所大学的城市。外国居民被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伟大的“五四”运动所震惊。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对中国提出的无理要求，迫使北京卖国政府倒台。这件事告诉外国人，中国政府是虚弱的，但他们并未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学生是强大的。他们写信回国讲中国学生的情况，后来不再关心这方面情况而去干他们更有兴趣的事，如到旧货店购买珠宝和丝绸等。

我却爱上了北京。甚至在一九二五年我就说过：“如果我在这里有合适工作，我愿住在这里。”许多年以后，当人民解放军横扫华北，美国的朋友们等待解放军夺取南京并在那里建都时，我笑了。我说：“南京只不过是商业发达的上海的一个郊区。北京将成

为首都。”我并没有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任何内部消息。我只不过是了解北京罢了。

在北京，我遇见了在莫斯科认识的范妮·鲍罗廷，并常和她见面，直到她和丈夫悄然离去。那时，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去向。范妮告诉我，迈克尔·鲍罗廷是在华南成立的新国民政府的顾问；他是孙逸仙邀请来的。她说：“你一定要到广州来看我们。广州象征着现代中国。”由于一次大罢工，香港与广州间的交通中断了许多个月，广州也没有船可以去接上英国轮船。

她说：“我将要求罢工委员会给你一张入境许可证。”

一九二五年我从北京南下，访问了汉口的吴佩孚（不到两年我再次访问汉口时，它已成了“红色汉口”）。吴佩孚的后台是中国大商人和想在华中取得利益的外国。有些人说他“老实”，因为他把帝国主义给他的贿赂分给小军阀们，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吴的盟友比其他军阀多，但他们的关系不那么稳定。吴和他的盟友们经常在著名的寺庙中聚会“讲经”，实际上是进行了土地的分赃。吴向我引用了孔夫子的话，还对我说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有好有坏”。他希望有一天能隐退，在庙里“念经拜佛”。另外，他还在我的扇子上写了一首诗。

我沿江而下，到了上海。这座城市一半归英国，一半归法国。两个租界以外是“华界”。英国人从印度带来的高个子锡克巡捕，他们公开在街上毒打瘦弱的黄包车夫。帝国主义者在北京扮着外交使节的角色，行为比较隐蔽，而在这里却是肆无忌惮的。大家都对我说：“你不能去广州。广州被封锁了，那里在打内战。”想回广州大学的香港学生，不能正常地乘四小时火车到广州，而要绕道上海，用八天时间。

孙逸仙博士早在几个月以前逝世，但他的遗孀孙夫人是一位

文静、和蔼而又坚强的女人。在此后的岁月中，我对她更熟悉了，那时，她已用自己的姓名宋庆龄了。她告诉我，愿帮助我去广州。她说：“如果你从上海乘轮船去广州不去香港，就好办得多。但作为一名记者，两个城市都该去看看。我将写信给在广州的哥哥，请他帮助你。”

我首先去了香港。广州工人举行了罢工并以一条长达一百英里的纠察线封锁海岸达六个月之久。在这种打击下，香港快成死港了。银行濒于破产，向伦敦求援。这个城市每天损失一百万美元。领事馆的一位美国人对我说：“你知道采矿热过去以后的内华达州那鬼城吗？夏季进入以来我一直在想，这种情况会不会在英帝国的第三大港、东方的最大港口重演。”这就是以广州为基地的中国罢工工人的威力。

罢工工人破例让我去广州了解他们的革命。我乘英国轮船从香港到离广州海岸不远的一个岛屿、英国租借地沙面。傍晚，当轮船在离沙面不远的地方抛锚时，一艘小摩托艇从排列在广州岸边的成千舢舨中驶出，挂着一面镶有青天白日的红旗。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国民党党旗，此后它将在全中国飘扬。这时，我看见范妮·鲍罗廷坐在船尾。我迅速提起小箱子走到下甲板，跨入汽艇，在船员们惊奇的目光下离开。这是几个月来第一艘来到英国轮船接人的广州船。

正象我突然走出古老的亚洲，跨入现代世界那样，在整个华北，我被军阀们和奇异的礼仪弄晕了。我也开始说：“一个不可思议的民族，我们将永远不能理解。”但在广州，罢工是严厉的、无情的、明确的。这和西雅图、匹兹堡、伦敦、汉堡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有组织的工人罢工是一样的。这里不是异国他乡，而是我的家乡。

在汽艇上，范妮·鲍罗廷一开头就对我说：“我恐怕你要有一

位翻译或朋友陪同你。罢工委员会只给一个人许可证。”然后，她把和她同来的一位苗条的中国姑娘介绍给我：“这是辛西娅·廖。①你肯定听说过她的父亲廖仲恺。他是最近被暗杀的劳工领袖。我们马上去廖夫人家。妇女部执行委员会正在那开。

辛西娅·廖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二十一岁的姑娘，长着黑而柔滑的头发和一双灵活闪动的眼睛。她把一只柔嫩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道：“我父亲是广州老百姓中站在最前列的一个人。他刚制定好一项稳定货币和建立我省财政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杀害他的原因。我们的罢工和革命正在取得胜利。但我父亲的思想将永远活在工人们的心中。为了纪念他，我在广州基督教学院②学习蚕桑培育，因为他说过养蚕是我省农民的一大需要。”

我突然想起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廖仲恺”这个名字。一家香港报纸说：“那位声名狼藉的劳工领袖……把孩子送进了广州基督教学院……。”这家报纸主张，不让这种人的孩子进入正统学校，“因为他们会把别的学生带坏。”站在我身旁的这位穿浅蓝麻织衣服、连孝也没戴的廖小姐，就是会把别人“带坏”的姑娘。

在码头上，我们跨进廖夫人的深栗色汽车，驰过广州街道。辛西娅指给我看几条是孙中山加宽的街道，从而使广州已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她又指给我看回到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正在修筑一条尚未完成的凹凸不平的道路。这是他们赠给广州的礼物，感谢广州对他们的热情接待。这条路把广州和下游十一英里处的黄埔港口和军事基地连接起来。

她说：“罢工者正在加强我们的城市以使我们永远记住这次罢

① 即廖梦醒。——译者注

② 指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现在的华南农学院的前身。——译者注

工。”

廖家的屋顶上飘扬着一面旗帜。辛西娅把上面写的中国字“精神不死”翻译给我听，并说：“我们把它当作全家的座右铭。许多人写信来，谈到我父亲的‘不朽精神引导着人们前进’，因此我们把它挂在家门上面。”

妇女委员会正在廖夫人家里开会，讨论第二天群众大会的准备工作。廖夫人未经化妆的慈祥而悲伤的脸，克制着丧夫的痛苦，带着微笑前来迎接我。然后，她又忙着准备茶会。我们一边吃着美味可口的菜肴，一边讨论许多事情。一位曾在莫斯科学习过七个月的、长着诚恳而锐利眼睛的二十来岁姑娘和一个四十岁的知识界妇女、师范学校校长正在讨论即将举行的群众大会。另一些人谈论着最近黄埔军校学生夺取惠州城的胜利①，并且说现在是妇女们组织红十字会的时候了。

她们还谈到一次“海盗袭击”。我们到达前一星期，三艘伪装成广州政府的船，溯江而上，在一所教会大学附近抛了锚。他们放了一把火把学生引出来，绑架了五十名学生，然后从三角洲上的隐藏地点捎信给学校说：这次行动耗费了一万美元，要求得到偿还。

开会的妇女们一致认为“这次海盗袭击是香港组织的”，这帮海盗在香港的一个歹徒家里聚会。她们说，一切都必须恢复到原来的秩序；国民党改组和广州革命政府成立还不到两年。她们还说：“我们打败了三支反革命军队，巩固了本省四分之三的地方政权。现在我们必须肃清海盗。”后来，在一九二六年开始了北伐。

每前进一步都要通过斗争。甚至加宽广州的几条街道都曾遭

① 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东征军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三日战胜了陈炯明，攻克广东惠州。——译者注

到商人们的强烈反对，因为马路两旁的商店要拆掉或往后移。但街道加宽后，空气和阳光更加充足，商店更加明亮和卫生，货物可在门口装车，他们的财产的价值更高了，所有商人都获得了更多利润。于是，他们要求联合庆祝加宽街道的成功。“所以这些街道还是在这些商人和市政府合作下加宽的”，一位妇女这样说，眼睛里闪着会意的神情。

在第二天的罢工委员会上，我了解到罢工的经过，以及罢工和广州政府的关系。这次大罢工是以香港十万中国工人罢工开始的。他们要求“言论自由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废除对工人的体罚；中国人和英国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占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应在香港市政府中有代表。”无家可归、身无分文的罢工工人离开香港到广东老家暂且栖身。他们中间有四万人到了广州。当时广州已经成为孙逸仙建立的新国民政府的中心。鲍罗廷是孙逸仙聘请的正式“顾问”，因为他有丰富的革命知识。

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党在一九二四年一月改组，接纳对组织工农群众有特别兴趣的共产党员参加。许多广州商人，由于三十年来竞争不过他们的对手香港，也同情新国民政府，参加了合作。广州政府把新近清除赌场空出来的房屋以及五六个被驱逐的军阀留下的兵营给罢工者居住。这样，罢工工人就以广州为基地沿一百英里海岸线设下了由一千五百个纠察队组成的对香港的封锁线。

海员工会，是罢工工人的主要领导，它是最早组织的现代工会。苏兆征是海员工会和大罢工的主席。他告诉我：“一百四十个工会参加了这次罢工。这不是一次种族斗争，也不是一次中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斗争。请转告西方的工人们；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

可是，罢工工人和广州政府的统一战线是不巩固的。虽然工人们正帮助广州政府统一全省。但身穿绫罗绸缎的官员们对工人的力量感到不安。工人们也厌恶这些官员们的模样，但要利用他们对罢工者的接待来反对英国剥削者。广州的气氛就显示出有摩擦，但目前还有权威。这样，联合能持久吗？

我就这个问题征求鲍罗廷的看法。他说：“短期可以。商人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即他们能控制的政府。他们希望消灭土匪，修筑道路，兴办工厂，稳定币制和采取其他有利于贸易的措施。这样，他们与英帝国主义发生了矛盾，而被剥削的工人和英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中国大家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我表示了我的看法异议。“但人们对如何才会取得稳定的政府和谁控制这个政府却持有不同意见。上海和香港的所有资本家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他们抱怨说，中国的混乱局面妨碍他们做买卖。”

鲍罗廷笑着说：“是这样，但这种混乱局面使外国人控制了所有商业。中国越乱，他们越能凭借自己独占的安全地位，从香港和上海获得利润。军阀们把军费存在外国租界。百万富翁跑到租界去避难。中国船想挂外国旗，向外国人表示敬意。中国的混乱使外国人得以掠夺中国。”

我没有被说服；我认为他讲的话自相矛盾。我将记住他这些话，看看以后的岁月中事情将如何演变。

在广州，我去参加了一千五百名妇女的群众大会。他们要我谈谈俄国的情况。我想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些面孔，严肃的斗争面孔？我猛然想起了从多次轰炸中活下来的基辅妇女参加的一次大会。我向广州妇女谈了俄国革命前的情况：愚昧的农村、家长统制的家庭、被奴役的妇女、军营般生活的工厂。我谈到一位莫

斯科纺织工人杜尼娅革命前后的生活。我谈到她的工厂的妇女们如何开办一所医院、一所工厂食堂，用经理住的房子开办了一所日托托儿所。

这些广州妇女比任何美国听众都能理解俄国革命。这也许是她们自己有过的或可能有过的生活。我回想起廖夫人说过：“由于受传统思想束缚，我们中国妇女觉醒得慢，但一旦觉醒，就变得坚贞不渝。”

在广州停留四天后，我去美国作巡回演讲。我知道，我应该在远离中国革命的地方，关注着中国革命，并将使我再次回到中国。

第一卷 华中地区的 群众暴动

一、在上海停留

一九二七年五月

甚至远在太平洋行驶的宽敞豪华的美国轮船上，我们已感觉得到正在临近中国的影响。我们是在沉默中很奇怪的感觉到的。在船上看不到任何有关中国的新闻。船上印的报纸，其内容主要是笑话、甲板上的体育或桥牌比赛；也有关于密西西比河的水灾、洛杉矶的离婚案、芝加哥的谋杀案、毫无希望的日内瓦会议的报道，但只字不提中国、日本和任何东方国家。可是，当我们离开旧金山时，报纸的头版充满了宁汉分裂；越来越多的军队从英国往华开拔；巡洋舰从美国太平洋海岸驶往中国出事地点，那里的争端可能意味着世界和平或世界大战。在船上毫无中国的消息，是否就说明一切都已平静下来，再也没什么新闻价值的消息了？

后来，我知道了沉默的原因。船快到横滨时，一位乘客问船长为什么没有从东方来的新闻？船长笑了笑说：“我们收到了消息，但没发表。我们的船员是中国人。这帮叫花子对政治问题很激动。如果我们公布有关中国的

新闻，他们就会不做工作而在一起讨论中国革命了。由于同一原因，我们不把日本的消息编集，借以制造一种印象，我们和东方没有无线电联系。我们的船员主要是这帮好激动的广东佬。如果他们为了南京——汉口的事打起来了……好吧，晚安！”为了使船开得快，使无忧无虑、满不在乎的乘客们舒适，我们的船长竟以如此无情的美国效率对待他的中国船员和他们的革命。

船的一等舱很空，因为旅游行业已停止组织去中国的旅游活动。但从中国驶回的同一条轮船公司的船只却拥挤到几乎超过了安全限度；乘客们睡在餐厅和走廊里的帆布床上。他们是在中国发生大风暴前夕，离开中国的外国人。往东的乘客，主要是去菲律宾的美国商人。大家都在猜测，是否能象往常那样被允许在上海停留半天，购买东西和游览观光。船上的旅客们在得知我不但打算在上海停留，而且，如果可能，还要到上游的汉口去时，他们认为我有些神经错乱。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底特律飞机制造公司的一位旅行推销员；他想去中国兜生意。他不在乎把飞机卖给哪一方，因为他不是对中国有明确政治见解的英国人，而是只对赚钱感兴趣的美国人。他愿意把飞机卖给任何一位将军，只要他拿得出硬币来。他甚至异想天开，想乘他的飞机去汉口作一次飞行表演，捞一些传说那里很多的俄国金子。当一位熟悉中国、老于世故的乘客告诉他，如果汉口方面发现一架飞机从上海方向飞来，很可能先把它干掉，然后再问这是什么飞机。于是，他天真的梦想破灭了。

在上海登陆比我们预料的简单得多。而中国乘客的确有麻烦；他们担心会扣留他们，调查他们有无激进的政治倾向。我们这些外国人是上帝的宠儿。海关官员们甚至连护照都不打开，只望一眼我们美国护照的红皮封面，就手一挥，让我们通过。街道上，

我们发现黄包车夫很乐意为一角或一角五分钱，拉我们到离码头不远的旅馆。我路过专为“白种人”开放的外滩公园，看见公共租界用铁丝网和沙袋筑成的路障，不但不让华界的，也不让来自法租界的“不受欢迎的中国人”通过，法租界为了报复也不让住在公共租界的“不受欢迎的中国人”通过。每隔不久，我就遇到成群结队的士兵。回头就能望见在阳光四射的港口水面上，排列着许多国家的战舰——钢铁铸成的“国际废品堆”。（第二章）

在轮船上，我曾见到一位鼓吹中国现代化的人。他以介绍白话文代替古文而闻名。他说，这样做使普通人都能学习知识。然而，在政治上他不是一位革命者。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被农民和工人提出的不可理解的“粗暴”要求所困扰。他相信谣言：共产党人正在煽动湖南农民，“农民要把每一个有大学学位的人都杀掉”等等。他的朋友曾经劝他不要回中国，继续在外国避难，讲授中国的民族主义。（第三章）

他说：“有些事正难以理解。我的朋友们多数是站在南京方面的，它似乎会赢得这场斗争。然而他们充满怀疑，对前途很不乐观。在这个国土上，到处都有内乱。据说某些省属于南京，另一些省属于武汉，在所有这些省中都有集团间的斗争。”（第四章）

他告诉我，在日本停留的十天中，许多人来向他打听中国情况，来访者的名片多达五公分厚。（第五章）

“日本人十分同情中国国民党，以致他们迫使他们的政府采取不干涉政策。”他这样说，也似乎相信这一点。（第六章）

这位美国化的中国教授认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三位老人参加南京政府。他们是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和学者，有得到公众信任所需的“道义影响”。三人之外，再加上蒋介石的军事才干，以及他认为有把握立即参加南京政府的宋子文的理财能力，就有可

能形成中国的有权威的“重心”。他只字不提解决农民的饥饿问题，也不谈满足操劳过度的工人的要求；这不是他熟悉的生活过的世界。但他强调那三位老人都是“年逾花甲”的学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威信。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位教授虽然是文坛上掀起的一场革命的倡导者，但他总的来说显然不是渴望革命的变革，而是希望效忠于一个稳固的、坚定的、可敬的政府。他说，除非这样一种“重心”能在南京确立，中国至少要乱十年。

我在上海还遇到许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我参加了“妇女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这个委员会是由蒋介石指定的九名妇女组成的，负责妇女团体的事情。它的目的是要使妇女团体得到群众尊重，使华中地区突然觉醒起来的年轻妇女们从放任的红色革命狂热中解脱出来。“妇女委员会”的九位委员中，五位曾在美国、日本、法国和德国留学。这个事实本身说明她们属于享有特权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国姑娘出国留学是非常少有的。其中一位有很动人的叛逆历史。她是一家五个孩子之一，曾经拒绝缠足，十四岁时反抗家庭为她定亲，后来又在北京带着炸弹去炸死满洲大官们。但她的反叛仅仅是为了自己出身的名门显族去反对满清，为了争取个人所喜欢的权利，她对“妇女权利”非常感兴趣，曾经送四十位中国姑娘去法国留学，学习法律、医学、蚕桑、接生等。她自己是法律专业毕业生，现在是中国的一位著名法官。“妇女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是“争取平等选举权联盟”和“禁止鸦片协会”的代表。这些聪明的、可敬的、渴望为改善中国妇女处境做些工作的妇女，给每天屠杀劳工领袖的政权装璜了一个象样的门面。她们无视这样的恐怖行为，说这是为了“恢复秩序”。她们这样做是不难的，因为她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中国苦力和农民的悲惨生活。对她们来讲，在湖南的革命暴动中，农民杀死一个地主或学者比在白色恐怖中反动派

绞死二十名工人可怕得多。在她们的充满阳光的办公室墙上，贴着印成的标语：“消灭文盲”、“保护劳动妇女的劳动权利”、“改革家庭”。夹杂着在这些标语里面的还有：“打倒共产党”的标语。

星期天一早，军乐队的喧闹声从窗外传来。这时，我想起教堂曾宣布将专门为军队举行礼拜。于是，我便去看看上海的宗教生活。我走进英国人和美国人做礼拜的新天安堂，这是无宗派色彩的基督教教堂。身穿蓝、白色制服、容貌整洁的年轻水兵占据了教堂三分之二的座位。他们年轻、天真，对世界政治一无所知，从遥远的国土来到中国，做他们受命去做的事。牧师证道讲天父上帝，作了长篇理论分析。他向这些孩子们讲了家庭以及一个无所不在的天父，他对他们在上海的要求，如同他们在家时母亲对他们的要求是一样的。他尽力不让他们被东方的酗酒所毒化和妓院所诱惑。但他从未提到上帝也是中国人的天父，这可能在这些顺服的、爱国的心灵中制造窘态。

我还乘黄包车迅速地前往英帝国圣公会的圣三一堂。车夫乐意为赚八分钱拉我到那里。教堂周围阳光普照的草地上，身穿咔叽军装的英国军官们在溜达。在庄严而美丽的教堂大厅的座位上，坐满了穿笔挺军装的英军官兵们。最令人吃惊的是，在每排长座的边上，安放着半打步枪。

尊敬的牧师，身穿黑色圣衣，站在崇高的圣坛讲道。他讲的不是上帝是人类的天父，而是“缔造了英帝国的上帝，而这位上帝今天仍然赋予英国以重任，在今天世界上有所作为。”

他敦促听道者在这个拥有各种精神和物质引诱的东方城市中要抓紧两个思想：

第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或面对任何新思想，要“依然如故”——要和在英格兰的小城镇和乡村时一样。在整篇讲道中贯穿

着一种坚定信念：所有变化都是邪恶的，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要能“依然如故”并永远保持英国化，这是上帝的旨意。因此，西方人要锻炼自己，抵制物质上的诱惑和更加狡猾的东方新思想的诱惑。

第二，他嘱咐听众们牢记：“英帝国依然如故”。在讲到这方面问题时，他有点不大愉快，他得为英国作许多辩解。只有牵强一些才能把“如故”一词用于英帝国。他曾谈到“除非在英国内的人们不能保持旧传统”。我知道他担心的是英国的劳工。最后，他大声疾呼号召那些坐着听道的英国官兵要“担负起光荣帝国所赋予的职责”。他说：“英帝国是上帝缔造的，上帝还要这个帝国在世界上继续有所作为。”他从宗教上认可了干涉行为，并以高唱基普林的退场赞美诗^①结束这次讲道。在这首赞美诗中，上帝和“漫长战线”、“棕榈树和松树复盖的疆土”以及“无法无天的野蛮人”纠缠在一起。

那天，我还去了上海的其他几个教堂。圣约瑟夫天主教堂在法租界边界地带。教堂里，中国人和法国人、英国人、爱尔兰人在一起，高唱圣歌圣诗，感情上完全融合一致，不需要理智的抉择。俄罗斯正教教堂耸立在上海旧城，现在窗户破碎，空无一人。那里的神父深知革命要把他们驱走，早已急忙地把教堂中的祭坛、圣像搬走，在法租界建立了一个新的教堂。

整个星期天下午，我在用铁丝网和外国租界隔开的中国旧城里漫步。我发现许多过去战争的遗迹和目前军队占领的标志。靠

① 基普林(Rudyard kipling) 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小说家和诗人，以歌颂英帝国主义和描写侵略印度、缅甸的英国士兵闻名。他的退场赞美诗是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皇登基六十年写的，诗中充满帝国主义使用的词汇。——译者注

近北火车站有一大片烧焦的土地，说明那里发生过最激烈战斗。我们走过一些孤儿院和教堂，已被蒋介石部队占领。外国租界内的儿童保育院和学校，也被外国军队占据了。英国军队驻扎在一所很大的、漂亮的孤儿院内，把衣服晒在窗外。所有适合驻军队的建筑物都用来给军队用。除了外国人使用的教堂以外，宗教、教育、儿童保育，都让位于刺刀和步枪。

我没有见到上海的任何劳工领袖。国民党通讯社的记者美国人威廉·普罗梅给我泼了冷水，叫我不要去寻找。

他冷冷地说：“如果蒋介石还没有找到他们，你恐怕不可能找着。”他还说：“你找他们还可能给他们带来危险。”

的确，这样做对我没有害处，因为我是美国人，中国当局不能逮捕我；可是这会给我要寻找的人带来危险。到处可找到镇压的证据。我打听国民党办的上海大学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年半以前，我曾访问过这所大学，并在那里作了一次演讲。现在人们告诉我，这所大学已被查封，我不能找到以前的教师了。

报纸每天都在报道：“被指控的共产党人”在英国的默许下，在沿江而下的英国船上被中国军事当局逮捕。这是在英国的纵容下进行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朋友们对武昌文华书院^① 韦校长被捕感到很不安。韦是一位保守的基督教徒，曾在这所大学中和共产党人作斗争，而现在他自己却被蒋介石当作共产党员逮捕了。韦校长的有势力的朋友们营救了他，而在同一条船上被捕的其他五六名学生和知识分子，却被民事法庭转交给了“军事法庭”。从此便杳无

① 指私立武昌华中大学。该校是一九二四年二月由前武昌文华大学、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与汉口博文书院大学部合并而成。校长韦卓民。——译者注

音讯了。

人们唯一能接触群众生活而又被允许继续开办的机构，是象基督教青年会那样的慈善团体。我访问了浦江对岸新建的浦东工业区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棚屋”，发展起来的工业区。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集中了农村和城市最不舒服的条件。工人们挤在狭小而肮脏的陋屋中，那里没有阴沟和自来水。停滞的小沟中的粪杂着污泥的绿水流入河流。基督教青年会在那里挖了口好井，免费供应附近的居民，受到普遍欢迎。人们成天排着队领取净水，并把水运往远处的住所。十万人口的居住区，只有一所小学和一所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学校。一位青年会干事抱怨说，要孩子们留在学校读书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的父母很穷，只要有机会把孩子送进工厂，哪怕每天挣上一两角钱，也立即叫孩子退学。基督教青年会还举办“经济但又体面的婚礼”，因为穷人家不能按中国传统习俗结婚，那花钱太多，按那种方式结婚，必须有乘花轿，烧香点烛，吹吹打打；请算命先生选择良辰吉日离屋、上轿、下轿等等。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新式婚礼，有一个证婚人就行了。在浦东的棚屋里，三对男女以这种方式结了婚，但多数姑娘不喜欢这样简单的婚礼，因为她们认为，除非坐轿子，她们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我向这位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打听了浦东区工会的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工会已停止活动，因为政府正搜捕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他说，五年前浦东办了一个工会，但现在已被迫“转入地下”。国民党来时，工会“一涌而起”。他们接管了公立学校和英美烟草公司的学校，缴了警察和北方军阀部队的枪。

他说，“学生们和工人们一起冲击上海的各警察局。但在浦东，工人单独行动，没有外来学生参加。他们的全部武器就是一、二十支短枪。但他们从丧魂落魄的国民党士兵手中夺取了约二百

支步枪。他们把地方政府设在一所医院里，并且宣布他们有权管理这个城镇。上海方面委派了一个警察局长来到那里，但工人们拒绝接受他们，说他们有自己的警察局长。工会是一支很强的力量，对蒋介石政府不很友好。因此政府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且杀了他们十到十五人。工人们掌权时，也枪毙了一些人，大约七八个，都是他们痛恨的工头。”

这就是我在脏得可怕的浦东听到的上海发生的事的简要的叙述。我还从许多记者那里听到整个上海这个城市的革命情况。在国民革命军到达前许多天，工人们举行了起义，夺取了警察局和军火库。“这次行动的计划和组织是很出色的”，一位美国领事馆的官员这样说，暗示工人这次行动一定得到了苏联军事专家的帮助。我了解到，工人们曾经把政权移交给国民革命军，并列队欢迎他们。但不久后，蒋介石就开始镇压和屠杀工会领袖了。当我表示希望了解更多情况时，当地的人要我去汉口找劳工领袖们。他们说，“活着的人多数已逃离此地或去武汉出席全国劳动大会了。”

二、溯扬子江而上

我在上海遇见的每个人几乎都劝我，如果我希望看到真正的革命，就赶快去汉口。美国副领事看了我的新闻记者身分证后，告诉我多数记者都在“扬子江上游”。我微微一笑，问他是否禁止我上那儿去，因为我知道领事馆一直在劝告美国人撤到沿海城市去。他迅速回答说：“我们不鼓励美国人到那里去，但你们记者有自己的行动准则。”

刚从汉口回来的《福斯报》^①的德国记者萨尔兹曼对他在那里看见的革命充满了羡慕之情。他说：“别在南京浪费时间了。南京不革命了。南京将被上海的英国人和中国富商实行妥协而送终。汉口将会生存下去，如果人死了，至少思想还会活着。即便汉口被镇压下去，它也将载入史册，而且还会东山再起。这种思想是什么？共产主义能最确切地说明它。我不能作详细的说明。共产主义是一切革命的

^① 应为《Vossische Zeitung》。此报已于一九三四年停刊。——译者注

支柱——长期受压迫的群众突然有了理想。

宋子文是国民政府的年轻财政部长。在这个部的管理下，广州曾经建立了暂时稳定的币制。这时，宋子文还没有宣布他站在国民党分裂的哪一边。他也私下要我去汉口。我不止一次在法租界孙逸仙博士故居拜访了他。他身穿一件考究的青灰色中国长衫，看来完全脱离了战争和革命的严酷现实。然而革命却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他已不象一年半以前我在广州认识他时那样。那时，他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能干地为国家在建立一个财政制度。现在，他是一个被犹豫和疑虑折磨的人。他眼看着自己的中央银行被同党的军人夺去，文职人员被赶走，财政金库被破坏。他也吃了共产党的不少苦头。有一次在汉口，愤怒的工人几乎袭击了他。

宋是一个上海商人家庭的保守成员，在美国哈佛大学受教育。他本能地喜欢商人，不喜欢共产党人和工人。他显然注定要成为上海的一个商人。如果他未遇见国民党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并深受其影响，他无疑会走这条路。革命给宋以威信，给他以建立国家财政的机会。是封建军阀毁了他的成就，掠夺了他的金库。因此，如果宋不喜欢共产党的话，他也恨军阀，因为军阀们比共产党更加不要建立国家银行。汉口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但提供了重建国家财政的机会，而且汉口高举文官控制军人的旗帜。因此，他向往汉口以及汉口所提示的他可以成功的机会，而且他知道汉口正等待着他去完成这一工作。但他不敢到那里去；他和蒋介石将军以及上海的商人们有千丝万缕的个人关系。

他对我说：“去汉口吧，越快越好！南京没有什么可看可听的。除了漂亮话和旧中国的无能外，什么也没有。在汉口你将看到有趣的社会变革，如禁止白银外流，武装工农等。”他一再要我转告他姐姐孙逸仙夫人和老朋友鲍罗廷，一旦他能摆脱蒋介石，他立即来

汉口，和他们在一起。他告诉我，他的住宅被监视，如果他要走，人身安全会遭受威胁。他曾三次买好车票准备走，但最后都退了票，他害怕。看来他是诚恳的，眼睛里有痛苦的神情。但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无意间吐露了真情，他说：“再见吧，我们在北京再见。”这时，我才知道他正在等待着安全的时机到来，不仅是指对他的生命，而且也对他的声誉安全。

当他终于来到汉口时，他是作为蒋介石的代表来谋求妥协的，谋求汉口与他那天以尖刻的言词批评过的政权间的妥协的。也许他一直是蒋的代理人和一个自觉的伪善者，也许他的过去使他成为一个懦夫，也许他认为重新联合能挽救中国的民族革命。从几次谈话中，我清楚了解到，他知道革命和革命的党在汉口，而且汉口也需要他去工作，但他徘徊在两条道路之间，终于没有选择革命道路。他身穿洁净的青灰色长衫，住在法租界的小别墅里——孙博士曾经居住过的圣地，企图和一个很反动家庭的漂亮女儿结婚，以消除他的失败情绪。

唯一不劝我去汉口的人是那些十分接近或与南京政府有关系的中国官员。伍朝枢是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他的有名望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份投资在外国租界的财产。他的个人利益促使他一直反对任何过激行动。他竭力使我相信汉口“完蛋了”。王正廷是在国民党和北京政府间摇摆的一位美国训练的知识分子。据说，他是作为冯元帅的使者来上海的。他告诉我“鲍罗廷已经逃走，孙逸仙夫人正沿江而下。如果你溯江而上去汉口，你会错过她的。”当我告诉他，孙夫人打电报邀请我去汉口时，他显得有些不安。他之所以不安，或者是因为听到了这个消息，或者是由于我说话不讲究方式。

有关汉口的各种新闻沿江而下。“裸体女人游行”是最为轰动

的谣言之一。来源不明的谣言传说，汉口妇女为了庆祝获得新的自由，组织裸体游行。甚至连游行的细节也报道了，说什么官员们将检阅准备参加游行的妇女，只接受体型美的。这是一个独特的下流谣言。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在炎热的夏天，成年男子和男孩可以上身赤膊，但他们要求妇女保持庄重。

一位几乎被中国的所有教会辞退的名誉扫地的传教士，拿出一份复写的所谓湖南来信。信中说：“根据新法律，所有超过十六岁的姑娘必须在一个月内结婚，否则政府将配给丈夫。”同时，他拿出一张所谓国民革命军女宣传队员穿的衣服的照片，这件衣服是非常奇异而不庄重的、几乎什么也遮不住的游泳衣。和这些荒诞的传闻混杂在一起的是许多有点根据的传说，如工会和农会没收了外国人的财产等。

为了抵制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上海的一些自由主义者，主要是美国人，传播他们从上游能得到的正确的消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些开明干事油印了一些武昌墙上贴的革命布告。她们不但把这些材料送给上海的朋友，而且以私人信件寄往美国。她们也催促我去汉口，并说：“那里有我们在中国从未见到过的新的革命精神。”他们张贴的布告的确表现了一种新精神。从未有过胜利的军队在攻占了城市后会散发宣言，人民和士兵们“团结起来”。请看这张布告：

十五军军部告武汉人民书

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才攻克此城，使你们遭受痛苦，谨向你们表示歉意！十五年来你们深受北洋军阀压迫之苦，四十天来又受围城之苦：忍受饥饿，惨遭掠夺，担惊受怕。值此双十节之际，我们祝贺你们在青天白日旗帜（国民党党旗）下获得自由。虽然我们为攻克此城感到高兴，但对

人民遭受的痛苦感到十分难过……。

革命军队必须为人民解除痛苦。我们和人民是一家人。我们要同甘共苦，克服困难，争取过上好日子，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革命之光已普照武昌，浙江已解放，福建已攻克。我们能够解决湖北的一切困难……。

帝国主义和军阀一定会在我们面前灭亡！

下面是又一文告，是第四军致武汉人民书：

“以前，你们见到士兵就象老鼠见到猫，吓得不能动弹。你们逃不掉就哀求说：‘最尊敬的先生’。现在担惊受怕的时代已经过去。你们可以在青天白日下游玩。我们第四军的士兵来自工厂、田野、商店、学校……。因为受压迫，我们才参军。虽然我们和你们穿的衣服不同，但我们可以有相同的思想。我们不再是‘最尊敬的先生’了，我们是你们的战斗朋友。希望你们广泛宣传：联合起来，和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贪污受贿者、大地主作斗争。……不要为了眼前的欢乐而忘了敌人和过去的痛苦。

为召开国民会议而斗争！废除不平等条约！联合起来！”

下面是第四军提出的较为具体的纲领：

“我们已攻克武昌。我们必须：

保护商业！

废除苛捐杂税！

确立人民的言论自由！

保护人民团体并促其发展！
召开国民大会！
任命廉洁奉公的官员！
执行人民意志！
大家团结起来，参加国民党！
打倒吴佩孚，打倒帝国主义！
这些就是从武汉带来的表达革命精神和宣传革命纲领的布告。

从上海往上游开的有三种轮船。英国船每星期开三次，在炮艇的保护下，结成船队缓缓而行。没有英国海军舰队司令的特别许可，不载女乘客。日本航船不拒绝女乘客。作为东方人，他们缺乏那种认为妇女的生命比男人的生命更宝贵的英国骑士思想。但由于缺少从汉口下运的货物，他们的船已经停开了。剩下的是德国船。这些船也载女乘客，这不是因为缺少骑士精神，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汉口绝对安全。尽管汉口的酷暑已经开始，而且战线后面的山间避暑胜地没法去，所有德国商人都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住在汉口。

德国轮船公司没有定期的长江班轮。有时从日本经过中国港口、绕印度洋到汉堡的远洋货轮不在上海靠岸，直接从扬子江口的小城镇吴淞溯江而上去汉口。因此，我得以乘坐“萨克森”号德轮去汉口。这艘船没有武装，也没有任何炮艇护航。这使英国往往以炮艇护航显得有些可笑。德国人也乐意停船接受中国地方当局的检查，因为他们接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但英国、日本轮船和偶尔开来的美国船，坚持不受检查。因而往往由于接到信号后不停船而遭到炮击。他们便用轮船上所装的炮还击，准备发生“事故”。

德国船通过战区时，唯一的保护是船两侧用油漆写上四个大

字：“德国商船”。由于有这个标志，德国船只能在扬子江上平安行驶。当我们靠近任何一边江岸时，乘小船捕鱼的农民或士兵都挥舞着帽子向我们友好致意。有一次，南京与隔江的浦口之间发生了混乱的炮战。当一艘德国商船靠近时，他们双方停止了射击，让这艘船通过后再交战。这就是中国人对非战斗人员表现的礼貌。

十二位乘客中除一人外，都是妇女，她们都是不能乘坐定期的英国轮船的人。与我同桌吃饭的一位俄国姑娘是汉口电话局雇用的一个管理人员，是被雇用的一个专家。她告诉我，她为什么离开汉口而现在又回去。她说：“那里的工会太凶了，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根本无法管理电话局。因此我对我的上级说：‘我要去度假。局势平静一点再打电报给我……’现在他打电报告诉我，工会不那么强了，所以我回去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的有关汉口正在变化的暗示。

和我同船的是一位在汉口住了多年的德国妇女。当她告诉我这一点时，她补充说“这是不幸的。”我问她为什么她认为在汉口的生活是不幸的。她回答说，生活非常枯燥。她又说比汉口更枯燥的是九江（在汉口下游的一座城市，那里的英国租界也被中国人占据了）。她见我对她讲的情况感兴趣，于是解释说：“除了赛马场外，无处可去。没有戏院，只有两家电影院。原来还有个乐队，但‘这次动乱’后离开了（汉口体面的外国人用‘动乱’来指中国人占据英国租界）。”她接着说：“如果你想散步，只有两个去处。要么沿江岸走，要么去赛马场。……真没意思。”

但这是我那时正要去的地球上最激动人心的地方。那里正在进行着一场赌博，它将决定以中国为战场的英俄战事问题。那里，在贫困、封锁和各种力量冲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经过痛苦和斗争，铸造着未来中国的模式。然而，她却说：“枯燥，非常枯燥，只有

九江比它更枯燥。”

载着我们这些妇女的轮船平安地向扬子江上游驶去。我们知道正在进行内战，但沿途却看不到战争的迹象。我们懒洋洋地望着太阳从黄色的江面上冉冉升起又徐徐降落。从江面开阔、波浪滚滚的吴淞口起，南北两岸逐渐靠拢。不时看见江面蒙眬远处的英国或美国炮艇在游弋，这些炮艇也显得平静和懒散。在扬子江口，后来在南京的江面上，有南京政府的小军舰在巡逻。我们离开上海以前，报纸上报道了英国和苏联之间谈判破裂^① 和国民革命军正乘火车沿两条铁路迅速北上。但在我们的德国轮船上，仍然是按时打铃宣布正常的开饭时间；在凉爽的夜晚，留声机放出音乐，请旅客们跳舞。南京和汉口间的江面上看不见中国船。但，几十条做买卖的小帆船却在江面上重新出现，近岸的水面上也有一些渔船。到达汉口三小时前，我们经过一个小村子。村子的山头上正举行一次游行，当时正好是五月三十日——上海大屠杀的周年纪念日。山顶上设了一座讲坛，周围挤满了穿白衣服的人群。二十多面红旗在天空中飘扬。我们能看清其中一面红旗上写着“苏联”字样。但多数旗帜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几个小时慢吞吞地过去了。在这段时间中，华中地区的烈日越来越猛烈，警告我们七月份可有酷热的天气。我们乘坐的轮船，经过美孚油公司的储油库和各色各样的外国工厂，出现在外国战舰林立的汉口江面上。我们慢慢地到达码头，到达这个被外国人普遍称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首都。可是正如那位女电话管理员所说，在那里工会正在失去权力，红色正在消退。

① 指英国与武汉政府间的谈判破裂。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英使馆派驻汉口代表牛顿，致函陈友仁，责陈不能履行诺言及缓和反英运动，认为无继续驻汉之必要，即回北京。”（见《民国大事日志》）——译者注

三、汉口的红色力量

一九二七年五月，汉口以“红色汉口”闻名于全世界。它是国民党左派政府所在地，地处扬子江与汉水会合之处。隔江相望的有三个城市连结在一起，汉口是其中之一。宽阔的扬子江，在冬季的风暴中也汹涌澎湃。江的对岸耸立着古老的武昌城，几个世纪以来省政府都建立在此，也是大学集中的学府。国民革命军经过长期、激烈的围城战斗才攻克武昌。在此期间，许多居民死于饥饿和流行病。国民党人把这座城市作为他们新省政府的活动中心。在武昌的省会堂召开了第一次省农民大会；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就是在它附近发动的。邓演达^①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宣传部曾从武昌散发了成千上万的五颜

① 国民党左派。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政治主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农民部部长等职。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发生反革命政变后，他辞去了国民党的职务，组织了一个工农党。后来，被蒋介石分子杀害。——译者注

六色的传单

汉口以西，隔着挤满帆船和住家船的狭窄的汉水，是汉阳城。它以兵工厂和炼铁厂闻名，是革命战争的支柱。汉口这座半外国式城市是国民政府为与各国保持联系而设置的那些部门的所在地。这里有财政、外交、铁路管理部门、英文官方报纸以及高级顾问鲍罗廷的办公室。这三座城市合起来构成武汉。设在那里的国民党政府因此被称为武汉政府。

汉口之所以对革命政府重要是因为它是华中的主要工商业中心。它是北方的麦子、南方的米、茶和芝麻，桐油以及许多热带谷物的集散地。这些产品从上千英里以外的内陆通过在这里会合的三条河流送到这里。这使汉口对外国也很重要。外国租界占据了该市主要沿江地区。名为外滩的一条美丽的现代化大道沿江延伸约两英里。靠江一面是各外国轮船公司的码头。靠岸一面是高大的现代化银行、办公大楼和公寓。这个地区过去被外国政府控制。日、英、德、法、俄等国都为自己划了一个势力范围并设立了自己的政府。德国租界在世界大战后被协约国废除了；俄租界在俄国革命后放弃了；英租界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冬被组织起来的工人收回了。所以人们称这几部分土地为前租界。在高楼大厦和宽敞街道组成的外国租界后面，是拥挤的华界。租界三面被华界所包围，一面临江。

我应邀和孙逸仙夫人宋庆龄住在俯瞰外滩的中央银行顶层。身着军装、配戴“青天白日”党徽臂章的两位匀称的小个子士兵保卫着大楼入口处。他们保卫宋庆龄和银行的财产。在我们住的套间的顶层楼梯口，站着另一位不带步枪的士兵。我到达时，他总向我敬礼。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什么重要人物，而是他认为任何拜访宋庆龄的人都可能很重要。大楼周围是宽敞的花园，原先是俄

新银行主人在这里打倒；现在是宋庆龄的援助国民党伤兵组织红十字会而举行茶话会的地方。

中央银行本是作为国民党的政府银行，其处境不佳。由于这个地区的频繁军事行动，汉口时而和北方隔绝，时而和南方隔绝，时而和扬子江上游的西部各省隔绝，多年来无法获得内地的物资。除经济困难外，又发生了财政困难。武汉政府与蒋介石分裂时，中央银行在广州的白银储备被夺去。武汉政府财政赤字日积月累。汉口地区本来就缺少银元，因为当地商人把银元收藏起来，各外国银行又把银元运往上海，致使革命政府处境窘迫。每天早晨，我看见窗外数百名苦力排着队，等待提取支付工资所需的大量铜币。每人提取的数量不得超过价值五十元的铜币，当然这已是非常沉重的一口袋了。

孙逸仙夫人宋庆龄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温柔和最高雅的人物。她身材苗条，穿着清洁的亚麻布旗袍，举止谦和端庄，和粗暴的革命斗争似不相称。她出身于上海一个富有的家庭，曾就读于美国女学，因而任何极微小的失礼行为也会使她感到难受。然而革命需要她，她献身于革命，不仅出于对革命的忠诚，而且因为她也是数百万中国老百姓出于她是孙逸仙博士的遗孀而对她表示的敬仰之心。她笑着告诉我，她如何解除了家庭包办的婚姻，私奔到日本与孙博士聚会，从而轰动了上海的上流社会——“因为象我这样家庭的女子是不解除婚约的”。她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位比她大许多岁的革命理想主义者联结在一起，跟随他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进行革命斗争，现在这位年轻的遗孀又为实现她丈夫毕生的理想而献身。仪态谦和甚至显得柔弱，但她有刚强气质。她不顾家庭和社会的种种压力，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她的朋友们曾企图劝诱她背叛武汉革命政府，并且以她是被劫持为由，为她提供

一艘日本船作逃跑之用，当她明确表示她留在武汉完全出于自愿之后，一切造谣中伤的武器都用来对付她，不但诋毁她的名誉而且还玷污已故的孙博士的声望。一直作为她的革命顾问的最亲爱的兄弟宋子文，也来汉口与革命政府谈判和劝她脱离武汉政府。

尽管完全孤立，甚至她最信赖的家庭成员也成了敌人，但她对孙博士的革命主张从未动摇过。她一直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与共产党合作和组织工农大众，只要武汉政府坚持这个立场，她就绝不背弃它。但当武汉的胆小的自由主义者们转向军阀的反动立场时，她就不让他们用孙博士的名义来掩盖这种背叛行为。于是她离开了汉口，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以致武汉政府禁止这个声明在它所控制的地区公布。这样，为了共产党和工人、农民，她最后和自己的党决裂了。由此证明，体态、性格看来是很温雅的宋庆龄，对革命却比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何其他成员来得更为坚定和顽强。

我还记得她在花园中为国民党红十字会募款而举行的一次茶话会。这是在革命武汉举行的第一次社交活动，有各国政府代表参加。在会上，孙夫人敏锐地觉察到潜在的相互之间的摩擦。

她对我说：“许多过去从不和我们交谈的人，甚至他们互相间也不是朋友的人——德国人和法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突然彼此见面而愕住了。”这是对汉口社会的非常透彻的描述——一小群互相之间有利益冲突的外国人面对着他们都不信任的中国政府。外面江面上，停泊着二十多艘炮艇，接到命令就可向这个城市开炮。而在花园里，这些外国炮艇的代表们正在为被认为是他们的敌人的伤兵，而和国民党官员们一起吃冰激凌、喝汽水。这次游园会的主持人孙夫人注意到这些摩擦力，却运用个人的影响和力量赢得人们的敬慕，甚至从敌人那里取得援助，并推迟不可避免的

冲突的到来，她希望能为革命军北伐赢得时间。

武汉政府的对外发言人陈友仁，他是外交部长，又是左翼领袖之一。他不是出生在中国，而是生在英国统治下的特立尼达。他受过良好的英国教育，他讲英语远比中国话更为自然。他对制定政策所起的作用不大，但有非凡的能力向外国政府阐述这些政策。在这方面，他的精湛的英语和渊博的英国法律和文学知识超过他的外交对手。他又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并组织工人和农民。他的信仰，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是来自与劳苦大众的联系，而是来自一种理性认识，认为中国如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状，使工农群众的要求得到满足。

事实上，这就是当时国民党的正式纲领，后来甚至连反对它的人也接受了。在外交部的经常会见中，陈友仁十分清楚地向我作了阐述。

他说：“中国在组织上和精神上仍然处于中世纪。但这种中世纪的结构正在解体，因此不再会有稳定性。问题是为新的社会组织寻求新的支柱，从而使生活能重新得到稳定。这个支柱首先必须是农民和工人。农民是连原始社会也需要的粮食的提供者，而工人则是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有组织生活的支持者，那么一个社会如能满足这两个集团的需要，社会就有牢靠的基础。这两个集团的基本需求必须得到保证，然而今天却没有。九年来，汉口的工资没有增加，生活费用却上涨了一至二倍。而我们的生产方式是如此落后，以致要满足工人的正当要求，会使大多数工厂破产。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工人们已经看到这情景：他们一旦要求改善待遇，工厂就要关门。农民也看到了：他们一旦向地主绅士发起进攻，这些地主绅士就不肯为春耕提供借款。现在，他们正饿着肚子。农民和工人自己没有维持生计的力量。他们必须和小资产阶

级联盟。所有的人必须联合起来，为反对共同敌人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而作出一致的努力。”

这种温和的见解正是一九二七年五月汉口的官方观点。大大落后于国民革命在胜利进军中掀起的早期革命热情。几个月前，随着国民革命军胜利的足迹，群众运动的火焰也向北传播并达到高潮，使国民党中的知识分子受到很大影响。他们提出了比工农更为激烈的主张。孙博士前妻的儿子孙科是一位保守的、典型的商人。他当时就曾高呼：“杀死地主绅士”。徐谦，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年长的司法部长，在规模巨大的汉口群众集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提出了比共产党人更为激进的主张。然而，这类人物现已开始动摇，并正在设法从他们以往可敬的立场寻求一条退路。

他们面临着严重的内部问题。不仅蒋介石脱离武汉而在南京另立政府，而且在武汉管辖的心脏地区，许多将领，也表态支持蒋介石并在各地作乱。正当对这些活动进行镇压时，唐生智的部队又在武汉发动了一次十足的反革命军事叛乱。但是，作为主帅的唐生智却仍被认为忠于武汉的。当他远在北方前线时，他的下级将领，绝大多数是地主子弟，对农民起来夺取粮仓，设立法庭，越来越不能容忍，于是用暴力攫取了权力，镇压了农民组织，枪杀了他们的领袖。这些军事独裁者仍然宣称效忠于唐将军，而唐又是武汉政府的主要将领。武汉会接受这种已被玷污了的效忠吗？武汉政府究竟应该抛弃它的将领还是它的农民群众呢？它夹在这两股力量之间动摇不定。数周之后，则以转向彻底的反革命而告终。然而，过去的口号仍然保留着，许多不久就背弃它的人还把这些口号挂在嘴上。例如，孙科此时向我介绍了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并以赞许的口吻告诉我：“我们把八个部长席位中的两个给了共产党，即他们特别感兴趣的农业部长和劳动部长。”随后他提到“今

年秋天我们到达北京时……。”在此时的汉口，象孙科这样的商人，还认为有可能以两个部长席位来满足工人和农民的要求，以允许变相的抢劫来安抚士兵们，并组织统一战线来实现光荣的攻克北京。

外交部街对面有一幢石砌的楼房。它的底层是《人民论坛报》报社；上层是迈克尔·鲍罗廷的寓所；他是国民党政府的俄国顾问，已任职四年之久。两位青年美国记者威廉和雷娜·普鲁梅负责《人民论坛报》和国民新闻社的工作。他们的任务是代表国民党用英文进行宣传。他们两人比任何人更负责把新闻发往美国。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就根据这些新闻形成一种反对力量，制止美国政府武装干涉中国。四年中他们不辞辛劳，随着国民党的命运的变化，从北京到广州，又从广州到汉口。他们两人虽然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一直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甚至武汉革命政权崩溃后，他们仍然如此。甚至左派停止活动后，他们还继续经营一家左派报纸。后来，雷娜·普鲁梅去莫斯科，并且死在那里。普鲁梅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完全可以和另一位美国人约翰·里德对俄国革命的贡献相比。

四年前由孙逸仙博士邀请来担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顾问的迈克尔·鲍罗廷在《人民论坛报》的楼上居住和工作。这座房子的边门直通他居住的寓所，边门周围经常停放着好几辆汽车，汽车的主人是前来同他商讨问题的政府官员。在他寓所的各个房间里，日日夜夜，总有国民党或共产党的会议在进行。

对在汉口说英语的外国人来讲，鲍罗廷几乎有一种超人的力量，但在他们眼里，他是魔鬼而不是天使。他们会悄悄地问：“你真见过他吗？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当他们知道我已见过他好几次，并且还会和他再见面时，他们几乎不知道应该特别尊敬我，

还是特别怀疑我。他们把他看作是每一项新法令和每一份文件的唯一制订者，不论是陈友仁对外国政府发出的照会，还是孙逸仙夫人离开武汉时发表的声明都是如此。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人们激动地进行议论的题目。如果他在晚上按正常时间睡觉，因而他办公室里经常点到凌晨三点钟的灯提前熄灭了，午夜以后从他屋前走过的人就会把谣言传遍汉口，说鲍罗廷“昨晚已乘私人飞机逃走了。”他们认为这意味着武汉政府的垮台就在眼前。由于完全不相信中国人有任何管理国家的能力，由于迷信只有象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出身的“强人”才能管“落后国家”的政府，因此，他们除了鲍罗廷外，看不到武汉政府任何其他领导人的作用和力量。就武汉政府的实际成员来讲，他们并不十分错。所有这些成员经常来找他。这不仅仅为了听取他根据多次革命中的经验所能提供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从他那里认识革命的目的以及吸取由此而带来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他所具有的，而却是他们中多数人缺少的。他们在强大的群众运动和军阀的压力之间徘徊和妥协，而唯独他却能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并说出这样做的道理。他的理由是如此的动听，是建立在广泛的经验基础上的，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甚至根本利益和工农运动对立的国民党人也表示赞同。

鲍罗廷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于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阶层经常进行明智的研究，并根据过去多次革命的经验来加以分析。我曾听到许多算是熟悉情况的自由主义者说，以鲍罗廷为代表，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把中国投入混乱中，以求共产主义得以实现。”但我从没听过任何共产党人，当然也没听过鲍罗廷，提出这种看法。他认为中国处于混乱状态中，被几十个封建军阀的内战搞得支离破碎。他们都在抢劫群众，削弱抵抗外国干涉的民族力量。他认为这种混乱局面的继续正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愿望，因为混乱给他

们借口可以继续掠夺和加强对战略港口的控制。他总是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有哪些社会集团有胆略、有组织、有纪律、有团结一致的力量来组织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创建一个现代化国家呢？”他认为这些品质只能在迅速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工人中找到。因此，正确的革命策略是组织和教育这些人，使他们能最后夺取政权。当时，他的观点也是正统的共产党人的观点，即是：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一场驱除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革命，但这场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联合贫农进行土地革命，才能成功。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五月通过的决议指出：“只有吸收广大劳苦群众参加斗争，才能产生一种力量，去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并清除封建残余。”

溯江而上到“红色汉口”的外国记者，如果能待上一星期，总首先要求会见鲍罗廷。一般来讲他们都被接见。他们来时都带着这样的想法：谁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嗜血成性的极端主义者，但多数人离开时对他如此赞美，以致他们的报社难以发表他们的报道。这位俄国顾问给他们的印象是：明确的观点，这在中国官员中是少见的；广泛了解中国的各种力量，以及清醒地选择道路。他对革命的无畏和忠诚的个人品质，以及觉察来访者的思想的敏捷，给记者们留下深刻印象。

我在汉口的数周中，鲍罗廷大部分时间在生病，时轻时重。这是四年来他在中国南方生活带来的疟疾的旧病复发，加上手臂骨折的旧伤。他常从疟疾的间歇性发作中挣扎起来，去参加会议或接受访问。只有在“摆子”大发作时才卧床。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可曾想过，我们搞了俄国十月革命，认为是干了一件大事。而这里的革命却要大好几倍。这关系到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民。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事。时间会很长。为完成这场革命而牺牲的将不止一

个鲍罗廷。”

另一次，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和我们在他房里。我说，即然我去俄国太晚没赶上十月革命，这次我就及早来到了中国，以便亲身参加这里的革命。鲍罗廷笑着说：“斯特朗女士在赶时间上是不走运的。她去俄国晚了，现在来中国又太早了。”当时，我还不太理解他的话。因为，除了国民党某些核心成员外，我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们一样，仍然以为武汉政府是革命的，不知道它已经向右转了多少。

后来，当我知道一些关于封建军阀和要求文官掌权的现代力量之间的斗争后，我对鲍罗廷谈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文官们坚定不移，军阀们就不得不屈服了。他笑了。

他说：“你有否见过一只兔子在蟒蛇面前浑身发抖，知道自己马上会被吞食，已经吓呆了。武汉的文官们在军人面前就是这副模样，两眼瞪着这些军人，浑身哆嗦。”……因此，他对那些和他共事的，组成武汉政府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抱什么幻想。但他是他们的坚定性和革命精神的主要来源。人们在想：他的病使武汉政府的革命寿命缩短了多少，假如他能去参加郑州会议，与冯玉祥会晤，他可能为组织工人和农民赢得一个较长的喘息时期；甚至有可能改变与冯的联盟的方式，以便能有足够时间攻克北京。谋求国民党革命各种力量的和解，是他所做不到的，也是任何人也做不到的，而且也不是他的愿望。因为他的根本目的是效忠于工农革命，支持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只是暂时的。

在构成“红色汉口”这个门面的这些人物背后，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成了实际的“红色力量”。国民革命军经过的每一个地方，工农组织就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在革命军到达以前就把群众组织起来，举行罢工和秘密传递情报来帮助国民革命军。上海各工会自己发动群众从北方军阀部队手中夺取了上海，然后移交给国民

革命军。华中地区的农民协会常常带领国民革命军抄小道袭击敌人后方，出其不意地击败敌人。国民革命军在任何地区取得胜利后，加入工会就成了每个工人“理所当然的事”。如果谁不参加，就会被怀疑为反革命，从而处于不安全，最不受欢迎的地位。

将近三百万各类工人加入了庞大的工会组织。他们中有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最落后的不熟练工人，也有已高度专业化和高度觉悟了的、已在讨论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政府的工人。他们在汉口地区一次又一次举行罢工，向雇主们提出各种要求。一些外国人对这些要求报之以嘲笑，叫嚣说“这不可能”、“这是疯狂！”这些还算是他们所使用的词汇中最温和的形容词。这些要求实际上是把苏联劳动法规的规定全都搬了过来，包括假期工资照付、社会保险、八小时工作日、增加工资、免费医疗、组织工人俱乐部等。我发现，事实上，提出这些要求的工人们只要每月工资能增加一两元，只要他们的工会得到承认，就愿意继续工作。提出上述要求是为了宣传，使工人们熟悉摆在他们面前的基本纲领。

许多工人极为落后，工会给他们规定的制度也很粗暴。例如，靠近汉口的堤坝上的工人的遭遇就是这样。工会巡视员对生产的兴趣似乎比对满足工人愿望更大。他在我面前夸耀自己如何阻止工人要求某些假日。他提出各种理由劝诱工人，从呼吁他们忠于革命到以鞭撻相威胁。虽然这些作法粗暴、专横，但所被取代的旧制度却更加专横。工会至少能使工人的工资增加一倍多，并且每晚教育他们以更民主的方法行使自己的权利。虽然工会巡视员夸耀自己有权逮捕堤坝上的任何人，但“工人委员会”找他时，他变得非常谦逊，因为他的主要乐趣和任务就是组织和鼓励这样的委员会，从而也就为自己的专制权力的消失铺路。

汉阳兵工厂的冶金制造工人要比这些堤坝工人先进得多。我

出席过他们为俄国工人访问团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他们向这些俄国人提出了一些复杂问题，据说，这些是他们中间有很多争论的议题。

他们问俄国工人：“你们对在政府办的工厂中实行怠工，采取什么态度？你们是鼓励这种行为，还是容忍或惩罚这种行为？”……“冶金工人在革命中什么时候开始得到好处？是否在剥削者被推翻后立即得到好处，还是必须长期受苦并作出许多牺牲，等到革命政权最后确立了才给他们好处？”这些就是他们在汉阳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工人们自觉地参加政府的建立。

许多工人已经在为革命政府作出许多牺牲。他们放弃了八小时工作日，在兵工厂内每天要工作十三到十七小时，因为他们的“革命政府受到了威胁”。他们推迟了提出建立童工劳动法的要求。我亲眼看到七八岁的儿童在武昌棉纺厂中工作十小时。工会组织者告诉我：“武汉被封锁了，我们决不能打击生产，特别是在外国人办的工厂里。”他们有理由为武汉作出牺牲，因为别处的形势比武汉严重得多。在上海、广州和湖南，工人们正被处决。而在武汉，他们还有机会抬起头来争辩几句。他们为这种微小的特权感到欣慰。

就在这时，反动力量正在集结。他们甚至要从工人手中夺去这一点点权利。他们甚至利用武汉军队的胜利扩大自己的势力。武汉军队在北伐中正打退敌人并和另一支国民革命军、西北冯元帅的国民革命军会师。这两支力量召开一次会议，以实现军事和政治上的联合。武汉的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的成员将乘坐专列北上，去巩固他们的胜利。然而，这次会议竟使革命失败，违背了给武汉政府以胜利的工人和农民的希望。

四、进入战区

芦笋罐头、冰镇汽水、加利福尼亚桔子、法国巧克力糖——这就是从汉口北上的军用列车上的所谓“艰苦生活”。然而我们正在华中的深处行进，穿越被战争破坏的地区。在我们身后的汉口，躺着一万四千名伤兵。他们挤满了医院，又涌向孙逸仙夫人领导下的红十字会仓促征用来的咖啡馆和仓库，躺在木板上、空地上。这些伤兵是在临颍战斗^①中和张作霖的精锐团作战的广东、湖南和湖北的小伙子。他们遭到敌人优势炮火的袭击，他们不了解敌强我弱的态势，奋勇作战，终于征服了敌人。还有成千的广东铁军的健儿，正躺在我们列车两旁的广阔平原上。政府专用军列现在通过一星期前以重大代价换来的稻田和麦地，列车上设备齐全，舒适之极。

①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分裂，张学良率奉军十万与吴佩孚残部联合，经河南南下进窥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以唐生智为总指挥进军河南，继续北伐。张发奎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河南临颍与奉军主力决战，经三昼夜激战将奉军击溃。——译者注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军。南北两方面的国民革命军，在过去一年中向对方靠拢准备会师。随着郑州的攻克，冯玉祥的西北军和来自南方的广东军已经会合。远隔数千英里的这两支部队，按照共同的军事计划，从中国的两端相向而行，在赢得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胜利以后终于会合了。

冯玉祥的部队在北京附近战败后通过西北各省的长途跋涉，可以算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强行军。他的部队在从南口退到蒙古沙漠深处的路途中，吃完了粮食，穿坏了军装和鞋袜。他们甚至没水喝，因为原来仅够少数本地人饮用的、沙漠地区为数不多的水井已被成千的过路部队喝干了。忍受着饥饿、寒冷和干渴，他们在遥远的中国西北的甘肃省集结，并在那里整编，重振旗鼓。他们挥戈南下，进入陕西解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西安之围^①；由于饥饿，城里百姓不断死亡。数月后，得到成千名地方部队的补充又和甘肃和蒙古的精锐回族骑兵一起，到达通往郑州的铁路的西端附近，在那里等待广东军到来，并为他们开辟道路。

这一年中，广东部队也向北挺进。首先巩固了自己的广东省，然后通过山口进入河南。在那里他们接收了唐生智将军领导下的十万湖南兵。湖南兵凶猛善战但纪律不大好。在国民党的宣传鼓动下，这些部队显示了中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良好素质。广东的第四军尤为著名，被称为铁军。这支部队的声誉是如此之高，虽然在战斗中伤亡很大，但农民、工人和学生仍不断参加进来，最后竟

① 一九二六年春，奉军、直军、直鲁联军联合向国民军发动进攻。四月十五日，国民军由北京退往南口。下旬直鲁进入北京。国民军又放弃南口、张家口，向西退往绥远、甘肃。国民军第二军和第三军残部被围困在西安达七月之久。城里发生饥荒，每天死亡达一百人。西北国民军南下援救，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解西安之围。——译者注

壮大到能分成两个军：第四军和第十一军。据说这些士兵“甚至在指挥官阵亡时，也能继续战斗”。这是中国的其他部队做不到的。他们打退吴佩孚的进攻，使之陈尸遍野，但既不向对方索取什么，也不接受对方的任何条件。在这方面，他们又违反了中国战争的常规。在中国，弱方往往投奔强方，有时则收买别的部队来壮大自己。他们占领了扬子江以南的华南地区后，沿京汉铁路继续向北挺进，直指京汉路与陇海路的交叉点。陇海路向西通往冯玉祥部队，向东通向大海。他们要到达这个交叉点，必须对付张作霖的最精锐部队。张作霖的部队用英国坦克和法国飞机向他们进攻，然而他们并不会使用这些武器。这些来自广东的短小精悍的士兵，只习惯在南方的山地和稻田里作战，不习惯在河南的麦田开阔地带作战。尽管如此，他们全凭勇气、夜间奇袭和不顾一切地冒着炮火冲锋，打败了装备精良的大个子北方兵。这样，他们就为在铁路交叉点和他们会合的冯玉祥部队，打开了进入洛阳和郑州的道路。

但是，意见尚未取得一致。公开的分歧如此之大，就举行会议是不可能的。在诸如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工人和商人的矛盾、军人和文官的矛盾等越来越尖锐的问题上，冯和汉口方面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一致意见，现在还不知道。因此，军队打通铁路后，汉口的军事、政治委员会立即前往郑州与冯会商，处理这些军事和政治策略问题。

就在这辆专列上，我获准去访问战区，参观正向北京进发的国民革命军。国民通讯社记者雷娜·普鲁梅和我，是列车上仅有的外国人。我们同住在有四个床位的包间里，上面用中文写着“西方妇女卧室”。其他所有包间都被权贵们和他们的秘书占据了。我们按照中国习惯，带着雷娜的家仆小李，作为照看行李的“听差”。他高兴地睡在过道中的提箱上。他给我们铺床、倒茶、端水。他见到

了先前只听说过的大将军们，笑得合不拢嘴。

汉口站台上，身穿各式各样中西服装的一大群人聚集在那里，向我们告别。打扮得最漂亮的要数外交部长陈友仁。他身穿一件厚实的暗米色绸料旧式中国长袍。“我给你们带来了几件你们可能未想到的东西，”他令人愉快地说，并赠送我们一个大手电筒、一把扇子、一只装满了的餐具的箱子和几只茶杯、一袋零花的铜子。他讲对了，我们突然认识到这些东西是我们遗忘了的必需品。也许有一天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所有的外交部长都对外国人经常表示这样的善意，而不是高高在上，代表他们国家的尊严。

孙逸仙博士的第一位夫人的儿子孙科，是交通部长，我们的这次旅程由他负责。他是一位身穿西装、面带微笑的矮胖子，还为父亲戴着孝。司法部长徐谦是位身穿折皱的灰制服、戴着眼镜、面有倦意的年龄较大的男子。如果只听其言不观其行，他是一位最狂热的激进派。汪精卫夫人到车站来给丈夫送行。她身穿淡紫色中式长服，身材矮小，神情自怡，是反动官僚家庭的女儿。汪精卫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列车上最重要的非军人。他穿一套灰色西装，敞着白衬衫领口，不象一个四十二岁的老资格政治家而象一个大学运动员。俄国军事顾问加仑将军^①住在我们隔壁房间。他这次旅行，穿一件不带臂章或任何特别标志的普通咔叽布军装——站台上一位美国人称它为“流浪汉夏装”。

突然响起了一阵嘹亮的军号声。谭延闿^②将军，一位总督的

① 本名布留赫尔，加仑是在中国的化名。一九二四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八月期间任广州政府和武汉政府军事顾问。后来，他晋升为苏联元帅。
——译者注

② 谭延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译者注

儿子，现任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身穿一件不很合身的中式长袍，大踏步地走过月台，上了列车。我们的列车就是在等候他，因为一阵忙乱和喧闹过去后，列车立即开动了。孙逸仙夫人给了我们一盒巧克力糖，孙科夫人又给我们一听梨罐头和一些饼干之类的茶点。我们的列车在告别的祝贺声中离开了车站，根本不象身负军政重任开往前线参加决策会议的样子。

然而，湖南第八军的三百名士兵占据了我们前后的车厢，以防止被击溃的敌军散兵游勇拦路抢劫。三百人可谓绰绰有余，因为敌人已被全歼。如果真有一点点危险，肯定会派更多卫兵，因为我们的列车上坐着几乎全部武汉政府的领导人。留下的有孙夫人，因为一位妇女出席在守旧的河南省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似乎有些不合适。还有断了胳膊、发着烧，卧病在床的俄国顾问鲍罗廷。——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可能违背将军们的意志，为群众权利说话，而且迫使会议产生不同结局的仅有的两个人。

整个傍晚，我们的列车在通过农田和村庄的匆促修好的轨道上慢吞吞地颠簸着。暗淡的黄绿色梯田，在夕阳中微微闪光。一切都很平静，好象这里不曾发生战争似的。身穿蓝色粗棉布裤子，从腰部以上袒露出褐色皮肤的农民们，在茅屋门前懒洋洋地躺着，或沿着山道挑水。偶尔较长时间停车，我们就挤进车站附近集市的人群中。由于我们的外国装束和白色皮肤，人们瞪着眼看我们，但并没有打扰我们。到了晚上我才被人提醒，这个地区不是太平无事。有一次我走过车厢的过道，看见窗户下站着士兵，他们倚着宽阔的窗槛站着睡觉，闪闪发光的刺刀随着列车的前进微微摇动。偶尔，由于列车摇晃，我撞着一位塑像般的士兵。他厌烦地咕哝几句后，醒过来，让我通过，然后又立即入睡了。在半睡半醒的迷糊状态中，他又成了湖南平原上的一位从事劳动的农家子弟，以一种逆

来顺受的宿命论忍受人世的艰辛。

第二天清晨五点，军号响了，催促三百名警卫部队起床。中午，我们开始碰见别的部队，并看见一些战争迹象。我们的列车在鞭炮声中驶入了一个车站。对我这样没战争经验的人来讲，鞭炮就象机关枪声一样可怕。从长竹杆上垂下来的成千上万的鞭炮在爆炸着，表示对我们的欢迎。这时，我们的高级官员们走进车站，和当地的司令官会谈。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些士兵是最近跟随他们的师长投诚到国民革命军这边来的。据一些军官说，他们的师长投诚的原因是：他看见民众如此友好地接待南方部队，“甚至集市上的妇女都端着茶水来迎接他们，因此知道他们不是这些英雄们的对手。这位师长说，他“牺牲了一切”来参加国民革命军。所谓“牺牲了一切”，是指他的妻子儿女都被张作霖作为人质扣押了，而且可能现在已在沈阳被处决了。但他的新效忠行为至少救了自己的命。和他一起的两位司令官，由于打了败仗企图逃离北军，以贪生怕死的罪名被立即处决了。即使要付出失去家庭的代价，他也要逃脱这种命运。据说这才是他投诚的真实原因。

怎样对待新参加的投诚士兵，是国民革命军经常碰到的问题，因为他们给部队带来了不利因素。但不让他们参加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我们的列车路过西平^①城时，那里的几千名敌军被包围了，正在进行投降谈判。国民革命军要敌人放下武器，遣散回家。这对任何欧洲军队来讲，是一种非常仁慈的作法。但这些被包围的中国士兵竭力反对这种残忍的做法。因为放下枪就等于丢掉饭碗，变成无业游民。他们要求战胜他们的军队把他们原封不动地接收过去。他们以当兵为职业，愿意为任何人打仗，当然最好为

① 西平在河南中部，京汉线上，漯河市南。——译者注

胜利者打仗。

这样的士兵经过几周政治教育能变成忠于革命的、有觉悟的国民革命军战士吗？可是不让他们参加，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要么把他们作为囚犯养起来，但这样做显然是不可能的；要么把他们统统杀掉，或者放他们走，让他们去当土匪，这也是不可能的。一位国民革命军将军发给敌军士兵每人两元钱作路费打发他们回家。但通常的作法是把他们接收过来。这样就使部队臃肿起来，而且不知不觉地受到腐蚀。

我们的列车突然在另外一辆满载士兵的列车旁停下了。这些士兵和我以往见过的任何士兵都不同，愉快、活泼、敏锐、聪明。他们挤在棚车顶上和地板上，或躺在烈日照晒的平板车上。他们爬起来，开始和我们谈话。其中两位士兵吐出几个英语字。“你们去哪里？去郑州？”他们带着骄傲的神情说。一个穿着弄脏了的白上装的小伙子豪爽地微笑着，然而他的笑容掩饰不了痛苦的痕迹。他身体向外倚，露出手上戴的一只旧表。在连鞋都没有穿的士兵中，这种情况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骄傲地用英语重复着：“长沙学生，长沙学生。”国民革命军从长沙北上时，他参加了。长沙是革命最激烈的地方，是大学生和“红色湖南”的省会。他向我逐个介绍其他士兵的籍贯：“湖南、湖北、广东、广东、广东。”他微笑着，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们从他们经历多次战斗后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臂章上看出 11A（第十一军）的番号。后来，我们得悉，这支部队是著名的十一军的一部分，而十一军是从第四军分出来的，并和第四军组成北伐的先头部队。经过良好战术训练和政治教育后，他们在十一个月以前，离开了他们的广东家乡。十一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在向北挺进，一面战斗，一面以路过省份的新兵补充他们残缺队

伍。这支队伍的革命传统被冲淡了，但仍保留了许多老作风。最近几次战斗后，运往汉口的伤兵中半数是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的。

在列车上过了两夜以后，我们到了北军撤退时炸断的一座桥梁。三百名湖南籍警卫部队得意洋洋地一涌而下，沿着铁路路基奔跑，然后迅速地踏着尘土飞扬的小道向河边跑去。这时，我们的听差小李开始和三位挑夫讲价钱，要他们把提箱、行军床和打字机搬到三四英里以外的另一列火车上去。然后，他骄傲地监督着三位新雇来的苦力出发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当主人。

通向河边的陡峭山路上挤满了士兵和挑夫。山脚下是一座跨越两条浅河的临时木桥。在拥挤的人群中，我们失散了。我一个人单独地走着，滑着跤，躲开挑夫的重担和士兵们的刺刀。我很快就被淹没在士兵的人流中，他们讲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这就是英国人和美国人遵照领事馆的命令撤离的华中地区。这些士兵就是传说的排外的士兵。然而，我单独地走在他们中间，一点也不害怕。铁路路基在飞扬的尘土中仍依稀可见，我只需要不断地向前走。士兵们打我身边走过，有的毫不在意，有的笑着喋喋不休地谈论一位外国女人的意外出现。偶尔，军官们骑着马踏着尘土从我身边走过。他们都向我敬礼，因为他们知道我一定和刚从汉口来的那辆军用列车有关。一小时后，我碰见了小李。他的三位挑夫不干了。他们不愿意走四十英里到郑州去。小李不断地安慰他们，还买了些黄瓜给他们吃，润润沾满尘土的嗓子，并告诉他们走过这一小段路，就可以乘坐飞快的火车了。

一座车站终于出现在尘土飞扬的田野上。车站周围，几十个赤条条的男孩在那里卖茶水，从锡罐里往外舀水。我们这一行人陆续到达了。有些人比我幸运。譬如，年纪较大的司法部长徐谦就雇了一头小毛驴，骑在上面，两条腿几乎拖到地面。交通部长孙

科也出现在一辆小推车上。我们坐在树荫下，喝着茶，听三十六军政委给我们讲前线的消息。

这位政委姓夏。他在北京当学生时，参加过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爱国示威游行，为推翻一届内阁出过力。后来他到德国去学“政治经济学”。他不在学校里学，而在德国工厂和工会中学。他谈到我在柏林结识的维尔·明岑贝格和其他人。我问他是不是一位共产党员，他低声地、但坚定地以德语回答：“当然是。”那时，军队里的最好的政治指导员，多数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但这种身份已不公开了。

他向我们谈到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他说：“在和平时期，我们给士兵讲文化课和公民课。我手下有三十六军的一百名政治工作人员。他们每人负责一百名士兵。打仗时，我们也上前线，提高士兵们的士气。在北伐中，我们不但在士兵中工作，也在人民群众中工作，动员他们端茶送水、照看伤员。我们组织农民大会，解释国民党的纲领。我们离开时，就把工人和农民的组织交给地方领导。”

一小时后，送我们去郑州的另一列火车到了。它比汉口出发的非常舒适的专列差多了：汽水里不再放冰块，士兵们坐在车顶上或趴在火车头上。这时，湖北种稻子的梯田早已被中原的大片麦田所代替。六月上旬，农民已在收割麦子，紧接着就是种豆。中国一年两收，可见这里气候温暖宜人。但尽管农民们付出了双倍劳动，得到双倍收成，但在军阀的横征暴敛下，他们还是食不果腹。麦子长得非常好，完全没有受到刚过去的战争风暴的摧残。只在一个沿铁路线几英里长的地带里，麦地被逃跑的奉天部队踩平了，成为一条宽约五十英尺的道路。农民受到军队干扰，但很快调整了自己，仍然过着和以往一样的生活。穿着粗蓝棉布裤子、光着上身

的男人和赤条条的男孩，弯着腰在田垄里劳动。我们也看见了姑娘和妇女。她们总是全身裹得严严地，连这个地区妇女的标志——小脚也被遮住了。在稻田里，我们没有看见任何牲口，而现在偶尔能看到拉着原始的结实木轮货车的毛驴和公牛。

过了一会儿，冯玉祥派来的一位将军沿着铁路走过来迎接我们。这是西北和南方的两支国民军合作的第一个标志。当列车徐徐进入郑州时，响起了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夹杂着欢迎的军号声。车站上排列着整齐的队伍，向我们敬礼。一营“我们的北方兵”已接替一营南方兵。当然他们不是正向北京撤退的奉天北方兵，而是新近到达的冯总司令统率的西北国民军。老百姓已在谈论南北会师，并且希望中国从此统一，停止互相倾轧。我们在南北士兵夹道欢迎下涌出车站。所有的人都在敬礼、微笑；大家都是盟友。经过一年奋战，竭力向对方靠拢的两支军队终于在约定的河南中部平原上会合了。

五、将领们在郑州会晤

郑州是一个典型的内战阴云笼罩下的中国城市。没人知道它有十万还是二十万居民，因为从来没有进行过准确的人口调查。大家都讲郑州因八万部队的到来而人口增加了，但部队的人是否准确，也值得怀疑。中国人不重视统计数字，不论军队还是地方都是如此。

在中国农村，古老的农民生活仍然持续着，虽然受到过境军队的干扰，但以极大的耐性调整着自己。在郑州也一样，中国城市的古老商业生活也持续着，虽然受到干扰，但也耐心地调整着自己。当我们从住处走出来时，黄包车夫叫喊着，招揽生意。在古老的市场里，一清早，地面上堆着嫩绿的新鲜蔬菜。男人们和裸体的男孩子们在街上闲逛、聊天，发挥着他们在生活中的全部作用；而穿蓝色长裤长衣的缠足妇女们却端庄地走着。

战争对郑州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征用房屋和滥发钞票。对老百姓来讲，这两方面影响也许可以归结为一点：八万善良而饥饿的、腰无半文的士兵来到这个城市，耗尽了经济资源。他们显然是温顺的、不爱寻衅的农民子

弟。除了在激动情况下(我们还没亲眼见过这种情况)，他们很少使用暴力。他们总是大踏步地走进或走出这样那样的司令部，或连续几小时在沿街的哨位上立正站着，僵直地、紧握着带刺刀的步枪。如果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偶尔冲撞了一位士兵，他总是礼貌地表示歉意，并为我让路。

驻扎在城市中的士兵，即使最不爱惹事的也总得有个栖身之所。即使象苦力那样睡成一长排，八万人也挤满了学校、大厅、寺庙、教堂、银行、仓库、外国传教士的房屋和一切空着的建筑物。而他们驻扎的任何地方，家具都被损坏无遗。

这就是我和雷娜在郑州的第一个夜晚住宿的天主教堂的神父们的主要苦恼。我们被送往临时住所时，听见这样令人高兴的消息：这些传教士同情国民革命军，主动邀请我们的将军和他们住在一起。这所教堂是一幢美丽的石砌建筑物；中间有一片宽阔的草坪，这在拥挤的城市中是很难得的。庭院里石铺的地面上堆着士兵们的行李。几十名士兵正出出进进。身穿黑袍的神父们正沿着庭院两侧的走廊慢慢地溜达，看来并不高兴。这些神父是从欧洲的拉丁语国家来的，因此我用法语问他们：你们是否真邀请了这位将军到这里来住？

他们说：“你瞧，这是战争。在战争时期，你还能要求什么呢？你要知道，一位大将军住在你家里比五六个小军官在你院子里你争我夺要好得多。我们的将军发给我们战区所需的一切许可证。”他们都是精明的现实主义者，能适应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们庆幸地告诉我，这些士兵并不粗暴无礼，是些“好小伙子”。“但是我们的灯罩都被打碎了，墙上钉满了钉子，锅也熏黑了，所有家具上都有蜡烛油。”由于神父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这一切，全郑州都知道他们很友好。

对当地商人来讲，新纸币带来的财政危机远比士兵们造成的房荒严重得多。除了给中国带来灾害的各种货币外，三种新纸币在郑州流通，使许多店主破了产。首先是张作霖的北方部队强加给他们的奉票。这种钞票是沈阳的一家雕刻印刷厂发行的，没有金银作后盾，甚至在张作霖自己的地盘内也几乎毫无价值。谣传日本和张作霖之间发生过严重磨擦，原因就是张作霖的奉票使满洲的无数日本商人破了产。北京的商店也曾被这种纸币充斥达一年之久。在本国人居住的市区内，商人们在武力胁迫下不得不使用这种货币，不然他们就把值钱的货物藏起来，或者干脆关门。张作霖被赶出郑州后，他的纸币变得一文不值。

另外两种使商人发愁的纸币是：冯玉祥印的钞票——不是平板印刷的而是印刷机印的，甚至看起来也不象钞票；以及武汉政府中央银行印的钞票。冯玉祥的钞票开始没有其他标志，上面只有一个“冯”字。但当它可以用来支付冯玉祥征收的赋税时，开始有些价值了。当冯玉祥掌握了铁路，老百姓可以用这些钞票买火车票时，它就更值钱了。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有一定数量的白银作后盾，而且比人们较乐意用的其他中国钞票多。但郑州商人怎样会知道，怎么会相信呢？对他们来讲，这些钞票全都是纸，完全不受欢迎。

尽管如此，郑州的商店使用着这些纸币。他们非用不可。由于长期生活在军事管制下，商人们害怕军人。即使我们的听差小李拿出这种纸币，他们也会接受。但他们找零头时，不会拿出“好钱”来。他们在这场赌博中，把物价定得很高，希望拿到的钱多少能换回些什么。他们用同样的纸币找给零钱，从不拿出银币或铜币，除非顾客首先付给银币。他们把银币藏在店铺后面的隐蔽地方，无疑地也把最值钱的货物藏起来了。然而，他们愿意用冯玉祥的钞票兑换汉口发行的钞票，或用汉口钞票换冯玉祥的钞票。这

样，冯玉祥与汉口之间在财政上的新联盟也被人们承认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有无法预测的种种敲诈勒索。在现代欧洲，货币也经常贬值。尽管如此，人们还在做买卖。郑州的情况也一样。虽然有上述种种障碍，生意还得做。我跨进出售纺织品、鞋帽、食品的商店，发现虽然价格很高，但货架并不是完全空着的。这些内陆小城市的中国商人总得活下去。要活下去就得做买卖。正象农民已使自己适应许多非常时期，商人也得这样做，也得忍受痛苦生存下去。我们认识到，只要有稳定的铸币，只要能打通贸易渠道，使麦子能运到扬子江流域，又能运回一些货物作为支付，就能使困难减少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打通渠道正是郑州商人对我们会议寄予的希望。对他们来讲，冯玉祥与汉口的联盟就是上帝的恩赐，因为这种联盟给他们以希望：铁路修好了，铁路沿线的散兵游勇清除了，货物的运输就又能畅通无阻了。只要联盟可以扩大管辖范围，而且战争停止了，匪患消除了，生意能做了，不论是和蒋介石的联盟，还是和张作霖的联盟，都同样受欢迎。

然而，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郑州的最显要人物不是商人，也不是政府当局，而是将军们。出席这次重要会议的已有几十位将军，而且还不断有新的将军到达。这里有冯玉祥手下的将军们，他们本身就是重要人物，是半独立的统治者，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人随时可能脱离冯的领导而独立。使他们结合起来的不是被人们承认的稳定政府，而是一层新的薄薄的叫做民族主义的黏合物；而对他们中多数人来讲，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对双方都有利的联盟的体面名称而已。此外，还有张发奎^①，广东铁军的将领。当时，人们认为他比

① 北伐期间，张发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由于在与吴佩孚和张作霖作战中连战连捷而闻名。此后，他是国民党粤桂军阀首脑之一。——译者注

任何其他将领政治觉悟高，因为他年轻，能接受国民党的政治教育，而不受前辈封建传统的影响。

还有我们自己的将领，湖南的唐生智将军^①，当时赫赫有名的激进分子。据相当可靠人士说，他已要求参加共产党。他被蕴藏在工农组织中的伟大力量所打动，想借工农的力量来达到成名的目的。然而，当他在前线指挥部队向北京挺进时，他手下的将领们在他控制的省份湖南发动了军事政变，屠杀工人和农民。此时还不能肯定，对远在湖南的将军们他能控制到什么程度，甚至也不能肯定他想控制到什么程度。这要看怎样做对他自己有利。虽然他是张发奎的上司，但由于将军们有独立自主的封建传统，他并不能完全指挥张发奎。他被认为是效忠武汉政府的仆人，但实际上他正迅速地变成这个政府的主子。

冯玉祥是在我们之后到达郑州的。这也许是偶然的，也许是出于外国人难以理解的某种对威信的考虑。因为这样做，他在车站上受到了参加会议的所有要人的欢迎，而这些要人自己先前只受到他部属的迎接。他乘坐一辆货车，以表示他作风简朴。他的发言人告诉我，冯说：“既然士兵兄弟们都乘货车，我要和他们同甘共苦。……”后来，我听人说，冯玉祥一直坐在舒适的专用包房里，直到郑州前一站才坐进货车。虽然冯的简朴是故意做出来的姿态，但这不是一种单纯的姿态，而是一个很有效的军事策略。他在郑州颁布了一项规定：举办宴会每盘菜不许超过一元钱。这样就可以防止中国官员们在宴会上浪费时间和金钱，而且得到的是简朴的美名而不是吝啬。

① 唐生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湘军）军长、国民革命军西路司令。一九二七年五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九二七年七月开始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译者注

冯玉祥把个人权势和他率领的部队看得比城市的奢侈生活重要得多。他深知，如果军官们和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们就抱怨得少一些。他部队的纪律比南方士兵好，有普鲁士作风，站立笔直，精神抖擞。然而，虽然他的士兵们以禁欲主义精神忍受了难以置信的艰苦，但缺乏南方部队那种横扫八省的劲头，不肯拼死地去争取胜利。而在冯玉祥眼里，这并不是一个缺点，因为他本人就是这样训练部队的。在他看来，一个士兵不是冒生命危险去争取胜利的革命者，而是他个人的一名小卒，一个筑路人和种树人。他的士兵愈多，他就愈强大，因为他可以修更多的路，栽更多的树，控制更多地盘。因此，他把士兵的生命看得比打胜仗重要。当然如果肯定能得到相当多的土地，他也会叫他们去冒险的，因为得到土地意味着支配更多士兵和人口。他在对待盟友方面也很精明，特别擅长于让盟友去为他冲锋陷阵，夺取胜利。他让广东部队付出代价为他夺取了郑州。当他发现他们已精疲力竭，就希望蒋介石或山西省省长阎锡山为他付出代价，夺取北京。由于他玩弄权术，被公认为一位不值得信任的盟友，但没有人否认，他的部队纪律严明，地盘也控制得相当好。他有一种封建观点：盟友多多益善。因此，基督教徒、布尔什维克、农民、将军等等都是他的盟友。他在农民面前摆出一副慈祥家长的样子，但他决不让让他们对他发号施令。此外，他在战斗中采用现代战术，因此很欣赏俄国军事顾问。他在所有这些互相冲突的力量间纵横捭阖。

我还见到了冯玉祥的几位将军，其中一位是一年前见过的张家口驻军司令张之江^①。他是冯玉祥部队中的少数几位原教旨主

① 一九二五年十月至十二月直隶战争时，张指挥国民军第一军进攻据守天津的李景林部。一九二六年一月，冯玉祥通电下野时，张继任西北边防督办。一九二六年四月国民军撤出北京，在南口大战中张任国民军全军总司令。——译者注

义基督教徒之一。他把陕西省的大丰收看作上帝对“我们革命军队的帮助”。他还谈到上帝创造的奇迹：有一次，冯玉祥和寻找他的代表团在蒙古荒漠中“都走错了路，而上帝的旨意使他们在未曾预料的地方相会”。他宣称：“基督教是真正的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这个革命的经济部分。上帝在圣经中说：他要抬高卑贱者和抑制高贵者。难道这不是革命？”

张将军和我详细交谈了基督教在冯玉祥部队中碰到的困难。冯玉祥手下的将领们在讨论这方面问题时，愤怒地指责基督教和帝国主义，他们说：“侵略我国的英国人和在上海枪杀中国人的英国巡捕是不是基督教徒？他们自己不信基督教却要我们信，要我们爱敌人；当敌人打我们的左脸时，叫我们把右脸伸出去给他们打。基督教是使我们愚蠢和恭顺的麻醉剂。”

这就是他们讨论的内容。通过这种讨论，冯玉祥手下的多数将军不再信奉基督教了。但实际的理由可能更简单一些：他们信基督教是为了表示和冯玉祥站在一起，后来不信基督也是为了同一理由。冯玉祥自己无疑曾把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俱乐部，当作鼓励士兵过简朴生活和进行体育锻炼的手段，给士兵们以娱乐、纪律和士气。后来，他发现国民党的宣传具有基督教所没有的某些优点，于是又把它作为更现代化的方法而加以采纳。但后来他又发现这种宣传在农民中激发出过多主动性。冯玉祥原先的基督教牧师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宣传员都是他自己挑选的，并按他的命令行事。他们可以为他的部队服务，但他的部队决不能为这种宣传服务。现在他发现这两种宣传都不完全得心应手。于是，他开始创办一所培养他自己的宣传员的学校。

还有一位将军，他的姓名我从未打听过。他是在我们来郑州的第二天到达的。他把我和雷娜从天主教会的房子里赶走，让出

间房给他的部队居住。这样，我们就和汉口的要人们一起搬到中国银行去了。这次搬家对我们很合适，因为我们离庭院不远的小屋虽然闷热，不如天主教堂舒服，但毕竟和参加会议的人住在一起。白天黑夜，他们一直在我们附近讨论问题，有时开军事委员会，有时开政治委员会，而参加这两种会议的几乎是相同的人。他们讨论冯玉祥领导下的各省政府、军队改编和进军北京的计划等。有时，我们被允许到这些显要人物聚集的餐桌上去。冯玉祥作为主人坐在桌子的一端。两旁是唐生智和谭延闿。我们的座位离得不远，在孙科和徐谦之间。我们发现中国的午餐和美国的不同。就餐的人避免在餐桌上谈工作。冯玉祥和将军们愉快地谈论着蒙古和甘肃有多少只苍蝇，而不谈中国和世界等待他们决定的重要问题。

然而，幕后却进行着各集团间的交易和各种阴谋活动。他们进行得如此隐蔽，以致我们很久以后才知道真情。他们秘密地达成了协议：必须镇压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甚至武汉政府也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冯玉祥为了巩固自己的部队，决定“控制”农民组织，而武汉政府也想让冯玉祥承担这个罪名。因为如果他们自己立即公开反对把华中地区控制权交给他们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就会丧失民心。

除了这项协议外，他们各有各的打算，都想利用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作为国民革命军联军的总司令，冯玉祥想夺取北京，并且把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唐生智都置于他麾下。他认为自己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单独夺取北方。因此要利用武汉和南京，但不准备服从他们中任何一方。

而唐生智将军和武汉政府的其他人则想在进军北京前，征服南京和巩固他们在扬子江以南的政权。唐将军想这样做的原因

是，他对蒋介石怀着个人仇恨，而且蒋是他的竞争对手。汪精卫和武汉的某些政客也想征服蒋介石，因为他一年多以来一直蔑视他们的权威，特别是他在一年前把汪精卫赶出了广州。他们想在联合进攻南京中利用冯玉祥的军队。

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的确很困难。他们迅速失去了力量，但又不愿承认这一现实。他们的军队都控制在地方将领手中，而这些将领开始不服从党的命令。最革命的广东部队又在战斗中遭受了惨重损失。另外，曾经给他们力量的群众提出的革命要求也使他们局促不安。还有，他们缺乏金融力量，因为汉口发生了财政危机。

武汉政府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来参加郑州会议的。武汉政府的唯一武器是过去的革命成就产生的道义和政治威信。但是，武汉政府抛弃了这个武器，而一位有勇气的领袖则可能充分利用这个武器。后来，鲍罗廷在汉口对我说：“如果党的领袖们到郑州来时，以支持他们的工农群众的力量自豪而充满勇气，并要求冯玉祥将军接受党的领导，如果不服从，就以发动群众相威胁。这样就可能战胜冯玉祥，因为他毕竟受到武汉和俄国的钳制。”可是他们却来这里道歉，并且抱怨群众运动太过火，请求冯玉祥给予援助。于是，冯玉祥发现他们作为朋友或敌人，对他都没有用。于是，他与蒋介石结盟的打算就得到了肯定。”

此时，唐生智将军觉察到：在与南京的战争中，他不能对冯玉祥寄予任何希望；除非他在政治上迅速向右转，他的权力基础，远在湖南的部队，将会不属于他，而属于他手下的将领们；甚至国民党政客们也不再支持工农运动了。另外，他对为冯玉祥夺取北京没有任何兴趣。因此，他在会上一言不发，甚至不等会议结束，就开始悄悄地调动他的部队了。

郑州会议上互相倾轧的各个集团只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这就是抛弃工农运动。而他们之间的不一致却被一些客套话所掩盖。这就是中国的习惯。我们这些旁观者，以及在汉口等待会议结束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们，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武汉革命政府正在崩溃——他们的代表们正在郑州出卖他们，连和冯玉祥的军事联盟也未达成。

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我们三人在郑州城里溜达。这是一座古城，而沿铁路建成的新城区早已超过了古城的范围。令人难忘的皎洁月光耀着高耸的城墙和令人生畏的古城门，照耀着满布灰尘的杂乱街道和住宅。偶尔，一家打烊晚的店铺仍开着。一位店家坐在那里抽着长烟袋，招徕顾客。然而，街道上大部分商店已上好了铺板，烛光从破旧木板的裂缝中透出来。

我们正在寻找住在城里某地的一位将军。唯一办法是，在每一所有士兵站岗的官邸前停下来打听。由于士兵们除了熟悉自己的将军外，对其他将军一无所知，这样做是很费时间的。我们找到了唐生智将军的三十五军和三十六军，冯玉祥的许多军以及没有番号的部队的将军们的住宅，但没有找到我们要找的那位将军。然而，我们却游览了这座古城，观赏了街道上的和从庭院中伸出的蓬松大树、美丽如画的庙宇、林荫深处的宝塔。在这一切下面，我们看见了人，更多的人。他们蹲曲着身子靠着墙，交谈着，睡着，休息着；他们在墙下的阴暗处生了一堆火，煮着什么或什么也不煮，仅仅为了消遣——象以往一样，在灰尘中到处都是人，生活着的人。

我们好几次迷了路，但终于来到一扇关闭的城门前。翻译说服哨兵给我们开了城门。我们唯恐又被关在里面，连看也没看，就迅速地出了城。我们迅速走过曾经是护城河的低地，地上的残渣

仍散发着臭气。这时，我们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站在皎洁月光里的一面巨大的城墙下。绵延不断的城墙掠过山顶，背后是一片星空。夜里，城墙显得格外高——它可能曾经是中国的万里长城的一部分，城墙四周是有崎岖小道和许多溪谷的荒原，是土匪出没的地方。这是饱受战争摧残的一片开阔地，然而它显得格外平静。

我们绕城慢慢地走，直到遇见深夜还未收工的黄包车夫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回到中国银行庭院中的小屋时，天还热得难受。外面庭院的大石板上和一盆盆花之间，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名士兵，这些要人们的卫兵离开了炎热的房间，睡在阴凉的地方。雷娜和我，由于是女性，被剥夺了睡在院子里的权利。然而，我们敞着门窗睡觉。我们的听差小李在门外地上铺的一条席子上睡。

我们怕热，但已对军队习惯了。虽然我们和士兵之间只隔着一扇敞开的门，我们仍然在美妙的月光下，战火包围的郑州城里，心满意足地入睡了。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冯玉祥的列车在鞭炮、军号和口号声中进入车站以后四十二小时，突然有人告诉我们：“收拾行李吧。会议结束了。火车下午开。”

我们被惊呆了。会议结束得这么快！我们立即感到会议有失败的危险。但据说，他们取得了完全一致的协议，批准了改编冯玉祥部队的计划，决定把广东和湖南部队派到南方去“巩固南方几省和肃清土匪”。政治方面，他们成立了河南、陕西和甘肃三个省政府，组织了一个政治委员会来掌管这三个省的党务，任命了一个铁道管理委员会来负责恢复交通。这真是奇迹般的成功。当冯玉祥退出最后一次会议时，他的对外发言人递给我一份冯玉祥对我提出的问题的书面答复。他宣布：完全效忠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编他的部队，使其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

听起来这真象完全一致的协议、各种力量的大联合，比任何人所期望的都完美。但任何人都没料到，一星期以内，冯玉祥就要在徐州和敌对的蒋介石达成同样礼貌的协议。

冯玉祥断定，除了国民党剩下的那一点政治威信外，武汉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他已经从那里得到了他所要求的政治威信。他已改编了自己的部队，并得到了批准；他已任命了三省政府，同样也得到了批准。他们甚至还答应给他钱和军需品。作为报答，他也给了他们一个不费分文的“承认”，而这个“承认”一周后就被他对蒋介石的类似“承认”取消了。

当我们的列车开出车站向南驶往汉口时，告别和诺言如此彬彬有礼，以致武汉的代表们并不知道他们已被击败。他们在郑州进最后一次午餐时，曾一度消沉，但几小时后，他们又振作起来了，仍然象以前那样谈笑风生。唐生智将军和陕西的于右任将军^① 正交谈着趣闻。人们认为于右任是作为冯玉祥的代表陪同南下的，而实际上他已被冯玉祥逐出境，因为他对农民太仁慈了。

就这样，在虚构的成功中，列车向南行驶。我们这些旁观者还以为联合已达成，代表们也并非不愉快，他们已经得到了冯玉祥的“承认”，而在他们头脑中，这种“承认”意味着对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宝贵的威信。现在他们可以背弃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把罪名推给冯玉祥了。这件事不能做得太露骨，得在花言巧语的掩饰下慢慢地

①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于右任当选为第一届中央委员。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并率全军加入国民党。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为授旗及誓师的党代表。一九二七年初，于右任担任国民军驻陕总司令，并由驻陕总部行使政权（相当于省政府主席职权），作会师中原，策应北伐的准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于右任逐渐与蒋介石合流。——译者注

做。虽然他们在和蒋介石打仗上没有得到冯玉样的支持，但他们认为冯玉祥保持中立是可以肯定的。在返回汉口途中，远未到达断桥时，他们已在舒服地调整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新任务。现在他们不再谈革命工农的希望和需要了，而以前他们叫得比谁都响，尤其擅长辞令的汪精卫，格外起劲。然而，现在只要喊几声“恢复法律和秩序”和“控制共产党”也就可以安抚叛乱的湖南军阀了。

我们越过了河南中央大平原（这里的农民在过去几天中已收割了麦子，正在装车，准备运走），进入高山中的通向湖北稻田的关口。在下弦月的暗淡月光中，加仑将军指着树下和峡谷中的一些勉强能辨识的躯体说：这就是沿着这条铁路冲进关口时牺牲的广东士兵。为了攻克这个山口，他们付出了生命。另有一万四千名伤兵躺在汉口医院里；这些广东和湖南的小伙子为了刚开始明白的希望向北挺进。为了攻克这个关口，革命的铁军为胜利牺牲了自己，而他们活着的盟友却在联合镇压工农的基础上建立了军事独裁。

不久，我们又回到了山谷中精心修整的稻谷梯田。田里的水闪闪发光。庄稼在晨雾中呈现一片模糊的绿色。这一切真美极了。然而，农民却为了它几乎累断了腰。在鞭炮和欢呼声中，在旗帜挥舞下，我们又进入了汉口车站。这样盛大的欢迎使以往任何一次欢迎相形见绌。劳动组织的代表们正等在那里欢迎我们——他们是革命妇女的代表、学生代表、反帝同盟的裹着头巾的印度代表。他们来欢迎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派出的使者。这时，背叛了工人、学生、妇女的武汉政府代表，象胜利者一样，走进了欢呼的人群。

几天以后，工人们举行了总罢工，抗议郑州会议对他们的背叛。

六、工人们在汉口集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年会^①在一个巨大的会堂中开幕了，三百八十名代表以及通过武汉三镇各工会持票前来参观的约两千人挤满了会堂。观众们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但为了参加开幕式，还得再坐五小时。此外，还有好几千人想参加而未能如愿以偿。这就是人们对民族革命中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趣。

巨大的会议厅就象一棵圣诞树：墙与墙之间挂满了红旗和五彩缤纷的绢纸彩带。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到处可见。其中还有镰刀斧头的苏联国旗，这不仅仅是向苏联表示敬意，而且因为镰刀斧头是一切劳动者的象征。楼厅边缘上挂着金字或黑字口号的横幅，讲台后面

①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召开。这次即斯特朗报道的大会。因此，此次大会应称为“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译者注

的墙壁上挂着孙逸仙博士的肖像和许许多多红旗。把走廊的四角都挤得满满的人群穿着蓝色和白色的中国工人服装。顶棚上约有四十台木制风扇在旋转，搅动着热得发昏的代表们头上的空气。虽然我们静坐在讲台上，仍感觉大滴的汗珠在背上流下来。这就是汉口夏季的酷暑。然而，对那些热情的代表，这种炎热似乎并不起什么作用。

五十多名劳动童子团团员组成的仪仗队，站在发言者经过的门口。他们穿着棕黄色制服，戴着红领巾，手持长棍，排成整齐的队伍。他们的代表，一位十三岁的男孩，走上讲台，向大会敬礼，并以清脆的嗓音向大会祝贺说：劳动童子团正关注着工人运动并跟随着工人领袖。这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约有十六个组织向大会祝贺。仅宣读贺词就花费了整整五小时，使人感到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正在革命的中国形成。出席会议的有以下组织的代表：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农民协会、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省、市各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等。三个外国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并带来了贺信。他们是：赤色职工国际的罗佐夫斯基、共产国际的罗伊（印度），瓜哇工会的两位代表。

主席台上坐着海员出身的苏兆征，他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又是国民政府劳动部长。李立三原是学生，后来是总工会的秘书长，是主席团中最著名的成员之一。主席团下面是昂望着的一张张生气勃勃、全神贯注的脸，表现出对生活的强烈兴趣。这里有严肃的、微笑的、善良的和饱经沧桑的脸；闪耀着青春的、乐观主义的和经受过人生不幸而仍然顽强斗争着的脸。各种各样的脸有一个共同特点：火一般的不屈不挠的决心。讲台正下方也就是我坐的地方，有三位年纪不过三十岁的女代表。其中一位我记得特别清楚。由于她蓄着短发并有股假小子的劲儿，开始我不敢肯定她是

个女孩，还以为是一个两颊红润的可爱的小伙子。当她仰望上方，带着狂喜的忠于革命的神情，踮起脚呼口号时，她把手臂用力地伸向空中。突然，她有些窘迫地嫣然一笑，猛地坐下，因为她失口独自喊了一句口号。

这次大会的仪式和我后来在其他会议上看到的一样，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全体起立，向孙逸仙的肖像三鞠躬并背诵他的遗嘱。然后，为革命烈士默哀。接着连续五小时宣读贺信贺电，多次被欢呼声、口号声和国际歌所打断。国际歌是用中文唱的。我们西方人听起来觉得很不协调。他们同时以许多音调、热情地、有节奏地喊叫。但中国人呼口号时，把一只紧握的拳头高高举起，这倒是很好的办法。

一位兄弟组织的代表在发言中定下了大会的基调。他宣称：“前三次大会的任务是组织和宣传，而这次大会的任务是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实际革命斗争。在这场革命中，你们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现在要起决定性作用。当代中国革命的结果将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

在革命严重关头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并没有多长历史，但成长得非常迅速。然而，西方国家发展较慢的工人组织几次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中国工人告诉我，两年前他们写信给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要求派一个顾问代表团来和他们的执行委员会会谈，但得到的答复是：“由于中国没有工人运动，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派出这样一个代表团。”难怪此后中国工会就和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打交道了。

尽管我了解一点中国工人的情况，但开始时我也不相信中国有三百万工人，其中半数是在过去一年中组织起来的。我也没想到，参加这次在战火包围下的汉口召开的大会的代表，竟会是在遥远

的省份通过实际选举产生的。我还以为这些代表只不过是从通过封锁线的工人中挑选出来的所谓代表，但大会本身说服了我。大会发言是权威性的，反映了中国十八省中十四个省的问题。我问了许多代表，发现他们都是在地区会议上正式选举产生的各工会的代表。大多数人是来自工厂、矿山和运输部门的工人，只有几个人是专职工会工作人员。所有工会中只有三个——海员、铁路、邮政工会——是全国规模的组织，由全国领导机构派出代表。其余代表都是地区工会选举出来的。地区工会有些类似美国的中央工会理事会，代表好些行业。说实话，这种组织形式是过渡性的。随着国民革命军的胜利进军涌现出的数以万计的地区工会，还没有时间选举全国规模的各种工会。此时，典型的工人组织形式是商店和工厂的工会，它们结合成城市或地区的联合会，并开始按行业结合成全国性组织。

苏兆征主席在一个长篇报告中，概括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直到不久以前，唯一的工会组织形式还是手工业工会。这种工会目前仍然是偏僻地区的主要组织形式。工人们住在师傅的作坊里，不但不拿工资，而且要为学徒付出一笔钱。这样劳动几年，学会一门手艺，最后成为一名熟练的手艺人。几世纪以来，这些工人被组织在同业公会里。主人和雇工都参加这个组织。当然主人是更重要的成员。在工人和雇主的争执中，很少能起保护工人作用。这些同业公会是和新工会尖锐对立的。

不久前，现代工业才在中国建立，而且主要是外国资本家建立的。在廉价工业劳动力基础上，投资项目和价值增加了。不久，中国资产阶级也开始拥有自己的工厂了。

特别在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业大大发展了。手工生产和机器生产间开始了竞争。小手工业主的收入不断减少。而他们又以

削减工人的工资来维持自己。工厂受到了几世纪以来手工业行业中的工作制度的影响，仍利用学徒制获取劳动力。工厂也几个月不付工资。在手工行业中，工人和主人住在一起，劳动时间是无限制的。工厂也同样这样做。上述现象在手工业向现代机器工业过渡中普遍存在。加上，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问题就更加恶化了。在资本的力量日益强大并国际化的情况下，矛盾就更激化。

中国有许多工人，除每天吃主人的几碗饭外，根本就没有工资。作坊、工厂里的徒工和在东三省的矿工就是这样。许多年来，汉口工厂里的童工每月只拿三角钱。上海棉纺织厂里的熟练徒工每月工资一元五角。铁路工人中不熟练工人月工资五到十元，熟练技工十到二十五元。这就是工业工人的最高工资。熟练矿工每月工资八到二十元，不熟练矿工五到九元，而纺织厂的工资更低。

然而，为了得到这点工资，还要工作很长时间。许多店员站柜台从天亮站到半夜。工厂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算是少的；许多工厂工作十六小时。周休息日制度在中国没有普遍实行。手工业工人一年到头根本没有休息日，而工厂工人每月能休息两天就算很幸运了。湖北银矿的矿工连续二十天在矿井里干活，连吃饭、睡觉都在矿井里。仅在运输和金属加工这样的现代工业中，工作日有时才缩短到八至十小时。上海工厂里，周休息日制比较通常，但决不普遍，而日工作时数从十一到十六或十八小时。

由于大工业主要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中，第一批工人组织很自然地不仅仅要和单个的雇主斗争，而且要和在中国的整个外国帝国主义制度斗争。几乎从开始起，中国工人运动就受到反对外国剥削的爱国主义的启发，成为政治性很强的活动。工会成长的几个主要时期都和政治危机相吻合。

第一批工会在香港成立，迅速发展到广州，建立了四十至六十

个工会。但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是从一九一九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游行示威开始的。北京学生发起了全国范围的抵制运动，后来迅速发展到工人队伍中。此时，俄国革命的影响也传到了中国，学生中的许多革命青年开始和工人阶级结合。

紧接着爆发了一九二二年的海员大罢工。这次罢工从香港开始，起初只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但由于英国以武力镇压相威胁，迅速变成政治运动。这次罢工历时五十天，以工人们的胜利结束。它第一次给中国工人以这样的信念：白人资本家的力量并不是绝对不可战胜的。

此后不久，曾经组织罢工委员会声援海员罢工的华北铁路工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举行了罢工，并组织了十六个分工会。汉口的动乱是以人力车夫罢工和汉阳铁厂工人罢工开始的。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代表二十三万工人的五十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工人组织应按现代工业的方式来组织，主要为争取组织工人的权利，为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不受残酷待遇而斗争。尽管这些目的是纯经济性的，但工人阶级已经和军阀发生了冲突；最明显的是和吴佩孚的冲突。他在汉口杀害了几名罢工工人并以武力镇压罢工，使工人组织在他掌权的整个时期中被迫转入地下。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是由有良好组织的海员工会、铁路工人工会、湘赣矿工工会和广州工人召开的。它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的。这是一个革命风暴时期。在上海日本棉纺织厂的一次罢工中，日本工头杀害了一名中国工人。于是，示威游行开始，逐渐发展成著名的上海五卅惨案。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参加游行的工人和学生，激怒了全中国。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的会议，有代表五十七万有组织的工人的二百三十位代表参加，是两年前的

一倍多。会议一致决定，与农民联合并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民族革命运动，还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及和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联合。

虽然工人组织在两次全国劳动大会之间的几年中发展得很快，但与在五卅以后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参加工会的人数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了。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农民，甚至商人都参加了反帝游行示威。据估计，一百万工人参加了，还有一千万农民和知识分子也参加了。这些游行示威直接引起省港大罢工。它开始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在罢工的某些时期，使香港这个大港每天损失两百万美元。在这时期中，组织起来的工人开始被人们认为是民族革命中最强大的战斗部队，并且和国民政府的计划结合得更紧了。

当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北伐战争正要开始。代表一百二十六万四千名工人的五百一十四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会议的每一项决议都是政治性的。甚至经济性的决议也是对国民政府提出的要求，因为工会已把自己的命运和国民政府联系在一起了。他们要求制定八小时工作日和最低工资的法律。他们催促国民政府北伐，扩大其管辖范围，最后统一全中国。在北伐期间，工会会员人数惊人地增加。北伐军打到哪里，工会就发展到哪里。工会不但吸收工业工人，而且吸收数以十万计的搬运工人、手工业工人。不参加工会的人就会被群众认为是反革命。在湖南，工会会员从八万增加到三十五万；在湖北，从两万增加到四十万。据苏兆征说，宁汉分裂时，中国工会有三百万会员，是各行业工人的大联合。多数人在工会活动方面未受过训练，但在革命斗争中迅速成长。蒋介石镇压了上海工会以后，工人们至少有足够的组织工作能力，以

秘密方式继续活动。这样，他们选举了参加在汉口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

中国工人从未在全国范围内面临过这样严重的问题。他们知道，他们正面对一场关系国民革命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关系他们自己今后有无组织工会权利的斗争。他们在大会结束前制定的宣言中说：“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是在国内和国际的严重形势下召开的。帝国主义已经派兵到上海、山东和北京。他们的军舰在武汉集结，企图恐吓武汉政府。……他们明确地表示，准备对中国革命采取武装干涉的政策。……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威胁苏联——中国的唯一朋友和世界革命的中心。”（指北京和伦敦政府勾结起来袭击苏联大使馆。）

他们说，在国内方面，“反革命每天都在增加力量。”他们点出了上海的蒋介石、广州的李济深^① 和湖南的许克祥^②，并指出：他们是屠杀工人、农民和一切革命分子的反动军阀的封建势力的继续。他们意味深长地说：“在国民政府管辖的范围内，工人运动只能在武汉公开进行。……反动派可能有一天会控制武汉。我们必须为工会的继续生存而斗争。我们现在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宣言接着谈到与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宣言最后是以“国民政府万岁！”的口号结束。

宣言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提一下。第一点是，中国工人运动首次把自己的斗争和俄国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自然的联

① 李济深：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译者注

② 许克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译者注

系。这不仅因为俄国工人不久前进行了类似的斗争，而且因为俄国是援助中国工人运动的唯一国家。俄国工人为支持五卅以后发生的大罢工捐献了财物，并继续长期支持省港罢工。世界上有哪一个劳工组织，对在战火中召开的、面临这样多严重问题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给予过这样的支持和祝贺？美国劳工联合会是否发出过祝贺中国工会会员迅速发展到三百万的电报？欧洲是否发出过哀悼上海和湖南的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的电报？在最严酷的斗争时刻，除了俄国人及和俄国工人联盟的各国少数激进工人外，没有人给中国工人以帮助和同情。

俄国人派出了一个庞大的、精心选择的友好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不仅包括赤色职工国际主席罗佐夫斯基，而且包括金属制造工人、铁路工人、教育工作者和远东工会的主要领导人——他们能具体介绍俄国革命给手工业和工业带来的影响以及谁参加了这项工作，以补充罗佐夫斯基所谈的道理。这些人不但参加了大会，而且花了几周时间访问汉口以及汉口附近的工厂，了解中国工人的情况，回答有关俄国革命的任何问题。

中国人热切地倾听了有关策略问题的讨论，因为俄国人成功地进行了革命并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他们向中国人奉献了同志友谊和宝贵知识。俄国革命的道路是一条必胜的道路。它正在建立亚洲工人间的牢不可破的联系。他们已在这次大会中感觉到，苏联和中国之间没有什么界限。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宣言大胆地指出了镇压工人的封建军阀的姓名，包括湖南的许克祥将军。接着宣言明确指出，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然而，湖南名义上仍忠于武汉政府；而工会也忠于武汉政府，以“国民政府万岁！”的口号结束自己的宣言。国民政府特派使出席了劳动大会的首次会议，并在会上致了贺词。它的头号

人物汪精卫还在会上作了长篇革命演说。然而，同一个国民政府却容忍在它管辖下的一个省集体镇压和屠杀工人领袖。显然，这样的局势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必然会同一个或另一个方向转变。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向武汉提出了挑战。

大会期间的最后一个上午，会议已结束，只剩下一些委员以及工人和士兵的联欢会有待举行。这时，唐生智手下的一些士兵，好象是在回答大会的挑战，突然占领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办公楼，并开始抢劫。这件事发生在清晨，大会工作人员都不在场，而且事先未得到任何警告。一位忠诚的佣人由于提出了抗议，头部被打。消息迅速在汉口传开：象其他地方一样，军队也开始在这个城市镇压工会了。我在鲍罗廷的办公室的外间等候接见时，听到了这个消息。我看李立三匆忙走过，脸色苍白，没有认出我。后来，汪精卫和其他人也到了。他们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我把这则消息送到《人民论坛报》后，就到工会总部去了，不料被士兵们挡了回来。难道武汉工人运动就这样结束了吗？不，这还不是结束。

下午一点，我又去工会总部，发现士兵已撤走。苏兆征拖着疲乏的身子走进大楼，重新接管工会。他向我道歉，上午失约了，虽然这并不是他的过失，而是士兵们强占了我们的约会地点。

人们对这个插曲作出了种种“挽回面子”的解释。他们告诉我们，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是某些驻军的一次违反纪律的行动。士兵们误解了一次预定的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的行动，在没有警卫的工会会议厅中发现了抢劫的机会。国民政府得知此事件后，立即和汉口卫戍司令联系。司令命令士兵们撤出了工会。看来武汉政府还不十分愿意在向工会致欢迎词后不久，就看见全国的工会组织在他们的家门口被镇压。

不论这是不是少数几个士兵的一次误会（湖南士兵不遵守纪

律，所以也可能这样做。），这是一次警报：军人们正步步逼迫政府对工会采取行动。当我问苏兆征：肇事的士兵们是否会因这次非法行为而受到惩罚，是否有希望收回被抢走的代表们的行李，他只疲倦地笑了笑。能收回办公楼，他已够高兴了。他简单地回答：“我们今天在这里办公，谁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那天晚上，工会仍按预定计划举办了工人和士兵间的盛大联欢庆祝会，会上有音乐、舞蹈、戏剧、演说等节目。工人们仍竭力教育当天早晨曾经粗暴地对待他们的士兵。他们仍然表示忠于“武汉革命政府”，虽然心里明白，它只不过是半革命，而且很快地连一半也不革命了。他们知道，他们的组织迟早得转入地下，但仍充分利用这个短暂的喘息机会。武汉给了他们一点时间开会和进行组织工作。他们甚至在一九二七年六月还在通过拥护“革命的武汉政府”的决议。不到一个月以后，他们已在逃亡，躲避仍然由这些人组成的政府的追捕。

七、中国的劳工领袖

出席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来自各省，他们各自的经历大不相同，你可以从他们的生活经历中看到中国工人运动史。我花了许多时间和来自中国各地的代表交谈，了解工人运动的各方面情况。

全总主席苏兆征是一位广东的农家子弟。由于当地劳动力过剩，年轻时就被迫离开家乡到海上谋生。他对我说：“我从未上过学，一直是自学。我很会鼓动，但头脑很简单。”我从其他人那里获悉，苏曾在世界各港口组织国民党的分支机构，并冒着生命危险同中国的封建君皇分子展开斗争。随后又参加组织一九二二年著名的海员大罢工，使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认识到世界上的白人老板是可以打败的。这是中国劳工运动的真正开始。苏参与组织了这一运动，随着运动的发展，升任劳工组织的主席。针对香港而举行的广州长期罢工和抵制活动也是他领导的，这一运动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间，大大影响了这一英国华南基地的繁荣。

我还会见了其他许多来自华南的海员。他们站在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前列，得以接触西方并向后者学习。一位姓陈的海员，是穷苦船工的儿子。正如数以万计生活在广州附近江面上的人一样，他也生在船上，长在船上。他的父亲曾到爪哇去当合同工，每月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三四元钱寄回家。在国外没当了几年劳工，因劳累过度，死在异乡。这也是华南地区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典型例子。陈幼年替地主放牛，一年得到一百二十磅米，一顶斗笠和一件外衣。就这样，他长到十三岁，才当上一名海员。

李立三和所有这些人不同。他是湖南农村教师的儿子，读过七年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去过法国，在钢铁厂中工作，看到法国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取得了较好的生活条件。回国后，他首先在家乡的矿工中照样把中国工人组织起来。为了逃避捕杀。他四次易名。他笑着告诉我说，上海那些受雇的刺客每次要袭击他时，都故意泄漏风声，以便使酬劳优厚的雇用期能拖长些。他关于中国劳工运动的观点是超越国界的。

他告诉我说：“只有在中国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爪哇、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的工会组织才可能蓬勃发展。”

但我记得更多的不是他的世界革命的观点，而是他在我为他拍照时所暴露的弱点。他带我匆匆离开挤满工人纠察队和贴满标语的大院子，来到一个颇为凋零的中国式小花园，以花木溪水为背景，摆好姿势让我拍照。这样，我所拍的他，不是在胜利的喧哗中，而是在平静优美的环境里，然而，他的一生是在最不平静的动乱中渡过的，他做过秘密组织工作，“偏离”过党的路线，然后通过公开认错和学习，在革命队伍中重新工作。

还有几位次要的工会领导人，他们也许永远不会闻名于世——如今也可能在某次未公布的冲突或逮捕中死去——但是他们

的一生为我勾画出一幅中国工人阶级雄心壮志和复杂斗争的画卷。他们是：一位姓于的上海青年鼓动家；一位姓马的不屈不挠的广东工会组织者；一位姓唐的湖南失业矿工。他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国的动乱和剧变的一部分。他们三位，一位有火一般的活力；一位有极度的耐心；一位除了想过上好日子外，不知要追求什么。

于莫怀（译音）是一个来自上海的鼓动者。他有一张椭圆型的脸，高高的额头，一双诚挚清澈闪耀着智慧的眼睛。他容光焕发的脸上并没有留下长年斗争的风霜，几乎看不出他已经是二十六岁的人了。他不象是刚刚逃脱蒋介石秘密警察追捕的鼓动家，而象是一个欢乐的、充满希望的小伙子。于莫怀是上海代表团中最健谈的一个，常常使用激烈的言词。他纯粹是一个鼓动家，除了从一种行业到另一种行业组织工人外，没有别的兴趣。作为一名技工，他能轻而易举地从铁路调到发电厂或纺织厂工作，目的不是建立某个特定的工会，而是从各方面把工人的力量组织起来，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他参加过组织上海工人工作。他们夺取了政权，后又把它交给了国民革命军，而后者却反过来镇压他们。

他告诉我：“我出生在扬子江上的安庆。父亲是一位手工业工人，我三岁时，他就死了。在我的六个哥哥帮助下，我读了一年书。我十一岁到一艘轮船上当茶房，十六岁当了信号手，还学会了技工手艺。十八岁时，上岸到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当线路工。从那时起，我对工会发生了兴趣。当年我在江上的生涯，对我很有用。由于我对扬子江上的所有港口都很熟悉，使我多次得以从敌人手中逃脱。有一次，奉系军阀的部队追捕我。但一连几个月，在忠诚的工人的保护下，我和李立三照样在铁路线上做组织工作。我去广州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回来后，发现本省军阀部队云集，无法再待下去。因此，我决定去上海，组织那里的市政工人。我给了法租界电

厂一个工头五十元贿赂，他就在电厂给我安排了工作。由于有这个便利条件，我在几个月内组织了四个雇员工会——电车工人、清洁工人、电厂工人和自来水厂工人的工会，为国民革命军攻占上海作了准备。”

小于的观点特别能代表上海工人。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慢吞吞地建立一个一个的工会，而是联合起来向国际剥削阶级作斗争。上海和香港是这种冲突最公开和最明显的地方，因为新组织起来的工人们面对的不是单独的中国雇主，而是世界资本的强大力量。在其他许多方面，于莫怀所走的道路也是很典型的。他是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后参加工会的。那时，抗议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罢工和抵制运动正席卷全中国。中国的革命生活是以举行抗议活动的日子来计算的。今天的工会领袖多数就是在那时参加革命的。于莫怀也参加了一九二五年上海工人的“五卅”游行示威。这次示威引起了众所周知的南京路枪杀事件。在这次事件中他被捕了，后来以一百元保释。五卅枪杀事件后，工人情绪激昂，抗议浪潮高涨。于莫怀和其他三位工会组织者在三个月内把上海的工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万。

他说：“所有这些任务都是我们四个人在工人革命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完成的。八月底，军方查封了上海总工会，于是，我们又象五卅以前那样，转入地下。”

他把南京铁路工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日工资从两角增加到两角五分，每两周休息一天。后来，他们取得了每星期天都休息的权利。这些就是世界上最勤劳而工资最低的中国工人赢得的小小胜利。他把宁波铁路工人也组织起来，并且赢得了同样的权利。他还把上海市政工人组织起来，使他们每天工作十一小时，月工资从七元五角增加到八元六角。

他告诉我：“所有这些胜利给其他市政工人以很大影响。因此，我们能很快地组织起一个市政雇员总工会，包括电话、电报、电厂、自来水厂和邮政工会。这样，我们就为争取上海的总罢工工作好了准备。”

他还讲述了这样一件振奋人心的事件，“工人纠察队突然袭击并夺取了警察局，缴获八百支步枪。我们集合了几千工人，用这些武器以及棍子、铁路工具，缴了把守军火库的奉系军阀士兵的枪枝，经过两天半激战，占领了军火库。这时一切权利都在工会手中了。在革命军到达以前，我们选举了临时市政府——一个由十九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五人是工会方面的代表。五个区的纠察队维持秩序。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武汉政府表示效忠，他们接受了。”

于莫怀还谈到工会和“青红帮”流氓之间的斗争。于说“青红帮”是蒋介石武装的，其目的是挑起事端，为镇压工会制造借口。

当工人们集结在那里等待他们的领袖和军方谈判的结果时，军队把机关枪对准他们。谈到此，他激动地说：“那是上海发生的最残暴的一次镇压。”他的妻子遭到逮捕，家庭破散，同志被处决。他自己装扮成房东的儿子，穿着漂亮的衣服，手里抱着孩子，通过侦探们的包围，走到江边。同志们已为他买好去汉口的船票。

“但我不敢作为乘客上船，因为侦探们在监视着。这时，我想起了我当过茶房。于是，我穿上茶房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捆扫帚走上船去，装作刚为轮船采购了东西。”

于莫怀要我把他的经历告诉全世界的工人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工人所受的苦难，让他们知道我们并非暴徒，而是文明的人，只是起来反抗沉重的压迫。”我不能肯定于莫怀所谈的情况能否证明这一点，但它能使人们理解为什么中国工会能如此迅速发展，而对这个事实，西方世界至今还不相信。中国工会是在被一次

又一次的“事件”所激起的炽烈的革命火焰中，以及在许多象于莫怀这样具有坚强意志的组织者的推动下，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

如果说在上海和香港，新组织起来的中国工人面对的是世界现代资本主义的联合力量，并在这种力量的压迫下发起暴动，那么在广州，他们的对手则是有悠久历史的同业公会，那里的商人手段更加狡猾，令人生畏。广州工人经历的斗争也更复杂，遭受过多次失败和被人出卖。在现代工业兴起以前，这些同业公会曾在中国盛行。当广州成为和西方世界交往的第一个中国口岸时，这里的商人便以古老封建式的奸诈，加上西方的新知识和谋略，来适应形势并利用一切条件，加强对各方面的控制。

马舟帆（译音）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广州印刷工人。在他工作的短短九年中，目睹广州新工会诞生以及它与古老的同业公会的斗争。他参加了斗争，耐心地组织，学习，战斗，失败，又从失败中取得经验。他在李济深的势力到达之前逃离广州，出席在汉口举行的劳动大会。但是会后他不能回广州，再去就有被绞死的危险。他毫不气馁，积极组织有八省代表参加的印刷工人第一次会议，准备在内战的烽火中建立中华全国印刷工人工会。听起来，这并非是什么浪漫的目标，但却是他坚持不懈为之奋斗了多年的目标。

马舟帆是个短小精悍的小伙子。他缺乏于莫怀那样的激情，但有一股顽强的毅力。他比一般中国工人受的教育多，这对印刷这个要求文化水平较高的行业来说，是很适合的。他父亲在离广州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手工业作坊，因此能让他上了五年私塾，但后来，马舟帆放弃了学习，到一家米店里做工，从早到晚搬运一袋袋重达百磅的谷米，而得到的只不过是顾客给的小费，雇主只提供食宿。

在劳动的重压下，他的身体垮了。一年后，他用自己和父亲积

蓄的十五元钱交给一家印刷厂，从而使他能在那当学徒。他没有工资，工头答应他学徒期满后给他每月十元钱的优厚待遇。在这里，马第一次领教到世间的欺诈。因为他成为一名正式工人后，每月拿到的不是十元，除了吃饭外，只拿到一元钱。

他对我说：“这是包工制造成的。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和这种制度作斗争。工头拿去了工人做工的全部报酬，只给工人不得不给的一小部分，其余的都装进了他自己的腰包。我们没有组织，没有力量迫使工头合理地分配工资。”

不久，马自己也在一家报纸印刷厂当上了工头。这家印刷厂设在离广州不远的地方，是孙逸仙博士的支持者开办的。他取消了包工制，和印刷厂的全体工人渡过了短短两年愉快的学习生活。他选择了熟练工人，因此用六小时就能完成全天任务，而且工人每月拿到九元钱的工资，他自己也只拿十元。他们把宝贵的空闲时间用于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工会理论及马克思主义，获得了许多知识。后来，由于报馆老板与孙博士发生了争执，印刷厂关了门。他只好回到广州，当了一名普通印刷工人。为了每月四元五角钱和米的津贴，每天工作十二到十三小时。

从那时起，马开始组织印刷工人，他说：“我认识到，为了争取自由和改善生活，工人们组织起来是必不可少的。开始，我们在车间里鼓动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但包工头们依靠同业公会从内部加以控制，阻挠我们的斗争。因此，我开始感到，我们需要一种没有包工头参加的工人组织。我所在的印刷所工头势力太大了，无法开展工作。于是，我转移到另一个印刷所去，在那里组织了中国排字工人协会，很快吸收了一百名会员。这时，包工头们也组织力量对付我们，通知各印刷所不得雇用我们的会员。有三个印刷所坚决支持我们，但雇不了我们全体会员。”

马舟帆又一次失业了。以后他成了香港的一个有名的不搞包工制的诚实工头。他应邀去掌管一个工人怨言甚多的印刷所，因为前任工头带着工人们的工资逃跑了。他花了很多时间在香港组织印刷工人。一九二五年大罢工时，他又回到广州。那时，他在组织工人方面更有经验了。

马舟帆说：“我现在认识到，取得成功只有一条路，就是把印刷厂中的各种工人都组织在一个工会里。过去印刷工、排字工和外文排字工都有各自的组织。这一次，我们把各种工人都联合起来，因而取得了胜利。我们有了新的力量，一是由于我们有了较好的组织，二是由于国民革命斗争的力量有所壮大。我们迫使厂方接受了一项协议：不实行包工制，每月给我们十五元工资；如果不领取老板提供的米，还可以拿四元钱。现在我们不再睡在车间的桌子上或地上了，而是住在老板提供的住房里，每间不超过两三人。现在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我们通过工会所得到的成果全部夺走，即使是如今控制着广州的军阀独裁者也办不到。”

马舟帆组织印刷工会以代替旧的雇主同业公会，这个行动使整个广州震动很大。由此也引起了许多幻想和矛盾。各种中央工会理事会成立，但它们之间互相倾轧。于是又成立了一个协商组织。该组织的创建人蔡某，是个图谋私利的人，卷款潜逃了。最后成立了广州各行业的代表协会，马舟帆则代表印刷工人。这个组织成立后的第二年，会员达到二十二万人。但它和其他工人组织间发生了流血冲突，带枪的人、拳击者和职业拳击家给这场冲突火上加油。马舟帆说：“他们用棍子、铁棒，有时还用枪互相残杀。”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为生存而斗争都不如在中国南方那样激烈，工会控制的就业权利实际上就是生活的权利。谣言传开了，说两个敌对组织都出一千元雇人谋杀马舟帆！

马舟帆笑着对我说：“我不相信这些谣言。他们不会出这么多钱，他们散布谣言仅是为了吓唬我。总算还好，我在李济深实行军事独裁之前离开了广州。军阀们‘改组’了工会。他们把老板的亲戚塞进来控制原来的印刷工会和广州代表协会。他们把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袖们赶走，而把走私分子塞进来……如果我现在回去，他们会杀掉我，连那一千元也不用花！……工人群众会承认他们派我来汉口所做的工作。我们正在这里筹建第一个中华全国印刷工会。由于内战的影响，只有八个省派出代表。有这些代表参加，我们开了一个头，将来有可能再增加……。”马舟帆对最后胜利毫不怀疑，而且没有功夫对过去发牢骚或对未来作美妙的预言。九年来坚持不懈的工作，使他认识失败乃成功之母。

如果没有我所遇到的一位来自湖南的矿工的故事，关于中国工人的描写将是不完全的。这人在四十年的岁月中，有二十年以上是在汉冶萍公司的大型矿山中劳动。唐寿一（译音）没有于莫怀那样的青年激情，也没有马舟帆的组织能力。他来自一个落后的农民家庭，不识字，长年累月在井下工作。仍然用清朝的老皇历来计算日期。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思想似乎都没有进入他的头脑。然而，他也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为饥饿所迫，他和工人一起接管了这个空矿山，自己开工。同时，他们请资本家回来办矿。

唐寿一说：“我工作的矿山是一座非常有名的老矿，从清光绪二十一年就开办了。”他称这个由日本投资的矿为现代矿井，提到矿里的电车和电车司机领取的特别津贴。他说这个公司的一个矿就有七千工人，另两个矿有一万三千人。

“我到十八岁还是个农民。土地养活不了一家人，我只好到矿上去做工，每天挣一百二十个小钱（合二分半银洋），工头给我吃的和住的，公司给我们一个地方洗澡。但伙食和住处很差，一间棚屋

要睡上四十个人，冬天没有炉子，夏天很热，有臭虫和蚊子，没有卫生设备。吃饭不定时，饿了就自己做菜饭吃，菜是大批买进的，堆在棚里已开始腐烂。工头不发工作服，也不发鞋子。

“我开始做工时是每天三班，每班八小时。但光绪末年时，改成每天两班，每班十二小时。工人曾举行大罢工，但失败了。为了叫我们每天多做四个小时，他们把工资加到一百六十个小钱（合三分半银洋）。成为熟练工后，我每天挣三百小钱，后来又挣三百六十，再后来由于劳动力缺乏，每天挣四百小钱（合八分银洋）。这是十四年前的事，这以后一直到我们组织工会为止，再也没有变过。”

唐继续说：“到湖南来帮我们组织工会的是李立三。起先，他为工人在业余时间办了一所学校。整个夏天都上课，直到其中最勤奋的学生会识字读书为止。这些人已经被他培养成为工会的组织者，当然是秘密进行的。他们把全矿分成四十四个区，每区有一名组织员。组织员又挑选其他工会会员来协助工作，每名会员负责做一百个人的工作。这些人又组织并挑选十个人来进行协助，每个人再负责做十个矿工的工作。这样，我们很快就把一万三千名矿工都组织起来了。我们不叫工会，叫矿工俱乐部。虽然如此，老板还是想破坏它。但是我们的要求不是针对老板的，我们只对工头提出要求。”

工头包工制度在广州的小厂中是一种弊病，在一座大型的现代矿井里更是不能容忍的大弊病。在那里，一名包工头雇用并控制五十到一百名工人，给他们吃得很差，每天只付给四五分钱，而自己却从公司每月获取二三百元。工会抨击这种弊病，要求公司为每一车煤按过去的比率付款，工头只能得百分之十五，其余都归工人所有。这以后，正式矿工每天所得是一角五分到二角，这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但是，唐寿一说，一年多以后，由于军事形势恶化，由

于“重税和军事征用”，矿井完全关闭了。他自己和其他人一起南下参加广州的革命军，并于次年春天返回家乡，从军阀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家乡。

唐寿一说：“当我随部队开回湖南时，我们革命军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起初是很好的，他们互相帮助。矿工们组织起来，成群结队地去破坏北方军阀的运输线，他们向广州军队赠送粮食，提供民伕。但是，当蒋介石力量壮大，打下江西后，他就反过来镇压工人，尽管是工人帮助他夺取了江西。现在，湖南工人遭受的镇压比任何时候都厉害。”

他讲到矿井在国民革命军控制下的短时间内，如何根据矿工们的意志开了工。当地居民，包括工人和土地所有者，都希望矿井开工。但是，这所大型的汉冶萍公司却拒绝在这个战火弥漫的地区冒险投放更多的资本。唐寿一并没有为此而谴责公司，他理解这一情况。

他说：“他们可能已损失了一百万元。在军阀们的重税下，他们不肯再冒险投资和支付工资，但他们为维修矿井送来了一千元。我们工人索性鼓起勇气来重开矿井，并同意不立即领取工资，因为失业的人太多了，非先开工不可。我们把煤运到汉口去卖，几个月来我们一直这样做，由于卖煤需要时间，我们一般总要欠发三个月的工资。一个月以前，正当我们打算如期发放工资时，另一个军阀来了，他们又重新关闭了矿井。上星期，我们再次开工，但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我问唐寿一，矿工们接管的矿山归国家所有，还是归工人自己。他露出惊奇的神色，说：“哦！不，矿井还属于汉冶萍公司。只是他们不开工，因为他们怕军队，不敢恢复生产。我们索性自己动手开矿，因为我们都已失业。我们希望国民革命军会制止这些无

法无天的军阀，恢复秩序，让汉冶萍公司能回来用充足的资金重开所有的矿井。因为我们只能管理很小一部分矿井，再大一点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唐寿一的要求多么温和，多么不象革命的样子。此人从光绪以来就一直在矿中劳动，任何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思想都钻不进他的头脑中去。他是一个落后国度里的一位淳厚的矿工，他对生活的全部要求只不过是太太平平的过日子，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能拿到一份过得去的低薪，再加上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就行了。然而，在中国现存的条件下，即使这样温和的要求也使他和广州、上海那些自觉的鼓动者和组织者在一起，成为革命的一部分了。为了吃饭，他和他的伙伴们接管了矿井并且开了工，他们挖煤并把煤卖到汉口去。他们武装了自己，并象士兵一样进行战斗。他们使湖南成为中国“最红”的省份而扬名世界。

八、争取妇女权利的 斗士

在今天的地球上，任何地方的社会冲突，都不会象中国为争取妇女权利所进行的斗争那样壮观和令人吃惊。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沿用原始方式从事生产的农民们，为了生活可以出卖自己的女儿，而体面的妇女们则深居闺房。现在这里却崛起了一代“短发姑娘”，她们公然宣称男女是平等的公民。她们身着军装，作为宣传人员随同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她们唤醒乡村人民，组织起妇女协会。她们许多人为了自己的斗争而牺牲，不断有报道描述如何处决十几名或数十名女子的情况，她们被指控为革命党，罪证仅仅是剪了短发。

我遇见的第一批妇女革命家是来到汉口参加全国劳动大会的工会代表，主要是上海和武昌的纺织工人，约有二十人，坐在全国劳动大会的会场里。在她们中间，我特别注意一位生着一张娃娃脸的演说家王叶金（译音），她是上海妇女代表团的领队。她是纱厂工人，每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她身材瘦小，长着一个圆圆的脸蛋和一头

柔软的短发，当她在会议的座位上俯身微笑时，看上去活象一名十四岁的初中学生。但是她那谴责蒋介石的激烈演说，却使两千名工人听众着了迷。

后来，当我为这二十名妇女代表举行午餐会并请王女士在首席就坐时，我发觉她是一位和蔼能干的主席。她略微摇摇头，就止住了全部私下的交谈，并始终使我的客人们保持安静，认真地一一回答问题。最后，这位二十岁的温和端庄的主席站起身，正式感谢我为她们举行的午餐会，并请我转告美国的工人和妇女，说：“虽然我们是落后的中国的工人，但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克制住自己，没有对她讲，美国工人和妇女并不意识到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然而，正是这世界革命使她热血沸腾。

王叶金象大多数纺织工人一样，直到最近才认了一些字，但还完全不会写。她八岁时，因父母再也无法养活她，就进纱厂做工，开始时当学徒，一点工资也没有。六个月后，每天挣六分钱。现在，她已成了熟练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可挣两角一分钱。她说：“当我年幼时，做工一出差错，工头就打我。长大后，我不再挨打，但要罚款。不久以后，工会保护了我们，使我们既不挨打，也不罚款。”

她继续说：“工会成立以前，我们都不识字。后来，工会派老师利用午饭时间教我们识字。老师说‘快点吃，吃完上课。’这样，我们就识了一点字，但没有学写字，因为没有桌子和纸，也没有时间。现在连识字课也停了，因为工会被镇压了。”

在我的要求下，王叶金又谈了一些工会的情况，她说：“国民革命军开进上海以前，没有一家厂有工会。后来，到处都成立了工会。在蒋介石开始镇压以前，我们的工会是公开的，现在尽管都转入地下，但是所有的工厂里都有工会存在，在工资问题上，工会有一个

统一的规定，学徒一天挣八分钱，六个月后增加五分钱。蒋介石来后，英国人开的工厂就不遵守规定，……工作时间没有改变。我做工的那家英国人开办的工厂是现代化的。每天两班，每班十二小时。在旧式的中国工厂里，女工们从清晨四点干到晚上八点，工作十六小时，另外一家英国人办的厂，织布工人一天要工作十七小时，一直干到晚上九点。”

她还告诉我工会活动的方式、方法，“我们在群众大会上选举委员会。一个人如能真正为他人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就选他。工会干部是由工厂派出的代表选举的。会费每月一角钱，工会还废除了侮辱人格的处罚。以前女工犯严重错误时，工头可以把她整夜锁在木笼里。那是只很小的笼子，没法躺下。”当她比划笼子大小时，王的柔和姿态象舞蹈家一样优美，她的声音象歌唱家一样悦耳，和她所叙述的事情极不相称。

代表团中有两位被称为“学生”的代表。小施(译音)在中央纺织工会工作。她曾在一所公立学校上过四年半学，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算术、自然科学、体操和一点英语。直到去年到上海看望在工会工作的亲戚以前，她对现代中国一无所知。通过这位亲戚，她在工会中找到了工作。……小金(译音)在闸北工会工作。她曾在国民党办的一所特别学校上过一年学，学习过“妇女运动、工人运动、现代汉语和自然科学”。

尽管上海来的代表们所受教育很少，但她们很清楚自己能从工会和国民政府得到些什么。当我就此请她们回答时，四五个代表说，“从国民政府我们得到了工会。如果没有国民政府，工会就会被镇压，工会领袖就会被枪毙。……工会就是我们的家，因为工会为我们的要求而斗争。……我们希望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提高工资。妇女们特别需要这些，因为她们所遭受的压迫最深。妇女

不但要在工厂劳动十二至十六小时，而且回家还要洗衣、扫地、做饭，还要梳头和处理自己的一些事情。……妇女们怎么能劳动这样长的时间呢？……我们希望国民政府督促工厂给我们办学校，设置婴儿哺乳室，生病时能得到治疗，因为我们太穷了，看不起医生。另外，产前产后的假期工资照付，废除一切残酷的、侮辱人格的惩罚。”她们对革命的劳动纲领学习得很好，这些要求基本上是按俄国工人已取得的权利而制定的。

如果这些姑娘回到蒋介石统治下的上海，都将面临逮捕和处死的可能。但她们却面带笑容谈起这些可能性，她们充满了生命活力，感到自己是伟大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能把个人安危看得过重。许多象她们这样年轻的姑娘，已在上海和广州的反革命屠杀中英勇就义了。

代表中有一位皮肤黝黑的广东小姑娘，她身穿蓝色的长裤和束腰上衣，一副中国农村装束，和上海纺织工人穿的新式裙子和白色宽松上衣截然不同。她告诉我，广州的情况和上海很相象。

她说：“但广州火柴厂的情况更糟。另外，麻袋厂叫孩子们扛沉重的麻袋，他们简直受不了。”

她让我请全世界工人支持中国革命，“因为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她说，中国最困难的问题是妇女问题，“直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从国民政府得到任何东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不满的话。她比其他人有更长的时间等待革命的变化和经历叛变所导致的失望。

我注意到台下一位容光焕发的姑娘，后来知道她叫江温霞（译音），是武昌的一位纺织工人。她十三岁开始做工，每天挣五分钱。一九二六年十月工会一成立，她就参加了。

她说：“妇女过去吃的苦太多了，现在也不用多讲。工厂过去

雇佣女工，因为雇女工比雇男工便宜。年轻漂亮的姑娘有时会得到较好的待遇，因为工头和经理喜欢她们。难看的姑娘，待遇就差多了。不仅仅工头和经理玩弄女工，以前的督办和他的官员、士兵都玩弄女工。妇女的遭遇总比男人更糟。

“我们的工会是自发的，没有人来组织我们。它是六个男工开始组织的，当时活动是秘密的，他们与湖北总工会联系，得到了承认。国民革命军来后，工会才公开了。工会为我们争得了一些利益。原来每天挣五分钱的工人，现在多挣五分；但每天挣两角钱的，只增加两分。工会为最穷苦的工人尽了最大的力，但工会还不那么强大。工作时间仍和过去一样是每天十二小时。我们要求八小时，但厂方不肯答应。尽管如此，工头们对我们的态度比以前好多了。”

从湖北来的其他代表也谈了同样的情况。她们中有一些是头上梳着发髻的年龄稍大些的女工。她们生过许多孩子，但由于不卫生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而夭折。许多人还记得，那时候要付出五千枚铜板（折合一元），才能当上一名学徒。这对中国工人来讲，是很大的一笔钱。后来，这种手工业时代的传统逐渐消失，不用花钱就可当上学徒。现在，有了工会的力量，徒工一开始就能领工资！

三位武昌的纺织女工异口同声地向我诉说妇女的苦难。一位是长相忠厚的织布女工，穿着蓝罩衫，衣领上别着一枚镰刀和锤子的别针；一位是头发花白的老年妇女，穿着一件黑色无袖外套，她已失去了她所有的孩子；还有一位是快乐的、容光焕发姓江的青年，她因自己是工会会员而十分激动。她们争相补充，活象一支在一起唱赞美诗的合唱队。

“照老规矩，妇女不准走出家门。她们的脚缠得很小，不然就

嫁不出去。她们的婚姻是包办的，婚后的生活更苦。在工厂做工，要受工头的欺压。下工回家，要做家务。今天，假如她们加入工会，她们的丈夫就压制她们。此外，她们深受愚昧无知和不识字的苦，还要受叔伯姑嫂的气。过去，逃避家庭压迫的唯一办法是削发为尼，但这意味着新的压迫……在国民革命军教导她们组织起来之前，妇女根本没有任何自由。”

她们讲了许多受压迫的事例后，开始叙说革命带来的变化。佩戴镰刀斧头别针的那位织布女工特别认真地说：

“虽然农村和旧家庭中仍有妇女缠脚，但多数女工已中止这种旧俗。国民革命军来了以后，甚至连丈夫对待妻子也比以前好了。但是，妇女在没有取得经济上的自由以前，是不会有真正自由的。中国妇女是世界上受压迫最深重的人。我们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时间学习。我们只有争取缩短工作时间，才能有时间学习。告诉你的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同志们，要走革命的道路，争取真正的自由。请告诉他们，我们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中国妇女得不到自由，全世界也不会有自由。”

除了男女共同参加的劳工组织外，在国民革命军控制区内还有三个组织专门为妇女权利而斗争。它们是：广州的著名劳工运动烈士的遗孀廖仲恺夫人领导下的国民党妇女部；邓寅达领导下的军队妇女宣传组织；各省和地区的妇女协会。这些都是妇女们为争取妇女权利而组织起来的群众团体。

在国民党总部对面的一所小寓所里，我访问了廖夫人，两年前，在她丈夫死后不久，我曾见过她。她对我讲了中国传统势力的强大以及中国人的妇女观。

“在中国学校的教科书里有一则关于一位贞女的故事，她的手被一个男人碰了，为了免受污渎，她把自己的手砍下。人们还读到

这样的故事：有的妇女在没有出嫁前未婚夫就死了，她们仍然得到夫家去，终生为他服丧，吃素，成年到头守着未婚夫的木头牌位。这三千年的旧习惯很难破除。现在广州姑娘可以自己选择丈夫，但在乡村，如果你提出让一个姑娘在婚前看一看自己的丈夫，她们会因这种念头的出现而感到可怕。”

尽管廖夫人自己对旧风俗的强大力量有充分了解，但她对这些旧风俗的反抗却比其他年轻妇女更为激烈。她在丈夫被暗杀后，并没有按中国老规矩躲进深楼守寡两年，而是出现在群众集会上用这件事来鼓动民众。由于过度劳累，她的身体和精神几乎全都垮了。

我这次见到她，是在国民革命军胜利进军的两年之后。此时，妇女运动已席卷了好几个省份的乡村。她坐在青年妇女们中间，有些妇女身着军装，她们刚从湖南前线回来，有的穿着便服，她们是汉口妇女组织的干事们。她身体不太好，但仍象一位和蔼慈祥的母亲。她讲的是广东话，必须经过两次翻译——先翻成普通话，然后再译成英语，我才能领会。她告诉我，现在不但是城市妇女，而且连乡村妇女也开始觉醒了。已有十多个省的近一百五十万妇女在国民党领导下，参加了各种妇女组织。她的那个部——党的妇女部的目的是吸引妇女投身革命，并促使国民革命政府给予妇女们各种权利。妇女们最感兴趣的是有关结婚和离婚的法律规定。过去，一个男人只要把妻子送回娘家，就可以把妻子休掉，但是没有一个女人可以用这种方法和丈夫离婚。现在根据国民党的规定，可以自由离婚，但许多地方并没有执行这一法律。还有的地方则有战争，妇女们甚至不知道有新的法律存在。我们必须加强宣传工作，使她们都知道。她最后说：“离婚是中国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

显然，通过两名译员的谈话使廖夫人感到疲劳，我也不忍心继续使她受累。我邀请三位刚从湖南部队回来的穿军装的年轻姑娘到我的住所来，我们在阳台上谈了几个小时。她们穿着整洁的青灰色军装，腰束军用皮带，头戴军帽，但没有武器、弹药。她们的武器是更加厉害的东西——宣传。两位姑娘谈话十分认真，还有一位矮胖、黝黑的广东姑娘，总是咯咯地笑着想说出几个英文单词。每当她打断别人的话语，补充解释时，总能使人感到她对国民革命的理论有一定的理解，和她的表情一样，是很聪明的。她们正在国民革命军最近占领的河南乡村地区组织妇女协会。上两个月，她们共吸收了两千名会员。她们解释说，这只是一个小小数目，因为国民革命军最近刚到达，而河南这个省则是最落后的省份之一。

她们说：“我们跟在部队的后面，但不参加战斗，也不在士兵中开展工作，这是男宣传员的工作。不过，我们遇见伤员时就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常常给他们每人一把扇子和一条毛巾，催促农民把他们送到医院去。如果当地有医院，有时我们也到医院去为他们安排床位。但这些不是我们的主要工作，我们隶属于军队政治部，它负责组建新区的第一届临时政府，我们的工作是组织妇女。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走访家庭、涉足市场，找她们谈话。等到我们谈透了，就组织起地方妇女协会，让它处理当地的事务。然后我们再转移到另一地区去。”

我问：“你们对那些农村妇女谈些什么？”

“我们首先说明革命军和北洋军阀之间的区别。告诉她们，我们来的目的是要把她们从压迫的境遇中解救出来，并给她们带来新的思想。我们解释说，现在男女已经平等了，即使你是女人，你也是人。我们说，她们对社会有义务。在婚姻上，征求父母意见是

好的，但不能让他们包办。我们还宣传自由结婚的新法规：就是说，青年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我们还解释，根据新法律，妇女有继承财产的权利。我们还告诉她们，年轻女子不应裹脚。”

“农村妇女怎样回答？她们是否发火要赶你们出去？她们的丈夫是否对你们不客气？”

姑娘们惊讶地叫了起来，“哦，不！他们用茶水招待我们，并说‘对，对！’”

不过，这是中国人的习惯，出于礼貌，他们总是说“对，对”，不管他们真正的想法和意图是什么。无疑那个农村妇女，除非是笨蛋，是不会鲁莽到敢于反对一位穿军装的客人。我从他处获悉她们乘坐的宣传列车前进得并不太顺利。事实上，河南的女宣传员被撤回了，因为她们在这个十分落后的省份出现，引起了流言蜚语。

这三四百名随军女宣传员只不过是妇女运动的突击队，而妇女运动本身要广泛得多。一旦军队的宣传员能争取到几十个人，就在当地成立一个妇女协会，把进一步的组织工作交给地方从事群众工作的干事和委员会去做。这些非军队的女干部的装束和外貌不那么显眼，而人数多得多。在汉口这个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访问了已开展一段时间工作的妇女协会。我拜访妇女协会的领导机关时，见到了两位二十五岁左右的漂亮姑娘，她们穿着粉红色的和白色的女式夏装。她们是汉口妇女协会的干事，告诉我，这个机关共有十名干事。除了一位负责记录的干事外，都不领薪金。那位秘书的薪金每月五元，另外还给她提供食宿，因为她经常要值班。

汉口有七个区妇女协会，会员总数超过三千人。按规定会员应缴纳会费，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缴纳。区妇女协会每月开支预算是一百五十元，用来支付房租、工友工资、传单费用及干事们的

伙食费。妇女协会下设六个工作部门：管理部、社会部、文娱部、宣传部、组织部和财务部。某些特殊的活动，例如反缠足斗争，则由几个部共同组织。

她们告诉我说：“我们从棉纺厂开始反对缠足的斗争，这些妇女整天站着干活，最能体会缠足之苦。其中许多人想改变已经太迟了，但是她们愿意拯救自己的女儿。从前，如果女儿有一双‘三寸金莲’，出嫁时可以要价高一些，而现在有一双正常的脚，就有利于在棉纺厂工作。人们承受的经济压力使她们反对缠足。然而，要摧毁老的习惯势力必须通过革命的冲击。反对缠足的运动一旦兴起，数以千计的妇女立即响应。英租界的一家棉纺厂里很快掀起反对缠足的热潮，妇女们扯下自己的裹脚布，扔得满街都是。那些愿意放脚的妇女，先把自己的裹脚布解掉，然后强迫别的妇女也这样做。但妇女协会并不赞扬这种突然行动，因为那是很痛苦的。较好的办法是，把裹脚布逐渐减少，直到最后全部拿掉。这样不会有很大的痛楚。另外，年岁较大的妇女放足已没有用处，她们的脚不可能再恢复正常。”

在各种纠纷中，妇女协会充任妇女的保护者，甚至几次宣告它有权批准离婚，协会也在打官司上给予妇女们各种帮助。例如，一位年轻姑娘被父母卖给妓院。一个老实、正派的男人爱上了她，愿意娶她，但鸨母不允许。按照中国的老习惯，如果这位姑娘逃走，就会被警察抓住并送还她的主人。这个姑娘逃到了妇女协会。在新法律保护下，她们把此事送交法庭审理，使她终于获得自由，并和自己选中的男人结了婚。

妇女协会的干事们还给我讲了其他几个故事：“汉口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几年前，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乡下人。不久丈夫生肺病死去了。按照乡村习惯，如果公婆不想把她留下作劳动

力使用，就可以把她卖掉。这个妇女发现公婆有这个意思，就逃到妇女协会去。协会让她在妇女训练学校学习了一个时期，现在她已成了军队的一名宣传干部。”另外有一个教会中学的毕业生，被父亲以五十元卖给一个农村木匠作妻子。举行婚礼的六天前，她逃到妇女协会，也得到了一个成为宣传干部的学习机会，其他宣传队员也有类似的经历。

所有这些妇女的外部特征是她们的短发，这在中国已成为妇女们被杀的原因。在一些反动军阀的镇压下，已经有一批精明干练的女子被杀害于落后的乡村。但是，尽管有这些苦难，几个世纪以来沉睡在蒙昧中的妇女们，没有被教育的平稳影响所触动，现在却突然觉醒了，痛感过去自己是多么地不幸，她们是多么地渴望自由。

九、中国新女性存在的问题

我访问湖北省妇女协会时，正好有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婢女，赤着脚，气喘吁吁地逃到协会来请求收留。当时妇女协会的干事们都到别处开会去了，于是我问她是否可以回答我的一些问题，让我直接了解中国妇女运动面临的现状。就这样，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孩走上前来，站在我跟前，带着恐惧的神色向我诉说了一个中国婢女的典型经历。

她言语梗塞地声称：“我不愿回到女主人那里去了，就是她来抓我，我也不回去。”说着，她卷起袖子，露出从手腕到肩膀上满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愤慨地指着自己脖颈上的黑色斑疤，用一种比她年纪大几倍的女子才具有的自制和组织能力开始叙述她的处境。由于经常挨打，她过早地成了大人。

她说：“我的主人是个寡妇。我父亲死后，留下母亲和我们五个姐妹。没有吃的，母亲只好把我们一个个卖掉，养活剩下的人。我来武昌已经一年多了，我的活是做饭、

洗刷、倒痰盂和冲茶。女主人待我很坏，每天打我。今天她问我：‘你为什么到处说我虐待你？’其实我并没有对别人说起过。她不管青红皂白把我捆了起来，把我打得浑身是伤。我说：‘我要去找妇女协会。’……她说：‘如果你敢去妇女协会告我，我就把你抓回来，碎尸万段！’你们不会让她把我带回去吧！？”也许是向一位外国人诉苦的新奇感支撑住她。后来，妇女协会的干事回来了。她转向一位接待她的姑娘，暂时支持她斗争的勇气消失了，她失却了控制自己的力量，突然向干事的怀中扑去，象一个受惊的孩子一样抽泣起来。

我还曾和其他六位逃出来的卖身丫头交谈过。于慧（译音）是一位结实的十岁小姑娘，她的原名叫洪运，意思是“很好的命运”。象其他婢女一样，“于慧”是后来妇女协会给她取的新名字。她已记不起自己的亲生父母了，因为四岁时，她就被卖给江苏省一个小城市的市长。她自夸地说：“卖了一大笔钱。那个市长每天要用铁钳打我两三次。有一次，他把我打昏过去。还有一次，我的头被打破，鲜血直流。”妇女协会的人告诉我，她来到这里时，浑身是伤。现在，她正在读书识字，她感到很幸福。

与上面情况完全不同的是一位名叫林芳（译音）的姑娘，年纪才十四岁，长得很漂亮。她说：“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父母亲，他们是江苏的农民。我被卖掉时才七岁，父母痛哭流涕，舍不得。他们待我很好，但家里实在太穷了，没有办法。我的女主人是个很慈祥的人，她是教会学校的老师。她把我当作她的女儿，把我带到汉口上学。可后来，她当了尼姑，还要我跟她一起出家。我没答应，她就把我丢在这个城市，再也不给我钱去上学。因此，我到妇女协会来找个住的地方。”

林芳的情况是特殊的。多数姑娘比她年轻，而且都有惨遭鞭

打的经历。余敏(译音)是一个堤坝工程承包商家里的丫头。她告诉我，她烧饭、洗衣、打扫。我问她会烧什么饭菜时，这个不过十来岁的小姑娘说：“我会烧稀饭、干饭、白菜和土豆，主人自己烧猪肉、牛肉、羊肉等好吃的，因为怕我偷吃。”一个警察得知她受主人虐待，便向妇女协会报告，她们就派人去调查。主人把余敏藏到邻居家里，但在那位邻居劝告下，她自己走了出来。起初，她对调查人不敢说，后来她讲了。现在她很高兴，因为妇女协会带她离开了主人家，她正在这里学习文化。

最可怜的是小于贞(译音)——一个七岁的小女孩，总是用手摆弄着肮脏的衬衣下摆。她说：“父亲把我卖掉，不然全家都会饿死。家里没饭吃了。”除此之外，她无法讲清家里的情况。她接着说：“主人把我浑身都打遍了，还不准我哭。一哭，他就打得更狠。我给他家端茶水、擦桌椅、倒痰盂。一个警察把我领走，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我是婢女。”她断断续续地谈了这些情况，讲完后，脸上露出一丝友好的笑容。但这是一种不自然的、迟疑的笑容，她好象开始信任我们，但她几乎没有理由可以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

拯救婢女只是妇女协会的一部分工作。在孙逸仙夫人为培训宣传员而建立的女子训练学校中，校长告诉我，她有三个最严重的问题。她首先提到的是婢女问题，她问道：“我们拿她们怎么办呢？她们逃到这里来，我们给她们住处，还想对她们进行教育，可我们没有这笔钱。如果这个消息在婢女中间传开，那么我们这里就会挤满了。一个逃亡的丫头也许比一般工人家庭的孩子还要幸运些。成千上万的工人孩子，从七八岁开始就得进厂做工。工人们自己的孩子在厂里做工，难道我们能向他们征税，来为婢女建立学校吗？

“因此我们不把这些婢女看作应受教育的公民，而当作应受保护免遭摧残虐待的工人。这种保护，其他工人也应获得。按照国民政府通过的法律，所有的婢女都应作为‘养女’看待，她们有权在工作之余获得二至三小时的教育。但是，许多主人不服从这条法律，而我们又不能强迫他们。每当他们保证好好对待这些女孩子，不再打骂时，我们就感到最好还是把她们送回到主人那里去。中国还没有富到可以拯救这些小姑娘，让她们只吃不做；也不能一下子都使她们从封建性的家务劳动转为工厂劳动。可是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女孩们不愿回去，而主人们又不愿接受对纯属于他们权利的监督。这时，我们就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些女孩了。我们曾设想建立一个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机构，使她们可以半工半读。但是，政府看来要把所有的钱都用在军队上。”

妇女学校校长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强迫剪发问题。郊区的人们纷纷告状，说妇女协会的年轻追随者认为剪短发是获得解放的一种象征，于是便跑上街头，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强迫妇女剪发。一九一一年革命时，在男子中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那时革命军守在街头拐角的地方，为每一个走过的男子剪去辫子。许多受辱的男子因此而自杀。现在，同样的事情在妇女中也发生了。

校长抱怨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向所有妇女协会发出通知，说明剪发纯属个人的事情，任何人无权强迫别人剪发。我们也曾解释，反对缠足远比剪发更为重要，这件事反倒应该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对那些替自己女儿缠足的妇女，必须真正课以罚金。但比起耐心地劝阻缠足，剪发，毕竟要容易得多。因此，仍然发生了许多强迫剪发的事，这样就引起了对妇女运动的很大不满，甚至在旧式妇女中，还发生了自杀。”她补充说：“怎样才能在我们组织内部加强纪律性呢？”

妇女协会碰到的最严重问题自然是婚姻问题。许多事例说明了中国妇女的悲惨复杂处境。

汤依昆(音译)姑娘，自幼许配给一家有权势人家。父亲死后，留有供她上学的费用。但中国女孩是没有继承权的，因而这笔钱由男方掌管。婚期来临前，她获悉男方生活放荡，传闻已经有病。我不清楚这些消息是怎样传到闺房中来的，以及她究竟了解到多少事实真相，但是她对结婚产生了巨大的恐惧。一九二七年春，国民革命军到达，男方家庭已为婚事作好准备。汤姑娘怕他们强行邀请她前去作客并加以扣留。一位朋友对她说：“不要踏进他们家门”。“不去，我知道”，她颤抖着回答道。当妇女协会组成后，她前去求助。但是，协会还没有处理她的问题，就被反动派解散了。没有人能帮助她。未婚夫的父亲是个妄自尊大、有权有势的人，对于干预婚事的人，必将报复。而她自己的家，已没有父亲，而母亲则苦苦哀求她接受自己的命运，免得所有的亲戚都跟着遭难。对汤依昆，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这是对一位被困的姑娘的匆匆一瞥。

可爱的楚姑娘躺在医院里，而且不想离开。男大夫对她说话时，她是那么兴奋，微笑而涨红着脸。她受过教育，自幼许配给一家破落富户的体弱男孩。有一天她回家，发现婚事已全部准备就绪。他们事先没有告诉她。她曾请求再让她读几年书，满以为他们已经答允，但是当她星期六晚上从学校回来渡周末时，却看到成堆的礼品和红色彩缎、结婚用的漂亮衣服和首饰。她发怒并且哭了。但是，母亲斥责她。她也自知无法挽救。情况似乎是这样，男青年的祖母病了，生怕死去，因此坚持要她的孙子立即成婚。她要亲自看到完婚。这比年轻人的愿望要重要得多。中国姑娘自幼就被教导要逆来顺受，因此楚姑娘一言不发坐在桌边，一边泪流满颊，一边为叔伯兄弟们添饭上菜。她到达夫家后，举行了三天宴

会。从前，除了在孩提时和叔伯兄弟们外，她从没有和男人说过话。她的男人身体衰弱而且堕落。她再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了，在男方父母的家里，生活索然无味。多年以后，她只享受到一次短暂的幸福。那就是男大夫们走过，有时对她说几句话。她因兴奋而涨红了脸。她不希望病好回家去过那种枯燥、空虚的生活。

还有朱姑娘，毕业于上海一所很好的学校，嫁给了一个老式家庭的男子。丈夫患肺病，但人们不许年青的妻子请西医来看病。她已有小孩，也得了病，但要用任何西医的治疗方法也是不许可的。婆婆按照中国老法把婴孩裹得紧紧的。朱姑娘的一切抗议均归无效。不准她为婴儿洗澡，孩子两三岁了也不准喂罐头牛奶。有一次，孩子病了，她请了一位受过现代训练的广州女医生来诊治，是假装为老朋友前来看病。婆婆发现了，把药品全部扔掉。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都死了。第二个孩子出世时，她自己也病得很厉害。由于和两个儿子相比，她是无关紧要的人物，才允许她的一位老友来给她看病。她告诉她的朋友，她不想再活。“我没有自由”，她说，“甚至无权照顾自己的孩子。”

还有一位刚强的年青吴姑娘，订婚于一位基督教传教士。一次，她对他发了火。他宣布解除婚约。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十分冷酷地认为这样的女子不配作传教士的妻子。由此她丢了脸，人们都看不起她。她去找媒人，请求为她安排一门婚事。那时，岳州附近有个富人，两个前妻都已死去，小老婆没有文化。他想娶个受过教育的妻子，为自己的门第增光。他过去曾向一名十六岁的女学生求婚。后者的母亲因他太老拒绝了。现在，媒人正在为他和吴姑娘说亲。吴姑娘感到满意，因为她虽没有见过新郎，却收到他送来的许多绸缎，一顶配有轿夫的轿子，还有一名士兵当保镖。这样，她就无需再和街坊邻居打交道了。她在邻居眼中的地位又上

升了。直到有一天，那位原先拒绝这位富有的老年人的女学生的母亲妒忌起来，向男方散布谣言，说他的新娘脾气暴躁，过去被人遗弃过，甚至说她不规矩。

突然，吴姑娘听到一个可怕消息。那老人不要她了。那位年青女学生的家人，为老人送的漂亮礼物所打动，决定将女儿许给他。吴姑娘吓坏了。如果她再次被休弃，除了自杀就别无出路。她到老人那里去，在他面前一躬到地，哀求道：“我情愿让你娶小老婆，爱多少就娶多少，只求你娶我。不然，我永远无脸见人。”他娶了她，但不喜欢她。他的家人也看不起她。她象囚犯一样生活在他房里。妇女协会成立后，她前来求援。她们找她家人谈了话，此后他们待她稍好些。不久，农会把他丈夫作为“劣绅”关进牢房，而她每天都去探望。亲戚们开始尊敬她了，说：“到底是受过教育的，为了表示对丈夫忠贞，不怕到牢里去。”在她丈夫被杀，农民抄了他家之后。她说：“我错嫁了这人。我是自作自受。”尽管如此，她并非完全不快活。和她住在一起的夫家人尊敬她了。

这位校长说：“请求我们给予保护的妇女，她们绝大多数要求离婚。在法律和法庭还没有正式建立以前的过渡阶段，妇女协会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有一定的权威。如果我们不能满足妇女们的要求，她们将会不信任妇女协会。但是如果同意她们的离婚要求，我们就会和农民协会发生矛盾。因为农民要娶一个妻子很不容易，并且，往往对不愿意和他在一起的妻子已经花了很多钱。”

接着，她讲述了一次令人惊讶的两性对抗：“有个地方，一个农妇要求和丈夫离婚，得到了妇女协会的批准。但当地约有一千个会员的农民协会却提出：‘如果一个女人竟可以随意把自己的丈夫丢下，那我们男人更可以把女人抛掉。’于是，他们把自己的妻子都打发回了娘家，来表示对妇女协会的抗议。这件事在附近地区引

起了一场风波。妇女协会只好去找那位已离了婚的妇女，请求她为了这个地方的安宁，再回到夫家去。”

妇女协会在决定离婚问题上的作用，不象西方国家那样，具有官方权力。在中国，结婚并非在政府或教堂登记就算了事，而是要举行家庭和社会仪式，要摆酒席、祭祖宗，吹吹打打，用轿子把新娘抬到夫家，才构成结婚的合法程序。离婚也不是民事诉讼问题，而是把妻子送回娘家，让她父母接收。家庭成员和亲属，有时甚至邻里的议论，都会在处理离婚时起重要作用。妇女协会只起到类似邻里的作用，使他们自己已经认可的事情或多或少地得到社会承认而已。有时妇女协会行使权力，惩罚虐待妻子的丈夫或虐待媳妇的公婆。这种惩罚往往采取戴高帽子游街的形式，并强迫游街受罚者喊妇女解放的口号。

在武汉市，离婚有时并不需要妇女协会的裁决。既然已宣称年轻人结婚不须家庭同意，年轻人也可以自己解除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婚约，因此也没有什么标准可以判断这种新关系是否合法。国民政府没有制定婚姻法来说明怎样才算合法的婚姻。过去旧婚姻是通过家庭间和亲友们的承认，成为一种社会所尊重的关系。而新的婚姻关系往往采取在报纸登一则启事宣布的方式，这用于结婚，也用于离婚。

下面是一则典型的离婚启事：“离婚启事：唐延生与杨子清（均为译音）的长女结婚，系旧式家庭包办。经双方协商同意，据婚姻自由的原则，谨正式声明离婚。此后男婚女嫁，各不相涉。”

还有一则女方发表的正式离婚启事：“唐雨芳（译音）在家庭专制的压力下与罗盛庭（译音）结婚，但本人从未同意。幸运的是国民革命军到来，女权得以提高。特此宣告：经法院判决，我与罗盛庭离婚，永远断绝一切关系。我这一宣告是为制止罗家亲友对我

自由的干涉。……”显然，她担心的不是她丈夫本人，而是他家的亲友，因为在每个中国家庭中，亲友构成了一种实权以及扰乱的因素。

这个时期，只要是受到一点国民革命影响的中国法庭，对没有争议的离婚启事都予以承认。但是这种通过登报声明离婚的方式，有时也被人滥用。例如，我认识的一位在妇女训练学校学习的姑娘，她与国民革命军的一位军官订了婚。起初，他没有讲自己在农村有妻子并与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后来，当他被迫透露真情时，又隐瞒了有两个孩子的事实。他把农村的妻子说成是父母强加给他的一个愚昧无知的乡下姑娘，并暗示说，他自己很不幸，要离婚。他在报纸上登了离婚启事，姑娘看了，同意和他结婚。而此时，他在家乡的妻子，由于从不看汉口的报纸，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仍心满意足地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等待着他的归来。当听说丈夫又有了新欢时，很难过，但只以为这姑娘不过是她丈夫要娶的第二个妻子或小老婆。她婆婆赶到汉口，请求儿子不要纳妾，这才知道他已离婚，正打算和另一位姑娘结婚。最后，这位姑娘了解了真情，特别是知道他已有了两个孩子，就和这个欺骗了两个女人的男子断绝了一切关系。

许多年轻的妇女从军阀统治的农村逃到这里，进了妇女训练学校。一天下午，四位姑娘来看我。她们美丽端庄，衣着朴素，长裙里还穿着厚实的长裤。作为女性，她们经历了非女性的危险遭遇。她们当中有两位曾被游街，从嘲笑侮辱她们的士兵中间通过，随时都有被蹂躏的危险。她们在朋友家躲了好几个星期，然后用假发遮住短发，从镇上逃走。

她们说：“城门口站得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哨兵怀疑地盯着我们看了一眼，然后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笑了笑。他是个好人，

没有向他的长官报告。……”

好几个星期，船缓缓地沿江而下去武汉，她们一直藏在帆船的船板下。因为害怕土匪抢劫，帆船得成群结队地航行，在一个地方停了八天，等到聚集了足够的船只后才开航。这两位姑娘不敢出来，怕别人注意到她们的大脚和短发而引起怀疑。当她们终于到达汉口时，由于长时间地躺着不动，已经不能行走了。

她们想和我谈的并不是这些经历。我是个美国人，她们从小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上学。她们想问我许多问题，正象我想问她们的那样。她们不象旧式妇女那样，肯顺从地接受我的采访。她们想知道我对中国革命和对妇女运动的看法，想了解我是否赞成她们组织农村妇女的工作（我猜想她们原来读书的教会学校的老师不赞成），我是不是美国某个妇女组织的成员。美国妇女组织是怎样为自由而斗争的？或者说，她们有没有自由——那种完全的自由，不仅是法律上的自由，而且有社会斗争的自由？她们听说美国妇女是自由的，但是在新的社会建立之前，妇女会有可能得到完全自由吗？我是不是个基督徒？我是不是某个美国政党的成员？如果是的，那么党的纲领是什么？我对美国政府的组织形式有什么看法？这种形式是否适合于中国？我是否认为资本家对政府的控制太过分了？

多年来，我从未被人象这些中国姑娘那样寻根究底地询问过，这些问题涉及到我对人生和对社会生活的基本哲学观。显然，她们并非想对我无礼。这些是火辣辣的问题。她们正在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为了这些观点，明天她们将可能因此而被杀害。此外，她们还在思索，是否可以把我当作同志看待。我是否会象教会学校的老师那样，因她们参加的活动而哭泣，为她们那种过火的爱国行动而祈祷。如果是那样的话，她们和我谈话时就会十分小心。因

为她们对有人为她们祈祷，即使是仁慈的老师们的祈祷，已经感到十分厌倦。在学校的那些年里，这些姑娘一直热爱着自己的老师，但如今却竭力避开那些老师。

她们告诉我：“我们从小就被培养成为基督徒。至今我们依然认为耶稣的教义是很好的，但他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了，他的教导不可能满足现代中国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认为，光洁身自好是不够的，因为这只能使你在极不公正的待遇面前保持顺从。要改变这种不公正，不能依靠洁身自好和顺从，而只能依靠斗争。首先必须推翻旧的经济制度，建立一个人都做好事的新社会。仅仅依靠法律上的规定，妇女仍不可能和男子平等。只有建立了新的社会，所有的人都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妇女才能得到平等的地位。同样，宗教规定，人都应该做好事，人们仍不会变好。但是如果建立了新社会，人们就容易变好。”

于是我问她们：“那么，你们想建立什么样的新社会呢？”

她们中的一个回答说：“一切生产手段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我们革命不仅是为了中国，因此必须和各国人民、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相配合。我们是妇女，但我们在农民协会里工作，因为我们认为妇女必须同农民密切联系。如果农民得不到和平与福利，妇女同样也得不到。”她们解释说，关于在农村的妇女组织究竟应该单独成立，还是只在农民协会中建立妇女部，意见分歧很大。她们以为，在农村应该采用第二种方法，因为农民全家的经济收益问题是首要问题。

她们多次向我保证，她们对外国人没有成见，并希望我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不要有什么拘束。她们说：“我们不管你是什国籍。你们美国有许多大资本家，洛克菲勒，摩根，福特，这些人控制着石油和其他资源。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控制这些属于全世界的资

源，这就是当前世界上存在着的不平等……”我问她们为什么参加妇女运动。蓝舒玲（译音）回答说：“为了我们自己和后代的解放。”她是她们中最年长的，曾任襄阳农民协会妇女部干事。

我不仅从蓝舒玲本人嘴里，还从一位和她相处多年的美国老师那里，了解到她那非常有趣的经历。她父亲是一位满清地方官，但她在幼年时，就关心百姓的疾苦，尤其对那些被关押在她父亲衙门里的囚犯。有一次，她在半夜里悄悄溜到牢房，把一位白发老汉脖子上的木枷卸下，让他躺下。蓝舒玲的父亲抽鸦片。她姐姐嫁的也是个鸦片鬼。后来姐夫死在贫民窟里，姐姐也病死了。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蓝舒玲全家从衙门的后门逃走了，把年仅十岁的她托付给那位美国教师。这样，蓝舒玲幼年时就摆脱了家庭影响。

蓝舒玲作为这位美国教师的女儿，在她家待了十六年以上，接受教育，成了一位幼儿园老师。她对工作很负责。她的美国老师告诉我：“即使是在她组织农民协会和在那里演讲期间，她也没有缺过一次她在幼儿园的教课，在学校关门、我们离开前一直是这样……”这位教师还谈到，有一次蓝舒玲跑到她面前哭着说：“他们叫我当会员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人。我还是个孩子，怎么能决定年龄和我母亲一般大的妇女能否入会呢？这责任太重了。怎么办才好？”

但蓝舒玲并没有推卸责任，不久，她又担负了更重大的责任。她当选为妇女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人民司法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农民、工人、妇女、学生和商人的代表组成，负责维护襄阳的革命秩序，特别是要审判“土豪劣绅”。尽管这种法庭是原始的，不正规的，但它是人民直接行使审判权的尝试。中国的法庭往往被有钱人买通，而司法委员会审判的正是有钱人。就这样，这个曾在半夜里偷

偷起来帮助被父亲关押的犯人的小姑娘。自己倒成了新革命法庭的法官。

我问蓝舒玲，什么样的人被判处死刑，她回答说：“我们只宣判过两个人死刑。镇上有一个姓宋的小官吏，滥用职权，不但征收屠宰税，而且还征收土地税。一天，他看见一位妇女在种花生，就强迫她交税，她交不起。其实，他根本无权征收此税，但他是有权势的官吏。在他的逼迫下，这位妇女悬梁自尽了。他还抓过许多人，把他们的一只手和一只脚捆在一起，吊起来毒打，直到答应他的要求为止。由于这些罪行，有四十五个人到农民协会来控告他，要求依法惩办。他被带上了法庭，判处死刑。可是反动势力的复辟，救了他的命……

“还有一个叫张华堂（译音）的六尺多高的大个子，是一个有权势的坏蛋。他看见农民协会在开会，便想方设法反对。他派了狗腿子，带着枪去破坏农民的和平游行，杀死了三十个人。他有一千多亩土地和七十五支枪，这是违法的。农民交不起租，他就把他们投入监房。即使发生了水灾和饥荒，他也不管别人没有饭吃，首先收租。大家都恨他，但没人敢逮捕他，因为他有枪。于是，大家想了个办法：请他去赴宴，在宴会上逮捕了他。司法委员会判处他死刑，但不敢立即执行，怕他儿子和狗腿子们进行报复。我们想先缴他的枪，然后再处置他，但反动派来到后把他释放了。”

她说，反动派杀害了许多农会会员。一位受过教育的人为农民自卫军购买子弹，被士兵逮捕了。他被判处了死刑。在被押赴刑场途中，他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反动派！打倒一切压迫者！”他被打了五枪。甚至在向他开枪时，他仍高呼口号，直至牺牲。他是一位思想进步的人。将来国民党回来时，我们要为他举行纪念仪式。蓝舒玲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国民党士兵屠杀

革命者以后，不把国民党看作革命的象征。接着，她谈到一年前农民协会在襄阳成长的经过。

她说：“农会成立后的第一个月月底，一万人参加了。到第二个月月底就增加到十二万。”即使是一个大区，也难以置信有这么多人参加。但这几位姑娘却坚持说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她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凡符合参加条件的人都积极入会。要求入会者必须填一张登记卡，而且要有两个保人，还必须说明家庭经济情况以及为什么要参加农会。他们不接纳拥有一百亩以上土地的人，也不接纳依赖剥削者的人和土匪、罪犯、吸鸦片烟者。

“我们农会进行了减租。过去农民们把一半以上的收成交给地主。除此之外，过年过节还得给地主、官吏送家禽家畜，否则就会受到迫害，收回土地，不让他们种地。现在，我们颁布了法令：农民只以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五交纳地租，而且可以拒绝向地主送礼。这就是我们不让大土地所有者参加农会的原因。如果他们参加了，我们就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几位姑娘都说：襄阳附近拥有土地达一万亩（五千英亩）的大地主。他们把土地分成二三百亩一份，分租给中间人，中间人再把土地分成小片租给贫苦农民。许多大地主有自己的武装，说是“为了保护财产，防范土匪”，实际上也为了镇压农民。私人武装是法律禁止的。农民协会依法逮捕了这些地主，并没收他们的部分财产，用于教育事业。

这四位姑娘还举例说明妇女协会要解决的其他问题。一位姑娘是襄阳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她爱上了一位学生，并和他结了婚。后来，她发现自己受了骗，原来他已经有了妻子。他把她当作小老婆，带回家和大老婆住在一起，并且和大老婆一起虐待她。这个姑娘逃到襄阳，向妇女协会进行了控告。最后，她被允许离婚，她丈

夫被迫拿出一千多元，帮助她自谋生计。但这件事还未了结，反动统治就开始了，一切事情又都停下了。我们逃到了这里，不知道这件事后来如何了结。其他成百个案件也是如此。”

后来，她们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作为妇女运动的先行者，是否应该特别重视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因为她们是最受压迫的人。”接着，她们谈到她们救出卖给妓院的妇女，保护被公婆卖掉后逃出来的媳妇。她们说：“我们的父母和老师都说，女孩家不应象男人一样独自在街上行走，不应该和妓女、离家媳妇打交道，更用不着为她们的利益去斗争。我们这样做也成为‘迷路的女人’。请告诉我们，这样做错了吗？这些人比任何人都需要帮助。”

以上就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中国新女性遇到的问题。蓝舒玲曾说她的责任太重了，但并没有逃避责任。她取代了父亲在法庭上的位置，敢于坚持正义，判处两个坏人死刑。而这些姑娘的母亲们生活在高墙深院中，连去粮店买米都怕别人看。她们的女儿们却被嘲笑和戏弄的士兵们拖着游街，然后只身逃出，现在正在武昌学习，准备组织妇女运动。我问她们，她们经常谈到的“反动士兵”是否指那些经常倒戈的封建军阀部队。他们一年前脱离吴佩孚参加国民党，两个月前又倒向吴佩孚，现在又回到国民革命军的行列来。

一位姑娘回答说：“是，他们称自己为国民革命军，但他们是靠不住的。我们革命者除了靠自己和自己的组织外，不能依靠任何人……。”这就是生活给她们的教训，是在沸腾的革命斗争中必须牢牢掌握的。

十、王素贞为自由献身

在诸多中国妇女中，王素贞短促而炽烈的一生最令人瞩目。中国妇女被困缚在古老家庭习俗的罗网之中，挣扎着，时而失败，时而有所成功，但始终没有取得完全的自由。年青的王姑娘总算彻底自由了。她为自由付出了生命。

王素贞的一生最令人震惊。她的一生短促而悲惨。从趾高气扬地自寻情人开始，接着是在妇女协会工作七个月，她的自由达到炽烈的程度，直到痛苦的最后一刻，那时刻，在她自己的邻居的怂恿之下，嘲弄着的士兵，从她的骨头上慢慢地将肉割下，最后还向她那撕裂的躯体开火，一共打了十七颗子弹，以发泄他们刻骨的仇恨。我是从一位认识她的中国学生那里获悉这一故事的。他是位典型的知识分子。他那胆小的评介，和他所谈及的那位大胆的革命女子，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整整七个月，王姑娘是华中地区无数短发姑娘之一。她向湖南落后的小城镇已经接受的一切“市侩”道德

标准发起挑战。今天，自从军阀反动统治来临，她已成为无数无名女烈士之一，其中有些人也许有朝一日会在新中国为妇女界所纪念。然而，我从未见过她，我还不十分清楚王姑娘是为何而死的。是为国家的自由？妇女的自由？抑或为自己心灵的自由？我也不知道，杀死她的那种仇恨，其根源何在？也许是被她揭露的身居高位的贪官污吏的愤怒，也许是士兵们的暴虐狂，或则是她所藐视的根深蒂固的古老道德标准。这三种仇恨联合起来反对她。这是曾经害死许多历史上的殉难者的那种仇恨。

一九二六年九月，国民革命军来到湖南之前，王姑娘还是个好姑娘，在教会学校念书，信奉基督教。“她的兄弟”向我提供情况的那位学生说，“以及她的未婚夫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们住在离岳州城约一百里的一个名叫宁乡的小镇上，离中国的中心地区很远。她到由美国传教士创立的齐默纪念学校读书，在那里读完初中。这以后，她父亲把她送到遥远的福建省去念高中。他是位农民，不富，但却是基督徒。作为中国人，他尊重学问。作为基督徒，他相信即便是女孩子，也是有灵魂的。他为自己女儿的教育作了很大牺牲。今天，每当他想起女儿被污辱和肢解的躯体，思考着她究竟从美国传教士那里以及从国民党那令人迷乱的胜利进军中学来了多少关于自由的狂妄观念，他的那些信仰和尊重已成悲哀的忏悔。”

“国民革命军开进湖南前不久，王素贞从福建学校中回来。革命军来后不久，她声明和宁乡一位年青人订婚，以此造成了第一次轰动。这一声明在西方世界并不会如此激动人心。这在她的整个故事中是最重要的声明，其他一切都由此派生。中国的女孩子从不自己宣布订婚。受人尊敬的婚姻是通过媒人，由父母决定。自选未婚夫，是王姑娘对湖南道德标准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打击。很快地，也是无可避免地，这一打击扩展到其他方面去了。”

“我想，那个男的是镇上唯一的大学生”，那位中国学生想以此为王姑娘开脱。因此，假如她为自己选择终身伴侣，这位姓李的男子自然会当选。她从小就熟悉他，当然是间接的，正如中国姑娘对家庭世交的儿子们是了解的一样。说来算是好的，双方家庭都是基督徒。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古老习俗的反叛。当然，如果不是随军宣传工作者带来国民党的新法令，她是永远不敢宣布自己挑选未婚夫的。有一些关于自由的新法令，我想是好的。但是在宁乡这样的小镇上，对女孩来说，可能有些危险。”

“难道那位青年男子自己是毫无作为的吗？”我问道，感到奇怪，为什么那位男子的作用竟一点也不清楚。

“噢！这样有才干的姑娘”，我的学生朋友充满热情地叫道，“谁得到她的青睐，都会感到高兴。”我两次试探那姑娘究竟有什么个人魅力。他稍有犹豫，答道“不过确实，她很美。穿着时髦，就象你在上海和汉口看到的，乡间是少有的。长裙，里面只穿很小的短裤，老法乡村妇女抱怨说‘实际上不穿裤子’。这一地区的中国妇女服装，一般都是又长又宽的裤子，长褂子，长袖子。妇女必须全身遮盖，我们的谚语就是这样说的。缠足，当然在华中地区至今存在的。但是，王是基督教女青年，她不缠足。她还有一串项链，上面有一只表，还有一支自来水笔。”

我只是巧妙而逐步地才从我那位学生朋友口中获取这点关于王姑娘的女性美的描述。我意识到，他认为女性衣着和女性美不是我们合适的谈话主题。但是当我注意到王姑娘和她周围那些好挑剔的邻居之间的不同的现代化细节，这幅图画就逐渐清楚了。无疑，即便在“自由订婚”之前，她的品德就受到宁乡保守家庭的怀疑了。

王姑娘订婚的轰动尚未平息，她又提出新的自由要求。就象

是为了证实和坚定自己的挑战，她投身到宁乡的妇女运动中去。“她是个十分活跃和能言善辩的姑娘”我的学生朋友说“也许有点‘出风头’。”我想，外国话中没有相应的词。它的意思是‘头脑飞到九霄云外’了，象一只高坡上的公鸡，在众人之上，昂首矗立。刮东风也好，刮西风也好，它总是首先捉摸到。很高傲，很能干。时髦的事，赶在前头。顺着风走，但不会陷于困境。她也清楚地显示出刮的是什么风，显得很清楚，凌云直上，在被刮得贴近地面时也不着慌。

“那就是王姑娘其人。在风暴中昂首矗立，非常明确，非常坚决。也许太明确，太坚决了，没有调和和谨慎的方式。她被选为宁乡妇女协会主席。她使协会增加了成百成百的新会员。这是一个力量很强的妇女协会。人们恨得她要死。”

“假如许多人恨她”我问道“是否也有许多人爱她呢？”这位中国孩子对这个问题显得有点含糊其词了。

“既然她干了这么多坏事”他说“除了她自己的家和她的未婚夫李之外，不会有人爱她。只有她的自家人才爱她，但确有许多追随她。”

“她干了哪些坏事？”我又问。

他对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个女人谈及这个题目时，带着明显的厌恶情绪。他宁肯谈些叫人愉快的事，诸如回忆王姑娘是教会学校一位好姑娘等等。”就是那些所有妇女协会干的坏事。”他说“妇女权利，自由恋爱。”

“你指的是什么自由恋爱”我不客气地追问“是不是王姑娘订了婚，还认为可以和她喜欢的任何人不结婚就同居！”

这次，他吃了一惊，以致不再吞吞吐吐了。“噢，不，王小姐怎么会相信那样的混账事！”他叫道“但王在结婚前就恋爱，并且宣布

了。她在父母允许之前就自选了未婚夫。这就是自由恋爱，自己订婚，自由结婚。这对中国的老法人是一个重大打击。”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中国婚姻规矩的概要，认为这本可能为王和李所接受的。

“王小姐从没结婚。首先，年青人没钱办婚事。其次，他们还没有爱到非结婚不可。他们俩都想继续受教育。因此，王和李都仍和各自的父母住在一起。他们盼望他们的家长不久后会同意他们体面地成婚，然后由男方的父亲支付结婚费用。

“在中国，婚姻如属体面，新郎的父母就会支付所需费用。新郎的父亲就会发请帖：我儿子将于×日娶某先生之女，敬请光临。为了结婚宴会，他将支付很大一笔钱。许多年以后，他可能还要还债。但是，这对他来说是很值得的，因为在婚礼之日，一切荣誉都将归这位老年人。儿子既然娶妻，他就要做爷爷了。

“但是，假如婚姻未经父母允许，年青人结婚就不许在家举行。一个正式的体面婚姻，没有父母是实在办不到的。一切都将乱了套，谁来迎亲？象王和李这样的年青人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等待，向父母哀求。即便他们不喜欢这女子，但他们爱自己的儿子。假如他们见儿子总是不快活，拒绝另娶妻室和生儿育女，最后他们也许会让步。还有一条出路，完全是西方的做法。年青人自谋工作，积蓄钱，租一所房子，请一位朋友代替父母主持婚礼。我认识武昌一个女学生就用这种方式和国民革命军一位军官结婚。他们的父母都远在他乡，而这种方式是很新式的。

“当然，如今在国民党统治下，结婚是无须什么法律手续的”我的那位学生朋友带着惭愧的声调继续说“你在报上宣布结婚，举行一个宴会，就算结婚了。在国民党统治下，任何仪式都不要了。或者你自己登启事：××日，A先生与B小姐结婚。或者请朋友为

你登一下报，我们祝贺 A 先生于×日与 B 小姐结婚。后一种做法较为体面，因为其中多少有点媒人的味道，表示朋友们承认这一婚事了。

“在汉口国民党统治下，这种不正规的结婚还行得通，但在宁乡这样落后的小镇是不行的。对王小姐来说，她的父母鉴于她的行为，巴不得她随便嫁个什么人。但是，男方父母的态度更为重要，是他们支付婚事，把女孩娶回家来。他们是绝不想要如此时髦的媳妇的。”

接着，这位中国男孩子叙述了中国人结婚时的那套繁文缛节。我终于明白，王素贞所公然反抗的，竟是世界婚姻生活中最为完备、最为渗透一切的一种社会制度。同祖先、子孙和一大堆亲戚纠缠在一起，因为结婚的男女双方自己的共同愿望倒反而显得不值一提了。王姑娘曾经提到这事，大声疾呼讲出自己的欲望。同时，她公然鼓励别的姑娘也这样干。她变成湖南这个小镇上建立道德秩序的危险人物了。

在这些繁文缛节中，我只想提其中的几个细节。首先，由双方的媒人负责为双方作客观的介绍。然后，新郎带着吹鼓手和一乘精雕细刻的大红花轿来接珍贵的妻子。新娘的家门是关闭的，经过一番恳求似的吹打才开门。新娘的家庭设宴招待新郎，最后将新娘这一最后也是最重的礼品带到他面前，把她送进花轿。当他们到达男家，姑娘是羞于自行下轿的，必须由两名老年妇人领着下来。这以后，在紧闭的新房里，点起蜡烛，神龛里供着写有天、地、君、亲、师文字的牌位，对每一项她都得行礼，按规矩，把丈夫的祖先认作自己及子女的祖先。

王姑娘，作为一个基督徒家庭的人，显然会取消某些古老的仪式，代之以一种外国的教堂仪式。但是她决不会取消婚礼后的宴

会，那时朋友们要来喝新婚夫妇的喜酒。新娘在这种场合要给朋友赠送无数礼品。新郎新娘在每位客人面前都要一躬到地。这样，他们才会被这古老的社会之网所承认，其线索可以追溯到几代之前。这就是宁乡这小镇上的体面婚礼。王素贞以自己的意愿截破了这个无情的罗网。我的中国学生朋友认为，肯定说不可能只凭她的个人感情才敢如此大胆，如果不是国民党军队进军通过湖南，从南方吹来一股风，这种感情不会达到如此炽烈的程度。

“王素贞”他继续说，“没有钱，根本不敢去想婚宴的事。李的父母也不想办婚宴。因此，王姑娘放弃结婚计划，投身到妇女运动中去了。这些妇女协会在湖南干了许多狂野的事情。湖南人是热情的。很快就会接受一个观念并为之拼命。湖南人是狂热的战士。

“湖南的妇女协会带着剪刀上街，向路人演讲，要妇女们剪发，而且当街就剪。人们说，有几次，被强制剪发的妇女回家就上吊自杀了。妇女协会还挨家查访缠足妇女。凡30岁以下的缠足妇女都得放足，不过为了减少疼痛，总给一点时间。她们不找年长的女子，因30岁以上就不可能放足了。

“这些妇女在街上游行，呼喊口号。她们和男人一起参加集会，和陌生人说话。她们公开赞扬国民党的新法。新法规定，妇女遭虐待，或丈夫娶妾，可以离婚。我是个基督徒，因此我也赞成禁止娶妾的法律。但是，新法可能操之过急了。

“所有的妇女协会都是这样干的，而王素贞却有点出风头。随风而起，眼睛长到额头上，有点晕头转向了。去年十二月我回湖南度假时见过她。她已不再是教会学校安份守己的好姑娘了。不过，她很快活。她把越来越多的妇女，甚至老年妇女，吸收进协会，她自己简直陶醉了。我觉得，在她眼里，姓李的男人已不再是个男

人，而是她所获得的新的自由的象征了。”

“但是，那未婚夫对王素贞的行为有什么想法呢？”我问道。

“哪会有男人赞同这种过火行为！”我的学生朋友争辩说“他是个很安详的男子，而她则既活跃又多话。他从没对我谈起过对王小姐有何感觉，既不说好，也不说坏。”我觉得，他有点盲目。你想，他是她的未婚夫。而她跟得那么紧的风又是一股非常强烈的风。

我不解这句话是何含意。难道那强劲的革命之风也带走了这男子，竟为了这女子而公然对抗自己的父母？也许他是在观察，孤立无援，以中国式的克制保持缄默，眼看他所心爱的女子被风刮向不可避免的末日。在此悲剧中，此人是一点也不能感动人的角色。我们仅仅知道，他不顾父母的意愿，至死和她保持订婚关系，而从不向外人透露一点自己的感情。

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一生处在老习俗束缚下的年长男女会对王素贞目空一切的喜悦和自由会如此仇恨。他们一向以维护家庭为名，扼杀一切年青人的愿望，如今却失去了控制，任凭王姑娘公然地、不识羞耻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嫌恶之情与日俱增，最后变成愤怒不堪。而王素贞却满不在乎，毫无戒备，继续以不顾一切的挑战姿态猛进。夏斗寅军队带来了突然而彻底完蛋的结局。

“当反动军队到达市镇”这位曾经是她的朋友的学生说“她自己的街坊邻居把她交给军队。她无法逃脱。她是镇上国民党成员中最显要的人物。她的邻居，出于仇恨，把军队带来，还叫喊着催促他们。

“士兵包围了她。那么多士兵对付一个女煽动者。这是人们对王素贞的称呼。士兵们对她高声大骂，直到大家狂怒起来。然后，他们用刺刀和刀子把她剐成碎块。”他指指自己的胸膛，神态阴沉，以表示切割是从胸部开始的。”接着，他们砍掉她的手臂，他们

一块一块地砍。最后，向肢解剩下的尸体打了十七颗子弹。”

“这些射击有什么意义呢？她不是已经死了吗？”我问道，因恐怖而眩晕……。”不过，显然，他答道“这些射击是为了发泄对她的仇恨”。王素贞就这样毁灭了。

我十分想知道详情，也许，从没有人记录过这件事。在那恐怖的最后一刻，那位未婚夫在何处？当时她昂首而立，到底支持了多久？但是，我了解到一点造成灾难的重要情况。我当时询问，除了争取妇女自由的斗争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足以引起如此狂暴的仇恨。

“有一件事，使事情更糟”他鼓起勇气说“宁乡有个国民党称之为劣绅的人。人们对他议论甚多，说他买通警察，帮他打劫，把吸鸦片者关禁起来，榨取钱财，而他自己却一直抽鸦片烟。但他是当官的，又很富，无人敢告他。……王从福建回来后，正好国民革命军也从南方来了。他们说，是王首先动员三个人出来作证控告他的。他被捕后，很快就被判决并枪毙了……他们说，是他的家人和朋友首先鼓动邻居把她扭交军队的……”

“或者她认为揭发贪官污吏是她的公民责任”我大胆地问道。

他点点头，但态度严峻。“一个女人”他说“竟敢动员男人去杀另一个男的！”

证据俱在，这场戏剧的许多片断于是凑完整了。这些情节合到一起就和一出古希腊悲剧一样，人物就象棋盘上的小卒，以一种必然性向前移动，走向自己命运的结局。那个已故劣绅复仇心切的家人，士兵们的色欲和血腥的渴望心理，更为可怕的是那种触犯了古老道德标准引起的激怒，而站在这一切的对面，是一位姑娘炽烈的青春。她那傲慢无礼的派头，正是古希腊人早就知道是致命的冒犯神灵的自命不凡的人，必须毁灭晨之子撒旦，盗火者

普罗米修士，还有圣女贞德，她以自己的声音昂然面对上帝的僧侣，以自己的质朴的男性装束傲视宫廷的荒淫无耻。这些人，还有一大群其他人，象在可怕的羞辱中死于湖南血污的街道上的十九岁王姑娘一样，他们都是一个高傲的同族。

王姑娘七个月的自由应该受到这样痛苦的惩罚吗？如此稳重的一桩恋爱事件，期望继续受教育，还没有准备结婚。这么一点点自由，只能和西方妇女日常生活中的自由相比。但是，自由的强度，与其说应该用争得多少权利来衡量，毋宁说应该用挣脱多少旧束缚来衡量。她为从复杂的罗网中冲出一条前进的道路而战斗。这个罗网缠住过年青的汤姑娘、楚姑娘、吴姑娘。王姑娘生活在一个古希腊人所不知道的世界里。她决不会想到，个人命运是一幕戏的必然结局。根据她过去所受的中国教育，她会感觉到，生命是延续的，一代传一代，她不过是其中的一环。在教会学校里，她被告知，为一个崇高目标去死，是一种得救。最后，国民党的军队使她走向革命，革命的烈火燃遍她的全身，把她的个人情感引向更为炽烈的燎原之火。不管她凭理智能推断出多少，革命的直觉已经把古希腊人所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了她，那便是，高傲的人的死，是对上帝的挑战，这将策励人们坚定地走向胜利，她昂首矗立其中的、把她吹向毁灭的风暴，正在扫清历史的前进道路。

十一、湖北的学生和农民

我叙述中国农民时从学生联合会开始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唤醒并组织农民的是学生。后来，觉醒了的农民才开始掌管自己的组织。直到我在汉口停留的最后一天农民协会被镇压的时候，半数以上的农民协会执行机构是学生组成的。

我在同一天中访问了湖北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农民协会。它们都在离历史名城武昌不远的地方。江水湍急，我们乘坐的汽艇花了一个半小时逆水斜渡扬子江，而后来从武昌回汉口只用了半小时。我在城楼下的陡峭石级上登岸。大堆的碎砖说明，国民党按照要消灭一切中世纪象征的宣言，企图拆毁武昌城墙。然而，象他们的其他打算一样，这个企图也半途而废了。留下的是个大豁口和乱七八糟的破砖头。也许这个豁口就足以防止任何人将来攻城或守城了。一件工作半途而废，破坏性是很大的。国民党所做的其他事情也是这样。

那天早晨，武昌下了雨。石头铺的狭窄街道上还有

几寸深的积水。武昌这个政府租学府所在的美丽历史名城，竟没有象样的排水沟！我们的人力车夫叫喊着，推挤着，蹚着水前进。武昌的上层人士坐人力车，而穷人却赤着脚踏着泥浆拉着车奔跑。我们迅速地跑过架上堆满货物的宽敞铺面，来到一幢挂着“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招牌的石砌建筑物前。

林理富（译音），学联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看上去很疲惫。这一方面是由于华中地区可怕的夏季高温；另方面也是因为工作和斗争过分紧张的原因。他是福建一位颇有名气的编辑的儿子，毕业于厦门大学和福建外国语学校。他告诉我，各学校联合起来组成市学联，在此基础上产生省和全国学联。学生运动已开展九年了。原来学联是由大学生和高中生（十六岁到二十岁的学生）组成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学联也吸收初中生（十二岁到十六岁的学生）参加。在年长学生指导下，初中生成立了童子团。

我问他，学生是否只关心政治而不关心学习。他答道：“除了短期参加群众运动外，学联不参加政府。在上海，学联配合工人纠察队夺取了城市；在华中，我们派代表出席特别法庭。过去五年中，我们从各方面帮助国民党。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参加政府，而是搞好学习。并不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学联带领学生走出学校参加群众运动，破坏了教育。我们所破坏的不是真正的教育。我们正在探索一种适合二十世纪中国的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教育制度，甚至我们还不清楚这是什么形式的教育制度。目前中国有两种教育体系。一种是老式教育，讲授中国古典著作，不教科学知识和西方技术。另外一种是教会学校和一些以外国学校为楷模的学校。这种学校教授的西方思想是未经消化的，因此不适合中国的需要。我们的学生运动正在

探索，从这两种形式中吸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发展一种适合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新教育制度。我们的政治斗争也包括这个目的。除此之外，我们争取较好的科学实验设备和体育卫生条件以及改进被军阀统治严重破坏的教育。即使在武汉政府管辖下，我们还必须和军阀的影响作斗争，以改革教育制度。

小林认为，目前中国青年最需要学习的是：科学、良好的政治制度和革命理论。他说，教会学校最早把西方知识带给中国，做了件好事，但它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它只重视教授外国历史、地理和语言，很少教授有关中国的知识。他抱怨说：“我们了解美国比了解自己的国家还多。另外，他们还强迫我们上教堂、学圣经，不管我们是否信基督教。这些使我们特别反感。”

林理富概略地介绍了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他说：中国学生运动是以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击败了德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根据这个条约，原来德国控制的山东省权利移交给了日本。北京军阀政府屈从了这一决定。于是，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发了中国学生反对卖国政府的游行示威。从此，中国学生运动就有了明显的政治色彩。他说：“许多卖国贼被学生痛打。此后，各种学生组织成立了，领导罢工、抵制洋货，反对旧官僚等爱国运动。学生运动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生联合会支持孙逸仙博士。当孙博士号召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时，学联在各省召开了国民会议预备会。^① 孙博士逝世后，学生成为国民党的支柱之一。一九二五年

① 根据历史事实，应为“促成（进）会”。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北上，号召召开国民会议，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全国人民的响应，各地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进）会”。——译者注

五月，日本工头在上海杀害了一位中国工人。于是，学生们离开课堂，游行示威，引起了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以前，示威游行主要由学生领导。后来，领导权转入上海兴起的工人手中。当工人和农民罢工和抗税时，学联宣布参加他们的斗争。从一九二六年初起，学联特别关心冯玉祥，开展了宣传运动，帮助冯玉祥控制北方几省一段时间。^① 当列强为大沽口炮台事件向北京临时政府发出抗议照会时，^② 学生们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北京政府首脑段祺瑞下令开枪，在他官邸前杀死三十六名学生，伤数百人。这就是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

学生现在看到，言论和宣传是空的，必须学会打仗的本领。于是，一千多名学生南下参加了黄埔军校。学联也开始认识到，真正的希望在广东政府那里，因此，一九二六年七月在广东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许多学生参加了北伐。他们不仅仅参加北伐军，而且在北伐军到来之前，在华中地区的工农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许多学联会员在革命中牺牲了。林理富说，除了在前线阵亡的以外，数百名学生被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军队杀害了。在上海，学

① 一九二四年全国各地革命运动高潮，促使军阀内部发生重大分化。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自己的部队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冯玉祥的革命倾向受到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一九二六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联合向国民军发动进攻。四月十五日，国民军由北京退往南口，接着退往西北。——译者注

② 为了防止奉军从海上进攻，国民军在大沽口设防，封锁海口。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奉舰在日舰带领下驶入大沽口。日舰开火，国民军还击，双方死伤数人。英、美、法、日、意、荷、比、西八国公使向北京临时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译者注

生们参加了武装起义，和工人一起占领了市政府，并一直据守在那里，等待国民革命军到来。据林理富说，四百名学生被蒋介石当作共产党员杀害了，而实际上他们并非共产党员。上海大学被军队查封了。现在学联支持武汉，当然不完全支持。虽然武汉也有许多帝国主义分子，但武汉总比蒋介石接近群众。他说：“我们正在设法建立一个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甚至包括士兵的统一战线。虽然士兵很粗野，但毕竟是农民出身，而且对革命作出了贡献。学生们在所有这些人中做工作，进行宣传鼓动。”

一九二六年秋冬，大批学生涌进农村，组织农民，按国民党宣传部规定的形式，成立农民协会。

一九二六年底，学生们完成了组织工作以后，农民协会开始独立工作，并在自己的领袖们的领导下发展组织。这时，学生联合会的重要性已降低到工会和农民协会这两个更大的组织之下。然而，学联将作为发动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宣传鼓动者永远载入史册。

湖北农民协会设在武昌的一个古老而凌乱的院落中。它由一进进绿色植物覆盖的庭院和有大屋顶、花格墙的精致建筑物组成。大门口站着由农民自卫军战士组成的卫队。这个卫队使我想到，虽然工人纠察队不久前已被迫放下了武器，但农民协会还有权保留一定数量的农民武装。他们穿深蓝色制服，以区别于穿蓝灰色军装的士兵。我通过门卫，走过一段不平的石路，又通过一座庄严的大门，走进一个石铺地面的亭子，亭子前面有一片绿色花园。在这里，我等候着农民协会的代表。我看见墙上挂着写满标语的红色大横幅，以及说明反动军阀控制地区被杀害农民所受可怕折磨的大字报。

一位穿着褪色蓝布衣服的瘦小青年终于来了。他叫邓亚声（音译），是省农会秘书。他解释说，所有执行委员都已去省里调查

军队的暴行，改组和加强各地区的农会。他愿意提供我需要的一切情况。他有一张苍白的知识分子的脸，显得诚恳、忠实但很疲倦。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总有六到二十名农民站在亭子里，听他解释，偶尔也插几句话。

据说世界上的农民都很难组织，但中国农民是个明显的例外。在国民党控制下的省份里，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农民参加了农会。他们控制土地，设立特别法庭，宣判土豪劣绅死刑。但反革命政变后，他们受到了反动军队的屠杀和严刑拷打。我访问湖北农民协会时，武汉政府已通过了决议，“要加强控制农民运动，使其健康发展。”这个决定产生的结果主要决定于执行的方法。

中国平原地区的农民是世界上最温顺、最勤劳的人。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辛勤耕种两三英亩土地，养活一大家人，因此他们的生活是一场永无休止的与自然的搏斗。失败就是死亡，胜利也不过是获得在来年中另一次与自然搏斗的机会而已。甚至好年成，收割的庄稼也吃不到下次收获；半饥半饱昏睡过一冬，来年春天吃饱饭下地干活。水旱年间，没有储粮。大荒年时，成百万中国农民饿死。近几年来，又来了比洪水、饥荒更凶恶的害虫，成群的半土匪式的军队。他们横征暴敛，夺走粮食，拉走儿子去当兵。即使在中世纪的欧洲，也找不到类似今天中国农民遭受的苦难和不安。

几十年来，人们对对中国农民有一种普遍的看法：他们是小土地所有者，因此不喜欢变革。显然，各省土地分配情况不一。北方省份，地少人多的现象还不十分严重，大部分农民是独立小农户（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虽然也非常穷，但仍不失为土地所有者。在这些省份，人们对军队的怨言较多，对地主的怨言较少。而在南方各省，地主的残酷剥削使人们想起封建制度下最严重的横征暴敛：地租高达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借几个月粮食，要还加倍，另

外还要送给地主家禽和牲畜。饥饿的农民把自己的女儿卖给人家当丫头，去换取全家活命的粮食。

因此，在北方，几个村的农民往往联合起来自卫，防范土匪和军队，但他们并没有进行重大社会变革的要求。例如，河南某地，三名青年农民只离家一个夜晚，第二天回来就发现自己的房屋被吴佩孚的非正规部队烧毁了，家里的人被杀得只剩一个男人。于是，他们立即到附近的“红枪会”，要求入伙，誓死报仇。这种毫无政治纲领的农民与军队间的尖锐冲突是北方省份的特点。而在南方，农民要求建立能限制大地主的政府职能单位，因此他们的要求往往采取社会革命的形式。在过去一个世纪的连续三次革命中，华南联合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整体（尽管这种联合是暂时的），但在与扬子江以北的分散的单独集团的对抗中分崩离析。以上事实并不是没有经济原因的。然而，现在北方也开始有了军阀地主，如现在得势的将军或高级官吏的儿子往往也把自己的资金投放到土地上。例如，张作霖就是中国最大的地主之一。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甚至在北方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开始产生调整社会关系的要求。

第一个农民协会是一九二三年在广东省的海丰建立的。下面一段关于农会建立过程的叙述，说明了农民对所有外来人的严重猜疑和畏惧心理。一位学生在农民中劳动了几个月，想了解那里的情况。起初，农民对他毕恭毕敬，后来知道他既不是来收租的也不是来征税的，就再也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都去忙自己田里的活了。他不敢在村里开展宣传工作，因为白天只有妇女在家，而他这样一个陌生人和妇女交谈是不合适的。他发现穿城里人衣服似乎是与农民交往的障碍，于是就改穿农民服装，按农民习惯生活，并在需要组织起来的问题上说服了五六位农民。但当他把他们列入

农会会员名册时，他们都吓跑了。这就是受压迫的中国农民四年前采取的态度。

但海丰农民协会建立后，就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农民们发现了抵制运动的威力。在采取这种行动时，他们是竭尽全力的，因为他们知道，失败意味着集体和个人的毁灭。他们大家一同把市场挪到别的空地上去，迫使商人削减使用场地的收费。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群众怒潮中，在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中，涌入农村的学生们发现农民对组织起来有很大的兴趣。仅湖北一省，就有五十八个县农民协会，三百万会员。被反动军队严刑拷打致死的农民达四千人之多。

邓亚声是黄明村（均为音译）的一家富裕农民的儿子。由于村里没有学校，他只得在家读书，后来成为一位农村教师。六年前孙博士组织国民党时^①，邓通过城里一位朋友的介绍参加了这个革命党。他是村里唯一参加国民党的。当时，他从来没想到什么农民运动，因为那时国民党的纲领中还没有这一条。他劝较富裕的农民朋友参加国民党。他办了一所学校，教孩子们“三民主义”；告诉农民们，革命成功时，他们的沉重负担将会减轻。后来，他逐渐地了解穷苦农民的问题。一九二七年一月召开第一次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时，他作为村里的代表出席了。他在会上作了许多报告，提出了许多建议，最后，被任命为省农民协会秘书。虽然，他过去的社会经历是与农村的上层阶级相联系的，但他反对地主和军阀。

他告诉我，湖北农民协会是五卅惨案在全国激起民族主义

① 从一九二二年九月起，孙中山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故此处“组织国民党”恐为“改组国民党”之误。——译者注

热潮之后开始建立的。学生们到全省各地，宣传鼓动，组织农民，领导农民。后来才由农民担任领导职务。省农民协会的执行委员中有十三名农民和十三名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多数象邓，出身农村。

邓说：“我们的运动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吴佩孚统治下的秘密组织时期。从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到年底，我们的会员增加到七千人。这时，吴佩孚开始残酷镇压。一九二六年十月以前我们的组织暴露了，受到了打击。尽管如此，我们的组织仍继续发展。从一九二六年十月，也就是国民革命军到来时，我们的运动公开了，并迅速发展到每个区。一九二七年一月召开省农民大会时，会员达两百万。估计现在已达到三百万。每个入会的人都必须填一张表格，写明姓名、家庭情况、年龄、履历、拥有土地数量等。必须有两名介绍人，每月交一个铜板（三分之一美分）会费。有三种人不许入会：吸鸦片烟的、犯过抢劫之类严重罪行的和拥有一百亩以上土地的。

邓秘书还谈到农民法庭和农民自卫武装的情况。他说，以前法庭控制在地主、流氓、二流子和贪官污吏的手中。由于人手不够，国民政府至今还未派新法官来。所以，农民们只得自己组织起来，惩办罪犯。

他说：“如果是小罪，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就可以给予从轻判处。如果是大罪，应该判处死刑的话，就要召开农民群众大会，让起诉人在大会上说明案情。经大会表决判处死刑的，就立即执行。现在国民政府已发出命令：惩办罪犯必须由政府来掌握。农民也愿意把审判工作交给政府，但政府没有向任何地区派出法官。我们最大的要求是：武汉政府应尽快建立地方政府秉公办事。如果政府把武器发给我们，我们将以生命来保卫这个政府。”

武器问题自然涉及农民自卫军。按农民协会规定，每个地区可以有五十名农民自卫队员，由当地农民协会，国民党党部和政府共同负担供养。全省各农会共有三千支短枪，但在蒋介石唆使下，反动将领收缴了许多枪，现在只剩七百支了。步枪很少，只是武汉各协会总部的警卫人员手中才有少量步枪。农民应有更多的武装，他们应授权保护农民不受反动派镇压，而不只是防范土匪。

邓秘书说：“黄安地区的反动派杀害了二十一名最主要的农民领袖。农会曾请求政府派部队来保护他们，但政府说部队忙于在前方打仗。那末，农会要求允许使用自己手中的武器，但政府禁止这样做，说我们的武器只许用来对付进攻村庄的土匪，不许用于村子内部冲突。我们能干些什么呢？反动派根本不承认法律，可以任意屠杀我们，但我们必须遵守法律，因为我们是负有责任的组织。所以，法律不帮助我们，只妨碍我们。”

邓秘书列举了湖北农民协会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他说：“第二个困难是：我们曾答应帮助农民克服困难和免除苛捐杂税，并以此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可是实际上办不到。农民领袖们都理解我们目前的处境：北伐战争是个沉重负担，使政府财政困难。但普通农民不了解情况，他们叫喊：‘你们是骗子！你们没有为我们做什么好事。再不要听你们的空话了。’

“第三个困难是乡绅们的经济封锁。我们试图打倒封建主义，但封建主义是以当前农民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的。乡绅们有钱，穷人每年春天要问他们借钱买种子、肥料、甚至口粮。现在乡绅们恨农会，不愿借钱给农民，三分之二农民没钱买种子，他们开始责备农会。我们答应组织合作社，但没有经费。

“第四个困难是农民中有些坏分子甘愿出卖自己给地主豪绅当刺客。农会禁烟禁赌以后，过去以此为生的人失业了就铤而走险，

如果我们能给他们土地，他们中许多人可以成为老实农民。但在新土地政策制定以前，在法庭作出判决以前，法律禁止我们夺取地主的土地。这些无业游民从我们这里得不到什么，就转向为地主服务，被雇佣去刺杀农民领袖。为了防范这些刺客，我们还得依靠法律，因为政府禁止我们自己审判地主，但法律不帮我们的忙。这些二流子闲着没事，就在国民政府跟前散布流言蜚语，使政府不理解我们的工作。他们还在农民中造谣，说国民政府快要垮台了，使农民失望，造成混乱。”

这一系列困难是压在邓秘书肩上的沉重负担，使他形容憔悴。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农民只提出了两项简单要求：一是立即建立地方政府，并组织强大的农民自卫军来支持政府对付土匪和无法无天的反动派；二是立即建立合作商店，向农民发放政府贷款，“否则，我们都会饿死”。然而在武汉的军事、财政、政治形势下，这些基本要求只不过是乌托邦的空想！

当他谈到湖北农民协会成立后几个月中所取得的成就时，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情。他说农会已建立了两万所学校。我坚持说：在到处打内战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这么多学校。他笑着说：这些学校是非常简陋的。

他说：“所有农会都立即开始办学。他们利用农会会馆或农舍做教室，当地农会提供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如果需要更多的椅子，就叫学生自备。家庭只需向学生们提供一支铅笔和一些纸。农会每月花五元钱（金币）请老师。当农民都渴望学习时，办这样的学校并不难。”

他的解释说服了我。确实，中国兴办教育，一旦开始，在速度上会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国家。

除了建立新学校外，他还谈到农民协会的许多功绩。在农会

领导下，农民在广大地区禁烟禁赌。他们保卫了自己的村庄，使其免遭匪徒袭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动用武器。他们利用熟悉情况的有利条件，帮助国民革命军攻克久围不破的城市；为军队提供运输队和士兵；骚扰进攻和退却的敌人；参加铁军，为革命殊死战斗。但革命通过武汉政府给了他们些什么呢？给了曾给过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东西——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使他们能在被封建军阀的铁蹄踏入地下以前，抬起头来争辩一会儿。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礼物。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份重礼，因为在这几个月中，他们制订了一套方针和措施。他们在广大地区宣传了土地改革。这并不是一个很激进的纲领。它没有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只规定：地租不得超过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五，荒年免租，征收统一的“不得预征的”土地税。它还提出举办农民银行，以百分之五的利息借钱给农民，并规定任何人放债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它禁止土地包租制度，不许大地主把土地租给中间人，然后中间人又转手以高地租分租给穷苦农民。湖北农民协会提出的要求不过如此。此外，它还作出决议，反对“任何平分土地的运动”，并说：“没收财产的对象仅限于流氓、劣绅和反革命份子”，换言之，仅限于犯罪分子。除了土地改革外，他们要求在农村建立负责的政府，以及武装自卫、举办学校和合作社的权利。

在最落后、受镇压最严重、封建主义盘据最深的华中地区，农民的社会革命就是从实现这些简单的要求开始的。他们要求的和为之殊死斗争的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首先从封建制度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十二、反动派镇压下的“红色”湖南

我们乘坐的日本小火轮从汉口出发，逆湘江往南进入湖南的心脏。那里曾经是国民革命“最红”而现在反动派镇压最残酷的地区。正如过去上海无人了解汉口发生的事一样，现在汉口也无人了解湖南发生的事。湖南表面上仍在武汉政府的管辖下，但实际上已被一些宣称忠于唐生智将军的将领们所控制，而唐生智又宣称忠于武汉政府。自从五月二十一日夜军方查封工会和农民协会并开始屠杀他们的领袖以来，不允许武汉政府要人进入湖南，连武汉政府派出的调查委员会也被刺刀挡回了。唐生智将军本人领导的调查委员会被允许进入，但他在当地军人的压力下，向武汉政府递交了一份为他们开脱罪责的报告。他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他手下的部队就会很快背离他。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七月中旬我离开汉口去湖南省会长沙，奇怪的是，政府本身不能进行调查的地方，持美国护照的外国人却通行无阻；我乘坐日本商船，在路上走

了两天，毫无困难地通过战线。和我同船的有两名美国传教士。其中一个是美国领事馆下令集体撤离的，现在要回长沙；一个是湘南山区一家矿产公司的德籍代理商；还有一位武汉外交部的代表，获准去掌管长沙交涉署^①，因为他是有名的保守分子，而且他的亲属有权有势。

在船上他们谈论在湖南的经历。两位传教士是教会在湘东地区价值二十五万元房产的代理人。他们谈到：头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占用过他们的一些空房子，全部损失只不过是重新粉刷所需的费用。真正的麻烦产生在工会成立以后。佣人们提出了种种“无理要求”，但后来每月只增加了一元五角（金币）工资也就不再继续罢工了。教师们也要求加薪。由于增加的薪金超出学校的预算，他们没讨价还价，干脆在期终时关闭了学校。这下可把教师们吓坏了，他们到现在还没喘过气来。当地的中国人对关闭学校很懊悔，首先是女校友们，然后是当地政府。他们要求重新开办。传教士们拒绝了。他们离开后，当地政府就占用了学校的房屋，用作被大火烧毁的一所公立高中的校舍。工会过去曾要求从一月到四月每周借用一次学校的礼拜堂作会场。这项要求也遭到了拒绝。传教士们一走，工会也占用了这些房屋。然而，他们也承认，工会不象第六军士兵破坏性那么大。这些士兵占据了一所空宿舍，把地板和课桌拆掉当柴烧。他们不接受任何湖南权威的命令，说：“我们的将军在南京。我们不承认本地的任何将军。”

工会从未找过这位德籍矿产代理人的麻烦。他说，正月间当他把一台新洗矿机运到矿山时，他在“厘金”站碰到了麻烦——厘

① 北洋政府时期，各省办理对外交涉事务设有特派交涉员。特派交涉员的公署称交涉署。——译者注

金是各地区自己任意征收的税。“但当我解释说，我是德国人时，包括农会干部在内的所有人都帮我说话。后来，由于矿产公司和中国股东之间的纠纷，于一月份关闭了。”他又解释说，矿产公司是外国资本建立的，只吸收了几名中国股东，目的在于使公司合法化。“但国民党来后，中国人都变得为自己打算了。这些股东也要求得到更多利润，才让我们使用他们的名义。因此，我们关闭了这座矿山。我留下来当看管人，每两周去最近的城市郑州取一次邮件。

六月上旬，我在换轿子的地方被人拦住了。他们为了农会的某项需要，向我索取十元钱（金币）。我只答应给一元钱，他们也就接受了。但我怕每到一站都要钱，就返回矿山。他们拿我的钱并不是抢劫，而是把我的姓名登记在一本簿子里，还告诉我这些钱的用途。但我已记不清了，好象是修桥还是修学校。所有这些地方政府都为了修建什么而要钱，但什么也没建成，因为他们当权的时间太短了。……两周后，我从山里出来，发现农会都被取缔了。我对那位拿过我一元钱的厘金站的人说：“如果我把你的事报告给郑州当局，你会怎么样？”他给吓坏了，表示愿还给我一元钱或更多的钱。我本可以敲诈他一大笔钱。当然，我没有这样做。我向他保证，决不会控告他，但他还是很不放心，把我一直送到郑州。这就是那位德国青年叙述的湘南山区的白色恐怖。

传教士们认识的一个地主和我们同船回湖南。他很阔气，有一双狡猾多疑的眼睛。他不愿意和我交谈，因为我是陌生人。后来传教士们告诉我他在长沙以南约一百二十英里的攸县见到的情况。在那个地区的地主没被杀害，但多数为了躲避农会征收重税逃跑了。现在农会被取缔了，许多男人和两个姑娘被杀害。这两个姑娘曾经在妇女协会中很活跃，企图让妇女协会接管救济孤儿的地产基金。

当日本轮船在长沙靠岸时，码头挤满了苦力。他们叫喊着，打着手势，准备跳上我们的船。船离岸还有几英尺远，他们就不顾危险跳到船上，跑过甲板，争着为旅客搬运行李，挣几个铜子。在这场争夺战中，年轻力壮的得胜了。码头上，一大群年岁较大无力竞争的苦力等在那里，凄惨地盼望着能得到一点剩下的机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我没见过这样赤裸裸的可怕的争夺面包的场面。

长沙的狭窄街道有结实的石砌地面，两三层楼屋顶上架起遮蔽烈日的白色和蓝色天篷。天篷下面满是商店、铁匠铺、木匠铺和裁缝店。我们乘坐的人力车走过拥挤推撞的男人和女人，睡在人行道上的狗，以及躺在竹床上或在母亲怀里静静地吸着奶的婴儿，最后来到一所外国教堂的雅致绿色草坪上。车夫想多要几个钱，我们的译员问他：“这是你们工会定的价吗？”他们害怕地喊道：“别提工会了，你们愿给多少就给多少吧。”这些车夫把译员的无意提问理解为指责他们是工会会员。这是我们首次感觉到的湖南所存在的白色恐怖的情景。

往后的日子里，我在长沙每天都见到这种白色恐怖。我曾试图和交涉署的一位秘书交谈。他非常害怕，不敢告诉我这里曾经发生的事情。他面色苍白，几乎在发抖，呷着茶，尽量回避我提出的问题。后来，我得知和我同船从汉口来的新特派交涉员，年轻的肖博士，已开除了几名有共产党嫌疑的秘书。长沙没有一位工作人员愿在外国人面前说自己以前参加过工会，或谈论过去参加过的活动。敢自由谈话的是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以及上层军人和反动分子。他们倒很高兴接受一位美国人的采访。从这些革命群众组织的敌人的有意无意的言谈中，我对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强大群众运动有了深刻印象。他们的纪律、热情和力量都叫我吃惊。即使从敌人嘴里听到的只言片语，也能证明这个群众运动的伟大。

我问督军的参谋长：他在多大范围内“恢复了秩序”。他告诉我，将近两个月以来，他一直在驱逐和处决“共产党员及暴乱分子”以及“蛊惑人心的煽动者”。他向我保证，大城市已相当“安全”，因为有足够的军队镇压群众组织。但他劝我不要去山里或边远农村。军队挨家挨户搜查“坏分子或共产党员”。如果这家人说没有（他们总是这么说），军人们就叫他们“从当地的大户人家中找两位保人”。他懊恼地说，尽管作了这样彻底的清查，有时军队一离开村子，农民协会就以新的名目出现了。现在正从北部战线调回部队。他相信，不久后农村地区将有足够的军队来“彻底解决困难”。这就是湖南军事镇压的彻底性。

此时，湖南全省没有一个合法的非军事组织，没有农民协会、工会、学生联合会，没有国民党、共产党，也没有国民政府，而只有一个国民党的改组委员会。它的首领是李毓尧^①，一个精明的反动分子。我和他本人以及他的一位副手交谈过。他们告诉我：该委员会的成员是武汉政府根据唐生智将军的推荐指定的。这就足以说明该委员会的性质了。它解散了所有国民党组织，并要求党员们重新登记，每人要有两位经过考验的老党员作保证人。他们坦白地告诉我，目的在于清除共产党，“不许他们举行任何游行或集会。但我们有时很难发现他们。”为了防止共产党员参加集会，任何集会须经警方批准。“如果我们了解到某个会议的确是共产党员召集的，我们就予以禁查并逮捕其领导人。……”我出席了在瑞典教会会馆为教会学校女毕业生举行的茶会。由于忽视了开

① “马日事变”后，反动派为了清除共产党、镇压革命，成立湖南国民党“救党委员会”，不久后停止活动。同年七月又成立“改组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改组各级党部。次年，“改组委员会停止活动，又成立“党务指导委员会”。李毓尧为上述委员会的骨干份子之一。——译者注

会必先获准的规定，这个茶会也被警察光顾了两次。中学以上的所有学校都接到命令，至少停课六个月，以便从学生中清除共产党员和激进分子。

我问李毓尧：怎样从国民党员中发现共产党员？镇压群众组织是否有困难？他回答说：要求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的人，不但要有合适的保证人，而且要有预备期，让他们在农村中工作，“观察他们象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他承认镇压这些组织很困难；在此过程中已处决了几百人。他说：“不是所有共产党员都要杀掉，但必须查清。担任工会、农会领袖的多数共产党员必须杀掉。……我们不允许共产党员在军队中做宣传工作。以往的这类人必须立即自首，否则查出来就要处死。这些政治工作人员不再受武汉的政治部指挥，而必须一切听命于当地长官，并且象普通士兵一样受军法约束。”

他们告诉我：湖南曾经有一千万农民协会会员。我问他这些人究竟做了什么坏事而必须镇压，他们回答说：农会会员敲诈富人钱财；涌进富人家并住在那里直到把米吃光；为了使米价下跌，禁止稻米自由输出。我说：农民自己种稻而要求降低米价，岂不是怪事？他们解释说：这些穷苦农民四、五月份就把米吃光了，必须借钱买米才能活到下一次收获。他们还告诉我：农民们“剪掉所有妇女的头发，杀掉所有的鸡，砍掉所有的树。总之，他们象疯子一样。”既然我看许多妇女还留着长发，许多树还长着，我就问：我到哪才里能看到树被砍光？他们说：岳麓山上能看到；长沙城里的穷人把那里的树砍掉当柴烧。他们着重地谈了所谓“共产党组织的一次阴谋”。“共产党计划在五一纪念日那天，命令店员把雇主杀掉，工人把老板杀掉，年轻人把三十岁以上的人杀掉。”后来我在湖南一再听到这个奇闻。据说这个阴谋是湘潭总工会委员长临刑前受

拷打时招供的。但他供词涉及的“一系列阴谋”一点也没公布过，只是反动派的文件中有一些供词的摘录，以证明他们屠杀工农是正当的。

我和长沙城里的德国商人以及其他外国人也进行了交谈。他们都认为唐生智是“地道的共产党将领”。他是在部下的逼迫下就范的。“唐将军来湖南作了一次为群众组织辩护的演说。但在部下的威胁下，他不得不离开长沙，住在江对岸的一所房子里。将领们又到那里去拜访他，给他一份文件要他在上面签字，他签了。因为他认识到：再和共产党站在一起是无益的；如果他这样做，他不可能保留自己的部队。……”这些德国商人对农民运动的力量有深刻印象，而且认为将来农民运动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兴起。一位最大的德国出口商告诉我：在“人民政权”时期，也就是农民协会掌权时，农民协会用武汉政府发行的纸币来代替银币。他笑着说：“这是农民第一次自愿接受纸币。他们到新合作社买卖大米时用这种纸币，使这种货币稳定了好几星期。我们用少得多的银币在汉口兑换纸币，然后到湖南农民中以票面价值使用纸币，赚了许多钱。这是农民协会忠于武汉政府时发生的事情，而现在……当然象往常一样，在农村中必须使用银币。”

荒唐的传说大大增加了在湖南了解真情的困难。现代国家的公民谴责报纸上登载的谣言，然而他们完全不了解多数人不识字的国家里的荒唐得多的谣言，因为在那里的谣言是口口相传的。我们可以用发生在一位姑娘身上的事来说明收集证据的困难。这位姑娘是在湘潭被军阀处决的。

第一位向我提供消息的人说：“她是一位可怕的姑娘。她叫人逮捕她母亲并且把她游了乡，关在监狱里许多天。当军队来到时，她的亲哥哥出于对母亲的孝心告发了她。据说她被处决时，她母

亲拍手叫好。”这个戏剧性故事的讲述者承认她的故事是第三手的，而且告诉我，向她提供消息的是外国教会的一位中国领导人。而这位领导人却告诉我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他说：“他很熟悉这位姑娘。她叫李安琳（音译），母亲是鞋店老板，为了得到一大笔钱，把女儿嫁给她不喜欢的男人。她被迫上了‘花轿’，抬到丈夫家。后来，她从丈夫那里逃回家，母亲不让她进门。于是，她去妇女协会要求保护。后来不是她自己，而是妇女协会，逮捕了她母亲，游了她的乡。据说这位姑娘向母亲要了二百五十元（金币）。但这笔钱究竟用来退婚还是作其他用途，我就不清楚了。她母亲非常生气，军队到来时，谴责女儿的是她而不是她儿子，但她并不打算杀害女儿，只不过希望女儿得到轻微的处罚。

“他们在法庭上问她：‘你为什么压迫你母亲？’她回答说：‘是我母亲首先压迫我’。他们又问：‘你是共产党员吗？’她骄傲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你们现在可以杀害我，但共产主义必将胜利。’他们就把她杀掉了。这位母亲怎么会想到，女儿竟会这么傻，在这些军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呢？”

这种说法似乎比较确切。因此，在我从一个知名中国商人那里听到又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以前，我一直相信这种说法。他说：“湘潭的确有位叫李安琳的姑娘被处决了。我认识这家人。她与母亲之间没有任何纠纷。她留着短发在妇女协会负责宣传工作，在街上演说。逮捕她时，她正在演说，高呼：‘打倒许克祥’。军人们自然把她处决了，因为许克祥是他们的长官。她是在一所中学门前被处决的。当时我就在这所中学的广场上。他们把她的手绑在柱子上，她高呼：‘妇女自由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这时，士兵们开了枪。”

从这三种说法中可以了解到：李安琳被枪决了。如果我停留的

时间更长一些，也许还会有人提出与此相矛盾的说法。另外，还了解到：她是作为共产党员被处决的；正因为她勇敢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才被处决的。而其他细节则是相互矛盾的。

搞清在湖南究竟有多少人被处决有类似的困难，包括被工会、农会处决的和后来被反动军人杀害的。往往发生这种情况：传说在邻近城市或较远的县城，几千人被处决了。但本地人所说的数字总是小得多。而在一个小镇上两三名“劣绅”被处决，在一个区法庭上五六个人被判死刑，就被说成是革命组织统治时期的“赤色恐怖”。被军人处决的革命组织的领袖通常多一些，但没有人能提供全省被处决者的可靠数字。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承认：在镇压工会和农会过程中，至少有两百名领导人被杀掉。我在湖南遇见一位最聪明的中国人，他研究政治经济学。一般来讲，他的消息比较可靠。据他估计，“可能有两百人被革命组织处决，而被军方处决的人数达到这个数字的两三倍。”

革命时期关闭的一所外国教会学校的女教师讲了一个典型的故事，说明革命运动是怎样在她所在的城镇开展的。她要我保证不透露她的姓名以及这个城市的名称，因为即使象她那样悄悄谈论革命组织，也是很危险的。她说：“圣诞节前几天，农民运动波及我们学校附近的一所普通中国学校。一些共产党员来到该校，号召学生罢课游行。那时农民协会还未成立。他们要求学生们离开学校去组织农会。此时，这个城市的三所教会学校拒绝参加罢课。于是，公立学校的学生游行示威，反对教会学校，并且散发传单，声言要强行关闭这几所教会学校。他们每天都来叫喊：‘打倒基督教！打倒教会学校！’我们的学校就在圣诞节时关闭了，外籍教师都走了。”

我问她，什么人参加农会？她是否认识一些农会的领导人？她

回答说：“当地农民多数参加了。领导人通常是一些读书识字的人。有的是帮助农民写状子的或在农民中有影响的人。我认识靠近我家的农民协会委员长。他姓陈，是屠夫。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和我们教堂有联系。副委员长是邮差，也和教堂有联系。后来他们不得不逃走，否则就会被杀掉。但我不清楚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

这里有四个组织：农民协会、工会、商民协会和妇女协会。工会在每个行业中挑选最信得过的人当领袖。开始，他们要求增加工资。后来，他们谈论如何管理工厂。他们掌管各车间的帐目，决定雇主从盈利中分得多少。我不知道是否许多车间都这样做了，但他们在谈论这件事。农民协会决定地主从土地的收获中能得几成和土地应租给谁。农会不允许地主把土地租给出地租最多的人，而要求他们租给家庭人口多、需要土地的人。以前，竞争使地租高涨，穷苦农民租不起。农会曾提出固定地租，但始终没有定下来。他们要等待政府通过地租法，但在等待过程中，革命已失败了。他们在掌权期间逮捕和枪毙了几个土豪劣绅。被枪毙的都是县里最坏的、农民最痛恨的人，敲诈勒索、荒年坚持收租的官吏。我不知道我们区里一共杀了多少人，可能有十个，但逮捕了许多人。地主被带到特别法庭，起诉人起诉，法庭调查，并问地主是否愿退还榨取的钱财。如果愿退，那很好。如果不愿退，就可能被杀掉。

我们城里的学校关闭后，四分之一以上的女学生加入了中国职业学校女学生创办的妇女协会。这些女学生耻笑我们的学生，并骂她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她们还说：在新政权下，不是会员的没有公民资格。因此，我们的许多女学生也加入了。

首先，妇女协会挨门挨户征收会员。然后，她们开办了一所职业学校，教学生缝纫、编织、烹调、织袜等技术。但由于经费不足，没有办好。后来，她们派姑娘们上街，劝妇女们剪去长发。农民协

会也曾一度派农民自卫军把守城门，把进城妇女的头发都剪短了。这是四月间发生的事。后来，地方官下令禁止这样做，而且听说这并不是革命行动，因此他们就停止了。妇女协会也谈论自由结婚和离婚的问题。农民协会决定：如果是父母包办婚姻的男女彼此不能相爱，六个月后可以离婚。但实际上没有人这样做。的确有几位姑娘不征得父母同意就自己选择丈夫。

当部队开进我们这座城市和农会作战时，农民们集中在教会的一所学校里。他们有三四千人，每人手持一条棍子或长矛，少数人有短枪。他们开到城边去迎战军队并发动了一次进攻。开始农民们打胜了，军队撤退了。但后来大批增援部队到达，攻占了这个城市。整整一个月，军队驻扎在城里，而农民回到了农村。偶尔军队出城清乡，和农民发生冲突。在过去两星期中，农民才开始认识到农民协会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现在他们秘密活动，因为已没有力量公开斗争了。

军队处决了许多农民。在某村，军队搜捕农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但找不到他们。于是，军队放火烧毁了他们的和亲属的房屋。现在人们惶惶不安，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怕别人发现自己是农会会员。现在局势比以前更乱了。……从农民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看来，我相信军队开走后，他们还会回来。军队告诉我们，他们的目的是除掉‘坏头头’也许他们完成这项任务后，会让农会重新建立。”这就是武汉政府通过不断发表声明给老百姓制造的希望。这些声明提到：“农民的幼稚行动”，以及需要“适当控制农会和训练农会领导”。群众对武汉的信心不是突然消逝的。但湖南的军人很清楚，他们的目的就是彻底镇压革命。

这个城市发生的革命正是全省范围内以惊人速度发生的革命的典型。根据长沙指示，学生运动从一九二六年秋末冬初开始，从

一个城市发展到另一个城市。罢课和示威游行使学校停课。于是，学生们走出学校去组织农民。每个地方的学生运动都在外国人办的学校中受到阻碍，而冲突的结果总是这些学校在一月份停办。隆冬时节，各地的农民协会都在培养自己的领导人。长沙开办了一所农民干部学校。几星期后，受过初步训练的组织者就随着学生们下乡了，开始把数以百计的地方农会结合成区和地区农会。农会的权力日益高涨，直到“地方官员除了在人民政权作出的决议上签字，没有其他任何权力”。（一位在湖南的德国人的描述）

除了每个区有二三百名农民自卫军外，“人民政权”没有武装。上级指示他们，要把国民革命军当作自己的军队，但这支军队在北伐中收容了所有反动军阀的部队，许多下级军官是正被农会逮捕、罚款、处决的地主的儿子。而武汉政府又动摇不定：一会儿下令要“控制群众运动”，一会儿下令“鼓励群众运动”，一会儿又下令要“控制”。这些命令到达地方农会时，农民总是服从，但不总能到达。他们所表现的纪律严明的英雄主义、他们提出的要求的现实性和朴�性、他们准备用生命支持任何能实现稳定和给他们以希望的政府，这一切只有更加英勇和头脑更加清醒的领袖才能与之相配。

在长沙，一位明智的中国人说：“他们树敌太多，他们打击地主。连我的佣人也被当作地主看待。他只有一小块土地，每年从这块土地上只能收到几元钱。他们打击士兵家属。他们攻击中产阶级，他们攻击宗教。他们攻击帝国主义。他们还攻击老年妇女想留长发的愿望。他们的确没有力量同时对付这么多敌人。”

“尽管如此，他们做了四件伟大的事。第一，中国农民沉睡了几千年，屈服于各种邪恶势力，从来不相信自己能有任何成就。现在，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集体力量。第二，农民从来对政府不感兴趣，看不出它和他们的日常需要有什么联系。现在，他们对政府很

感兴趣。第三，广泛开展的扫盲运动，不仅教会几千人读书识字，而且在整个农民阶级心中产生了一种信念：学习文化也是最穷苦的人的权利。最后，妇女觉醒了。就在去年，我妻子除了乘坐紧闭的轿子外，不愿上街。现在，她和四十位妇女一起组织妇女供销合作社，出售自己生产的手工产品。……所有这些种子都已播下，总有一天会长出新苗。要多长时间，我说不上。也许两年，也许二十年。现在就在我的家乡，军队一走，农会又办起来了。”

向北挺进的配备宣传员的广东军最后被淹没在封建军队之中。他们收容了这些军队，但未能加以改造。尽管如此，他们唤醒了华中和华南人民——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夺走的唯一胜利。

十三、永丰^①的革命

我觉得，如果想了解革命成就以及反动派正在湖南农村干什么，仅仅访问长沙市是不够的。长沙以南一百英里，有一个小镇——永丰和县城——湘乡。所有外国人都告诉我，这里曾是革命最“红”的地方。在湖南省别的地方，农民只杀了几个人，占领了逃走的外国人留下的空屋。而在永丰和湘乡，工会和农会确实赶走了外国人，占用了他们的房屋。这些外国人——中国内陆教会的德国传教士——现在已经回到他们原来工作的地方。我可以去拜访他们，了解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我决定到长沙以南的永丰去，到曾经是“红色”湖南的农村地区的心脏去。

一条公路从长沙向南延伸一百英里，通过中世纪的

① 永丰在湘乡县西南五十公里，原为湘乡县的一个镇。一九五二年行政区划变更，从湘乡县划出三个区建立“双丰县”。永丰为今双丰县县府所在地。永丰是蔡和森烈士故里。——译者注

乡村。在好几百万人口的湖南省，这是唯一能通汽车和马车的道路^①。我们冒着暴雨，从长沙城来到这条公路。猛烈的雨水几乎把我们乘坐的人力车从狭窄的长沙街道冲跑。然而，这条砾石公路却一点也没受暴雨的影响。这时，一辆卡车正在路旁等候着我们。单就不受天候影响来讲，现代生活就比中世纪生活优越。随着一阵喷气声和猛烈抖动，我们的汽车开动了。这条用国际救灾基金修建的公路，沿着一条宽阔的褐色河流，穿过绿色深谷，从长沙通向永丰。深谷中，种植稻谷的精致梯田的边沿弯弯曲曲地伸向长着稀疏牧草的崎岖山岗，消失在蓝灰色的群山中。

偶尔，一位着蓝裤长褂的妇女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的卡车；一群小伙子指着坐在驾驶室内的两个外国女人，格格地笑；戴着滴着雨水的大斗笠、毫无表情的小男孩，牵着一头水牛，穿过马路到一条小径上，在黄昏的微光中，懒洋洋地走回家。我们驶过由土坯盖成的一簇簇灰褐色矮屋组成的零星村庄，晚上到达了湘潭城。既然汽车当晚不再往前开了，我们就利用剩余时间乘人力车在狭窄黑暗的街道上兜了一圈。鬼魂似的旗帜在阴风中飘荡，红纸灯笼在夜色的穹窿中闪闪发光。有一次，当我们走过一家铁匠铺时，在熊熊的炉火照耀下，我们无意地看见了那里的一切。然而，接着几分钟又是一片漆黑。又一次，观音庙前的火光照亮了一百多码路程。那里，善男信女们正在焚烧奉献给观音菩萨的礼品。

掠过所有这些昏暗和明亮的店铺，所有这些绿色的梯田，所有这些喧嚣的城镇和烈日暴晒的村庄，经过一天半旅行，我们来到了

① 湖南省的第一条公路是一九一三年修建的长潭（长沙到湘潭）公路。一九二一年华洋义赈会以工赈兴修潭宝（湘潭到宝庆，即现在的邵阳）公路，途经永丰。——译者注

永丰镇——沿着刚从蓝灰色群山中流出的湍急的褐色河流的一条街道。这是公路的尽头，也是我们旅行的终点。我们在一排房屋和奔腾的河水之间，择路而行，跨过一座石拱桥，到达河对岸；又走过一些普通店铺和一座庙宇，来到了斯琴德乌夫牧师和他的妻子、女儿们居住的古老小屋。

十二年来，这所房屋一直是德国新教在这遥远国度的一块圣地，但这里的一切和德国的整洁农村大不相同。短短几星期里，这儿曾经是永丰工会的活动中心。它现在又成了德国的宗教圣地，散发着崇拜法律、私有财产和旧风俗的气息，好象这一切全未受到刚过去的革命风暴的影响。陈旧的地板已翘起，然而，按照德国人的彻底精神，洗得干干净净；床单和毛巾也很清爽；甚至“主啊！请告诉耶稣”的字样又挂在了老地方，并未被革命的动乱弄得残缺不全。这位牧师本人是一位彻底的福音主义者。除了在某些事情上追溯到魔鬼的行径外，他把一切都看成是上帝亲手干的。他告诉我，上帝利用农民革命惩罚贪婪的商人，现在又通过军队来惩罚农民的越轨行为。这是一种方便的说法，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可以心安理得。在观察和思考问题时，这种说法并不沾污他的德国人的彻底精神。

饭后，我们扑打着从未装窗纱的窗户飞进的蚊虫。这时，牧师开始介绍这里发生的事情。他说：“永丰街里有一万到一万二千人，是周围许多山村的集市，大部分土地属于十到十二家富人。他们把土地租给农民，拿走收成的一半；他们的粮仓被这里出产的一半粮食堆得满满的。这些粮食一直囤集到五、六月，穷苦农民吃完存粮，米价上涨的时候。由于他们了解中国农民传统的温顺性格，即使农民饿得要发生骚乱时，还感到相当安全。这时，他们开仓高价售粮；没钱买粮的农民，则要在下次收割时，两三倍地偿还借给的

粮食。

今年，这里建立了农会。永丰农会是方圆二十英里的中心农会。大约每隔十里(约三英里)有一个本地的农会。但农民到永丰来集会、游行或把豪绅带到这里来交税。农会委员长是姓梁的和姓李的有声望的佃农。但有些本地小农会的首领名声不大好。例如，离这里二十里有一位很坏的农会首领，他杀死了一位乡绅，当然不是他亲手杀的，他把这位乡绅连同状子一起送到湘乡的地区农会(地区农会是比永丰农会高一级的农会，在本区操生杀大权)。湘乡的特别法庭审判了这位乡绅，并把他处决了。我对农会领导人说，他这样做犯了罪，但他对此事至今不悔。他说：“这位乡绅是一生中只做过坏事，没有做过好事的富人。”

于是，我问这位牧师：“这个人真很坏吗？”

他回答说：“当然很坏。农民协会杀掉的多数是最坏的乡绅。他们有些贪污受贿的人，付给雇工最少工资的人，盗劫救灾款致富的人，荒年时从饥饿的农民那里抢走最后一点粮食的人。”但他坚持说：“尽管如此，这些人并未犯死罪。况且这些粮食属于富人是毫无疑问的，农民把它拿走就是盗窃。”显然，他把牧师的和平时期的标准套用到革命风暴上去了。

这样，我们就谈起了“人民粮”问题。这是永丰农民在当权的第三个月所采取的最革命的行动。据我了解，永丰的农民协会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宣判死刑；他们把有关死刑的案件提交湘乡的区农会处理。这种明确的纪律，即使在农民组织起来的最初几个月就存在。但永丰有权逮捕富人，要他们“捐献”。他们知道这些人有多少钱，并按钱数收税。牧师的房东付了五百元(金币)和八十担米；对那些租米收得更多的人，要收三百担米。他们答应回收获后偿还，但一斤还一斤，没有利息，不象以前那样还两三倍。这些米就

储藏在教会会馆附近。这位牧师证实说：他们每天取出三四千斤米，以低价在庙里出售给穷人。

这就是“人民粮”。每隔三英里设一个“人民粮”站，农民不必跑很多路。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买米的必须是列入名单的人。例如，这位牧师就可以到农会去，要求把两位仆人登记在名单上，同时写下他们的姓名、工资、家庭人口等情况。登记后，全家每人每天可买半斤米，但传教士的家庭不能买。当这位牧师抗议说：这样做不公平，农会的答复是：他们仔细计算过，他们掌握的米只够穷人吃到下次收获。那些有钱人必须以高价向私商购买。

农会把卖米得来的钱的一部分用来为附近村庄的穷孩子办学校。他们宣布，穷人家的孩子都有权读书。但许多这样的学校刚开办，就被反动军队查封了。农民们还常谈论组织合作社；从卖米开始，为将来买米和种子筹集资金。这种希望也被反动军队扼杀了。但即使在白色恐怖时期，“人民粮”的作法也延续了一段时间。甚至实际上是旧反动商人同业公会的新商会也不敢停止售米，因为他们怕激起公愤。不过此后买米的人不把钱交给合作社而直接交给卖主。这样，米价就慢慢地涨起来了。最后，永丰农民控制米价和兴办学校的尝试就停止了。

“人民政权”时期，永丰镇除了有农会外，还有其他许多组织。这位牧师以德国人的彻底精神为我列出了二十四种人的工会组织：码头苦力、佣人、厨师、竹工、店员、铁匠、铜匠、碾米工、裁缝等等。甚至四名电报员也组织了一个工会。此外，还有一个佃户联合会。这位牧师也是会员，因为他的住所是租来的。采茶工人还没组织起来，因为还不到采茶季节。摘棉工人组织在农会里，不在工会里。所有这些详细而彻底的组织工作都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到一九二七年三月这三个月中完成的。

德国人的精确性使这位牧师说出了工会的数目，同样也使他说出了当地现行的工资。“我们每月付给厨师三元五角（金币），女佣人两元；他们都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伙食费。店员根据技术和经验，每月拿一元五角到四元，外加米贴；女店员大概一月只拿一角钱但由主人供应伙食。衣服呢？啊，如果她的主人是一位富人，她可以拾主人扔掉的旧衣服。……”这就是永丰工人敢于组织“人民政权”起来闹革命的原因。

码头工人和把货物从山村运到永丰港口的搬运工人也制定了自己的劳动规章：必须轮流雇用码头工人；那些抢先跳上未靠岸的轮船的身强力壮的工人不应首先雇用；如果发生争执，双方必须到工会去解决。这位牧师对这项规定很恼火，他抱怨说，他雇到的苦力经常是动作迟缓和懒惰的，或年老而干不动的。敏捷的年轻人，过去每天都有活干，现在只有一半活可干。想到码头找活干的附近村子的农民，涌进了永丰镇，造成了严重问题：是接收所有这些新成员，大家一起挨饿，还是拒绝他们，让群众骂自己不顾革命兄弟？……这些曾经使那些比永丰码头工人更有经验的工会会员为难的问题，在人口众多和经济落后的中国是无法解决的。我还记得长沙码头上那幅悲惨情景：为了挣几个铜子，年富力强的人冒着生命危险跳上我们的船，而年老的、手脚不那么灵便的就一声不响地等着挨饿。因此，我觉得：永丰的码头工人勇敢地面对了中国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了谋生而进行的激烈竞争。

此外，码头工人工会还强加给这位德国牧师一些规定。他被驱逐后回到永丰，派仆人去船上搬回行李和家具。当仆人搬走第一批东西时，码头工人没反对，但当他回到码头继续搬东西时，他们发现他想独自把全船的东西都搬走，就把他打跑了，并跟着他到了牧师家，通知他：只有加入工会的正式码头工人才能卸船，他的

仆人无权做这项工作。他听从了，并且去工会请求不要惩罚他的仆人，因为这是他不了解情况才叫仆人干的。后来，码头工人卸下了其余的行李和家具，并与仆人和解了，邀请他晚上去参加一次工会会议。在会上，他和码头工人一起向孙文（孙逸仙）像鞠了躬。对这件事，牧师提出了抗议，他说：“他是我的仆人，是基督教徒，我要保护他。他不应该向孙文像鞠躬。”这就是外国传教士和当时风行全国的新民族主义经常发生的冲突。

群众组织对宗教的首次攻击不是针对这位牧师，而是针对佛像。学生联合会和青年团砸掉并焚毁了永丰两座主要庙宇中的菩萨。当他们开始批判家神并宣布要把它毁掉时，妇女们干预了。据说带头砸菩萨的人的妻子喊道：“如果我的丈夫敢碰我家的菩萨，我就宰了他！”这样，砸菩萨的运动就变得无力了，因为带头人连自己家里的菩萨也清除不了。农民们在攻击宗教方面同样不成功。当反动军队来到时，当地一位农会委员长到庙里去求签，结果是平安无事。于是，他放心大胆地走过村子，结果被军队杀害了。这样一个相信神谕的人还是一位革命领袖呢！

这位牧师被逐出和回到永丰的经过正说明群众组织有严明的纪律。他的教堂是在炮轰南京^①后的反帝高潮中，被群众组织查封的。他认为：命令是长沙下的，这件事是群众在学生和青年共产党员的唆使下干的。他们首先到这个地区的中心湘乡，煽动国民党部和群众组织，然后占领了城里的外国教堂。最后，在地方政府士兵的配合下，进攻永丰镇的外国教堂。后来他了解到，永丰的各

①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阀军第六军、第二军及其他部队占领了南京。当天夜间，英、美、日、法等国的兵舰炮击南京，死伤军民二千人。——译者注

群众组织为此事辩论了三天，农会和商会反对占领他的房屋，而工会坚持这样做，因为他们需要教会的礼拜堂做总部和会堂。

“星期三一大早，绅士们来报信：群众组织要查封教堂。我们还正谈着话，一大群人就到了。男女学生们吹着号角，工人们手持长矛，地方政府的正规军端着步枪。”这就是革命浪潮冲击这位牧师家的情景。

牧师要求见这群人的首领。这时，报务员组长、中学校长和一位信基督教的军官走上前来。牧师请他们进了书房，问他们来此地有何贵干。他们回答说：“请原谅，由于你是德国人，我们本不该打扰你，但现在国民党禁止宗教。因此，我们通知你离开永丰。……”牧师企图辩解，说明基督教对中国的价值。……他们回答：“现在我们有了人民政权，不需要宗教，只需要你们的礼拜堂作工会办公地点。”牧师要求他们出示合法证件，他们说：“我们没时间办证件。另外，也不需要，因为长沙政府本身也要服从人民政权。”他要求四周期限，向中国传教士们交代一些事情，但遭到了拒绝。然后，他要求四天时间包装运走的东西，得到了同意。他们说：“你可以把你个人的东西全部运走，但不许动教会财产，因为教会要交给中国人民，现在我们代表人民政权来接管。……”牧师说：“我要求他们开张收条，并且说我希望回来时能看到这些东西。他们给我开了收条。我这次回来，凭这张收条拿回了所有东西，而且摆得整整齐齐。”

接着发生了几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在这些事件中，革命的决心和中国的老客套奇怪地纠合在一起；法庭的正式宣判被非正式的理由改变了。从所有这些事件中，人们可以嗅到中国的农村气息。教会的佣人和雇员被作为“吃洋饭”的拉去游了乡。对如何判处他们，乡政府里展开了争论。少数几个人主张判死刑，但多数人

不同意，最后决定：“女人剪掉头发放走；男人关起来。”当天晚上，牧师到乡政府去，向他们解释，他需要厨师帮他收拾行李，他们就把他释放了。——这竟是释放厨师出狱的正当理由！

第二天，运走的东西快要包装完时，永丰镇和附近一个村子发生了一场小小的战斗。他们的争执是：究竟谁有权向一个富人征税，是他居住的村子，还是他卖东西的镇子。湖南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类似冲突。永丰的一个男人在冲突中受了伤，被送到牧师家治疗。牧师为他治疗后，胆子大了，要求他们把其他中国雇员和传教士放出来。这时又展开了一场关于他去留问题的争论：农会和商会正式要求他“重新考虑，留在永丰”，工会一言不发，而当地国民党党部表示：不允许他继续在永丰传教。于是，他继续打包。最后，他离开时，所有群众组织的代表，包括工会代表在内，送他上船。他们发表告别演说，放鞭炮，感谢他过去为他们做了工作并把教会房屋给人民政权使用。这就是中国式的“讲面子”，甚至在革命中都坚持存在。

几星期后，牧师带着长沙和湘潭政府以及地区工会的公文回来了。这些领导机关命令永丰的群众组织归还他房屋。他手持公文，走进长矛林立、旗帜飘扬的礼拜堂，出示了他带来的公文。四小时后，他就收回了房屋。他又拿出收条，取回了所有家具，包括被搬到别的工会办公地点的家具。

有件事远比占据房屋和征购粮食更使这位牧师震惊。在中国封建军阀战争时代，财物被一方或另一方抢走是平常的事。但在工会占据教会房屋期间，妇女协会的十个姑娘和男工会会员、工人纠察队员住在这所房屋里。按照中国的正统观念，所有这些姑娘一定是“堕落的女人”，干了乱伦的事。但我听说，这些姑娘和男人一样穿着制服，不知疲倦地走东家串西家，催促妇女们放足、剪发，

宣传自由结婚。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促使她们这样做的是革命激情而不是两性间的情欲，但对年岁较大的永丰居民来讲，女人穿男人衣服就够可怕的了。

军人推翻群众组织后，改组的商会着重惩罚了一个姑娘。他们把她上半身的衣服剥光，在士兵的看守下，在主要街道上的一座古庙里示众两天两夜。“这样，镇上的每个男人都能看见，她的确是个女人。”然后，她被送回丈夫家。现在她在永丰丢尽了脸，不敢见人。

牧师讲：“现在永丰的情况比以前更糟。军人来后，杀了五个男人：一人是因为控告了六十里外的一个人；一个是控告了三十里外的一个富人；一个年轻人据说是带头讲老年人都应杀掉；还有一个人是曾和那些姑娘住在工会总部的；第五个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军人们逮捕了两名妇女，准备把她们杀掉，因为她们剪掉了许多妇女的头发。但后来发现她们已怀孕，就把她们送回丈夫家了。……这些富人并没有从这场动乱中吸取任何教训，比以前更加残酷地压迫穷人。当时，只要富人说农民一句坏话，他就会立即被投进监狱。因此，不满情绪高涨了。将来总有一天还会爆发，而且会比这次更加猛烈。”

在结束永丰的故事时，我的眼帘上映入了三四幅图画：一条狭窄的石块铺成的小路，弯弯曲曲地穿过稻田和溪流，到达一个村子；一长队苦力永不停息地穿过村子，喊叫着，诅咒着，身负重荷互相挤碰着前进，他们正把乡村的物产运往永丰，廉价劳力使人们不用马匹运输。……小道尽头是个小茶村，姑娘和妇女们挤在小棚屋里包装茶叶。这里的一名商人一提起他儿子就叹息：这个败家子当过本地国民党的领导人。现在儿子待在家里，父亲希望能买通军人饶恕他儿子。……街心的古庙在过去几个月中目睹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场面：砸菩萨，卖“人民粮”，群众组织欢庆节日，剥光上

衣的姑娘在这里示众，而下令示众的商会现在就设在这座古庙里。……永丰的一个富商坐在庙里，骄傲地抚摸着头顶扎着髻子、颈上套着银环的幼子。当我问他，抓到工会领袖怎么办时，他从幼子的头上抬起头来当斧子，得意地做了一个杀头的手式。……最后，当我拿出笔记本时，一群农民都悄悄的溜走了。这时，牧师提醒我：“你把他们吓坏了。他们听说：四百艘炮艇集结在长沙，准备为被驱逐的外国传教士报仇，美国飞机也准备轰炸这些村庄。他们以为你在搜集罪证。”

永丰的革命就这样结束了：新军阀通过屠杀群众领袖恢复了秩序；商人们又在出售家神像和银箔护身符；农民们害怕外国飞机。但是这位牧师和我在湖南遇到的每个人都知道：在表面平静掩盖下，人们在思索、计划、期望。在无言的屈辱中沉睡了一千年的中国人民第一次苏醒过来，陶醉于自己的权利。现在他们又带着这些经验进入镇压与恐怖的黑夜，思索失败和成功的原因，集蓄分辨敌友的知识。那些在短短四个月中买过“人民粮”，送孩子上过为穷人办的学校，以及得到农会帮助的人，从这些简单的生活需要中发现了新希望。他们决不会按照军人的命令，放弃自己的希望。正如长官们告诉我的，工会又在军人背后以新名目出现了。在古代逃亡者和被压迫者的避难所——湘南和江西的蓝灰色群山中，活下来的领袖们正重新集结残部，计划着将来的斗争。

从华南的这些破碎的农会中，从千百万农民的希望和经验中，此后五年中必将生长出苏维埃中国。

十四、革命片段

我在湖南乡下了解到许多农民革命片段。我到过湘乡，那里曾经设立操生杀大权的地区工会和农会。曾被驱逐的德国传教士们告诉我，这个地区的农会和工会怎样有组织，有纪律地工作。他们是无情的，但有效地完成任务而不诉诸暴行。

他们说：“四月十七日，复活节的第二天，我们正在进餐。这时，阿妈跑来报告：街上有几百名农民自卫队员和工人纠察队员。我们并不惊慌，继续吃饭，因为我们想：他们并不反对我们，如果要找我们，他们会进来的。过了一会儿，一位首领的头伸进了餐厅的窗户。他吹了一声哨子，武装群众一涌而进。一些人把住了房门，但并没有动手。当我们看清他们的首领时，我们放心了。原来是聂先生，公立高中的校长，我们的老相识，现在是湘乡所有群众组织的首领。除了他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外，他一直是一位可信赖的人。”

“他说：‘国民党已作出决定：我们不需要外国宗教。

现在有了人民政权，不要总统，也不要地方官。”他要求我们三天之内离开，因为工会和农会急需我们的房屋作办公室。

“我们惊奇地喊道：‘这是当真吗？’……他回答说：‘是的，我们很严肃地向你提出这件事。’他说，由于我们是德国人，在镇上没做过坏事，如果我们想作为普通人留在这里，可以在街上另外租房子，但不能待在这所房子里，因为这是中国人民的公有财产，而且人民政权要在这里设立工会和农会。我们可以带走所有的私人财物，但必须把教会的设备和家具留下。他还告诉我，考虑到我们的教会是个穷教会，可能一时拿不出路费，工会、农会决定给我们二百元作为去上海的路费！

“正当我们在士兵的监视下在餐厅进行这次令人惊愕的公务交涉时，一群工人用石凿铲掉了大门上雕刻的教会名称，挂上了湘乡县工会和农会的招牌。另一群人，在两位拿着大本子的簿记员带领下，把每间房里的所有东西登记下来，包括门窗玻璃的数目。然后，在已拿走私人财物的所有房间门上贴了封条。

“星期一晚上六点到八点两小时内，一切事情都办妥了。我们同意星期三就动身。他们很客气地道谢后离开了，留下地方政府的十名士兵，守卫我们和新工会、农会的财产。工农武装人员在这里时，没有发生过抢劫事件。因为，他们纪律严明，违犯纪律会受到严厉惩罚。而留下的正规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第二天早晨打包时，街上的二流子当着我们面抢走东西，正规军不但不保护我们，而且参与抢劫。他们不敢动贴了封条的房间，就到我们打包的地点，从大衣箱里拿走东西。于是，我们决定当晚就离开。”

快到六点时，教会的两男一女动身去上船。开始，一群儿童嘲笑他们，接着另一些儿童呼口号：“打倒洋鬼子！”，最后一大群人叫喊：“杀！杀！”。他们一路上很害怕，担心会受攻击。后来，工会、农

会知道了这些情况。晚上六点，最后一人完成打包工作离开时，他们派了武装人员护送。第二天一清早，船就开了。走了不到十公里，聂先生赶了上来。他对传教士们解释说：他们走得太急，他一时拿不出二百元，现在特地赶来把这笔钱交给他们。这时地方政府的一位官员也赶来了，命令船夫好好照顾这些外国人。他说：他们被驱逐不等于任何人可以抢劫他们。如果有人敢这样干，定将受到法律和群众组织的惩罚。这样，他们在顺流而下到长沙的两天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到了长沙后，这群德国人一起去找湖南省交涉署，要求他们命令工会、农会归还占据的房屋。他们回答说：“交涉署不能对抗人民政权。湘乡工会和农会只承认省工会和农会。”后来，交涉署和省工会、农会进行了磋商。四星期后，这些传教士获准回湘乡去一次。……

这些德国人离开长沙的第二天，反革命开始行动了。军队夜袭工会、农会。经过激战，赶走了那里的人。但群众组织在农村仍占优势。这些传教士处于两条战线之间，亲眼看见农民准备作战的情况。在旅程的最后四十五公里这段路上，公路的每个拐角和山头都设有哨兵，搜查过往行人，但搜查了这些德国人的行李后，放行了。把多数人挡回去，他们回到住处时，看见那里的群众组织正准备战斗，又考虑到群众的态度，觉得待在那里很不安全。于是，提出要回长沙去。群众组织不同意，说：“现在长沙是敌占区，你们最好去永丰和其他德籍传教士会合，因为那里是我们控制的地区，而且他们已收回了房屋，可以收留你们。”

这些德国人在永丰待了五天。后来，听说群众组织在军队到来前已逃走了。于是，他们赶紧回湘乡，想在军队到达前收回他们的房屋。群众组织撤离后，湘乡县政府恢复了职权，把这些房屋封

存起来，准备交还外国房主。但军队不顾一切，破门而入，在“清乡”的两星期中，把司令部设在这里。经过争论后，军官让传教士使用楼房上层的两间房，而军人占用了所有的床和厨房。两周后，军队开拔了，去追逐逃走的敌人。

传教士们说：“军队撤走时，几乎偷走了一切能拿到手的东西。他们把炉子、煤、门、窗、桌子全搬走。我们站在门口阻挡，叫他们放下手里的东西，他们只得放下，但从后门和窗户拿走更多的东西。群众组织从来不把任何东西搬出这栋房子。相反地，他们从别的教堂搬来一些桌椅，布置办公室。”

这些德国人住在部队的司令部内，目睹了反革命时期湘乡发生的许多事情。虽然有些只是道听途说，但耳闻目睹也了解不少。他们说：“群众组织的监狱就设在我们房子后面。这是一个大区的中心监狱，各地组织把他们称为‘劣绅’的人带到这里来审判。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处决了，大概二十来个。我知道几件案情：一个是当过团长，贪污受贿致富的人，另一个是以高于群众组织规定的价格卖米的人。我还了解一位从附近村子里逃来的姓罗的。他逃亡的原因是，群众组织向他索取一笔钱，他拿不出来，就逃到湘乡去了。于是，他们没收了他的房屋，为穷孩子们办了一所学校。后来，湘乡的群众组织清查户口，他又不得不逃走。这时，本村的群众组织宽恕了他，捎口信来叫他回去看管校舍。于是，他回来做这件事，业余时间编织草鞋谋生。当然他现在已收回了所有房屋和土地。”

在湘乡县和附近农村，都为穷人办了一些学校。早在去年十二月，群众组织向一所由于经费不足两年前停办的教会学校借来桌椅，办了一所学校。刚办了六个月，反动军队就开始镇压群众组织了，但学校仍继续开办。因为负责这所学校的教师是个不问政

治的人，而且他已领取全学期工资，必须工作到学期结束。六月份，学校关闭了，桌椅全部还给了德国人。他们说：“这所学校再也不会办了，因为办校经费是从富人手里拿来的。”

他们告诉我：“人民政权是逐步扩大的。开始，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办学校的目的只不过是向学生进行一些教育，使他们听话。后来，衙门逐渐丧失权力，最后只剩下在人民政权发布的命令上签字的权力，群众组织和共产党掌握了一切大权。他们手中有了权，就提出了计划。从十月份提出小计划到现在不到半年时间，全省都响应了。圣诞节时，这里发出废除宗教的命令，一月份湘乡附近的农会就占据了我们的四个传教站作为农会办公地点。二月份，从武汉传来保护外国人财产的命令，农民们就立即把传教站归还了我们。四月份，在长沙学生的鼓动下，我们的房屋又被接管了。五月中旬又来了纠正命令，军事镇压开始时，得到了执行。武汉的命令要两三个星期才能传到这里的乡村，有时衙门还不向农民传达。但农民们一接到命令，就立即执行。……”

我向他们了解军事政变以来湘乡的白色恐怖情况。他们告诉我：“被捕的群众组织领袖都被杀了头。军人先到衙门去调查，哪些人是群众组织的积极分子。离这里约五十里地，群众组织和军队间发生了战斗。军队抓了十四名俘虏，都立即杀掉了。在另一离这里约九里的地方，军队捉住了从外地逃来的十五名群众组织成员，当天全都杀了。两星期以来，几乎每天都有一长队被判死刑的人从我们门口经过到北关去。大约三十人被处决，其中三分之一是妇女，其余的人在东关处决。因为不从我们门口过，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最近处决的不多，但明天要处决一名妇女。”这就是革命在湘乡被镇压的情况。

傍晚，我们乘卡车离开了这个镇子。靠我坐着一位从广东来

的漂亮的国民革命军军官。他曾在黄埔军校学习过四年。现在，在湖南第十一军——广东的铁军之一——征募新兵。后来，我们知道，许多工运和农运的积极分子想通过参军逃出湖南。农村里谣传，农民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武器和训练。他们回来时，就不那么容易被击败了。湖南的将军们向唐生智告发了此事。当我到达长沙时，发现禁止从湖南输送新兵给“铁军”的命令已发出了。

回长沙途中，我又访问了湘潭市，了解到那里的一些革命斗争片段。住在农民协会隔壁的一位德国女人叙述了在那里发生的三次战斗。第一次为了农会判处两人死刑。他们的家属亲友进攻农会，被击退了。第二次是湘潭市妇女协会剪发引起的。妇女协会的宣传员到附近村子把许多妇女的头发剪掉了。一位妇女因头发被剪要投河自尽。这个村子的一群武装分子到市里来，愤怒地说：“如果我们要自己的女人剪头发，我们自己会动手。”这场斗争的结果如何，我们不知道，看来最后和解了。最后一次战斗是长沙军队来镇压农民。他们开始遭到抵抗，但最后农民逃跑了。此次战斗后，这位德国女人发现她门口有一具农民的尸体。她还告诉我，这个地区处决了许多人。

一位湘潭的大商人说：对于商人来讲，新军阀的统治比群众组织当权更糟。那时，所有商店的工会和雇主在工资标准上都达成了协议，只有三四家商店不愿按工会的标准支付工资而关了门，被工会接管了。自从军事镇压以来，麻烦比以前多得多。伤兵们从商店里拿东西不给钱，汉口纸币每元只值一百八十枚铜元，军人硬说值三百六十枚，因此，商店损失很大。

“五月二十一日^①以前，国民党有力量禁止在货币上投机倒

①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在何键的指使下，驻湖南长沙的第三十

把。农民们卖米给合作社时，接受武汉政府发行的纸币，因此这种纸币有实际价值，商人们也愿使用。现在国民党和群众组织都没有了，投机商人就垄断了市场，武汉发行的纸币的价值跌了一半。军人强迫我们使用，而征税的人不收。豪绅、军人和地方官员联合起来敲诈我们商人。他们昨晚举行一次宴会，要我们立即捐献六千元。我们怎能这样捐献下去呢？”

湘潭从来没有采取直接征收稻米的方法。群众组织以巧妙的办法，成功地处理了这件事。武汉政府给他们几千元购买军米。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决定禁止个人贩卖稻米，因为富商哄抬米价，并索取银币。群众组织通过合作社收购稻米，卖给国民革命军，接受汉口政府发行的纸币。后来，穷人吃完了稻米，富人囤积居奇，群众组织要求他们按规定价格出售，他们不同意，借口说：销售无保障，担心被抢劫。于是，群众组织和地方政府在湘潭组织了一个粮食维持会，向全市各商店征集了保证金。这时，叫富人开仓，按定价卖米，他们不敢违抗了。这样，稻米就以低廉的价格在湘潭出售了。后来，保证金也退还了捐助者。

向我提供情况的是一位进步商人，一位老国民党员。他说：“首先，我们希望国民党回来，并控制所有的工会和商会。这样，商人就无法在硬币上投机倒把，政府官吏也无法任意勒索。其次，我们希望有一个省银行，发行可靠的纸币，使它能象在群众组织当权时期那样有信誉。”

在湖南流传：群众组织企图杀掉所有的店主、厂主、地主和三十岁以上的人。这次我从这位商人那里了解到这个传说的来由。

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叛变，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屠杀工农。历史上称为“马日事变”。——译者注

这个骇人听闻的传说为许多人所相信。它是以湘潭工会领袖杨某临刑前的所谓口供为基础的。^①这个商人说：杨是位学者，曾经是他的老师，为国民党做过八年秘密组织工作。杨遭受了酷刑，据说他供认了并在供词上签了字，但没有人见过他的签字。“士兵们在集市上砍下了他的头，把它当足球踢来踢去。杨领导下的工会曾没收过一家药房。这家人仇恨杨，把他的尸体砍成四截，开膛破肚，掏出内脏喂狗，还把尸体其余部分焚毁。”中国人认为，这样处理尸体是比严刑拷打活人更大的惩罚。

这个商人要我保证不向任何人透露他的姓名。他说，甚至对群众组织持容忍态度的商人和绅士也受到了迫害。一位叫吴松（音译）的学者就是因此受惩罚的，受到株连的还有他的整个家族，包括四位娶了亲的兄弟和五十位仆人。他以公正、诚实为人们所尊敬，曾为国民党做过六年秘密组织工作，然而他因允许仆人参加工人纠察队被定了罪。军人把他全家和仆人们一起赶出了家门，并在门上贴上了封条。当时，他的弟媳已临产，没人敢收留她，只得在街上生下了孩子。这位商人说：“这是我在湖南见到的最可耻的事。”

迫害老国民党员和屠杀工农的封建军阀们现在还打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这面旗帜几个月前曾作为士兵和工人间的兄弟关系的象征，挂在武昌墙上。军队的宣传部门曾经劝告工人和农民不要再害怕军队，要在“青天白日”旗帜下尽情欢乐。然而，现在工人和农民却在同一面青天白旗下惨遭杀害。

① 此处指杨昭植，与他同时牺牲的有负责湘潭农运工作的柳季刚及一位女同志。杨昭植一九二六年七月任湘潭工运特派员，被选为湘潭总工会委员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并担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马日事变后被反动派杀害于湘潭学坪。斯特朗报道的惨状基本与真实情况一致。详情见谢觉哉所写《马日事变一周年》。——译者注

当我在湖南待了一周回到汉口时。汉口的反动势力也大大发展了。在汉口和武昌，工会使用的楼房多数被军队占据了。人们声称，这是暂时的，因为在武汉集结去讨伐南京的蒋介石的部队需要宿营地。但工会对此并不抱任何幻想。共产党已完全转入地下，原已为我安排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见都取消了。工会、农会的领袖们也正转入地下。孙夫人已离开汉口去上海，声明她不允许盗用孙博士的名义来镇压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为了同样的理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准备在几天内回莫斯科。外交部长陈友仁还在位，准备坚持到底，保护中国人的权利不受外国侵犯，但他告诉我，他也许很快也要离开。而武汉政府的其他知识分子和官员都听命于唐生智，而他还在摇摆不定中。他仍然以工农代表自居高谈阔论，但已越来越快地滑向完全反动了。现在已不再是湖南的将军们忠于国民党和武汉政府，而是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剩下的人忠于湖南将军们了。

过去人民政权在湖南逐渐成长，开始并未察觉自己的力量，但最后发展到“衙门除了签署农民的决议以外没有任何权力”。现在，军人政权也以同样的方式成长起来了。这些军人曾一度被席卷华南的伟大群众运动吓得几乎不能动弹；几个月来对他们还不甚了解的国民党新政权俯首听命。然而，他们一次次地提出异议而每次都没有遇到认真的反对。如今，武汉除了签署军方发出的命令外也没有任何权力了。

但军队本身并不是统一的。曾经把革命推进到黄河以南的广东“铁军”，虽然在多次战斗中被打得残缺不全，而且被后来参加的外来分子所削弱，但他们还有足够的革命激情去憎恨湖南的公开反革命行为。当他们沿扬子江而下进攻蒋介石时，他们问自己：为什么要为唐生智卖命去打蒋介石？人们长期盼望的武汉与南京间

的战争已经变成了两位敌对将军个人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唐将军采取了中国人的老办法：让革命军队打头阵，叫他们和敌人两败俱伤。“铁军”明白了他的意图，于是纷纷议论。部分广东军再次南下时，终于突然叛变了。

由于动摇和胆怯，武汉政府的文官们再一次背叛了革命，使之遭受最惨重的失败。当时情况已很清楚：军事领袖们正转向镇压工农，而唐将军为了战胜蒋介石不惜牺牲他的少数革命部队。因此，孙夫人建议：武汉政府率领革命力量撤退到广东并在这个历史革命根据地扎下根。如果坚定地采取了这个步骤，武汉的领袖们就可能拥有足够的武装力量和政治威信来重新收回他们的古老城堡武汉，但他们动摇了，犹豫了，向唐生智屈服了。因此，向南撤退的只有一小部分共产党员率领的部队。他们的指挥官当时还是些不知名的人物——叶挺、贺龙、朱德。他们夺取汕头时曾一度威名远扬，但不久后就在中国的广大内地销声匿迹了。他们后来又以中国红军的核心出现，朱德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①

现在武汉的领袖们已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表面上他们在动摇，实际上决裂的思想正在加强和变得更加明确。据说使他们采取具体行动的原因是，他们得到了消息：共产党为了保卫“人民政权”准备武装工农。

汪精卫和国民党的“进步分子”曾经热烈欢呼革命，高喊“杀死豪绅”。他们发表的演说比人民粮、人民学校、人民司法等农民的

^① 一九三一年九月，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二十五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译者注

简单要求激进得多。他们现在突然明白：在军人手中忍受屈辱远不如武装他们的追随者可怕！最好还是与华中的封建军阀讲和，然后和他们一起镇压群众，“恢复秩序”。最好与蒋介石以及上海的金融资本家讲和，甚至与外国帝国主义讲和。汪精卫夫人毕竟在苏门答腊的橡胶园中有一大笔投资，因此，有必要为外国说几句好话。如果与南京和解发生困难，还可以侨居巴黎（实际上汪精卫曾逃到那里去住过好几年，直到蒋介石欢迎他回来。），但决不能和曾经称为同志的粗暴的武装群众站在一起！对于武汉的“进步分子”来讲，这是最可怕的事。

最后一部分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的联盟就这样结束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爱国商人的统一战线曾经把国民革命推进到扬子江，并在此过程中团结了全国人民，而现在这个统一战线就这样破裂了！以前，北方的敌人在这个统一战线面前逃跑了，外国几个国家也向它屈服并且准备承认它。但是，内部的封建军阀控制了这个统一战线，自称的民主分子和自由知识分子在动摇了一个时期后，最后终于跟着军阀走了。

由于武汉政府变成了军事集团控制下的反动独裁政权，当时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自由地组织工农，甚至连举行集会也不可能。这就是我一九二七年七月从湖南回到汉口时的形势。那时，军事独裁者已控制了革命的最后堡垒。

鲍罗廷和大多数俄国人都在七月二十七日这天离开了。如果他再待几天，几乎可以肯定会被枪决。唐将军把广东“铁军”派去进攻蒋介石，名义上作为突击队，实际上充当牺牲品。这支部队八月一日起义了，并向南方挺进。如果鲍罗廷留下，会被当作替罪羊。然而，他离开那天，受到了礼貌待遇。国民政府的首脑们都到列车上来正式送别。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企图以进攻蒋介石的计划

来打动他，劝他留下，而鲍罗廷的每一行动都作出了如下答复：“既然你们已经决定摧毁工农组织，我不能和你们共事。”

后来，他在郑州和冯玉祥总司令共进早餐时，冯透露了一件事。冯问鲍罗廷：南京和汉口有什么区别？双方都以国民政府自居，但他们正准备互相征战。冯曾经企图把满方面置于他的麾下，以便进行对北方军阀的战争。人们曾经告诉他，鲍罗廷和共产党员应对他的计划的失败负责^①。冯玉祥问鲍罗廷是否愿意说明敌对双方的观点。

鲍罗廷的答复使他大吃一惊。他说：“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没有区别。曾经有过，但现在没有。”

冯问道：“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打仗呢？”

鲍罗廷回答：“争食，仅仅为了争食。”他指的是争夺上海的财政收入。

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中。曾经以反帝而崛起的国民党，一步步地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的行动把自己和群众分开以后，在外国主子中找到了靠山。他们取得外国支持的代价是：从属于日本并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内战。

从湖南中部的革命片段中，我看出了中国的前途，而这是我从雄辩的演说家和聪明的知识分子的言词中从未感觉到的。从革命敌人那里搜集到的一些革命插曲也说明了工农群众的现实主义、直截了当和严守纪律的勇敢精神，而这些品质正是中国上层社会所非常缺乏的。在不到六个月中，这些愚昧、迷信、仍处于中世纪的农民，精明地、无畏地、民主地处理了控制粮食、管理政府、行使司

① 可能指鲍罗廷和共产党认为：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在政治立场上截然不同，因此不同意双方联合。——译者注

法权、兴办教育等问题。

因此，当我五年后听说，在苏维埃领导下的工人和农民在同一地区取得成就时，我一点也不怀疑。有勇气把中国从中世纪推进现代世界的，将不会是那些北方或南方的将军们，不会是那些富有而又卑躬屈膝的上海资产阶级，不会是那些胆小怕事的政客和官僚们，而必定是这样的工人和农民。

第二卷 橫跨大西北

一、礼别汉口

中国革命结束了它的第一阶段。它将称为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时期载入史册。汇集在反帝口号下，工人、农民、学生、地主，甚至还有思想封建的将领们把国民革命的旗帜插遍了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这一阶段的革命以一连串的分裂告终。革命的这种分裂是由于工农组织的崛起，而军人们反对工农的要求。首先蒋介石在南京和原先支持他的工农革命者破裂，并处决其领导者。接着，其他将领也跟着干了起来。在湖南军阀集团的控制下，武汉政府滑向反动。至此，全中国再也找不到一块地方还给工农以组织起来的自由，甚至集会也不允许。

国民革命由一场群众运动一变而为一种温文尔雅的门面装饰，至少在现时是如此。蒋、唐、冯诸将领又象他们尚未自我标榜为革命者以前一样，玩弄手腕争权夺利，以至公然互相开仗。只是在镇压工农这一点上此辈才是联合一致的。他们各有其特点：蒋介石控制了上海，拥有最大的财力；冯玉祥在西北，最穷，但其军队最有训练；唐

生智手下是一伙凶狠而不守纪律的湖南佬，却有武汉政府道义上的威望可供利用。但这种威望已因他的专制统治而丧失殆尽，从而注定了他的迅速垮台。……

国民党人在其引人注目的进军中唤醒了整个华南地区的劳动人民。这一成就的影响倒是持久的。三百万男女在城镇中组织起来了。几千万人进入了农会。他们从此对集体的力量有了认识。他们在进入地下活动的漫漫长夜时，怀着对平粜口粮、人民司法委员会和贫民学校的回忆。他们需要时间来回味这些并展望未来的斗争。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免除贫困，那么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便是不可能的。

一九二七年七月末的形势就是这样。当我从湖南回到汉口时，军事独裁已完全控制了这革命的最后一座卫城。宋庆龄（孙逸仙夫人）拒绝用她丈夫的名义来掩盖反革命，已经出走。鲍罗廷正准备偕同绝大多数俄国人离去。几个月来，谣言伴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到牯岭去休息一周，九江港口所有的外国炮舰都用望远镜监视他所乘坐的船只。英国领事登船访问，为的是想弄清他想到哪里去。谣传他想乘汽艇顺长江而下，穿过蒋介石的封锁逃跑。当他悄悄回到汉口时，又引起了各方面的惊讶不安。

流传着互相矛盾的谣言：有的说鲍罗廷已经走掉了；有的说蒋介石悬重赏要他的脑袋；也有人说，他根本不想走，而是北上支持冯玉祥进攻北京去了。当他早就离开汉口，经过中国的大西北到莫斯科去，并且已在中途时；北京的报纸却还说他隐蔽在冯玉祥辖区内，受到保护，秋天还会再回到南方来。还有的谣言形容他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微服逃过敌区。

这都并非真相。他是以一位使节所应有的尊严身份离去的。由于政治形势，这位使节无法在岗位上呆下去。他在国民政府主

要官员的陪送下登上火车。这些官员中的许多人都表示希望他很快回来。在穿越中国的漫长旅程中，他的身份是公开的。在冯玉祥的辖区内，沿途将领都设宴款待，为他设立行辕，派出卫队。然而，公开要求他引退的，恰恰也就是冯玉祥本人。这种表面上的矛盾，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人的讲究礼仪。他们对敌人有时也讲外交词令；更重要的是，冯玉祥想尽可能地维持和鲍罗廷的交情。外国的在华报刊活灵活现地把鲍罗廷描绘成一个阴谋家。冯内心却不这样看。他和他的将领把鲍罗廷看作是一位有才干的政治顾问，也是他们所不想得罪的一个国家的代表。他们不想拿让农民组织起来掌握政治权力这种高昂代价来换取苏维埃国家的友谊，但也不打算得罪鲍罗廷，弄得关系紧张。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晚上。我第一次被告知，可以参加这次旅行——随鲍罗廷和其他俄国人经陕西、甘肃和蒙古回莫斯科去。有朝一日，此行将具有历史意义。我们知道，得走三千多公里路。其实，谁也不清楚到底有多远，因为，究竟在那里能找到汽车道，在那里又得迂回半个省份的路程，都不清楚。只知道要翻山越岭，还要经过几百公里的沙漠。除此之外，只有天晓得了。

军事态势使这次耗费巨大而且异常艰巨的旅行势在必行。对鲍罗廷来说，到上海去是危险的。因为蒋介石正在逮捕所有的经过那条路线的俄国人。英国客轮，历来是不让中国当局上船捕人的，但在这件事上却给予了合作。蒋介石甚至扣留了一艘德国船，罪状是它把一批砖茶转卸到一艘俄国汽船上去。途经北京的路线显然更难通过，张作霖已监禁了鲍罗廷夫人。他的统治一直伸展到北京西北的蒙古地区，致使我们不可能从张家口到乌兰巴托的公路走。唯一可选择的是向西绕远道走一条没人走过的小路，这样就得穿越中国的西北省份和蒙古沙漠。

几个星期来，我总认为会有一批俄国人要走这条路。鲍罗廷还含笑答应过，“如果秋天有人走的话”，让我同行。当我获悉鲍罗廷本人也要走这条道时，我更加希望能让我参加了。不过，俄国人这次是仓促成行，出于安全考虑，总会多带些人同行，我怕会没有我的位子。但是，鲍罗廷只问了我两个问题。

“旅途艰苦，吃得消吗？”我答道，我早就习惯于美国的露营生活。“你去干什么？”他反问道“想写本书吗？”我马上决定写书。他考虑了一会说：“星期一早上之前作好准备。两个小箱子，不得再多。我提供汽车、帐篷和伙食。带美元。在路上我会用我箱子里的银元为你兑换。”他希望我负责记旅行日志，因为别人都有其他事情要干。

鲍罗廷要走了。关于他的出走，谣言四起而又离奇。走的前一晚，我在他房间里候见时，花旗银行的卡尔亨先生也来了。他一来就盯着鲍罗廷箱子上的标签，想知道他走那条路。第二天早晨吃早饭时，一名美国助理领事向我保证说，鲍罗廷已于前晚乘轮船走了。

动身的日期一再推迟。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四点，我们的汽车被装上平板车，汽油和行李装进棚车。我们集合在车站上，等着乘武汉政府提供的专车走。武汉外交部两名秘书以护送者的身份和我们同行，其中一人是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儿子陈丕士。我们带了国民政府派来的一名卫兵，还有鲍罗廷的私人警卫，是由武装工人组成的，一向负责照顾他。

为了赶时间，我们不再等行李，让它随后面的火车走。这是一项明智的预防措施。如果鲍罗廷在武汉再多待七天，他完全可能被一个愤怒的政权枪毙。广东的“铁军”被唐将军派往下游去对蒋介石作战，实际上是让他们去送死。“铁军”对此极端不满。几天

以后，其中的一部分造反了，转而向南进发。由共产党人领导的这次造反，在武汉引起一场反共反苏高潮。如果鲍罗廷继续逗留在这里，准会当上替罪羊。

不管怎样，我们走的那天，礼仪还是受到尊重的。国民政府的首脑都到车站来郑重地送行。他们都拥到餐车里来，一起饮茶喝苏打水，互相致意。汪精卫、宋子文和鲍罗廷坐在一起，看不出他们对他的离去有什么不愉快。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还试图以讨伐蒋介石的主张来引起他的兴趣，他拒绝卷入。他的一举一动都作出了这样的回答：“既然你们决定镇压工农组织，我就不能和你们共事。”

一位中国领导人和我相处甚好，可以多谈谈的。我问他，鲍罗廷走，究竟是他自己还是武汉政府决定的。答复是：“当然是他自己，武汉谁也没有叫他走。但是，作为识时务者，他明白，到时候了。有的人希望他永远引退。有的希望他再回来。如果将来让他回来是可取的话，我们是不会不让他回来的。”此人仍然把武汉设想成一个会继续存在下去的政府，能摆脱军事独裁的控制，并再次邀请俄国顾问。他没能象鲍罗廷那样看清楚，由于排斥工农，武汉连自己的生存也保不住了。

整个夜晚，加上第二天，列车在难忍的炎热中缓缓地向北开去。我们穿过湖北的稻田，田野间的潮气象蒸气一样地升腾。然后又穿过山谷进入河南的大平原。小麦已在六月初收割，蚕豆正在生长。中国农民一年种两熟，但是因为盗匪、士兵和官吏的劫夺而仍然贫困不堪。

我们沿途看到，停靠着许多满载到车顶上都是人的运兵车厢。有的士兵用纸伞遮阳。有的把帆布帐篷披在头上。还有的头顶肮脏的毛巾，以防中暑。他们就这样在烈日下耐心地等候着。

后晌，在我们离开汉口二十四小时以后。当地司令官安树德

来作礼节性的访问。他已经连接三封有关接待我们的电报，所以深知我们身分不小。一封电报来自冯玉祥本人。一封来自冯手下负责北线的司令孙将军。一封从他的顶头上司打来。他们都指示他接待我们，并提供尔后的旅途警卫。鲍罗廷问道，这样的警卫究竟是旅途中的必要呢，还是仅仅出于礼貌？如属礼貌，他不想占用司令官的人，因为已从汉口带了足够的警卫人员。

这位司令官描述了当时典型的军事势态。他答道：“从这里到郑州之间的各站，由各种不同的部队管辖。有的是过去吴佩孚的部队，刚投到我们这边来，纪律不严。你们的卫队是南方人，口音和制服都和我们不一样。那些部队可能因此不尊重你们。他们可能占用你们的火车头或汽车。我将派十名我的个人警卫来。他们是本地人，会说清楚你们的身份。”他用一种不以为意的口气补充道，过去那些部队常强占火车归自己使用，把老百姓都赶下车，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但是，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会，他承认，有的部队可能至今还没有“改造”好。

在这里以及往后在沿途各点所见到的冯玉祥的北方士兵，比南方的要高大些。他们戴着系了蓝布带的草帽。要不是还佩着大刀，站得笔直，看上去就象是女学生。立正站着，背着高过头的可怕的大刀，这和那种不卷边的小草帽，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对照。

安司令官和鲍罗廷以中国方式一再互致敬意。司令官向鲍罗廷保证，完全可以象对待自己的部下一样对待派去的警卫。“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国民政府的同志。”在汉口政府已经垮台后，再听到这种话，不免使人感到别扭。这位司令官完全可能是不了解情况。他是个头脑简单的军人，奉命对我们要客气，他就照办了……。就这样，我们开向郑州，并于半夜到达。

二、冯总司令接待我们

到了郑州站，一阵吓人的风沙突然袭来，把躺在卧铺上的我们惊醒。我从窗子里看到，在旋风似的尘土中还有电光闪闪。次晨，我获悉冯玉祥的参谋长曾带着卫队前来陪送我们到业已准备就绪的住所去。一听说鲍罗廷还在睡觉，他就把士兵留下，自己走了。等到天亮，他又带各种友好邀请上车站来了。

鲍罗廷随即到总司令官邸去进早餐，上午就在那里会谈。年青的译员张克（译音）回来后，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我们将在郑州，而不在铁路终点站等待我们的行李。这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总司令会谈。他们交谈的内容则严守秘密。

只透露出一支小插曲。冯曾问鲍罗廷，南京和武汉之间有什么区别。双方都自称是国民政府，却又准备交战。他曾试图把双方都联合在他的旗帜下，一起向北京进击，但失败了。有人曾对他说，这一失败应归咎于鲍罗廷和共产党人，鲍罗廷能把敌对双方的不同观点说清楚

吗！

鲍罗廷的回答使他吃了一惊。“他们没有区别，”他说，“一度是有的，现在没有了。”

“那么他们交战又是为了什么呢？”冯问道。

鲍罗廷答道：“为了争食。仅仅是为了争食。”他是暗指上海的财政收入。

晚上，冯邀请我们全体赴宴。我是在场的唯一女性，因为那位俄国医生和他的妻子同最后一批行李，随后才从汉口来和我们会合。中国不习惯让妇女参加宴会，尤其是在战区的军人宴会上。我想这种事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空前的。人们告诉我们，穿着要简朴，因为冯憎恨排场。我想，一件白色亚麻布短裙，加上黑白条子短外套总够简朴了吧！但一看到那辆冯派来接我们的满是尘土的货车，我立即决定去买一件卡其制服，以便赴宴。

总司令在美国教会的房屋里接待我们。这所房子已被主人遗弃，他发现后，就用作司令部。我们通过大门，进入一片宽阔的绿草坪，在过去的客厅内吃饭。精力充沛的孙将军是北线的年青司令官，马将军是著名的甘肃回族骑兵长官。他们都是座上客，都穿着满是灰尘的灰蓝色军服。冯也穿这种军服，但忘了系皮带。他象一个坐在农家桌边的庄稼汉，衣冠不整，不拘形式。菜肴中有汤、鸡、茄子和一种沉甸甸的面团，是当面包吃的。我们在往后经过的三个省份中一直吃这种湿润的面团子，都吃厌了。晚饭后，大家坐在草坪上互相打趣，但由于要翻译拖长了时间，令人乏味。

因为第二天早上五点冯照例要向士兵讲话，我们很早就告退了。鲍罗廷向我描述了冯的特点，说他是有才能的演说家，讲话中善于作简单贴切的说明，伴以有力的手势。当他谈到人力车夫的生活时，就象个人力车夫似地跑起来，因此即便是外国人也能理解

他的意思。

第二天，我和几位同冯一起工作过的俄国军事顾问谈话。他们逗趣地议论中国式的战争。他们说，中国的将领们是旧式的武士，他们所依据的战术主要来自一部描述古代战争的古典作品《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中说：“连我们的父辈都不能战胜四川，我们又怎么能。”现代的将军们相信这句古话，同样认为四川是不可战胜的。谁敢自称比祖先更有本领！这是中国人的永恒信念：祖先总比后代强。

冯的一位部下，张之江将军，是一位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在战术问题上，他既求教于《旧约全书》，也求教于《三国演义》。有一次对张作霖的部队作战，他搜罗了几百头公羊，尾巴上扎上火把，把它们驱向敌军，企图吓唬他们。向我提供情况的人说：“但是张作霖不是圣经时代的人，没那么傻。结果等于由我们付账，让他们吃一顿烤羊肉。我们的供应差得很，真负担不起。”

年轻的将军们告诉我，湖南北部有个自称“天门会”的农民组织，拥有一百五十万会员。农民正在组织起来反对军阀，这已遍及全国。纯粹是出于忍无可忍，所以甚至在没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人指导的情况下，也发生了这种事。这些自发的农民组织相互间没有联系，因此连一个省的政权都建立不起来。它们没有社会和政治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卫，为了反对封建将领及其军队的苛捐杂税。它们同美国兄弟会组织只在外表上有点相似。它们采取了怪诞的形式。举例说，“天门会”有一个皇帝。人们相信，把皇上的印放在胸前，就可保佑人刀枪不入。他们的衣着色彩鲜艳，有的红，有的绿，有的蓝。头上还戴着有颜色的角，同他们的衣服相配。人们赤裸着半边肩膀或一条手臂投入战斗，武器是长矛和农具。

尽管如此荒诞而又迷信，但是只要读一下他们的盟誓，就可以

发现他们的组织是在什么需求的基础上建立的。他们起誓，

- ①不向任何军队交粮；
- ②不向任何将领纳税；
- ③不准任何军队进驻我们的房屋；
- ④选举自己的县长和管事人，不服从任何部队长官指派的人；
- ⑤实行自卫，不向部队求助，不接受他们的资助。

这些要求反映了全体中国农民内心深处的呼声。他们已被封建军阀榨干了血汗，就象封建时代的欧洲农民处在到处流窜的骑士的统治之下一样。这些骑士在历史和小说中却受到颂扬，引以为荣。农民要求的仅仅是让他们自便。但他们的地区组织一般都无力抗拒军队。共产党人充分了解这一情况，据此决定了自己的政策，那就是：在农民中开展宣传，让他们在更大规模上组织起来，作为建立未来政府的基础。所有的中国将领，即使是所谓的国民革命军将领，都对此感到担忧。

冯总司令号称是农民的卫士，但也没能取得“天门会”的信任。当他的部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筹粮时，八千名组织起来的农民客客气气地予以接待，但拒绝交粮。他们说：“听说贵军是为我们打抱不平的朋友，我们很高兴，但请到别处去干吧，不要来打扰我们。我们自己管理自己，也不去打扰你们。”下雨时，他们不许士兵进屋躲雨。天气炎热，他们也不给士兵水喝。联合抵制运动十分有效。军队碰了钉子，只好回郑州去。

一位俄国顾问说，当他同一位中国将军谈到国民革命分裂的原因时，双方的不同观点非常明显。

“我对将军说：‘你说农民革命是多余的。但袁世凯的儿子拥有三个县那么大的田产，这公平吗？’

他答道：‘当然不公平，那是抢来的。’

我说：‘那末让我们夺回来再分配给农民。’

他叫道：‘噢！我们必须集中全力夺取北京。’”

这番天真的谈话反映了最基本的分歧。一个集团希望唤起并组织农民，以便获得力量建立政权。另一个集团则希望农民在某个国民军将领打下北京之前保持安静。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又从那里获取那种特殊的革命动力呢，当初正是由于农民寄希望于国民革命军，才带来了这一动力。

第二天晚上，孙将军也设宴招待。和冯总司令的招待相比，这次可不那么简朴了。我们吃了好多道西菜。招待员站在背后为我们打扇。鲍罗廷因为身体不舒服，提早退席了。我很为孙将军感到抱歉。主客离去，明显地使他失望。因此我请他讲讲他是怎样以一万四千人打败七万人，解了西安之围。这是孙将军最显赫的成就。

于是他没完没了地讲到军队的调动，还提到我无法记住的将领们的名字。孙将军是个军人，甘愿不问政治。他根本不提为什么目标而战，只讲道路和河流的位置，以及夜间运动。还讲到一次愉快的机缘。在一个刚夺下的岗哨上，他亲自收到敌军的撤退命令。“我预先就知道了他的退却计划，于是按照他的命令和他碰了头。”他格格地笑着说。

他描述了一番，他是如何把投诚过来的人派到敌人后方去，从那里攻打他们，而后者还不知道这些人已经投诚。还说到敌军中有一名下级军官，如何利用上级后撤的机会，扩充自己枪支和人马，一跃而成为“大人物”。对于军阀与其臣仆之间的争斗这种封建关系，这是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写照。

最荒唐的是，敌方一名姓刘的败将，倒到这边来，成了冯玉祥的部下。孙说：“我想，他现在是真心实意归顺冯玉祥了，因为他别

无出路。”孙说这话并非出于讽刺。他还补充说，冯和刘六年前就相识，当时两人都在同一个省份内，都身居军事要职。

孙将军和刘将军过去是敌对的，现在都成了冯总司令的部下。两人在郑州相遇时，以中国人特有的礼貌互相问候。刘说：“我撤退时，送过一份命令给你，你收到吗？”他暗指当时落入孙之手的那份文件。那份文件使他的那场撤退变成了溃败。

孙回答说：“当我知道你打算离开陕西时，我派了一些人去陪伴你，把你护送到郑州你的老朋友冯总司令这里来。”他这样说是影射当时对败军的追击。刘为了不显得失礼，答道：“感谢你的护送，但何必把我的部队都打发到山区去呢？我们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把他们再集合起来。”

讲完上面的故事后，孙将军又说：“中国人打仗不是真打仗，不过是笑谈。”我问他：“你进攻北京是否也是笑谈。”他答：“差不多是这样，每打一仗，双方的关系就更密切……”。孙是进攻北京的北线指挥官，并且被当作国民军的反帝战士介绍给世界公众的。即便是国民革命军也不过是这般货色。

孙将军很欣赏自己的顾问赛福林将军，对他和鲍罗廷一起回俄国去甚感懊丧。晚饭后，我们到庭院里去乘凉。所谓庭院不过是一片光秃秃的泥地。在玩“搬空椅”游戏时，孙将军和赛福林毫不拘束地互相拥抱和拉扯，象大学生那样一起逗乐。孙脱掉外衣，穿一件薄薄的白衬衣坐着。衬衣被汗水贴在身上，时而被风掀起。他因赛福林要走几乎想哭，声言他是多么喜欢他，怕他一去不返。

有句古老的中国谚语，描写士兵的生活是“如神、如虎、如狗。”孙将军说：“打了胜仗，我们坐在郑州大摆筵席，是神仙的日子。打起仗来，我们象老虎。但是，冒着酷暑严寒，在泥泞和乾渴中长途转战，我们又如狗。”他带着感情补充道：“赛福林和我共同度过如

狗一样的日子。”

赛福林致答辞，高度赞扬了中国士兵的忍受能力，他们赤着脚在冰天雪地中行进，却能坚持到底。他说：“没有哪个别的国家的士兵能忍受这样的艰苦。”

“但我们将是被迫受苦”，孙将军说，“而你们却自愿来和我们一起受罪。”

“我们俄国人到中国来是为了……”，赛福林开始感情激动了。其他俄国人赶快打断他。“嗨嗨！”他们喊道，想提醒他，世界革命的口号已不再时行，要他警惕，说话不要走火。他把他们推开，继续讲道：“我们俄国人到中国来，是为了全体人民能象兄弟般相处，推翻一切压迫者，不再有人受苦。”局面总算挽回了，因为这种公式化语言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根据鲍罗廷的邀请，赛福林将和我们一起走，因为他一直和冯军在一起，认识沿途所有的官员。我问他，孙目前的遗憾有多少真诚。他答道：“很真诚。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他很感谢俄国顾问，常对冯玉祥说，没有俄国顾问，他什么事也干不成。有时他对我说：‘你来制定对敌作战计划，我去应付那帮大官们。’他性格开朗，我喜欢和他一起工作……但我究竟能否回来，取决于未来总的政治情况。”

鲍罗廷似乎对所有将领们都厌烦了。他看透了。在他们的革命口号的背后，是渴求得到军事援助。他指出：“下次再有中国将领到莫斯科来高喊‘世界革命万岁’时，最好立即派人去找‘格柏乌’（国家警察）。他们想要的无非是枪炮。”我争辩说，看来孙将军还是友好的，并且喜欢俄国。鲍罗廷疲惫地答道：“他还年青。他们年青时都是好的。”

虽然这阵风沙使气温下降了，但第二天车厢里又热得无法忍

受，因此鲍罗廷同意住到铁路边一所为我们准备的房子里去。我想，为了腾给我们住，大概把什么人给撵走了。很久以前，这所房子属于法国人手里的铁路管理局。但接踵而来的军事占领把房屋的所有权全给弄混了。我们所知道的最主要的事情是，房子里有纱窗和自来水。在中国，这两样东西会使人感到莫大的快慰。

给我们住地特派了警卫人员。在他们面前生活起居，起初是很感不便的。我睡在宽大走廊的一角，用被单隔开。但是，两名整洁的士兵就在纱窗外面走来走去。我就生活在离他们几英尺的地方。当然，他们很守规矩，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真是遵守纪律的出色表现，因为夹在军队中竟有一名外国女人，这一地区的任何普通居民都一定要停下来看一眼的。

在这里，我发现中国的睡席很有用处。它是用光滑的硬草编织而成，很容易把灰抖掉，比被单好多了。被单容易沾灰，往往一个晚上就全弄脏了。我们每人都发到一张军用帆布床和一张席子。从郑州启程后，我们的席子不再用于睡觉，而是当窗帘，挡太阳，或者防苍蝇。

既然被分配到一所西式房屋去住，我们想大概要多住几天了。于是就把一辆道奇汽车从火车上卸下，乘着它在镇上转转。我们的汽车无疑是郑州最好的一辆。冯总司令自己也只有三四辆老旧卡车。鲍罗廷在发烧，这病经常提醒他在中国热带地区生活过的四年。总司令派来了自己的私人医生为他诊治。

正当一切都好似安排就绪了，突然有人传话，说我们将在晚上启程。一小时后，我们就登上火车。行李全部匆匆忙忙地集中到一起。我们在车上等候鲍罗廷。他刚从病床上挣扎起来，和冯总司令作最后一次谈话。谣言纷起。第二天，我们得知，前线突然受挫，需要冯总司令立即前去。按照中国人的礼仪，只要高等顾问鲍罗廷

在这里作客，冯就不应该离开郑州。于是来一个措词得体的建议，敦促我们赶快上路，以便前线的战事能进行下去。

将领们为我们送行。首先派来一大队士兵，还有军乐队。他们的前头骄傲地飘扬着两面旗帜。其中一面鲜艳的红缎子三角旗，是冯玉祥因攻占郑州而奖给他的“铁军”的。现在，全中国好象到处有“铁军”。而真正的广东“铁军”早就在扬子江边四分五裂了。他们才是真正打开通往郑州之路的人，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胜利，而其果实却为冯玉祥取走了。

冯总司令前来话别。我们在专车宽敞的末端围成一圈坐着。茶几上烛光摇曳，这是唯一的照明。冯祝我们旅途快乐，还支持孙将军的愿望，要让赛福林留下。透过这一套彬彬有礼的言词，使人感到一股尴尬的暗流。冯不想失去俄国的友谊，尤其想要取得俄国的军事指导。但是，他不想要他们的政治指导，而且正在考虑怎样才能不要政治指导而又获取军事指导。表面上，一切都是客客气气，而在背后，则是紧张的算计。

告别结束，我大胆地向总司令索取他的臂章，借口是我现已身着蓝灰色的军服，需要一个标记。他笑笑，把它从袖子上扯下来给了我。这件事缓和了一点气氛。鲍罗廷后来说：“我想他一定很高兴，能用如此简单的方式向我们表示友好。”

从我们西方的听觉来说，军乐队发出的是一种嘈杂、不协调的中国音乐的吼叫。从我们窗口射出的灯光照亮了吓人的大刀那笔直的刀口。士兵们突然把它举过头，以示敬礼。大刀下面则是年青而又严肃的面孔，姑娘似地戴着蓝帽缨的白草帽，显得滑稽。我们在引擎呼啸和乐队轰响中离开郑州。另一支卫队上车来替换了上次派来的那个卫队，陪同我们到陕西边境去。

到铁路终点只不过一百多里路，但由于缺乏燃料、信息不确和

举行宴会，足足花了四天时间。我们老是要等着人们送煤来。很可能机械师和沿途的煤商是有默契的。因为，凡是煤的供应很充足的站头，他总是开过去，开出几里路后又停了下来，于是又要通过打交道才能获得煤。在车站上，我们从穿蓝色棉裤（一种典型的乡下服装）、缠小脚的女人手里买鸡蛋，半分钱一只。两分钱就可以买一顶冯军戴的那种草帽。金属货币和农产品之间的这种比价，真象中世纪的情况。

遍及这一地区，成千上万的农民住在山坡上的窑洞内。山坡的地质构成很奇特。可以不很费力就掏挖成型，成型后却又可以持久不坏。窑洞打在陡峭的崖壁上而在圆形的山岗里，这正好适合穴居。有些窑洞很大，采光条件也很理想。我所访问的一家窑洞，造得小巧舒适，位于山坡角上，窗户上还装有防护铁栅。妇女在外面一个宽大的墙架上准备她的简单饭菜，在陶制的炉灶上烹煮。饭桌则是用硬土凿出来的。窑洞深处稍暗的一间做了粮仓。这窑洞位于一条沟壑上面约五英尺处。到了雨季，这条沟便成了溪水的河床。

其他窑洞更要象样些。一个聚居地可以容纳二十多家人家。这种住地进口的拱门上饰有色彩或图案。进门后是一个三面为峭壁包围的院落。沿壁开出一级一级的台阶，上有许多门，分别通向居室或仓库。后来在洛阳，赴宴之后，我们在一个大窑洞内度过了一个下午。盛夏酷暑，洞内却凉爽宜人。

这里的风景很象加里福尼亚州北部。褐色的群山，山脊上一片绿。一年二熟。小麦已收割完，玉米和土豆正在旺盛地生长。从远处看山坡，有挖出来的窑洞、仓库、堡垒，中间点缀着用泥土晒成砖头砌的房屋，真是奇幻如画。山坡间散布着各家的墓地，有巨大的柱子，覆着弯曲的阙顶，周围是拱形的墓石。难道这些穴居的农

民，真的在革命中组织起来了？他们真会成为未来的中华共和国的一部分吗？

离开郑州后的第二个晚上，我们在著名的军事要地洛阳停下来参加宴会。主人之一是韩复榘。俄国人告诉我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是发人深省的。他是冯玉祥手下的旅长，在南口吃了败仗之后，叛离冯玉祥，投奔山西的阎督军，以便为自己的部队寻求军粮和冬季营地。他对上司解释说：“我的叛离是暂时的。冯玉祥既无枪又无饷，如果跟他一起撤到甘肃，我们准会饿死。所以我准备投奔阎长官（当时是冯的敌人）过冬。到总司令能够重整旗鼓时，我会再投奔过来。”他是守信用的，现在他又为冯效力了。一叛再叛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耻辱。

在洛阳之宴中，我和五名女宣传员坐在一起。从服装和言词来说，她们很象我在汉口见过的革命宣传员。但在行动上要温和得多。从来没有发生过强制剪发，甚至从来没有处罚过强迫女儿缠足的妇女。最大的妇女协会设在西安府，只有三百名会员。她们都不敢宣传婚姻自由，因为怕引起农民反感。我不大清楚她们究竟宣传些什么，只知道她们敦促所有的人支持冯玉祥进攻北京。她们把这一点称之为“解放”。她们腼腆地笑着说，所有的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但是，她们从来没有见过帝国主义分子。而对她们来说，谁反对冯玉祥谁就是“军阀”。除了温和地反对缠足外，我看不到任何可称为革命宣传的痕迹。她们告诉我，农民和工人协会行动过激，因此必须按冯玉样的指示改组。当我询问此种过激行动属于何种性质时，回答是“他们自作主张。他们搞阶级斗争。在西安府，他们甚至不经审判就杀了一个。”

宴会上的发言者同样是温和的，非常有礼貌。他们颂扬俄国是第一个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国家。还说：“俄国和中国的联合

有伟大意义。”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辩解，谦恭地声称“许多流氓、二流子干的坏事被归咎于共产党。我们不认为共产党人真是坏人。拿共产主义原理来说，我们同意那是个好原理。但是，我们和共产党人搞在一起，名声就坏了。等到中国革命成功，我们攻下了北京，那时也许共产党人还能回来再和我们合作。但是此时此刻，这么多人反对他们，还是甩开为好。”

在别人发表这类令人惊诧的演说词时，鲍罗廷泰然地坐在红旗和孙逸仙博士像的下面，有点厌烦。他在致答词时，同样是客气的，说他选择了这条“最友好的路途”。

他说：“最近，我们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将对这一变化感到遗憾。我离此而去就是因为这一变化……有人说，我们想推翻国民党。不，同志们，我们仅仅是想帮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解放人民群众的政治力量。今天在扬子江上，希望是渺茫了。”他请大家注意，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正期待着他们。而他自己，虽然将去莫斯科，仍将象他在中国时一样，为他们的革命而操心和工作。这些黯然而又直率的友好言词终于消融在愉快的、彬彬有礼的气氛之中。真叫人摸不清，那些谦恭的将领们是故意拿革命言词来装饰门面呢，还是真想为他们称之为“革命”的那种新的解放运动服务——当然，这是一种有控制的“革命”，没有群众的过激行动。这场“革命”的主要标志是冯总司令的地盘更加扩大。

在他这番话里并无特意强调的嘲弄之词。然而，局势是够滑稽的。蒋已经悬赏要鲍罗廷的脑袋。不过，为了保住“革命”的外衣，这种事是暗中干的。但也就把由上海返回苏联的路线给切断了。汪精卫因铁军叛变而震怒，急令冯将鲍罗廷押回汉口。但是，冯需要一个中立的苏联作为他在军事行动中的后方。正巧冯的大

部分家属此时正在莫斯科，于是他催我们走。这样，他可以向汪精卫交待，说鲍罗廷已走了。我们匆促离开郑州的原因，终于由猜测而得到了证实……主人们到底知道些什么情况，那我们就不管了。他们对俄国和“中国革命”都奉以外交式的礼仪。当然，这所谓“革命”已不是指群众夺取政权，而是指群众被强制着安静下来……。我们于八月三日下午离开洛阳，晚上抵达陕州。我们还以为这是最后一站，于是把汽车从火车上卸下，并开始往上装东西。哪知道，人员和行李还要留在火车上继续走二十里路，以便绕过一段很糟的汽车路，而汽车则空车往前开，因为离开这个站，汽车就卸不下来了。当汽车最终到达铁路终点站时，已是下午三点了。大家都感到疲劳和炎热，气温已连续三天达华氏一百度了。我们在一条小河边的果园里露营。又等了一夜才能装车。当地旅店送来满满一大铁锅面条汤，几盘鸡、竹笋，肉食和蔬菜，最后则照例是湿润的圆馒头。这些菜可供二十个人吃，花了一元三角金币。我们在一条浅溪中洗澡。溪水是灌溉田地之后缓缓流来的，所以已变得温热了。灌溉用水是这一地区唯一能找到的水。

晚上，前陕西省副督军访问了我们。他是国民党左派。陕西是我们将要前去的省份。他说：“和几个月前相比，现在的陕西是叫人泄气的。”

北方各省中，陕西是最革命化的。冯玉祥统治下的各省中，唯有这个省掀起了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唤起了农民。一位俄国军事顾问告诉我说：“他们对政治比俄国农民更感兴趣。在陕西，人们不仅参加本村的集会，还步行三十里到镇上去开会。这期间，我和陕西督军于右任一起旅行。他每天参加三四个大会，每个会都有几千农民参加。一群人听完了，另一群人就说：‘于右任同志，休息一会，也对我们讲讲。’陕西农民是如此贫困，饱受压迫，只要能

听到一句有希望的话，他们都情愿走远道。”

于右任组织农民的策略是简单的。在那些并无政治和社会目的、只是自发地联合组织地方自卫团体的区域内，这种策略特别适用。他问农民：“你们接收什么样的人入协会？”他们答道：“我们想听听你对此有些什么主意。”

于右任说：“我的意见是接收所有依靠劳动为生的诚实农民。不要二流子，不要土匪，不要抽鸦片的，不要地主和高利贷者。你们组织起来后，派代表去和其他村搞联合，这样就可以建立全省的农民组织。这个主张好不好……”“好主张！”农民高喊。于是就开始重新组织他们的协会。

在我们旅行期间，于右任名义上仍然是督军，但由于拒绝运用他的影响来执行冯玉祥解散农民协会的命令，逃到汉口去了。他的副督军，实际上也是有职无权。这位副督军和鲍罗廷交换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看法。

他说：“我军中有三种类型的军官。有留学日本回来的。这些人最危险，因为他们腐化得厉害，谋求私利，是日本的工具。他们势力强大，行动一致。第二种是保定军校出身的，也追求私利，但势力不大。第三种是行伍出身，没受过专门训练。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从土匪一直到我们冯总司令那样的人。无论哪种类型的军人，都是没希望的。”

鲍罗廷指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没有希望。因为他们在外国或教会学校里学了一套自私自利的投机哲学。”对此，陕西同志说：“这种说法对那些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学生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对正在国内学习的学生，则未必尽然。”于是，在升起的月亮下，坐在果园里的一张板凳上，鲍罗廷为陕西同志从容而极其全面地分析了卷入中国革命的各种力量。这些，我还从未听他讲过。在

汉口，根本没有时间讨论这些问题。现在，离开现场已好多天，好多路了。他谈论这些问题好象也同时是为自己而进行总结。

“有三种力量在起作用，”他说，“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蒋介石已经在上海投靠了他们。汪精卫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还有工人和农民。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永远统一不了中国，因为他们不是真心反帝。他们和帝国主义联盟，从中得到好处。小资产阶级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大资产阶级和工农之间摇摆不定，最后倒向大资产阶级。唯有工人和农民能够统一中国。”

他继续说：“甚至当汉口工人掀起群众运动夺取了英租界之后，武汉那些胆小的政治家都不敢接管，还议论要把它交回去。如果有周密的计划，充分的勇气，全部外国租界都可能拿过来，甚至包括上海公共租界。我们无需先打上海。可以通过华中地区向北进军，和西北的冯总司令取得联系，然后，以一个联合起来了的中国为后盾，一起经过陇海铁路与扬子江直下沿海地区。我们将轻而易举地拿下上海，就象你坐在那里点上一支烟。面对全中国团结一致这种广大群众的压力，长江里的一切外国炮舰就不敢蠢动。然而，首先是，蒋介石因为渴望到上海分赃，出卖了这个计划。他违背了他的党和政府的指示，抢先赶到上海，出卖了工农，取得了大资产阶级的借款。即使如此，武汉政府也还是有可能将原先的计划付诸实施的。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他讥讽地说下去：“湖南有些女青年强迫一些老年妇女剪发。一些小米商少赚了点钱。于是乎，某些人就把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都置于脑后，大喊大叫反对共产党人，反对工人农民，要求在继续进军之前，必须先在国民党内进行清党。于是政府和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起来，一切全四分五裂了。”

“从现在起”，他预言，“帝国主义将凶残地压迫中国。过去，欧洲列强之间竞争激烈，他们先是忙于世界大战，后又忙于分赃。后来，国民党来了，当他们紧紧依靠群众从帝国主义那里夺回长江沿岸各地租界时，国民革命确是“最高权威”。现在，他们开始镇压群众，随之而来，帝国主义的剥削必将加重。但是，不要泄气。中国革命并没有结束。”

那天晚上，在光影错落的月色中，我们睡在树下。鲍罗廷搭起一顶帐篷，其他人则露宿在帆布床上。警卫人员在果园里巡逻防盗。这一晚很不安宁。我两次被一名中国士兵惊醒。他在帆布床上我脚旁坐下来。我一嘟囔，他就走开了。其实，他是站得太累，想坐下歇一下。还有一次，我被大声的吆喝惊醒，看到一名士兵在离我三尺远的地方，拉开枪栓，阻止一位吃惊的农民通过，这人回家晚了，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想穿过这座果园。太阳升起时，东方满天红霞。我们从附近的水井里汲了几桶水回来。我躲在果园旁边的墓地后面，淋了一个浴，以恢复精神。我们将开始一次真正的旅行——通过人们没走过的道路，穿越中国的后院，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去。这是一次超过三千公里的旅行。

三、通往西安府之路

八月五日早晨，我们开始装车，为横跨中国大西北和蒙古的长途旅行作准备。汽油是首要的、最严重的问题。途中是买不到汽油的。要到库伦才能买到，但那几乎已到达旅程的终点了。我们随带二百二十箱汽油，每箱十加仑。一共有五辆汽车、五辆卡车。我们的计划是：卡车上装载的汽油一用完，就把卡车丢下。按此，我们的车队将会越来越小。正如鲍罗廷所说：“最后到达终点时，我们就一无所有了。”他的话实现得比预期的更快。到达西伯利亚大铁路时，我们只剩下两辆汽车，其他车辆都在途中处置了。

鲍罗廷乘坐一辆大别克牌车，马力最大，也最重。由于一路上有许多坑坑洼洼和拱桥，这辆车引起了许多麻烦。小陈驾驶一辆道奇牌轿车，坐五个人，其中之一就是我。还有一辆绿色和两辆黑色的道奇游览车，三辆雪佛莱牌小卡车和一辆通用牌大卡车。照理，我们应该购买同一型号的车辆，但在汉口，只能有什么买什么。

仓促上路使我们未能对行李严加限制。东西多得带不了。我们把行李堆得高高的，用绳子捆紧，但还是有许多箱子装不下。当地长官说，如此超载，是到不了西安府的。迎面就是陡峭的山，而且路面多沙。他肯定地认为：“你们得卸下来，另雇马匹驮运。”听从他的劝告，我们用船把部分行李运到山那边的平凉城。平凉以后的道路会好走些，而且那时车上装的汽油也减少了。

在我们的轿车后部，捆扎紧的小衣箱、行李袋和篮子，堆得有车顶那么高，下面只露出车轮。车里面装着三张带褥子的帆布床，六只小衣箱和背囊，一只帆布水箱，内有四只热水瓶，还有几罐食品。两只西瓜，一把茶壶和一只打汽炉堆在前面底板上，和车用工具争夺地盘；而车用工具又是被鱼和青豆罐头从前座底下挤出来的。五顶帽子钉在车顶上，五件外套塞在我们身下。五架照相机和闪光灯塞在车门上的夹袋里。五只搪瓷杯有的倒扣在热水瓶上，有的挂在窗钩上。挡风玻璃的螺丝上挂着两支左轮手枪，这样一车的行李，还得加上一把扫帚，一把作为纪念品的剑，一支步枪和五六个人。踏脚板上堆满了汽油箱和轮胎。只有一扇后车门可以打开。其他车辆也差不多是这样。

一上路就遇到了考验。我们在一条溪前放慢了速度。小溪那边是陡峻的山头。一辆卡车卡住在溪中，必须卸货。我们乘的道奇轿车虽然顺利通过，但是水溅入了汽化器，必须擦干净才能开行。前面那辆卡车的后轮陷进了一层厚泥掩盖下的深洞。这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清洗气化器。化了三个小时才走完了九英里路的第一程，那些卡车还掉在我们后面。

我们经常不得不下车步行。有个地方，汽车在悬崖上，危险地沿一条上有流沙的狭路爬行，接着它就打滑，一直滑到斜坡脚下。后来有很长一段路，我们夹在高崖之间，顺着两道狭窄的车辙行

驶。这条路是几世纪来过往车辆辗压出来的，路面已比过去下陷了一百英尺。这个地区的地面，很容易形成大裂缝，从巨大的沟壑到公路上的坑坑洼洼，大小不等。这些坑洼里充满流沙，车轮未陷进去之前，根本察觉不到它。陷进去后，就需要化大力气用铲子和木板帮忙才能解脱出来。我们赶上鲍罗廷的别克车时，它正已陷在洞里。中国司机站在那里毫无办法。他只会在汉口大街上开车，而湖北那个省份是没有乡村公路的。所以他束手无策。相反地，小陈已在他出生的特立尼达有过经验。靠他的内行指导和许多人的劳力，那辆车才重新上路。

不少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是因为成群的孩子欢快地奔跑，跟着汽车，想乘一下。人那么多，我们只好停车。随后，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把铜板撒到人群中去，乘他们抢夺之机逃跑。

那晚七点，我们到达一条溪边，就地宿营。这地方离起点才三十二英里。距离是够短的了，但是所有的卡车还都没能开到，只有三辆小汽车到了。等了两个晚上，车才到齐，于是我们感到必须重新装载，还得抛弃一部分行李。直到八月八日，我们才能继续前进。这三十二英里路共化了三天。步行也肯定比这快。

在营地休息时，有几个法国人来访。他们是陇海铁路的雇员，正耐心地等待铁路铺到这一地区来。这条铁路是经过特许，由法国、比利时和中国合资修筑的。根据设计，它将延伸到西北的兰州，是第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但在内战期间，修路无法进行，实际上只修到我们从火车上卸装的地方，虽然路基已修到前面不远。这些不走运的法国人已有六个月领不到工资。因为不可能把经费通过战区老远地送到内地来，也不可能把一年多前就准备好了的铁轨和桥梁部件运来。他们恳求我们告诉他们一些消息。他们最关心冯玉祥和武汉政府是否已经实现和平，好让扬子江恢复通航。

这是军阀战争破坏建设事业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们的旅程现在开始沿黄河行进了。第二个营地就在黄河岸上。我们想在黄河里洗澡，但河水浑极了。靴子没入水中才一英寸，就看不见了。拿出来后，上面是一层泥浆。直到晚上，才找到一条可以洗澡的溪水。但一到早晨，溪水又干枯了。我们发现，这些水是田地里排放出来的灌溉用水。说实在的，找水成了我们的主要困难了。

在日记里，我记下我们离开黄河的那天是没完没了的“城门日”。每一座市镇都围起高墙，寨门在日落后关闭，以防盗匪。我们好象又回到几百年前的中世纪去了。城外的农民面对盗匪束手无策。我们的车队却无需惧怕。因为任何一个普通的匪帮都无力向一个备有左轮枪的汽车队发起进攻。

我们到达的第一座城门在陕西省。它标志着我们已离开河南进入陕西。一条很长的隧道是两个省份的分界线。隧道两头都有税卡。税卡征收“厘金”，即由各省征收的税金，这大大阻碍了中国的贸易发展。而我们是些有特权的旅客，免受关卡检查。

我们到达的第二座城门是潼关。这座城市有厚实的双重城墙。要经过一段又长又陡的斜坡才能到达城下。由于上坡时颠簸得很凶，鲍罗廷车上一支上了膛的勒明吞步枪走火，打伤了坐在鲍罗廷旁边的泰加诺夫。他立即被送往设在一座孔庙里的驻军司令部。取出臂上的子弹，我们又前进了。当地将领一再要我们留下参加宴会，但鲍罗廷只答应简单地见见面。不过，为了修一辆卡车，还是留下了几个人。经过看管的中国人允许，他们在一座传教士已经出走的瑞典教堂里过夜。一阵“狼！狼！”的叫喊声惊醒了他们。才知道尽管有双重城墙，一只狼仍然越墙而入，咬了他们隔壁的一个小孩。虽然经过几个世纪的定居生活，中国的西北地区仍然是

荒凉的。

你若想知道经过农村时人们怎样接待我们，只要想象一下当马戏团到一个镇上时大群小男孩的反应就行了。对中国内地的居民来说，我们这些外国人倒不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是“流动马戏团”。在荒僻山区，人们从屋子里拥出来，盯着我们看。在小镇上，差点被好奇的人群包围住。只要我们的汽车继续开动，人们就对它表示出尊敬，对我们并无妨碍。人们站在路边，叫着，比画着，跟在车后跑。但要是在市场上停车买茶水或水果，人们就潮水般一拥而上。哪怕想从车里往外扔个苹果核都会碰到人身上。有一次通过一个拥挤的市集，汽车撞翻一张桌子，打碎一只杯子。陈丕士停下来赔偿，人群显出惊讶的神情，难道一个乘汽车的大官竟公正到肯赔偿这一点损失！这又一次使我想起欧洲中世纪的农民。他们认定，受官吏压迫是命该如此。

载有我们这两名外国妇女的道奇轿车更成了特别的“噱头节目”了。我们这些人已经甚至比将军和君主们更显得稀奇。但更新鲜的还是我们的轿车。在中国这一地区，人们还是头一回见到这种汽车。前不久，这里只出现过少数几辆军用旧卡车。我们觉得卖弄这些汽车挺逗乐的，于是一会儿把车灯开亮，一会儿把窗玻璃摇上。有些人脑袋伸得太近，被玻璃碰上了，更感到有趣。有一回，陈丕士玩了点花样，把窗慢慢地摇上去，显得很神奇。人群中的孩子们快活得吼叫起来，但是他们有点迷惑，弄不清是怎么搞的。

近晚，赛福林同志提醒我们要抓紧，要在城门关闭之前，越过下一个市镇。因为若赶不到龙汀（音译）^①洗硫磺温泉浴的地方，

^① 据查对，在潼关、西安之间并无与此相符的地名，而从距离与有温泉来看，极可能是“临潼”之误。——译者注

就没有更好的宿营地了。我们象风一样驰过这个镇——我甚至不知道它叫什么，但我记得它十分美。毫无疑问，如果在白天，这准是个沉闷的地方，象其他地方一样的尘土飞扬，破烂不堪，毫无秩序。但在黄昏中，金黄色和绿色的纸灯笼悬在空中，散发出一股神秘的气息。城门开着让我们通过。这以后我们走上了一条又黑、又破的难走的路。晚九点，我们到了龙汀。

龙汀高耸的城门早已关闭。但由于事先已有通报，知道我们要来，所以立刻就打开了。士兵们戴着冯玉祥部队特有的臂章站在车灯的光辉中。街上的人群几乎都知道我们上那里去。根据他们的指点，我们穿过迷宫般的街道，经过远处一扇城门，来到了山间一处洗硫磺泉浴的疗养地。周围乡村的人们都到这里来治病。由于有些病有传染性，我们有些犹豫不决。但是，赛福林和考夫过去和冯玉祥部队一起到这里来过。他们把泉水的源头指给我们看，向我们保证，晚上迟一些或早上早一些在这里洗，完全不会有问题是。除非白天这里挤满病人，流动的泉水总是清洁的。我们发现洗这种澡是很爽快的，但太热，使人浑身无力。那晚，我们睡在山坡边上的小屋里。

在龙汀，我们躲在树下挨过了暑热蒸人的一天，直等到我们的卡车从潼关开来，然后沿着一条相当好的公路走了十五英里到达西安府。这是八月九日晚上。那辆本来开得很当心的轿车，进城时越过门槛，猛颠了一下，搞坏了发动机壳。离开铁路终点以来，我们已走了五天，共走一百三十英里。

首府为西安府的陕西，面积共二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二千二百万，和许多欧洲国家差不多大。在我们见过和将要见到的筑有城墙的城市中，西安是最古老的历史名城，早年曾经是中国的首都。这里有大秦景教碑，所记录的年代是公元六五〇年。这说明在那

古老的年代已有基督教传教士来到遥远的亚洲。我们到此的上一年，西安府经受过一次围攻，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到九月，长达一百九十五天。西安并没有陷落，而是由冯玉祥的军队来解了围。

我们住在一所著名的博物馆里。鲍罗廷被安排住在园林中心一个堂皇的馆阁里。其他人，有的睡在各处的厅堂里，有的睡在树下。整整三天，鲍罗廷和本省军事长官互相拜访。负责运输的伏洛辛则忙于修车。我发现西安府有几个外国人。布雷姆是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一位英国人，是邮局负责人。丁神父和许多修女管理一所天主教堂。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许多最新情况。

“义和团时期”，史密斯先生说，“陕西省是外国人最安全的省份。总督把上级‘杀洋人’的命令改为‘保护洋人’因此没有一个人被杀。后来，连太后都到这里来避难了。但在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中，陕西却是最糟的。据说有三万满人被杀。满族妇女们为了免遭侮辱都跳了井。井都填满了，以致别人没法再自杀。当时遇难的还有两名外国传教士和六名儿童。”

据布雷姆说：“冯玉祥总司令就是六年前在西安府首次出任督军的。他的军队来到这里，唱赞美诗，植树修路。后来他的军队在孙将军指挥下再次来这里解围，我们都高兴极了。孙是好样的，和冯共事多年的老军官绝大多数也是好样的，单纯，军纪也好。但后来来了回教徒和第二军——那可真是个可怕的混合体。”

他告诉我说：“本省的过激活动是从圣诞节前开始的。学生和士兵冲了我们的集会，吵嚷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喊道：‘什么是上帝！’我们还听说农民协会杀害绅士们，用铡刀把他们铡成块。干这类事的是于右任的追随者，而冯玉祥阻止这样干。农民和其他革命分子曾经占领佛寺，用作俱乐部或协会办公机关。他们还想

占领外国教堂。尔后，五月底，汉口来了命令叫保护外国人。冯玉祥还声明要保护信教自由，并且镇压了一些农民协会。”

“冯玉祥到徐州会见蒋介石后，他们就开始镇压共产党。连警察的警棍和帽顶也从红色改成棕色和黑色。‘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和传单从墙上全部刷掉。共产党人开始逃亡。我想，冯玉祥有些最优秀的部下是乐意这样干的……”布雷姆先生认为共产党人的理想在中国不会有太大成功。但是，他估计中国和俄国会建立密切联系，最终乃至会和日本建立同盟——成为一个反对欧洲的亚洲军事联盟。

我从其他方面获悉，农民和工人刚掌权就遭到镇压。一位提供消息的人说：“无论何时，操生杀大权的是部队。农民杀的少数几个人并未经农民协会批准。”有三位著名人士就是这样在省府附近被杀的。但是，最大的冲突发生在户县。“那里的人们组织起来，反对部队，拒绝提供给养。在骚乱中，杀了不下十个人，随后就遭到严厉镇压。但是，在西安府，他们却象绵羊一样，命令一到就自行解散。这里的居民倒是安份守己的。然而别人对待他们太粗暴了。”西安的外国人就是这样认为的。

丁神父向我生动地描述了西安之围。他在一个小客厅里接待我。尽管外面很热，里面却又凉又暗，象个修道院中的密室。墙上挂着许多教皇、主教和圣母的画像，这些画像和西安的动荡生活显得不可思议和不协调。西安府有六名天主教修女，她们开办了一所学校和一个诊疗所。围城期间，她们为妇女、儿童组织了收容所。

“有人计算，攻城共历时一百九十五天，”丁神父说，“从五月十七日到十一月廿八日。但实际上在一个月以前，即四月十五日就已经开始了。成千上万的人，在四郊遭到部队的蹂躏，拥进了城

市。到围城末期，每天要死上千的人。尸首丢在街上，或者被吃掉。有些人家甚至吃自己的孩子。我们收容所里的孩子，全都得了热病。几个月来，他们吃不到肉、蛋，只有一点面包和米汤。即使这一些，也是按定量分配的。最后，连面粉也没了，只好用糠和其他代用品做馒头。”

“攻城之初，教会买了足够维持六个月的小麦。到第六个月，又买进二十头骡和五匹马。别人吃狗，我们没有吃。有一种榨油之后的下脚叫‘油渣’，是用来肥田和喂牲口的。西安有许多油厂，有大量这类下脚料。这种‘油渣’救了这座城市。因为最后的两个月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靠它度日。如果再过二十天，连这都可能吃光。”他还告诉我，城内的官吏折磨人民，抢钱抢粮。部队到所有居民家里肆无忌惮地抄掠物资。听起来，象是十五世纪的故事。

作战双方之间的谈判，进一步显示出这次战争的中世纪色彩。正象中世纪的教会常充当作战双方的中间人那样，可敬的丁神父，一个外国人，还有其他传教士，也充当了中间人。他和进攻一方的刘将军会谈，安排好让四万名非战斗人员离城回乡。派往刘将军那里去的中国人信使都被扣留了，却准许外国人以中间人身份前往。十一月末，当城里的守军已放弃解围之望时，丁神父再次被指派前去和刘会谈投降条件。就在会谈的前一夜，西安之围被孙将军指挥下的冯军解除了。

“当孙进入城市时，”丁神父说，“他只带了一百人。这已足够用来接管权力和恢复秩序。城里所有的人都已精疲力竭。守城的长官们离开西安去和冯玉祥会合。西安的树木，许多房屋和家具都被当作燃料烧了……最后开城时，乡村里所有的居民都拥进了城，送来面粉、蔬菜、馒头、烤肉、鸡等等。我们所有收容所的庭院中都堆满粮食。这都是好心的农民免费赠送的。到了中午，西安人人

都有了足够的食品。在中国二十年，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行动。”

离开西安府前，我和本省的代理督军石敬亭将军谈话。他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孙博士的遗嘱，其第一个步骤就是人民革命。现在还不到世界革命的时候。我们必须唤醒中国人民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他用这种含糊不清的词句表述了一个公式。这一公式在冯玉祥地区已为人们所接受。“人民革命”，或称“中国革命”，意味着由冯和他的将领们去攻占北京。工人和农民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被诬称为“世界革命”，而这是他们所要压制的。石将军表达他的观点比较机智，他说人民共和国将没有阶级斗争，人人平等。他说：“汉、满、蒙、回、藏——所有的人应当是平等的公民。对一切友好国家，我们也将友好相处。英国对我们很坏，但如果他们抛弃帝国主义，平等待我，我们也将友好相待。有一些英国人是好的，但大多数高傲而贪婪，不把别国人当人。日本人又狡猾又坏。这里有很多日本人，若其中有好人，我们也会对他们友好。美国既强大又好侵略，但相比之下，他们不那么傲慢，不那么不平等待人。法国人，我不大知道。德国人虽被打败了，但有高水平的知识和科学。美国人的财政、商业好。俄国人的精神好。我希望在中国有美国的财政和商业，德国的科学和俄国的精神。”他以这种无所不包的希望结束他的谈话。

我问他，到底为什么他要镇压农民组织？

他向我保证，农民组织并未真正解散，而只是由于缺乏合格的领导人暂时停止活动。陕西省九十个县中，四十个县有农民组织。他无法告诉我共有多少会员，因为没有准确的数字。

“这些组织依然存在，但不能集会，因为他们已没有领导人。领导人们仍住在这里，但已经无权。有些人已逃走，但不象湖南那样。这里不用暴力。我们只要下达命令就够了。现在冯玉祥正在

开封培训农会干部。只要他们从过去的错误中接受教训，就可以回来工作。俄国也经常清党嘛。我们这里也不过是这样。但我们不象他们在湖南、湖北所做的那样粗暴。”

我问道，农民究竟干了些什么，因而必须停止他们的活动。他告诉我，农民在本省大约杀了十四个人，三个是省会附近的，十个或更多的人是户县的。他说，他们这样干不是根据工会或任何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纯粹是出于一群农民的激愤。杀人的理由是“此人侵吞人民钱财。”

我问道：“被处决的是否真是坏人？”

他答：“这不好说。有人说他们是。也有人说是报私仇。糟糕的是这种事是在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直接由农民干的。这是不能允许的。”

在西北地区，石将军是唯一对我们不讲客气的将领。西安出版的报纸，恰好是冯玉祥地区唯一的一份准予发行的报纸，发表了一篇社论，谴责我们这批人，并且问道，这里并不需要他们，为什么他们还逗留着不走。表面上，这不是石将军自己干的，但是如果他不认可，那决不会出现这种攻击。经过三天休息和检修车辆，我们乐于离开这座历史古城。

四、穿越陕西山区

八月十二日，我们在西安府外的一马平川之中走了整整一下午。汽车所过，尘土飞扬，弄得看不清前面的车辆，只见一股旋转的风沙沿着村庄腾起。有时显露出站在踏脚板上的警卫人员的头和肩膀，竟象驾着云车凌风而驶一般。如果驶近另一部汽车，我们只得停下，等着浓重的黄尘稍为消散一点，这样才能看清道路，免得陷入坑中。

离开西安府不久，我们抵达一条宽阔的、缓缓流动的河边，必须用原始的摆渡船才能通过。一股泥流，间或还加上硬泥块，不断淌入河中。我们被迫下车跋涉，以减轻汽车的负担。淤泥泛出一种令人恶心的黄绿色，几乎要漫进我们鞋中。但是，在最难走的地方，有强壮的苦力光着脚来兜生意，把我们背过淤泥地带。可以想见，这种方式是何等的不体面、不舒服。

靠着两条长跳板，加上小心驾驶和十来个苦力从后面推，汽车一辆一辆地登上了渡船。一船每次只能装两

辆车。因此渡船使我们耽搁了几个小时。在河那边，位于陡峭堤岸之上的是座筑有城墙的大镇市。看上去，卫兵们是异乎寻常地苛刻，每辆车都要停下来接受盘查。前头三辆车轻易地通过了，因为车上载有冯总司令派来的警卫人员。但是后面的车辆给耽搁了一些时辰。

这一地区的农民衣不蔽体。男人穿的除了裤子只有一个衬衫前襟似的背心挂在颈上，上面有个口袋可放铜元。小男孩常常几乎全裸，有时也套上一个小背心。有的人的布袋上还绣了花，但已破烂不堪。他们的身体的其余部分则是赤裸裸的。我们看到过许多十到十二岁的裸体儿童，他们手上抱着或背上背着的婴儿也是一丝不挂。

这就是陕西土地上穷得难以置信的居民，看上去比华中地区的农民要穷得多了。他们的身躯倒比较高大，但营养不良。然而，这些一副饿相的农民却是笑嘻嘻的、友善的。围在我们汽车四周的人群显示出一种机灵的幽默感。

这一地区有许多崖畔居民。在比较平坦的地方，人们则用粘土修造房屋，十分结实，经得起长久的雨水冲刷。我们途经一个地方，那里的房屋象哥特式建筑的窗户，既窄又高，屋顶尖尖的，使雨水能尽快流走。路上的泥土层很厚，致使路面到处是既深又硬的辙迹。离开西安府的第二天便到了山区。道路往往在垂直的悬崖之间越走越狭。有一次，车子陷进路边一个深坑，车顶从崖壁上撞落了大约五十磅土，有一半居然掉到车里面来了，可见车子已倾斜到什么程度。

离开西安府的第一晚，我们停在一个小镇上。那里没有驻军。当地行政长富在他的“衙门”里接待我们。这里既是住所，又是法院，同时又用于招待官方介绍来的旅客。外面的天井被我们的汽车

占用了，这里在审判时是群众聚集的地方。法院后面是第二个院子，长官在这里处理公务。再后面是内院，住着他的家眷。我们应邀在这三个院子中搭起行军床。

在镇上，可以买到当地居民吃的食品，但没有大米。我本来期望在中国到处能吃上大米。当发现在西北各省人们吃的是一种用厚厚的面糊汤煮的粗面条时，真有点失望。运输是如此之差，以致除了产地，只在较大的市镇上才能找到大米。为了调味，我们乱七八糟地把炒鸡蛋，醋拌洋葱片，黄瓜片，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蔬菜放到这种不好吃的面糊里去。吃完这顿饭后，我听说那三种蔬菜是生的，可能带有痢疾、霍乱等各种病菌！

我们总算已锻炼得能抵抗疾病了。有人说，吃西瓜是危险的，但是这许多天来，西瓜一直是我们的主要食物。它还代替了难以获得的饮水。我们常常在路边停下，用十五分钱买个大西瓜，切成几大片，立即象渴死鬼似地把它吞食了。我们还买到李子，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李子，还有很好的桃子。越是向北走，桃子越好。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一定能买到这些美食。每个村落，产品都是不同的。它们从来不能运到远离产地的地方去。

离开西安府的第二天，我们顺利进入山区。一清早上路，不久就经过一个市镇。镇上有一个很好的市场，在这里吃了一顿象炸面饼圈那样可口的煎饼当早餐。还有香甜的桃子，每只只要半分钱。到一点钟，我们到达一座糟糕的山边城市，名叫永寿，而且令人不快地获悉，必须在这里过夜，因为向前几里路有一处陡坡，得化费几个小时才能翻越。人们说，翻过这样的山坡，需要四五十名苦力来推车。车辆必须集中在一起，因为山间有盗匪出没。那天早晨，前车上的人确看到十个一副饿相的盗匪，拿着枪和长矛。他们老远望到汽车上带着左轮枪和步枪，便没有再靠近。

这类武装集团是各种各样的，从那些在山里游荡劫夺的真正盗匪，到联合起来抢劫粮食的无业饥民都有。有时也听说有象罗宾汉那样的侠盗，专门劫富济贫。但是，大多数盗匪宁愿找个机会投靠某个有能耐的将领当兵，这样就在乡里有了牢靠的地位，可以仗势为非作歹。中国乡村地区的封建传统就是如此。

但我们主要担心的倒不是盗匪（他们不敢向这么一大支武装队伍发起进攻），也不是高温、睡不好觉或饮食不对口味，使我们伤脑筋的是缺水。尤其是开头的两周，天气既热又多尘。除了煮沸的水，喝别的水都是不安全的。但即使是开水，也是满含泥沙，一只汤匙放进去就看不清了。这种水既难闻，也不好喝。即使这样的水还不够喝呢。只有那次我在西安访问两个外国人，才得到过足够的凉水。他们这种定居的人有厨师为他们烧水，又有过滤器和冷藏地下室。经过几小时这样的处理，水才变得可以喝，尽管仍旧比不上山上流下来的净水。但是在我们的征途中，只好搞到什么样的沸水就用热水瓶装起来。

我们为了获得哪怕是一点点比较象样的水所付出的辛苦努力，听起来几乎是滑稽的。在那个糟糕的永寿镇上，鲍罗廷化了好多时间来调制一种特种饮料。他向我借了一只大瓶，把其他几个瓶子上面那部分的水倒进去，这样就清除掉不少沉淀物。为了多烧些水，等了二十分钟，又等了半个小时让泥沙沉淀，才得到满满一瓶比较纯净的水。这种水，他用柠檬酸来调味，以掩盖泥土味。虽然很渴，但他总是不喝。为了迫切想得到一份真正的好饮料，他让水在床边冷却了一夜。次晨，乘着太阳还没有使水升温之前，把它装进热水瓶。我对他说：“假如你想有半个小时的彻底解渴，就应该在天亮前把整瓶水喝掉。”对于如此挥霍无度的想法，他叹了口气。这样干简直是抢劫王冠上的珠宝了。任何人都别指望会有真

正解渴的时候。相反地，鲍罗廷总是在一天当中特别累的时候，才珍惜地饮用这种近似水的饮料。他说：“假如我有一颗大钻石，我愿用来买一加仑真正的水，清凉如山溪，安全可饮。”

在永寿呆了一整下午。这段路程的总负责人赛福林花了一百元用于整修道路，派了几百农民到前面去填平坑洼，铲平路脊。在我们前面有三段山路，因此半夜三点钟我们就被叫醒，天亮前就启程了。这条路穿过美丽、空旷的乡村，陡峭的斜坡铺满蓝色和紫色的花朵，有的山崖上的山民，身佩快刀，面目可憎。有的山崖上则有人运着从矿上取来的巨大煤块跋涉而下。这些矿是露天开采的，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燃料。煤的质量是如此之好，它裂成巨块，每人最多只能运走一二块。煤块挂在扁担两头就象石条一样。从我们边上走过成群的骡马。它们艰难地向山上走去，有时要用十到十二头牲口才能拉动一辆车，可见山坡是何等陡峭。

按照老规矩，开始的两段山路，如果没有那些守在山下的苦力推车，汽车是无法通行的。鲍罗廷那辆笨重的别克牌由五十个男人和孩子在后面一边吆喝一边顶推着。前面的人推车，后面的人就推前面人的背。大家一起使劲才把车弄到山顶。接着，二十五个苦力把冯总司令的警卫人员坐的那辆卡车也推上了山。有一名士兵从来不下车，总是让别人出力，自己却在车上悠闲地打瞌睡。一般地说，这些士兵与其说有什么用处，不如说只是装饰品。他们都无法阻止有人在我们吃中饭时偷走一张床。

车与车、司机与司机之间展开了竞争。我们那辆道奇牌轿车想保持领先。小陈叫乘客下车步行，等待汽车引擎冷却。他的中国司机则站在踏脚板上，不让苦力们来推车。他不要人帮忙，依靠谨慎的驾驶，就把车开到山顶。这使苦力们大为不满，他们的老规矩就此告终。接着，另一辆道奇车也如法炮制获得成功。之所以

会形成这种推车的老规矩，显然是因为过去到达这一地区的都是些经验不足的司机和老掉牙的汽车。通过整个旅程，我感到，好的车辆，谨慎驾驶，即便道路很坏，许多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

中午，我们到达彬州。当地指挥官请大家吃午饭。这位指挥官是考夫同志，在冯玉祥炮兵学校里教过的学生。他用炒鸡蛋、肉丝和西瓜来招待我们。切西瓜用的是他那把宽大的战刀。

乡村逐渐显得富裕些了。或者说，不象山区那么极度贫困。鲍罗廷说，我们经过的那段路，几世纪来一直是两种文化的分界线。我们已经到达伊斯兰文化的边缘。这种文化经过甘肃，跨越亚洲，通向西方。可以看到良种骡马。用蓝色和白色羊毛织成的漂亮鞍毯使人联想到土耳其斯坦和布哈拉。很自然，在古老的世纪里应该有一座设防城市守卫这个山区的边界，而彬州城传说已有二千年历史了。

过了彬州，我们来到一尊奇妙的大佛像前。它位于从山坡上开掘出来的一个巨大洞窟之中，有隧道可通。阳光从山壁高处的一个口子照进来，正好射在大佛和列侍左右的两尊女菩萨身上。她们分别呈蓝色和绿色。香客从那个开口处可以直接看到大佛的脸。和尚敲击着一面铜锣，锣声圆润，在阴暗的拱顶中回响。此时我们正站在这尊庞大雕像的脚下。鲍罗廷发表议论说：“一个英国旅游者对此只有一件事可以抱怨。”我问道，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他说：“太大，无法搬到大英博物馆那个历史文物的窝藏所去。”我从小受的是盎格罗撒克逊教育，一向对大英博物馆怀有敬意，现在才忽然意识到，别的国家对于它占有他人财宝会怎么想。

到了下午，旅途中的第一场雨来临了。幸运的是下雨前所有车辆都已到达最高处，否则又得花好多天。在这个区域里，即使在一般质量的道路上，车辆仍不免在泥泞中严重地打滑。早晨，我们顺

利通过了几个拐弯，本来这也可能使我们沿着山崖滑到河里去。一个小时的中雨之后，我们发现即使在我们已到达的高地上也无法再前进了。但因为半夜三点就起床，一早就出发，我们好歹还是在下雨的一小时时到达了预定的宿营地长武。

军营里房间不够，我们辞谢了主人的邀请，他们便把我们送到街对面一所被遗弃的教会办事机构去。通过一条狭窄的胡同，首先来到一所福音教派式的小教堂，窗子差不多都打碎了，地板给过路士兵弄得污秽不堪。从教堂后面另一条夹墙中的胡同里，我们进入传教士的住所，也是因为无人照管和许多过路人的任意使用而污秽不堪，但还留着一些家具。有西式的炉灶。起居室中有壁炉，有许多椅子，几张桌子和台子，还有书橱。可以看出这些残留物的主人不是美国人就是欧洲人。

下雨使我们滞留在长武。次晨放晴了。两点钟时，赛福林认为可以出发了。我们过宿的这所被遗弃的教堂可能曾用于接待各色各样的旅客。出口在另一条街的后院，是马厩。早晨我们看到里面有十匹马，显然是昨夜来此的那些旅客们的。

天气好极了，凉爽而清新。公路沿山顶通过。俯看山谷，视野广阔。风景很象科罗拉多，南加利福尼亚或克里米亚。所不同的是，这里有许多种了作物的梯田，我能认出作物中主要是玉米。由于取土选用，山上被挖出许多垂直的裂缝。还有深沟。如此险峻，只有冰川中的沟壑可以比拟。

相对地说道路状况很不错，风和雨正好适量，使它平整了，只有在镇上，我们才往往陷进泥泞中。在这里市场上买来的桃子每分钱四只，是我们从没尝到过的最好吃的桃子。我们尽量地吃。抵达山麓时，发现在一个山崖的底部涌出一股清泉。我们高兴得叫了起来。这是我们旅途中第一次敢喝的未经煮沸的净水。我们迅

即把暖水瓶全都倒空——瓶中装有那天早晨花了几小时的劳力煮沸过滤过的水——重新把这些清净的活水装进去。

人群的外貌开始出现新的特征：更高大魁梧，营养显得更好些，更加象中亚细亚人。公共建筑和私人住房上出现艺术装饰，不象陕西贫穷山区的棚屋和窑洞那样简陋。这里有雕刻得很好看的门柱。商店里陈列着优质的陶器。马背上有漂亮的鞍鞯。就这样，我们越过甘肃边境，在傍晚六时，进入金州^①。

当地衙门只能接待我们一半人。其余的被送到一所天主教堂去，那里有一个中国人看守。他很尴尬，既不想让我们进去，又不敢回绝，因为是当地长官介绍来的。传教士们并没有撤走，而是暂离度假去了。这座教堂是一座小型中国式建筑珍品，又带着中亚细亚色彩。小院落的四周都是精心雕绘的彩色格子窗。水井里可以取得净水。

我们在附近的饭店里叫了饭菜，吃了一顿从没吃过的中国好菜。对比之下，我们更加感到陕西的山区城镇是何等贫穷。大米饭很多，煮得也好，油炸成褐色的美味小肉丸，煮得象蔬菜似的桃子，常见的竹笋，南瓜，还有肉丁，末了还加上一道用大米，蜂蜜，果仁和其它蜜饯做成的甜食。这是整个旅程中最令人愉快的一天。这都因为清新的天气，好食品，好水，好的道路，好风景，都令人高兴地凑在一起了。

在我们住的洞穴式小房间里（在旅途中我还是第一次豪华地独占一室），有许多圣像，诸如：基督在客西马尼园^②和西斯廷圣母。

① 金州县（今为榆中县）。——译者注

② 亚兰文Gethaēmāne的音译，原意为“榨油池”或“榨油房。”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的一座花园。据“福音书”载，耶稣在耶路撒冷传教期间，常和其他几名使徒退居园内祈祷；耶稣受难前夕，于此被犹大以接吻为号，将其出卖给前来拘捕者。——译者注

它们放在中国式镜框中多少显得不协调。更令人惊奇的是教堂里的某些图画。有一幅是描绘最后审判日的。画中的上帝竟是一位欧洲绅士，穿着华丽的袍子，闪耀着紫色、金色和猩红色。周围有许多小天使，同样明显地是白种人。画面下部是一个中国家庭，有男人，女人和小孩，由上帝判决，交魔鬼带走。

教堂另一头有一些类似的绘画，描绘的是天堂和地狱。在天堂里，上帝和上层天使都是欧洲人的长相，而下面是白种天使在接纳“各种族与各个国家”的人。有两个被新接纳的中国人穿着华丽的天国服装。这可能是体面的高等华人——显然就是欧洲人所雇用的中国买办。在关于地狱的图画中，所有人物全都一望而知是中国人。这些画像是某种蒙昧时期的产物。它们是用于宣扬一名从欧洲进口的上帝。它们是在革命者大力揭露“帝国主义”、促使艺术家们觉悟之前那时代画出来的。不管是出于哪一个时期，叫人难以相信的是，既然要派传教士去影响另一个国家，怎么竟会如此幼稚地去公然侮辱当地人民。

住在金州的晚上，又下起雨来。破晓时，天色昏暗，空气又很潮湿。当鲍罗廷到处寻找他那只气压计来预测天气时，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在西安府时，这只气压计被我们的一个仆人偷去卖给了旧货摊。外事办公室那位年青秘书张克（译音）有一次去逛商店时发现了，花一元钱买回了它，藏在行李里，就准备到时候拿出来当故事讲。

虽然气压计所显示的给人一点希望，赛福林和其他一些人对中国这一地区道路状况比较熟悉，还是建议等路面干燥后再走。他们的建议未被采纳，因为其他一些人等不得了。我们终于在八月十六日中午启程，几乎立刻就尝到了中国泥泞道路的厉害。到了镇外，穿越一条狭长的堤道，两边每隔一段都设有明亮的柱杆，以

保护道边。有两辆车滑过柱杆，一只后轮胎滑出道边，幸好没有掉下去。靠着农民的及时帮忙，才把它们推回路上。最后一辆是最重的卡车，竟把桥压垮，以致要回去是不可能了。

我们开到了一条山边公路上，如果天气好，它还不算陡峭，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出现了我还从没遇到过的险况。道奇牌轿车爬坡时向一侧打滑，弄得车头老是直指悬崖之外。坐在后座的人随时准备翻下去。车一停下，我们立即下车，徒步走过山顶，却发现这也有困难，因为双脚在泥泞中也打滑得厉害。在这样的路上走了不到四里，一致认为，再前进是不可能的，而且危险。我们只好在一块打谷场上露营，经过人们无数次践踏，它是比较干燥的。

一整天功夫走了还不到四里！这足以说明为什么我们穿越中国之行是如此之缓慢了。

营帐比我们预期的要舒服。如果再下雨，既不能进，又不能退，那才不舒服呢！但到夜里，一直是晴朗的。我们在一只空汽油桶里点起火，买来一只羊，烧起高加索名菜“烤羊肉串”来了。这需要时间，不能立即充饥。幸好并非所有的羊肉都拿去做“烤羊肉串”。厨子还烧了羊肉汤，煨羊肉（比汤浓的一种东西），我们把这些一扫而光。

夜幕降临，赛福林把大家召集拢来，设了警卫。这在有官方保护的情况下本来并不需要，但今后却经常需要这样做了。夜间每两小时一班，每班两人负责守望，指定了每个人在情况紧急时的战斗岗位。夜间露重而寒冷。但满月当空，预示明早的路会好走。

五点钟，我们被叫醒。七点以前，又动身了。道路仍然泥泞不堪。因为这一地区已经下了好几天雨。这儿的道路有其令人头痛的独特之处——路上经常出现一码阔、半码深的排水穴。它就挖在公路的中间。许多排水穴由于雨水冲刷变得比汽车底盘还要宽。

因此要经常停车修路，才能继续前进。特别伤脑筋的是这种洞穴常出现在小拱桥前后的坡面上，坡广又很大。我们看不到桥那边有洞，等到发现，车子已正好开到了洞上。因此，我们遇桥就停下车来，派人去察看。桥梁很多，这就大大地阻滞了我们的行程。

一次又一次，车辆深深地陷入泥泞，要花几小时才能解脱出来。有一次，经过一座小村落，望不见鲍罗廷的别克牌汽车了。我们还以为他走在前面呢，实际上它在泥泞里陷了两小时。后来，我们的那辆轿车也陷进去。四十个农民用了一个小时才使我们重新上路。

在这种情况下，八小時中只走了二十四英里。一个会走路的人步行也不至于只走这点路！由于经常陷入泥泞，我们确实看到一队驮货的驴子在整个旅程中都跟上了我们。三点钟过后不久，迎面吹来一阵陈丕士称之为“美好的尘土”。刚开始的几天，我们咒骂过那种尘土，因为它呛喉咙，而且使人看不清前面的路；而现在，它成了“美好的尘土”了，因为它预示道路将被吹干。

在这天的旅途中，我们看到妇女们的脚比别处还要小。不到三寸的小脚不算稀罕。实际上有的妇女简直就象没有脚，好似锥子触地，走路摇摇晃晃。对比之下，过去见到的那些女子可算是走得比较自然的了。

沿途多树，是八年前一位曾经远征鞑靼族人的将领种植的。现在这些树木已经很大，能够遮蔽烈日。不幸的是它也为泥泞遮住了阳光。另一边的树木较小，是最近由冯玉祥部队种植的。

驶近平凉，已近黄昏，遇到了先遣车辆的人员。他们已在一座幽雅的精舍里为我们安排好住宿。它是过去几位有地位的将军造来作隐居之用的。庙宇中心是美丽的荷花池，媚人的红荷正在盛开。我们在湖心及沿岸的凉亭中宿营。这些天来，气候仍然热得

叫人难受，但夜晚却很冷，以致半夜三点钟我竟被冻醒。这就提醒我应为戈壁之行准备皮衣。我们已越过陕西山区，现在我们的面前是甘肃的平原和沙漠，河套地区，然后是蒙古。

五、甘肃与黄河

平凉是甘肃省的门户，文化上有回族特点。山坡上牛羊成群，沿河有灌溉过的土地。饥饿的陕西省有居民二千二百万，而甘肃至今还没有从太平天国时期的大屠杀中恢复元气，人口只有八百万。比起中国较为稳定的地区来，荒地更多，且多沙漠，使它与中国有定居人口的地区大不相似，而在自然景观上与更为荒凉的蒙古、新疆接近。

在我们宿营的那所有高雅的荷花池的精舍附近，有一所精致的寺院。我们在路上遇见不少冯玉祥的部队，开往西安府，去参加对张作霖的进攻。一群炮兵正忙着把一辆重载车从泥坑里推出来。一群步兵一面行军一面进行体育训练。四人一排，从同一起点出发，跑一百码。第一排起跑不久，第二排就接着跑。这样，不用中断行军，就锻炼了不同部位的肌肉。

在平凉，我们的队伍分开了。留下一部分人，等候从火车终点站用船只驳运来的行李。四辆车，即鲍罗廷的别克牌，我们的道奇轿车，绿色道奇，还有大众牌卡车继

续前进。为了出空留下的车辆去装运新来的行李，我们这些车辆比原先装得更多了。重新装载花去了一天时间。八月十九日早晨，我们终于又向北走了。要穿越平凉城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中国的城门在建造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汽车运输的需要。靠近城门的地方都很陡，城门通常是狭窄的，经过多少年来几百万次车辆的行驶，城门口的石门槛上有深陷的车辙。车辙之间还有一块大石头。在夜间，城门肯定是贴着石头关闭上的，但是它对汽车的底盘却是一个威胁。我们不敢快速通过门洞，免得撞坏汽车底部的铁框。不得不依靠本地人的帮助，才把卡车和别克牌轿车推进了平凉城。

城门上的一条标语说明平凉城里还有农民协会存在，但是我们无从知道它有多少活动自由。另一个革命宣传的标志是城门里墙上有两幅招贴画，谴责妇女缠足。其中一张画了一位大脚女运动员，她在体力比赛中轻而易举地战胜两名三寸金莲蹒跚而行的妇女——其含义显然是告诉人，在中国家庭中也要求体力上能占先。

除了这些招贴画外，革命对甘肃似乎没有影响。我们沿着一个渐渐高起的山谷向上走了一整天，有高峰和山溪的美妙景色。这里的群众似乎和远处的伟大斗争是完全隔离的。我们倒是有一两次见到几批被征集的士兵是到河南去补充冯玉祥的队伍的。有一次看到四五名骑手带着一百多匹马去补充冯的骑兵。但这明显地只是一种征集活动。农民自身对为何作战是没有兴趣的。鞑靼族的小伙子们从多石的山边上盯着我们看，恐惧地逃开，接着又回来，好奇地围着我们的汽车打转转。

这是一个泉水清清、牲畜成群的土地。牲畜有绵羊、山羊、牛、驴和骡。女的骑驴，男的骑马。这些牲畜在华中地区很少见到，这里却多得很。道路变得相当平整了，只是有时遇到既陡且深的河床，没有桥梁，需要涉水而过。我们沿着山谷上升，自然景色显示

出更多的山乡特色，真有点象科罗拉多或加利福尼亚的高山。熟悉的薊类植物、风铃草和其他山花使我们忘却身在中国，直到出现一群在河畔屋边放牧的骆驼，才使我们醒悟过来。日落时分，景色更是气象万千。整个山谷就象是由各种不同植物缝缀而成的织物。大块的荞麦田正开着粉红色的花，随风起伏，间杂着深浅不等的绿色。从我们脚下一直伸展向几英里之外的山上。甘肃这地方和我见过的中国任何部分都不同。中国的西北真是名副其实的大西北。

目的地是固原，是一部队的指挥部驻地。食品和住所已在那儿等待着我们。我们未能赶在夜幕降临前抵达。卡车超载太多，不得不停下来将几百磅物品转移到载人的车上去。天黑了，我们停在一个鞑靼族村落里。那里有普通的乡下小客栈。主要的设施就是一个马厩场地。由于在高山上，夜间之寒冷是我们从没经历过的。次晨，经过一小时的行车，我们抵达宋哲元驻地的固原。

筑有城墙的固原，位于甘肃山区通道的制高点上。过了这里就一路下坡直抵黄河。在过去的年代里它三次毁于地震，已成废墟，但风光优美。最后一次地震前不久才发生，城里有数百人丧生，大部分房屋被毁。初看上去，高大的城墙和某些建筑物前面的古代雕刻，使人感到它还保存着往昔的壮观，但近看时，贫穷和破坏就遮掩不住了。

宋将军是冯玉祥的盟兄弟之一，是北伐的“北线指挥官”。这意味着，如需从这一地区向北京发起进攻，那就将由他来指挥。他引我们到餐厅去。那里挂的唯一的一张像是列宁的，旁边甚至都没有通常必挂的孙逸仙像。隔壁那间是他的卧室兼办公室。我从他桌上拣起一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文版小册子。这房间看上去象个军人值班室。一张办公桌和几张板凳就占去半间，另一半是睡炕。尽管如此，仍有奢华的痕迹——床上铺着厚厚的驼毛毯，这

样，炕再硬也不觉得了。在外观平常的灰色外套里面，衬有厚厚的狐皮，使人联想到北方的寒冷气候。还有炕头上的十来口结实的木箱，每箱装了二千块银元。在中国内地，只接受银元，但由于太重不好运输，银元又是很少的。

鲍罗廷和宋将军作了长谈。后来，我也和宋会见。他告诉我，甘肃省很富裕，如果交通运输方便，还会更富。主要产品是麦子，其次是玉米、土豆和家畜。它输出的货物是皮毛。没有工业。有很多矿，但未开发。开采煤矿仅仅是为了给本地提供燃料。有许多无主土地，经省政府同意，允许移民前来落户。牧场公用，使用人无需交税，但出售牲畜要交税。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是土地税、“厘金”（省属关税）和鸦片税。他解释说，后一项税收并不重要。但外国人告诉我说，鸦片税是主要的财政收入。

宋将军说，土地问题没有引起多少麻烦。没有大地主，许多人不过拥有百亩或稍多些田地，或雇人种，或分租给少数佃户。只有少数几个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也不象陕西那样有什么激烈的过火行动。甘肃居民是落后的，且从未很好组织起来。我问，山区居民是否过着村社式的群居生活。他回答说，是象一般的农民家庭生活。人们聚居一处仅仅是为了安全。

从平凉到固原的道路比较好。这主要应归功于宋将军。他的部队协助农民整修了道路。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农民对汽车道是反对的，因为征地修路是不付款的，而又不允许他们自己笨重的窄轮车在路上通行。但是，宋将军保证说，在他这一地区，无人反对汽车路，因为土地很多，而且农民要在路上行车也是允许的。在中国，没有人指望农民会要求良好的道路，他们不反对就够好了。道路主要不是让农民使用的，而是让军队和官员用于加强控制老百姓。

在固原，我们遇到一群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中国学生。他们只读了两年。一共八人，一半是女的。原先有四十人，已经学完走了。这几人是因病后走的。他们告诉我，在莫斯科所学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世界地理、西方革命史、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唯物史观、中国问题，还有俄文。他们在那学习如何组织和指导革命运动。

我问他们，是否期望自己所学会有助于中国革命。他们答道，既然俄国人领导了一场成功的革命，并且正在统一那个伟大的国家，他们的方法必然有值得学习之处。不过，中国革命终究不同，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而是所有阶级共同反对外国侵略者。十分清楚，他们完全反映了冯玉祥手下将领们的观点。我弄不清，这种理论是从莫斯科学来的，还是为了适应他们目前的处境。他们的确处境困难。两年前，国民党以良好的祝愿派他们去莫斯科，而现在可能是以深重的疑虑来对待他们，而不是分配工作了。

两位姓陈的青年和张克一起和学生讨论了到外国留学的问题。他们一致同意，日本留学生最糟，回国后不仅当了贪官污吏，同时又充当日本间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做生意，只顾赚钱，不知道什么爱国主义。英国留学生往往是激进的。并非因为英国愿意如此教育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在伦敦遇到英国所有的殖民地的代表——印度、埃及和其他地区的，通过不断讨论，了解了英帝国主义的种种。认为，“它是世上最坏的”。俄国留学生是政治鼓动家，但要知道他们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种人还太早。当然，这些人大概会生活简朴，献身中国革命。

八月二十一日一早，我们离开了固原。几小时后在一个鞑靼村里吃了一顿面包和蜂蜜当早餐。冯总司令的两名代表蒋先生和

李先生陪同我们一起到莫斯科去。他们另带两辆汽车，一辆自乘，一辆乘警卫人员。

这一带的村落小而稀少。中国人的和鞑靼人的村落毗邻而居。这天旅途中，我们遇到一件事，是鞑靼人诚实的明显事例。前面车上有人途中丢了一件外衣，一刻钟后，一个鞑靼人挥舞着外衣将我们叫住，因为他猜想我们和前面的人是一起的。只要愿意，他本可以把外衣留下，根本没人会发现。

有一次，我们停在一个鞑靼村，农民们对轿车，尤其是车上的玻璃简直感到狂喜。要是他们有钱，肯定可以在这个村里售出一打汽车去。当我想兑换一美元(值五十分)时，只有一爿店兑得出，再多就没有了。他们给了我五串又重又长中间有孔的铜钱，如此之重，我简直拿不动。使用这种铜钱的村落和我们的那辆轿车，代表着两种文明，它们之间的鸿沟，显得是不可逾越的。

冯玉祥的部队在这里来来往往，补充给养，维修道路，占领战略要地。但农民们做梦也不会去想什么帝国主义或革命的事。敏锐、精明，但与世隔绝，他们的心思是用在吃饭上面。无疑，正如任何地方的落后人民，也容易被激起仇恨，成为暴民。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温和、善良、勤劳、和平的——就象欧洲的农民，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前去参加十字军的武士们走过一样。村里可以买到鸡蛋、黄蜜、苹果、羊肉和硬而圆的馒头。正在大修新房。有用新的砖墙围起来的大院落。大堆大堆刚制好、正在晒干的砖头标志着修造工作正在乡间持续不断地进行。有很多好看的小脚女人。

道路的状况越来越好，我们竟然可以在短距离中加速到每小时三十英里。大家十分满意。为了享受这种高速度，也不顾汽车在突然出现的沟洼上重重地颠簸了。在陕西那种糟糕的道路上，每小时只走二三英里，尝够那种滋味后，眼下这种速度真令人兴奋。日

落时，我们抵达一座村庄——那真是一幅令人难忘的美景。远山的背景上，喷薄着淡淡的金色晚霞。在迷人的金黄色中耸起两座高塔。高塔下，水溪边，展现一座有圩墙的大村庄。在前场上，绵羊、山羊挤作一团，牧人正在赶它们回圈。进村必须先渡过一条宽而浅的河，到河对面还要爬一段陡岸，因此花了一点时间。我们涉水探测到最浅的地方，再加村民们用绳子绑着拉，终于登上对岸。入夜不久，我们在一个厩房中找到宿处。在这个区域内，这种厩房通常是充当客店的。

进一步了解，才发现这座漂亮的村庄并不那么吸引人。水必须从远处运来，而且气味很坏。我们称这地方为“臭水夕阳镇”。这里买不到食品。听说店铺三天开一次门，关店的时间店里的人到远处的田地里收集谷物。早晨，我们了解到这地方叫“同心镇”，意思是“一条心”的镇，暗示着处在中国人之中一个回教鞑靼居民区在宗教信仰上的一致。

次晨，我们在贫瘠、炎热的土地上疾驰而过，偶尔看到野山羊，有时在村里停车购买美味的桃子。中午时分，抵达黄河边的安宁堡。当地指挥官邀请我们吃午饭，招待我们吃一种名叫鞑靼头的圆形麦制面包，使大家很高兴。这是多天来我们第一次吃到的真正的面包。他还以极大的面子卖给我们三听五加仑装的煤油，每听六元五角(金币)，用以与我们不够用的汽油相混合。汽油根本无法获得。甚至煤油也只能通过军方作为一种特殊优待才可得到。

本来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渡过黄河的。船工们是熟练的，经常为冯玉祥的将军们渡运汽车。渡口有四只渡船等着。但是仍然用了二十四个小时。

我们和黄河之间，隔着几里长难行的泥滩。汽车通过泥滩不

断发生事故。绿色的道奇车，引擎箱被撞坏。大众牌卡车翻了车。车上许多行李和九名乘客全摔到车外。我们这些乘坐别克牌和道奇牌轿车的，倒没有遇到多少麻烦就到了河边。但是为了等待绿色道奇车修好，只好折回到安宁堡的驻军总部去过夜，否则就得在河边让蚊子叮。

当我们被迫在岸边休息时，就想出各种办法来消磨时间。鲍罗廷在汽车的荫处铺下一块油布，勉强打着盹。陈丕士去试乘了一次牛皮筏子。这些筏子从史前时期起就在黄河上用于交通。中国史书在二千年前就曾首次提到在战争中使用过它。剥离制筏用的牛羊皮需要高超的技巧，费工也很大。要从颈项处的一个小孔和脚部更小的孔中把所有的骨头和肉取出来。取净后，将脚部的孔封死，从颈项处充气并扎紧。一张皮可以浮载一个人游泳，一打或更多的牛皮扎在一起就成了一只筏子的基础。

我们和筏子的主人交谈了起来。他是个黑皮肤的男子。正象我们很想了解他一样，他也很想了解我们。年青的陈丕士想改变他对缠足的观点，耐心地问他，为什么姑娘要缠足。

那人简单地说：“这里的规矩是这样。”

“但是那样一来她走路就不方便了。”

“那她骑驴好啦！”

陈叫道：“这算不上什么理由。”

不料，那人沉着地答道，有很好的理由。脚越小，嫁出去得钱越多。

我们这位年青的十字军骑士跳了起来，问道：难道你认为人可以象驴子一样买进卖出吗？“噢，不”，那人答道，“人当然不能和驴相比。姑娘不能象牲口那样卖掉。但她老子花钱养大她，理应得到报偿。”

他告诉我们，十五年前，那时的物价比现在低，他为了娶妻只付了三元钱（金币）。而现在“在本村结婚，一个姑娘的公道价格是三十元到五十元。如若嫁到远处去，父母再见不到她，就要一百元的高价来补偿他们的悲痛。”

同行的一位中国官员问那船民，要是出五十元，能否为他搞到一个好姑娘。“你是过路人，谁认识你？”后者冷冷地答道。显然，婚姻还是有那么一种区别于买卖的因素的。

现在轮到他提问了。他想知道的是，轮胎是什么东西做的。我们终于感到，要用他懂得的话来说明什么是橡胶以及它是怎么来的，是不可能的。我们问，他是否愿意拥有一辆汽车。他的回答很实际：“我买不起汽油。”

过了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我们于早晨七点再次离开安宁堡。到八点，已有三辆汽车到达黄河边，登上了筏子。然而，我们又倒运了，卡车在三里外出了事。不得不等上几个小时。为了消磨时间，大家下河洗澡。水流很急，洗澡的人可以在渡口上游下水，顺流而下到下游的一个地方，中国孩子则拿着各人的衣服在该处等着他们。卡车终于到达，但因载重过多，车辆的后部压得筏子失去平衡，又必须卸下重新分散装载。实际的渡河时间只用了半小时。仰观是低沉的灰色天幕，俯视是黄水滔滔，我们顺流而下，到达彼岸，那已离开启渡处好几里远了。时间已到中午。通过犁过的田地又是一番困难，狭窄的河岸也好几次叫我们险些翻车，最后终于开到了宁夏的主要公路上。

离黄河十四里，到达我们此行中最好客的一个村落。在这里等到五点钟，所有的车辆才到齐。此地的妇女还比较肯露面，在涌向轿车的人群中令人注目。我们一出现，她们立即回家去洗净脸，穿上见客的节日盛装，戴着头饰和象牙耳环，或者银手镯。婴儿也给

带回，再带回来时，都穿得很漂亮。她们带来一把把无味的小干果，撒在我的膝头上，直至差不多把我埋在里面。鲍罗廷给我一瓶柠檬水果糖，我一颗一颗地分发给她们。妇女们得到这种外国糖果都很高兴。

看来，她们的主要兴趣在于轿车上的窗子。开始时，我们以为引起她们兴趣的是看到外国女人。但很快，我们发现是因为玻璃。明显地，她们过去从未见过玻璃，至少没见过这么大块的。她们把脸压在上面，摸摸它，兴奋地谈论着它。她们自己的窗户就象中国通常的一样，是油纸做的。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道路横穿开阔的荒地而过，其实只要有水，这里就能变得富饶。远处又出现三五成群的麋鹿、野羊。玫瑰色的落日光喷薄而上，化成一片仙境般的金黄色。车辆事故又一次使我们停下，在离宁夏六十里的一个村中马厩里过夜。再走一天便可到达盼望已久的宁夏了。

鸿吴(音译)村一片葱翠可人，因为经过多年灌溉，树木茂盛。一里半外，我们经过一个坟地，那里石雕的马、狮、牛以澄蓝的天空和棕黄色的大地为背景矗立着，使人联想到某个古城堡的遗迹。我们常常遇到荒芜的坟墩，远看象是石雕，而近看却是一堆风化了的浮土。在下面远处的一个峡谷中，黄河在奔流。我们沿河而行，然而这条河一点也没有给附近的土地带来湿润。我们遇见年青人，高大而剽悍，肩上扛着牛皮筏。同时，远处可以看到峡谷转了个弯而且变得狭窄了，我们就知道，前面必有急流湍滩，需要作水陆联运了。

突然，我们已经出了沙漠进入了灌溉区。几百年来，人们驱使黄河之水使这里的土地变得肥沃了。我们首先来到一座好看塔状中国式建筑物跟前，它同一座水流迅疾的渠道上的桥相连。这

是围绕宁夏使它致富的六条主要大渠之一。由此，荒芜的土地变成了绿洲。房屋都是晒制的砖头建成的，形状整齐，比我们常见的好得多。河渠本身显示出工程的效率。巨大的水车从河中提水。而水槽虽然象桥梁一样在道路上面穿过，滴下来的水说明它并不是桥，而是引水管。道路更宽阔也更坚固了。虽然有时要翻过水渠上坡度很大的拱顶，但即使在美国，这也算是不错的汽车道了。

但是，灌溉区同样存在交通问题。由于处置不当，我们几次为事故所阻滞，直到夜间才到达城市。这里，日落就是一个信号。一旦太阳下山，就允许农民把沟渠中多余的水排放到大路上去。白天，为了不影响交通，水是不排出的。我们离城门只有五英里路时，夜幕降临了，路上一汪一汪的水开始阻滞我们。逐渐地，水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由于每遇一次水就得浪费一些时间，越到后来，情况就越严重。有的地方，泥浆和水深达几英寸，我们必须下车涉水，把车推过泥潭。可怕的蚊阵更使人感到不舒服。

等我们开进城门时，天色已晚。我们的双脚、衣服和汽车都沾满尘土。然而这还算不上是最后几里路的最高代价呢。别克车在越过一座高拱桥时，车底的铁框撞坏了一处。那辆道奇车的底部也给重重地撞了几下。在向更难走的蒙古开进之前，每一辆车都得仔细检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已经横跨中国，来到了这段路的最后一个城市。再向前便是沙漠了。

六、盼望已久的宁夏



我们于八月二十四日夜间抵达的宁夏是一座拥有三万居民的普通中国商业城市。它之所以重要并非由于神话般的过去，也非由于文化或历史上有贡献，而是因为溯河而上到西藏去时，它是黄河边上最后一个口岸。黄河在中国算不上一条可通航的河流，但某些部分还可以航行。从京张铁路的终点便可一直航行到宁夏。这以上便是峡谷和湍滩了。离市区约十里处是船只卸货的口岸。那儿也有大车或商队开往甘肃的省府兰州，或到通往西藏的门户西宁，或经阿拉善到蒙古去。

宁夏对我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前往蒙古沙漠路上的最后一个城镇。多日来，我们一直盼望着宁夏，把它看作是休息、修车和购买供应品的场所。这简直已成为我们的口头禅了。每当汽车出了毛病，工具损坏，或物资丢失，我们总是安慰自己说：“不要紧，到宁夏去修。”我们把宁夏看作传说中的大都会，设有车库、汽油、店铺和人们所希求的一切。这种渴望因路上一再被耽搁而加

剧。当大家带着一身泥巴和蚊虫叮咬的痕迹，而且每辆汽车也都已弄得很糟，于夜间进入它那高大城门时，我们用手电筒向上照，看到一层又一层的美丽的塔形建筑。我们为终于抵达盼望已久的避难港而欢欣鼓舞。

宁夏的指挥官们将军拨给我们一个院子，这院子过去象是作过学校和军队宣传中心，再以前也许是公众开会或娱乐的场所。由士兵守卫的这片空场，围着高墙，长宽都有好几百米，足够修理四辆汽车之用。院子里，四座中国老式的大屋，面对面地矗立着，中间是天井，四周是回廊。屋内墙上都饰有鲜明的国民党招贴画。屋内都是大房间，有桌、椅和专供学习用的台子。这种房屋并不舒服，但明亮、通风而且宽敞。各人自选地方，把帆布床或者架在房间里，或者在走廊里。入睡时，心中都因已完成一半旅程而感到高兴。但事实上，我们离火车终点站只有六百七十英里路。这只是去莫斯科的三分之一路程。但正如以后的事件所证明，最艰难、最花时间的路程已经走完了。一俟汽油及其他供应品齐全了，我们将向沙漠和旷野开进，进入到阿拉善和外蒙古的游牧民族中去。

这城市在白天看上去减少了几分魅力。但它不失为一个商业城市，以出产中国地毯而著名，内以深蓝色最为值钱。它还是各种羊皮的集市，可以购到从五元到五十元各种质量的冬季毛皮服装。最好的一种叫西藏羊毛，是纯白色、长而卷曲，一根毛竟有十个卷曲之多。这种羊毛大量出口到美国，在那里加工成假的猴皮或灰鼠皮。

外国来的许多消费品出现在宁夏这个落后地区：小提包、古龙香水、热水瓶、卫生用品、高档香皂。这说明宁夏仍然和北京及东部港口有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薄弱的。就在这些出售舶来品的商店旁边，是铁匠的炉火，正在制作原始的马具，或者为维修队商

的车辆打铁。城后便是西面和西北面的群山。站在到处都是高大拱门的主街道上就可望见。有一句俗语说，这里的太阳落山是中国七大奇观之一。

我们获悉，在宁夏有几位外国人。三名俄国军事顾问住在这里，隶属于门将军的部队。中国内地会的一个机构有三位牧师，分属苏格兰、美国和瑞典血统。他们在这里宣讲耶稣教原教旨主义的教义。一位比利时天主教牧师里昂·凡达克，多年来也住在宁夏，但从不和耶稣教牧师交往。对于这些居民来说，宁夏根本就没有我们初到时感受到的那种魅力。他们全都认为，这仅是一个孤寂的工作岗位——尘土飞扬，远离家乡和亲友的荒芜之地。当我提到在长途跋涉后于夜间抵达时所见到的城门是何等美丽时，他们都惊讶地瞪着我。他们天天现实地面对宁夏，根本不觉得它有什么美。甚至那几位在这里只住了几个月的俄国顾问对它也厌烦极了，总是玩纸牌或同凡达克神父聊天来消磨长夜。达克神父除了传教之外，有一肚子的广博知识，而且是位摄影天才。

我们在宁夏呆了两周零两天，对这块曾盼望很久的地方也感到烦透了。这里买不到汽油。我们只好等待从平凉运来补给品。汽车需要大修，特别是鲍罗廷的别克车。我们叫人在住地的院子里掘一个深坑，把别克车架在上面，以便修理那晚撞坏的车底的铁架。工作进行得很缓慢。雇来的铁匠花了太多的时间抽鸦片。在甘肃，这是很普遍的。

门将军邀请我们全体参加那必不可少的宴会。其他方面也颇为关照，如送来马匹，让鲍罗廷和陈丕士早上溜马。常请他们出席晚宴和会议。中国戏院和澡堂就在近处，我们这伙人中的男客常在夜间去光顾。妇女是不准到中国澡堂去的，如要到戏院去，则必须坐在专为妇女保留的地方。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的中国司机们

在一些名声不大好的娱乐场所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这种场所在宁夏也多得很，接待来自各方的旅客。

一天早晨，大多数人都正忙于采购水果、糖果和我们旅途中十分需要的皮毛，我跑去访问了中国内地会。一家店里的小男孩为我带路。它离大街只有几百米。在拱门上刷有英文“救世学校”字样和长得多的中文。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费特勒牧师和他的妻子。他们分别出生于苏格兰和澳大利亚，而在芝加哥的摩地圣经学院受训。还有一位瑞士妇女娜斯特朗太太。她的丈夫几年前死于中国。

鲍罗廷有一次带着一种哲理的情调提出，我应该写一篇关于“上帝的囚犯”的文章，描写在边远省份的牧师们的情况。作为长期远离他们的同族的外国人，生活必然是空虚、孤寂，某些方面还是有损健康的。费特勒先生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毕业于摩地圣经学院，那里的教育使他对现世和来世抱着教条式的福音观念。他满脑子就是一个想法：中国的四万万可贵的灵魂正在迅速地走向地狱。他相信，上帝召唤自己出来拯救他们。

从他叙述自己的婚姻问题中我知道了几分这种信仰的严重性。“摩地学院里曾有一些讨人喜欢的姑娘，”他说，“要不是我被中国内地会接纳，本可望和其中的一位结婚。但是她们没有申请到中国来工作，而我又不敢确信她们是否能为教会所接纳。我们的教会不支付赡养家庭的薪金。除非妻子也被委派为传教士，才有可能陪同丈夫一起工作。我知道好几起这样的例子。一个男子被迫必须在教会和未婚妻之间作出选择。因此当轮到我时，我把对这些芝加哥姑娘的念头统统抛到脑后，只身前来了。在中国过了好多年，才遇到我现在的妻子。她是一位传教士，差点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她在山洞里躲了几个月，人们都以为她死了。”

我问费特勒先生，从教会领取多少薪金。“没有定规的薪金，”他答道，“我们来，是为了信仰，而不是为薪金，相信国内的信徒们会寄足够的钱来。我们通常在三个月前就从总部获知第二年的一个季度能得到多少薪金。平均每个传教士每月得十五元到二十元（金币）。我们的孩子早年就离家由教会特设的一所学校负责供养和教育，将来还可能被送到美国去读书。”

这么一点薪金，甚至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眼里都显得太少。这迫使费特勒学会讨价还价的艺术。举例说，他曾告诉我，我用六块钱买来的那条漂亮地毯，他只要花三四元就可买到。这是一条手工织的、精致美丽的蓝色地毯。我看到，织毯人一家有六个小孩，一妻一母。那毯子显然是全家的手一起织出来的。这就使我不好意思再去讨价还价了。然而对费特勒先生来说，如果他要生存，活得舒服，就必须学会甚至对这样的家庭也要杀价。

后来，我听到当地关于娜斯特朗太太前夫的若干议论。许多年以前，他发了疯，在兰州城乱开枪，打死了一个中国人。他被带往沿海，关进疯人院。途中拖了很久备受艰辛。我想，这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甘肃传教士会发疯。来时盲目地相信他们周围的人民是注定要下地狱的，来后发现他们自己被淹没在一城又一城、一村又一村的这类人民之中，后者固于根深蒂固的古老习俗，对被拯救不感兴趣。他们看到，年复一年在孤寂中过去了，远离人类感兴趣的事件，两三个星期才看到一次报纸，六星期才接到一次信。他们局限于只和两三个固定的同伴交往。他们相信，周围的广大人群正在麻木不仁地走向永久的毁灭，尽管传教士们作出牺牲，竭力布道，这些人却不愿意得到拯救。也许，娜斯特朗牧师发疯时要杀一个路过的中国人是不足为怪的。

这种孤独有点象单人禁闭。处在千千万万永远是异己的人

中间，这种孤独真是作弄人。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凡达克神父都算是一个达观并兴趣广泛的人，对本地居民生活和习俗摄下了许多出色的照片，拥有一个内容广泛、多种文字的藏书室。即使是这样一个人，也向我表示，甘肃是多么凄凉地孤寂。“四万万人民”，他说，“然而你永远感到孤独。”

凡达克神父向我谈了他自己的生涯。“十八岁时参加了具有这类宗旨的一个特别的宗教社团。这以后就在宗教学院中接受了很多年训练。学习哲学、神学和将被派往的国家的历史和语言。二十四岁时，作最后宣誓——是终身不可改变的。到达工作地点后，经上级允许，终身只能回欧洲一次。”凡达克神父就是在这种纪律下工作的。

“回欧洲去”他说“其实是不应该的。那对你在这里工作没好处。你第一次到中国来，还不觉得太困难。因为你上学时还是个少年。对世事了解甚少。在学习中了解到的唯一的国家是中国。但是当你回去后，正如我在世界大战期间那样，遇见了本国人民，发现那才是自己人，再回来就更感到困难了。如今每当欧洲人来到，我的心总是转向他们，渴望和他们在一起。但这又不合适。我的心本应向着和我一起工作的中国人。这是我所应该爱的人民，因为我的职责就是爱他们。然而，我的心却转向欧洲，转向比利时。因此我说，一个人为这一使命宣过誓后，再回去是不好的。”

凡达克神父几次访问鲍罗廷，后者也作了回访。在无神论者和神秘主义者之间终究还有关于世界和中国的广泛知识作为共同的纽带。凡达克神父展示了几千张他拍摄的汉人和蒙古人的生活照片，讲了不少关于蒙古人的动人故事。他的许多话至今还会在我脑际出现。他的观察是平心静气、宽容而冷静的。“我见过蒙古人喝醉，醉到不能走路的程度。但他们照样骑马，还能奔驰。”“蒙

古包上的窗格子是汉人做的。蒙古人一件东西也不会做，一件也不会……”“蒙古人的刑罚很残酷。他们有时将窃贼的双脚砍去，让他们在沙漠中渴死。然而，如果我把法国的刑警制度，包括侦查、法庭、律师和监狱告诉他们，他们会说：‘好人为为什么要为惩罚窃贼付这么多钱？干脆把坏人杀掉，岂不既好又省。’”

他就这样并无困难地理解和容忍了异族的观点。他会讲许多关于婚姻关系的故事，那是和现代伦理标准完全抵触的。但他只是笑笑说：“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生活非常接近于原始状态，几乎和他们自己的牲畜一样。”除照片外，他还收集中国谚语…“十里之外无真言”——指的是事实真相随着口传而走样…“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机警地暗指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女儿是赔钱货”——表达了中国人的妇女观。

他的学识和他对异己观点的宽容态度是如此之深不可测，使我感到奇怪，究竟是什么促使他到中国来当传教士。当我问他时，他惊奇地答道：“怎么，为了改造人民。”为了这一目的，他得遵守纪律。这种纪律比俄国共产党的纪律还要严。他曾宣誓要“贫穷、贞洁和顺从”。要贫穷，意思是，不经上司允许，他不得从任何过路人手里接受一元钱的接济，也不能从比利时的亲友那里接受一包东西。要顺从，意思是未经社团允许，不得发表任何文章，连摄影和地理方面的文章也不行。甚至要采购他从中得到某种娱乐的胶卷和摄影药品也取决于上级的意志。

但是，他的随笔却被社团认为值得出版。他的藏书室确实说明，中国天主教会对待传教士的艺术和科学爱好是十分慷慨的。几世纪前的书信集，有关早期天主教先驱者的故事，许多册地理学、地质学和人类学丛书证明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已有几代人了。我们初次进入宁夏时所经过的渠道就是耶稣会神父们几世纪前的劳动

成果。

比利时天主教徒在布鲁巴加善(音译)为蒙古人设立了一所教会,离宁夏约有五天路程。在一条长约一百公里的土地上,他们正在教导蒙古人如何耕耘土地。“但是,来了三千名蒙古人,只有一千人愿留下。”凡达克神父说“他们的本性是牧民,对定居生活不容易习惯。而由于风沙不断推进,埋掉整个乡村,我们教会的田地也越种越糟。沙丘曾被柽柳阻挡住,但是贫穷的、管不住的蒙古人却把柽柳砍作燃料,于是防风林遭到了破坏。因此慢慢地,教会也只好撤离。”

所有这些失败,凡达克神父都以逆来顺受的态度对待。“有些人认为,一个人在十八岁时就选定自己的生活道路是过早了”他指出“但是所有的生活都有风险,都是在没有足够经验的情况下选定的。在一生之中,人总为自己的早期选择所约束。”后来他提及他改造中国人成为基督徒的工作“如果一个人相信,犹如有些人那样,他必须改造世界,那他得发疯。”(我知道他是暗指镇上的耶稣教传教士)“我们不能改造世界”他继续说“基督教不能取胜。但是它还是会继续干。自从公元 70 年圣汤姆斯到印度传教起,我们就不断地想传播这一宗教。我们永远不会成功,然而我们也永远不会停止。”

他相信,往后数年,教会将在中国遭难,尤其是在中心城市。”耶稣教人士把老婆、孩子往沿海地区送,是做得很对的。很幸运,我们没有老婆、孩子。因此,我们不离开岗位。孤单单一个人,这当然不快活,但至少没有人跟你一起遭罪。”

尽管凡达克神父等着受迫害,但他却认为中国人从根本上讲是不会改变的。“中国”他说“在各国历史中是独具一格的。所有的国家都发展变化,有兴有衰。但中国却没有过发展变化。她昨天、

今天永远是一个样。十六年前成立民国时，农民问我：‘那么今后谁当我们的皇上？’如今，那些梦想革命的青年学生也迟早会为古老的中国所溶化。这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农民只考虑如何干活，他们唯一期望于大自然的是不要挨饿。”

我提醒说，现代工业和工厂制度已经传入中国，正在冲击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由此必将引起变化。对此，凡达克神父摇摇手答道：“那是在通商口岸。但那不是中国。有一次几个俄国人想在兰州开办工厂，但失败了。”他尽管有广博的哲学修养，但很不重视经济学理论。

鲍罗廷很有兴趣倾听我和凡达克神父之间的谈论。“我喜欢他”他说“我为他难过。一个悲剧人物——上帝的囚徒。”

“也许凡达克神父以同样的理由为你感到难过”我大胆地说。

“为我难过？为什么？”鲍罗廷问道。

“你们都来改造中国，而都失败而归。也许，他认为你，就如你认为他一样，是一个非常聪明有才干的人，但其理论却在中国无情的现实面前碰了壁。”

“再给我们十年时间，或二十年时间。”鲍罗廷叫道。

“是的”我笑道“凡达克神父也把希望寄托于将来。不同的是，他的未来是天堂中的什么，而你的未来是一场中国革命。他不相信你的理想，你也不相信他的。但你们都把当前的失败当作走向未来理想道路上的踏脚石。”

宁夏的耶稣教传教士们和凡达克神父截然不同。他们从不互访。神父刚到宁夏时，他的前任曾警告说，拜访费特勒夫妇是徒劳的。他去访问过两次，都因自己是天主教徒而吃了闭门羹。“但我知道”凡达克神父说“费特勒太太是个很和善的妇女。至于费特勒先生，长期住在甘肃影响了他的脾气。他和自己的信徒们也争吵。

在传道时，他公然辱骂信徒们和他们的国家。由于中国人讲究至少是表面的礼貌，他的教会分裂成两部分。较大的部分归一名中国福音派传教士管，较小的部分由费特勒先生管。他们的争吵大约发生在去年产生工会的期间。当时冯总司令从莫斯科回来，甘肃省一时思想颇为激进。”

凡达克神父关于费特勒太太和娜斯特朗太太待人友好的评价得到了充分证实。她们对我这样的一个过路的美国人如此之友好，使我因无以为报而深感不安。她们经常请我去吃饭，为我洗衣，帮我缝补。她们还让我洗了一个离开汉口以来的第一个热水澡。为了让我尝到家乡味道，她们烘烤了蛋糕和面包。她们拒不接受任何回礼。但当我送她们一些我所买到的美国罐头食品时，她们软下来了。这种友好态度也许部分地是由于遇到一个美国人使她们感到愉快，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她们天生的好心。

这种友好纯属个人交往性质。它不延伸到宗教事务方面。在宗教问题上——尤其是费特勒先生——他们都坚守在芝加哥学到的原教旨主义福音派观点，这种观点丝毫不因后来的生活经历而有所改变。他们不可能和凡达克神父作亲密无间的谈话。即使后者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他那胸怀豁达的达观态度，他对蒙古道德和宗教的宽容看法就足以使他们感到这是魔鬼的诱惑。至于对鲍罗廷，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去拜访。对他们来说，布尔什维克简直就是青面獠牙的鬼怪。

出人意料，费特勒先生竟告诉我说，在甘肃很难改造中国人，其原因是这里有完善的灌溉系统，使农民无需依靠老天下雨。“其他地方的人相信‘天老爷’”他对我说“但在甘肃，我们指望黄河。”面对实际功效，他的原教旨主义宗教显得逊色了。他还告诉我，最近在甘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期里，他的两名仆人参加工会之

后，他经历了“可怕时期”。

“给我们惹麻烦的是一名福音派教徒和我们的厨师”，他说，“冯玉祥从莫斯科回来，工会开始成立。他们的头脑真是发热了。首先，他们要求我提高工资。厨师每月工资三元五角，福音传教士四元，伙食自理。他们提出要加倍，但又分别让价到五元和六元。这就够糟的了，因为我没有这笔预算。接着，他们要求有权在教堂里宣讲三民主义。他们组成‘协进会’，意思是教会和工会不是分裂的，应该协调一致。他们自己花了不少钱，做了一面旗、许多纸卷和标语牌。他们扬言每星期五的四至六时将在教堂里召开会议，让人们自由发言。”费特勒讲到这一在公开讲坛上为调和工会和教会所作的温和的尝试时，语调充满愤慨。

“当然我禁止他们。于是他们声称教会的财产不属于我，而属于全体中国基督徒，他们就是其中的成员。他们真的召集了一次有许多人参加的会议。有几个众所周知的鸦片鬼竟被允许在会上发言。”费特勒先生的语气中表现出满腔义愤，“他们宣布下星期五还要开会。我断然拒绝。于是他们在大街上散发传单，称我为帝国主义分子、法利赛人和假先知。我不得不找当局，要求制止这种行动。”

在中国行政长官面前举行的听证发生在冯玉祥从支持工会转变为禁止工会的当儿。长官一开始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到其他城市的官员那里去，出示攻击费特勒先生的传单，向他们讨教。当他半夜回到衙门来时，起诉人还在等着。费特勒先生向我描述了随后的审讯。

“长官对我的姓刘的福音传教士说：‘你现在向我们布道吧！你布的是什么福音？’

刘答称：‘我们布讲基督。’

官员问：“基督是什么人？”

刘答：“救世主。”

“哦，假如基督是救世主，那么三民主义是什么？你不是又想布讲三民主义吗？”

刘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那时正是革命时期，三民主义的释义是变化不定的，搞不好会有危险。官员骂他是骗子，应该坐牢。

“接着又召见我那姓李的厨子。官员问他在教会干什么活。他答称在厨房干活。官员骂他不该在教堂里演讲。李答道：‘我是教会成员，有权在教堂里发言’官员认为这种说法纯属无礼。他对我说：‘把月底前的工资付给他们，叫他们滚。我一定采取措施，不许他们今后再进入你的住宅和教堂。’

厨子和福音传教士要把教会和工会的理想协调起来的梦想终于破灭。每月五六元的菲薄工资，他们不仅要养活全家，还要从中省下钱来印发小册子，买一面旗来提高“协进会”的威信。我纳闷，他们是否知道，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许多幻想者也干过同样的事。难道他们自以为是甘肃唯一的独创人物吗？这以后，他们所热爱的教会暂停了他们的工作，而他们所热爱的工会又被冯总司令下令关闭，虽然当初也是冯自己发动成立的。费特勒先生告诉我，听说那个福音传教士“后来神经受到一点刺激”。这也许不过是教会分裂带来的谣言。如果是真的，其中就含有费特勒先生所没有注意到的人类幻灭的悲剧在内。

冯玉祥对基督教的态度特别使费特勒夫妇感兴趣，尤其因为冯是该地区的长官。他们说：“冯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秩序井然的政权。两年前，当他被委派为甘肃省的军事长官后，有钱人都吓得藏起财宝逃跑了。但是，冯的部队在刘将军率领下到来时，唱着赞美诗，纪律严明。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清扫宁夏的街道。然

后，他们挖掘街沟，平整路面，还干其他好事。夜间，部队不准上街，他们的品行很好……但当冯从莫斯科回来后，他把布尔什维克的各种观念都带来了。这里建立了工会，发生了学生闹事。现在，所有这些又都停止了。这里的一家日报登载了一些反对蒋介石的文章，冯电令查禁，并把编辑召到河南他那里去。”

基督教徒们一度对冯的良好观感已转移到冯的部下张元江身上了。费特勒夫妇讲了张和教堂之间的亲密关系，如何“他每次来访，我们总一起祈祷。”“圣诞节时，他总在教会举行圣诞节晚餐，还给我们一千块钱，施舍给穷人……和我们从报上看到的南方对基督徒的迫害，真是一个正反对照。”……他们惧怕“南方”和它的造反思想，差不多和怕布尔什维克一样。事实上，他们把两者视为一体。

在宁夏，有一天早晨，一个年青的蒙古人到总部来送一份长长的红纸，上面写了被邀参加国民党内蒙党部欢迎鲍罗廷宴会的所有人名。于是，我才知道，宁夏虽然不在内蒙古，而只是在它的门口，但国民党认为，在这里建立内蒙古总部更为安全和方便，因为内蒙古的三分之二在张作霖手里。我还获悉，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曾答应给国民党内蒙党部十万卢布，但迄今为止一分钱也没有收到，现在更不见得会付款。

由于财库中一文不名，国民党内蒙党部通过私人关系借了十五块钱为鲍罗廷举行宴会，“既然他是路过宁夏的最显要的客人。”也是为此理由，他们把红请帖送了一圈，以便弄清楚要接待多少人。对诚心诚意的党部来说，晚餐有点象悲剧。有三四个人已经提前吃过饭，再吃不下多少去。鲍罗廷正有点发烧，只在晚餐开头的一段时间参加。其他三个俄国人迟到了二小时，还有些人根本没有来。因此，这个花了不少心血筹备起来的宴会，尽管有好多

道佳肴，汤菜、鸡、鸭、甜食、苹果、桃子，仍然说不上是成功的。

主委^①的妻子贝夫人是个可爱的人，剪了短发，显示出她的现代化倾向。在男客中应付自如，说明她有能力分担丈夫的活动。宴会后，我访问了她和秘书鲍先生，获知了不少关于内蒙古所处的境况和它的抱负。

他们告诉我说，内蒙古共有一百五十个部族，由六个显赫的家族统治着。在沈阳方面的东三省地区有二十四个部族；在甘肃，包括甘肃北面由甘肃管辖的阿拉善地区有三十个部族。其余的散居内蒙古本区。这一区域处于北京西北方向，包括察哈尔、热河和绥远各省。在这些地区，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打了好几年仗。东部的蒙古人最靠近汉人区，生活习惯同汉人一样，过定居生活，耕耘土地。其余部分的各部族都是流动牧民，饲养羊马，住在驼毛毡做的圆形帐篷中，叫“蒙古包”。虽然文化落后，但在五十年前创办的学校中也出过一些出色的学生，现为和中国国民党联盟的国民革命党的领袖人物。

蒙古的贵族视人民如奴隶。不只是六个望族，各部族首领也都如此。他们把所有的公地都视作私产，卖地所得全归已有，从而使整个部族因缺少牧地而贫穷不堪。贵族们自己则受汉族商人的盘剥。后者以高价出售奢侈品，又以低价买部族的土地。有一句挖苦人的中国谚语说：“你请一个蒙古人来吃饭，他就会吃掉他自己。”由于受到王公们和汉人这样的对待，蒙古人开始起来反抗，要象外蒙古一样搞一场革命。

“一九一一年中国的第一次革命时” 鲍先生说“我们蒙古人认为这不过是一次汉人反对满人的革命，与我们无关。于是我们开始建立自己的政府。我们成功地为外蒙古争得了自治权。外蒙古人

① 国民党地方党部主任委员，简称“主委”。——著作注

民很落后，打仗实际上是靠的内蒙古士兵和武器。我们打败了袁世凯的部队。如果不是日本和俄国干涉，我们本可在内蒙古建立自己的政府。那还是沙俄时代。他们和日本、中国一起举行三强会议，决定内蒙古仍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同意，沙俄部队就会连外蒙古政府也一起摧毁。当时，我们有五万部队，由于那次会议，只得解散了。”

这以后，爆发了由各种冒险家发动的一系列叛乱。一位内蒙古领袖组织一万名士兵起来反对张作霖，开始是成功的，但后来失败并被杀了。俄国革命时，一些俄国白卫军在内蒙古建立了一个新的都城。后来在他们和蒙古人之间发生了冲突。白卫军乘夜间动手，把新蒙古政府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全部杀光，摧毁了这一政府。可见，蒙古不过是大国之间的一只球。

五年前，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影响下，开始了目前这场争取自由的运动。一些蒙古学生在北京接着又在张家口举行会议，组成一个民族革命政党，派出代表到库伦和莫斯科去寻求援助。他们宣布的目标是脱离北京而独立，但是愿意参加中国的联邦共和国，有点象俄国北部的联邦。他们不久便成为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左翼的一个分支。后者的政策允许中国国内的不同民族实行自治。从那时起，这些内蒙古人士就站在冯玉祥一边，和张作霖作战，并于一九二六年冬和冯一起撤退到甘肃。他们从各王公那里征集到六七千部队，但是指望中国盟友提供部队开销的钱没有拿到。王公们召回了部队，只剩一千人继续留在甘肃，有的在冯玉祥部队里，有的在国民党里做党的工作。

“我们正期望集中三万人去和张作霖作战”鲍先生说。他吹嘘说，蒙古人可以打败四倍于他们的张作霖部队。“因为我们在平原地带更能忍受艰苦，而汉人却不能……”他补充说，“我们认为内蒙

古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它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之下，因而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不过，他承认，至今为止，他的革命党的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他们受一种新的民族情绪驱使，盼望能建立一个蒙古国。当我问他革命党打算在摧毁蒙古王公的权力这点上走多远，他的回答是不明确的。他说：“群众已经开始认清，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而王公们则剥削他们。”但他接下去又说：“大多数王公都反对革命，少数人为讨好群众，却企图和革命联合……”明显地，革命党的处境还不能拒绝这类王公的帮助。这是一个民族主义党，主要向群众寻求支持，同时也迫切需要各阶级的帮助。尽管如此，他们纲领中有一项明确的条文是，所有的土地都是公产，不得由王公私自出售。他们的社会纲领也就到此为止，没有再向前跨一步。

我很想知道，蒙古人是否会有足够的民族感情为创建一个国家而奋斗。也许，曾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的成吉思汗后代，竟会为中国内战双方去厮杀而导致种族绝灭。在沙皇俄国和日本的角逐中，后来又在白色和红色的俄国之间的斗争中，他们曾经当了工具。现在又在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的战争中被当作工具。这一小群知识分子能唤起这个游牧民族去关心国家利益吗？凡达克神父预言，三百年内，蒙古民族将要消失。两年前，蒙古东北部一个苏联领事也作过同样的预言。他说：“他们不想学习，他们无意于作为一个民族而生存。没有一个蒙古人关心蒙古民族。”

这里，在遥远的宁夏，这个蒙古流民聚集的中国贸易集市成了议论民族革命的蒙古人的小小前哨阵地。外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蒙古人真的是事关紧要的吗？他们会有所作为吗？我将在继续向北去的旅程中，在过去叫库伦现名乌兰巴托（红色巨人之城）的外蒙古共和国政府所在地，找到部分答案。

七、穿越戈壁

几个星期穿越戈壁这片人迹罕至地区之行，留在我脑际的是一片纷杂的奇观，有黑色的群山，有一望无际的灰红色的地坪，有奇特的红色物体与小丘，有令人惊倒的直指云霄的白沙山岗，有野山羊的狂奔，还有骆驼临死时的凄凉嘶叫。深深铭刻在我记忆中的，既有痛苦，又有无比的美妙。在落日中，初次见到那王爷府精致的尖顶，翻过危险的沙丘之后，住宿在夏拉介（音译）仅有的一座附近有孤井的废弃的蒙古包里；迷路一天，未遇任何牧人。到夜间，一座喇嘛庙的辉煌灯光照亮了我们的道路，在巴申图（音译）的大草山上，我们以危险的速度一直滑行到山底。这些景象，至今栩栩如生，时而在我的脑海出现。

在我们身后是中国人口稠密的土地和军事政治上的一片混乱。只要我们逗留在这些城镇，不管是和将领们讨论问题，或是和船民们谈话，或是参加内蒙古党部举行的宴会，就会接触到紧张的社会问题。而且，直到沙漠的边缘，我们身边总有一位彬彬有礼的将军陪伴着。然后

突然，和人们的一切交往，与现代世界各种问题的联系，全部中断了。我们知道，在我们前面很远的地方，将是属于另一种文明的市镇和铁路，那就是伟大的苏联。在那里，我们将再次面临被置于新的约束下的现代生活中各类问题和相互冲突的人类利益。但眼前，我们却是面对大自然原始威力的一小撮人，远远离开铁路、电报、城市甚至村落。处在两个世界之间，我们几乎失去了时间观念，甚至人们不惜牺牲生命为之奋斗的伟大斗争也显得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事。我们自身的存在也变成是一种循环不断的晨、午、夜和不断呈现在面前的道路、平原、沙漠和圆丘。在所有这一切中，最鲜明的记忆，是我所从未经历过的夜晚的彻骨寒冷和日出之晨。夜晚，我坐在铺在地上的毛毯上，拱着背，浑身颤抖，冻得不能入睡，又累得站不起来。早晨，太阳的升起对我们来说再不是日出而作的老一套，而是真正的生命复苏，僵硬的肢体得以活动，是精力和欢乐的极大的有节奏的恢复。

我们横越戈壁的道路是一条联结中国西北地区和蒙古首府的古代骆驼道。它在北京—张家口—乌兰巴托那条老路的西边很远的地方。这条老路目前在张作霖手中，要靠近它是不安全的。我们选择的路和张作霖部队之间隔着几百公里的沙漠和山丘，这里水井稀少，部队无法停留。地图上标出，它的前一段归内蒙古政府管辖，后一段归外蒙古政府。实际上，那里几百里路荒无人烟，居民极少，无需建立什么政权机构。

我们一行约二十人很可能是首次靠汽车穿越戈壁这一地区的人。另一条路，北京—张家口—乌兰巴托，也是只适合冒险家而非普通旅客能走的，不过那里总还有固定的站头，可以休息过夜。有饮水，甚至也许还有简陋的“蒙古包”。但是，战争条件迫使我们要走的路是没有站头，也没有交通的。我们在宁夏（最后一个中国城

市)企图打听我们会遇到些什么困难,得到的是令人迷惑不解的答复。人们告诉我们,水井是有的,但相隔多少距离则无人知晓。有人说,每隔三十公里有水。也有的说,有的水井水质不好。还有的说,一百五十公里内没有水井。事后证实,最后的说法是真的。有人说,迄今只有一辆汽车这么走过。也有人说,曾有好几辆。有人估计,到乌兰巴托需要六天,也有人估计需要六周。

难以以为这次旅行制订什么计划,也不知道该准备多少食品、汽油及其他物资。大家一致认为,将有许多艰难的“沙山”要跨越。人家告诉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得用骆驼来拉汽车,车轮下面要垫草席条。他们说:“在其他地方,人乘汽车。但在戈壁上,汽车得由人来背。”有关沙漠的宽度,说法大不一样,有说宽三十里,约十五公里;别的人又说有三百公里。还有的说,那是随风移动的流沙,因此我们无法预知有多宽。冯玉祥将军原先通过那条去张家口的通道和乌兰巴托取得的联系,现已中断。三个月前,他派代表到这一地区来调查能否建筑一条永久性的道路。代表报告说,由于流沙的缘故,无法建筑。我们雇请这位调查员与我们同行,为我们引路。

面对各种不同的谣传和说法,我们决定尽量用骆驼来驮运行李,由彼得洛夫和卡莱诺夫同志负责;而汽车只装运人员、汽油、煤油和旅途中必不可少的行装。由于汽油不够,不得不将三辆卡车和一辆客车留在宁夏。在这一地区是买不到汽油的。只得买煤油作为代用品,和我们从汉口带来的汽油混合使用。煤油价有时高达每五加仑六元五角(金币),而且要有军方的特许才能购买。

要核实整个戈壁之行的日期和每天发生的事件,必须查阅我的笔记本。但它已很难辨认。粉红色的硬封面早就撕掉,因为不时需要用它来做漏斗,往引擎里加油。许多页纸也被撕下来在途

中派了各种用场。这就造成其他纸页松散。由于许多记录是在途中做的，随着汽车的颠簸，笔迹也在跳动。到夜间，在帐篷中的烛光下，或在野外手电筒的照射下，也许可以写得平稳些（但也很不舒服），但我常常是累得不想写了。

因此，所谓记录，只不过是一两个抖动的字，有时还并到一起。下面就是例子：

- 725.4 离驼道直转右，转东后北。
- 725.5 过红壤山终
- 732.1 进入宽 100 英尺的老河床脊
- 734.8 突然离开峡谷，上陡峭左岸，越过许多溪谷山脊直向西。
- 736.0 两小石堆标志山顶，转西北。

上面的数码字是我们速度计上的里程数。其他所记是因为鲍罗廷要求对这段路程的情况作详细记录。此路是向导张先生发现的。有三条山谷都通向这段路。张先生都作了探查。结果，前两条无法通行。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他第三次尝试后找到的。路线难认，除了凭记忆与偶然出现的圆锥形石堆外别无标志。为这段前人不知道的山路做记录是供后人参考，只适用于汽车。足有一个小时，我们的汽车的四只轮子总不是在一个平面上。上坡下坡或过山脊小路时，总有一只轮子是悬空的。但是我们完成了这段旅程，尽管那辆最大的卡车不得不卸货轻装。

笔记本中的其他记录显得更为有吸引力。“1178 英里”处记有“大砂砾平原，黑色”，使我想起那是一个宽阔的地面，可以不受任何小丘或界限的阻碍，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前进。在“1267 英里”处又记有“四匹奇妙的黑马”，那是我们的汽车惊得四匹野生动物狂奔而去，鬃毛和尾巴在疾风中连成一线，十分壮观。记有

“山中两骑手”和“右首远处的帐篷”，使我想起整个平原是何等空旷，有时除我们自己外，整天见不到一个人。

在宁夏修理汽车花去两周，以后又因修理进展缓慢（中国工匠总是时而干活时而吞云吐雾、吸食鸦片，做做停停）一再延期，终于在九月五日一早启程。我们于四时三十分被叫醒，又冷又黑，六时上路。门将军带着警卫员陪我们，打算次日在王爷府同我们告别。

整个上午，我们不知不觉地盘旋上坡，向阿拉善的紫色和桔红色的山壁开去。路基上到处是大石块，经常撞击汽车底盘，使驾驶发生困难。不久，我们越过万里长城，长城在此处一点也不雄伟，蜷缩在山壁之下，完全没有张家口附近那种高大的城楼和辉煌的气势。但是，回望的景色却又颇为壮观。一大片一望无际的旷野，地面硬实而平整。靠近山壁是巍然的西夏墓碑，沙土色的尖塔上刻有古文字，塔内藏有某个王朝的遗物，西夏的统治者来自西藏，曾经据有这一地区，但后来，大约八个世纪以前，蒙古强盛起来，又将他们逐出。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一所小茅屋，近旁有一口小水井，是甘肃和内蒙古的阿拉善交界的标志。值勤戍军允许我们使用这所茅屋。它比一个山壁上的洞穴大不了多少。他们还为我们烧水泡茶。门将军在路边招待我们吃饭，有冷肉，是用中国香料腌制的，装在边上用羊皮条包起来的篮子里。清晨，我们越过山上的一隘口，于是第一次看到了蒙古。望下看，是一片浩瀚的青绿色海洋，以黄沙堤岸镶边。实际上这是一片砂砾地上矮小的暗绿色灌木丛，间隔着荒芜的沙脊。为了躲开这些沙丘，我们绕着大圈走。

不久，我们就第一次看到蒙古族人了。这是在我们驶近一处小村落和一家旅店的时候。迎面奔来了怀着极大好奇心的骑手。南边的蒙古人显然有中国的影响。和北部的蒙古人相比，他们有

更多的定居区。但他们的服装色彩和待人的坦率态度和中国人大不一样。他们走过时，丰富多采的衣服使周围的景物大为增色。妇女和男子一样地骑马、走路，所不同的是妇女有高耸的精致头饰，额上也有大块镶着珠宝或银制品的饰物。有一名妇女带着六匹马向旅店驰来。我们还看到不少其他骑术娴熟的女骑手。

中国人相互之间比较相象，而蒙古人之间的区别比较多，不仅在服装的颜色上，而且在智力上也如此。他们大多数显得落后和原始，但有的却十分敏锐，令人吃惊。不象中国人在智力上都比较接近。和中国人相比，他们比较坦率，反应也较快。当我们重施小陈发明的伎俩，用以挑逗好奇的人群时，这点尤为明显。等到人群完全围住我们的汽车，身体紧靠档泥板和水箱时，我们故意全神贯注地看着水箱帽上装饰的玩具小狗，然后揿响喇叭。听起来，好象是小狗突然叫了。人群每次总是吓一跳，接着是大笑，然后议论纷纷地猜测声响来自何处。蒙古人比中国人反应快，跳得远，笑得也更响。一两个比较聪明的几乎立即就猜到声响来自车内，而不是来自小狗，中国人猜得要慢些。

不久，我们第一次见到蒙古的白山羊，在褐色的地面上象一道道白光急促地从我们身旁逃开去。我们看到许多美景，有骆驼，有山坡上雪片似的白绵羊。这些是人口较为稠密的游牧区的生活景象。进入干旱的戈壁后，这种景象就会消失。有时我们还以为畜群是无人看管的，但随即就会发现远处有一名孤单的骑手。而且，我们还常见一大群骑手飞驰而来，使人联想起伟大的成吉思汗轻骑兵的故事。我们就这样从和煦、温暖的下午一直开车到金黄色的落日来临。阿拉善的群山在我们身后变成紫色和赤褐色，最后又消褪成清澈的蓝钢色。在我们前面的落日中，王爷府的城墙和塔楼闪闪发光。这座半中国式，半蒙古式的城楼是屹立在沙漠边

上最后一个有生命的建筑。

如此精致的小镇在全中国我还从未见过。条条溪水从远山流进村中。小溪夹岸都有绿树。受到灌溉的花圃和果园在居民区中形成层层阶梯。城垣在夕阳中划空而立，显得比令人失望的长城更为高大、神气。其实，它不过是一座小商业市镇为抵挡古代北方游牧部落入侵而修建的壁垒。两边的山顶上是羊圈，筑有高高的土墙，以保护畜群夜间免受寒风侵袭。

我们在暮霭中进入小镇。在喇嘛庙(或佛寺)的尖塔下，身穿红袍的喇嘛悠闲自在地踱向市场。小男孩们不停地将刚纺好的驼毛线绕到一个大轮子上去，随后再将它编成鞍袋。沿街的铺子里有锻铁炉，有挂在熊熊炉火上有待抛光的铜水壶，有篮子，有适合挂在马身上的小木桶。在街头，身穿紫色、猩红色、鲜蓝色服装的骑手嘚嘚而行。市旁的桥上，两三个饮食摊生意兴隆，烧好的食品，人们一拿到手就在露天吃掉。

我们所住的旅店是离开汉口以来最干净、最舒适的。有一所很大的外院。为了安全，我们的汽车就停在那里。内院稍小一些，四周都是最简单的中国式小房间。铺着席子的炕占据了房内大部分空间。门口有一小块硬地，可以站着洗刷或脱鞋。但席子是新的，而且干净。人人都有自己的房间。有一个很大的公用厨房，特许我们专用，也可以请当地主人代为购买和烹调食品。这里没有现成可吃的东西。但就在旅店外面的市场上，蛋、肉、蔬菜都很丰富。

次日一早，我散步穿过市镇。只需几分钟，就走到街市尽头了。那时店门已开，炉火也已升起。绕着壁垒走一圈，很快就到达山岗的边缘，从岗顶可以俯览沙漠。通过一扇拱门，有一条棕色小道弯弯曲曲穿过一些小土墩，直到与一条宽阔的骆驼道相交。骆

驼道在平野上显出一条大路的样子。我们向北穿越蒙古就将取道于此。交叉点上是最后的一层稀稀的树林，再向前，就只有沙漠中挂满沙土的蒿类灌木了。突然，在我下面的山边，响起一阵孩子的哭声。我发现，拱门下面的棕色小道上，一个受惊的小男孩在哭。看上去，他是完全迷路了。他一会儿走这边，一会儿又走那边，每转一次弯，总要爆发出一阵新的哭叫。不知道他怎么会在沙漠的边缘迷路；也拿不定是否应该下去帮助他。也许我这陌生的白脸不但不会使他感到宽慰，反会更使他害怕。他这样哭了好几分钟。突然，一个男子从山边的转角出现，抱起孩子，带他回村。对这孩子来说，这件事已经过去，并且很快就会被忘却。但对我，每次回想起，一个小小的生命迷失于如此空旷的空间显得多么的孤单无援！成了我第一次靠近沙漠时最强烈的感受。

王爷府城墙的北头，向着一个山峰延伸，而从环城的小道上北望，可以俯视到许多光秃秃的棕色山谷。沿这条小道走一阵子，我见到了沙漠生活的另一番景象。两位年青的蒙古牧民和我相遇时正打算转向北面的山岗。他们停下来看我。我之对他们，犹如他们之对于我，是一件新奇事物。接着，我们用手势交谈起来。我才发现用手势可以交谈许多事。他们问，我和旅馆里的人是否是一伙。我答，是的。他们又说了些什么，但我听不懂。不过看脸部表情，我知道是问，我这么早到城的这边来做什么。我挥臂做了一个手势，包揽了整个大平原，特别指了指近处的山峰，说了一句我不大会说的中国话“好”，指的是这里的风景。显然，他们误以为是指近处山上的羊群。年青牧人高兴得笑了，还带几分兴奋。他告诉我，羊群是他的，而且它们确实“好”。他做的手势是拍打一只羊羔，又指指散在山上，正在啃食稀疏牧草的羊群，又回过来自豪地拍拍自己的胸膛。当我微笑表示听懂了时，他又告诉我，山上的羊圈也

是他的，并请我去作客。他作了许多表示友好的手势，最后又一再指着太阳，意思是只要我愿意，可以整天整夜呆在羊圈里。我回头指指市镇，表示遗憾，然后离去。就这样，在短短一个小时内，我看到了人们在沙漠生活中最基本的两种现象，一个迷路者面对孤独时的悲嚎，和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时的好客之情。

在王爷府城墙东头的终点，在山边隐隐约约有一座菜园，许多溪水流向那里，使它汲取了生机。我沿此而下重返集市，那里早就沸沸扬扬，有紫色、猩红、深红的服饰，有喇嘛们在数他们的念珠，有农民们在出售蔬菜。当我走进主街道时，一男一女双双骑马进城，都穿戴着豪华的蓝缎子袍子和桔红色腰带。观看着这一切，我走向小旅店去吃早饭了。

八、在戈壁滩继续前进

恰好是在王爷府，雨水帮了忙。穿越中国的途中，雨水总是会严重地阻滞我们，幸好这种天气我们只遇到两天。现在我们热切地希望下雨，居然真的下了。他们说，这是王爷府五年来第一场雨。这到底是真话，还是为了奉承我们这些贵客，那是永远也弄不清的。两天来，雨哗哗地下，把旅店的小院变成一片水汪，把街道变成一片泥泞。但我们知道，一出城就是沙路，雨水会使泥沙变硬，对我们大为有利。

九月八日的下午，我们终于把骆驼装载完毕，打发它们上路。这是一支共约六十头牲畜的运输队，由彼得洛夫和卡莱诺夫同志率领。九日午后，我们自己也出发了。张先生的卡车载着士兵走在前面领路，跟在后面的是鲍罗廷的别克牌和陈丕士的道奇轿车。我们很快就从城内的泥泞中脱身，一路上坡，登上一条被雨水冲刷得很结实的沙路。有些地方有水洼，不易通过。两小时后，我们抵达只有四间房子的一个地方，离王爷府二十六英里，名叫成

塔荷(音译)。我决定在此停下等待后面的汽车，它们不是被水洼所阻，便是引擎出了毛病。傍晚，由于厨师和给养未到，根据鲍罗廷的要求，我试着能否从那四家人家找些吃的东西来。我们发现，此地的人是好客的。他们当天杀了一口猪，给了我们一条猪腿，还有大米，不要我们付钱，只要诸如针、线、肥皂或其他任何文明生活的细小必需品。这些东西他们很难弄到。一条六英寸长的洗衣皂、三枚针、半轴线，就换来了肉。还让我们用他们的锅，提供柴禾和开水给我们泡茶。汽车很晚才全部到达。他们看到一具蒙古妇女的尸体弃在路边，已经半腐。这使我们想起蒙古人处置他们的死者的原始习俗。

几小时的旅程就显出，有些汽车修理得很不好。因此，在成塔荷帐篷中休息一夜以后，工匠又得用大半天来修车。在此期间，别的人就去打野鸭和野鸡。这里这种野禽很多。张先生的成果最佳，打下一只大野鹅，足够让每个人都尝到味道。下午，我们离开成塔荷，很快来到沙土山脊上。如果不是雨水使之硬结，这将很难通过。我们经过一口井，附近有两所小屋，从那里弄到了开水。又走了数英里，来到一只将死的骆驼的身边，它在路中间抽搐，它那吓人的叫声响彻四野。这段路正好蜿蜒在小沙丘之间。鲍罗廷的“别克”企图绕开骆驼，结果却遭了殃。只有道路上的沙土才是硬结的，而小丘的斜坡却不然。结果，车子经过半个多小时才开出来。现在我们必须把骆驼从路上搬开。这很难做到。这庞大、沉重、笨拙的生物把头盘在肋下，象一条毒蛇。嘴里冒出令人讨厌的绿色泡沫。周围的恶臭令人作呕。当人们推它一下甚至碰它一下时，它发出的嗥叫也同样令人毛骨悚然。最后，许多人用绳索拖，才把它搬开，使道路得以通行。

日落时分，我们来到一座佛庙和喇嘛寺，这是方圆数英里之内

仅有的建筑物。喇嘛们已离寺去度假，只留下几个看守人。他们允许我们占用几间房间，水和柴禾也尽用。鲍罗廷又一次发了热病。我们再次被迫宿营。没有吃的，因为厨师和给养所在的卡车没有赶上来。两天的时间我们才从王爷府走了四十九英里。就是这个速度也已很不容易了。这不是由于道路，路是很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汽车状况不好，加上中国司机缺乏经验。

早晨，鲍罗廷感觉好多了。落在后面的汽车和卡车也已在夜间赶到。于是，在吃了一顿自王爷府以来令人高兴的最丰盛早餐（有咖啡、蜂蜜、香肠、鸡蛋和面包）之后，大约九点钟，我们又上路了。由于驼路不能通行，我们花了半天时间跨越一条山脊。我们也经过那种到处都生着很厚的草丛的平原，车轮撞上去，好象比石块、流沙和砾石还硬。又驶过一座红沙小山和一条河床。还有一小段很好的砾石坡，向着群山延伸。当逼近山下时，我们立即离开骆驼道，向东转弯九十度，以便在几英里之外的另一个地点进入山脊。我们缓慢地通过沙土、砾石和草地，直至忽然出现一处平坦的古老河床，伸向山中。它有一百多英寸宽。我们沿河床前进，在只有向导才知道的某个地点才离开它。向左转，径直爬上山丘的陡坡。我们向西又向西南转弯，然后又向北。在不平坦的道路上颠簸了不到两小时，指南针却曾指向所有的方向。在山脊顶上看到两堆石头，这是标记。从这里，一个急转弯，我们驶向西北。走了几英里路之后，重又回到骆驼道上，在一口井的旁边停车，那里有一所房子和一堆火。

这以后在一条很好的砾石路上我们奔驰了好多英里路。到处都是砾石。在上面行驶倒不难，难在要找到路。骆驼道是散在各处的，与其找路，宁可去找标石。黄昏时在平地一口井旁宿营时，才知道这一天走了七十一英里。早晨过山脊那段难走的路不算，这

个是离开铁路以来最好的记录了。

这天有一件突出的事是遇到一位奉命从库伦来接我们的同志。一辆意外地从沙漠那边开来的汽车，从中出现一位热情高呼欢迎的没刮胡子的白种人，这就是我们首次见到的来自北方的信息，而北方正是我们长途旅行的去向。他已经离开库伦一个月了，以为我们早就到了，一直在向北约一天路程的夏拉介井等候。南来的路被沙山封住了，直至几天前雨水冲开路面后，他才跑来找我们，为我们带路。从这里开始，他负责照管我们的旅行。这一夜，又是冷又是下雨。和上次一样，厨师和给养半夜才到达。次日，驶过沙土和砾石地，又过沼泽地，汽车在里面陷了几个小时，然后又是平地。流沙随风阵阵吹过干结的骆驼道。最后，我们遇上了“沙山”。

在整个戈壁之行中，现在是最令人激动的时刻了。我们本以为我们早已翻过“沙山”了。因为我们曾越过许多山脊，有的高些，有的低些，如若在干燥的条件下，这些都是难以翻越的，有的夸张一点简直可称之为“山”。但现在，我们的向导在山丘之间的一块空地上叫我们停下，这里完全没有沙土地和砾石地上特有的草丛。他说：“接下去的十英里路就是沙山。我先去开路。让其他车辆各保持五分钟的间距。要快开。要靠近我的车辙，可又不能沿着车辙开。不要停车去援救别的车辆。如有车辆陷住。我们明天将从夏拉介派骆驼来。”

说了这些话以后，他消失在一片越升越高的白茫茫的摇晃不定的沙丘之中。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前进。轮到我们开进时，前面除了四条依稀可见但在阵风中又很快平复的车轮轨迹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我们知道，如果车轮一旦把由最近的雨水造成的薄壳压穿，我们就只好坐等，在落日和风暴中在沙丘下受煎熬，直到从

远处的蒙古游牧部落那里召人来救援。我们有大型的铁制水罐和小听肉食，但是前景还是够怕人的了。有一次，在攀登一个沙土比较柔软的堤岸时，汽车陷住了。赶快用铲挖，拼命使劲推，总算把车子推回原来较为坚实的低处，然后才能重新发动。

接近翻过沙山时，我们赶上了前面的两辆车——警卫人员的道奇车和鲍罗廷的别克牌。它们停在沙土坚实的低处，前面就是我迄今从未见过的最陡峭高耸的沙山。圆圆的，白得耀眼，看上去几乎无法翻越。风从它的顶端刮起一股股沙暴，在蓝天中飞舞。

“这是最后也是最高点了”我们的向导说“只要翻过它，往后就没有困难了。”

为了加速，乘车者都徒步前行，车辆先尽量地往后退，再一辆接一辆地往上升。快到顶端时都慢得几乎要停下来，下坡时才又有了冲劲，人员就又跳上车。人们曾告诉我们，翻越沙山要花几天时间，要骆驼来支援，车轮下面还要垫毯子，现在多亏最近的一场雨，我们却翻过去了，只花了不到一小时。下午四点钟，第一批车辆到达夏拉介，即使那些重型车辆，经过一番周转，卸下了一些装载物，也于次晨二点到达。尽管是沙路，这天我们却走了近七十英里路。从现在起，我们到库伦就没有严重的困难了。

夏拉介是戈壁滩上一个著名的地方，原定由骆驼驮运的行李在这里和我们会合。既然是个会合点，我想象它应该是个象样的市镇，至少也是个大村庄。结果发现这是光秃秃的沙漠上的两口水井，两井之间距离一公里。第一口水井的附近有两顶帐篷，已由张先生占用。第二口井的附近只有孤单单一顶帐篷。剩下的人都住在一所驼厩的破墙边。我第一次见到了蒙古包。这是一顶圆形的帐篷，直径大约十三英尺，用驼毡制成，由格子状的木结构支撑着。帐篷中心圈起一堆石头，用来生火。满帐篷的烟把我们的肺同眼睛

呛够，熏够之后，才从顶部的小圆孔逸出。

我们挤在蒙古包里开了个晚间会议，讨论下一步旅程怎么办。一辆绿色道奇车已经损坏，要修好它缺少必需的部件。这辆车老是拖我们的后腿。也没有足够的汽油和煤油让所有的汽车都能开到乌兰巴托。因此决定，五辆车，即鲍罗廷的别克车，我们的道奇轿车，黑色道奇，刚从乌兰巴托来接我们的那辆卡车和张先生的卡车继续前进。其他两辆车（绿色道奇和大卡车）在夏拉介等后面的骆驼带来汽油再往乌兰巴托开，开多远算多远，再从乌兰巴托为他们送油去。从现在起，我们已经在指望乌兰巴托的汽车行了。

离开夏拉介是九月十三日中午。这又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因为又一次遇到了北方来人，一群在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学习了两年回来的中国学生。他们象我们一样，选择了这条中苏两国之间唯一安全的路线。他们乘骆驼而来，两个姑娘骑在驼峰上，走在前面，其他六名青年徒步跟在后面，黝黑而强壮。他们是三星期前我们在甘肃遇见的一大批人中最后的几个。两年前，国民政府择优录取，派他们到俄国去学习，准备回国做革命工作。这些搞糊涂了的学生现在却回到了正在杀戮革命者的地方来了。他们几星期来得不到任何消息。他们贪婪地聚集在鲍罗廷周围，询问中国的最新消息。

他没有使他们乐观。“现在发生了反革命，”他冷冷地说，“反革命以及枪杀劳工领袖和共产党员。北方和长江两岸都是如此。”

“在冯玉祥管辖区也这样吗？”他们焦虑地问道。

“好一些”鲍罗廷说“他不允许共产党存在，但他不杀他们。”

他们点点头，也是冷冷地，接受摆在他们面前的前途，走向南方，走向他们的未知命运。

离开夏拉介以后，我们的车速持续地增快，在我们眼前，一幅

又一幅丰姿多采的风景画不断掠过。道路仍然是骆驼道，没有任何人工修筑物，只有在山脊上偶有高高隆起的石堆指示方向。道路坚实，有时车速可达每小时四十英里。离开夏拉介后的第一个半天，我们走了七十英里，平了我们这次旅程中在中国境内时最佳的记录。水草树木的海市蜃楼幻影消失后，出现了层出不穷的红色石壁。然后景色又变成浅淡的灰红色，沙土地交叉其间。还从黑色的山岳下和宽阔的黑色砾石平原上经过。我们在沙漠中露天过夜。由于该地区没有水井，我们的大铁水罐用上了。又经过一天不断变幻的沙漠景象，我们抵达巴申图，这是一群帐篷的所在地，近处是许多蒙古古代圣祠和墓碑。离乌兰巴托只剩三天路程了。当晚，住在一位中国商人的大帐篷里。地面修整得很好。他告诉我们，他是从北京一家贸易公司来的，要在这里干六年，希望干完退休时能积聚一笔小小的财富。他从蒙古人手里收购羊皮和驼毛。

离巴申图后，九月十五日早晨，鲍罗廷用只有在戈壁滩才会有漂亮的姿势射猎野山羊。前一天的早晨，陈丕士在我们的道奇轿车上也这样干过。大平原上，有的地方十分平整，没有任何障碍物，汽车可以任意驶行，追逐野山羊。有一次在这样追逐中车速表显示的速度是每小时三十英里，但野山羊跑得比这还快，不久就逃掉了。

再也没有比在巴申图附近的大草山上的旅行更叫人欢欣鼓舞的了。整个戈壁之行，我们总是不断地向上爬，现在到达什么高度，我们连想都没有想到。我们最后到了高矗的圆圆的草山之顶，从这里往下，可以长距离地高速滑行，在起伏不大的绿色小丘之间跳跃飞腾。这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前面的路并不总是看得清，有时不得不在丘顶来个急转弯，以免坠下峭壁。我们的道奇轿车，载

着两位小陈，另外两位中国人和我，一路领先，直到第二天才见到其他车辆。在一个黑砾石平原上开了很长一段路之后，透过夜幕，我们看到了胡索素（音译）喇嘛庙繁星似的灯光。黑暗中摸索着走了一段不平坦的路，我们开到了喇嘛庙后面的一个中国商站，在那里他们殷勤地同意让我们过夜。

因此，我们有机会观察蒙古沙漠中中国商人的生活了。我们并排睡在店里的炕上。店主晚间搬到宽敞的厨房里，并为我们准备一顿好吃的大米饭，香喷喷的，内有羊肉和香菜。我们获悉，香菜是他们自己园子里种的，经过说不尽的艰苦劳动才在屋后这块广阔的未开垦的土地上建立起这个菜园，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刻苦耐劳的小小的典范。他们种植粗葛苣和南瓜，还有不同品种的索麻的豆类植物。店堂里，有漂亮的蒙古式丝帽，有黄色或深红色的，镶有沉甸甸的金线和用皮毛滚边。还有多种颜色的蒙古高筒靴，靴尖高高翘起，离地几英寸。有镜子、佛珠、各种各样的色纱、鞍袋、皮制烟袋和装在草鞘中的刀刃。绝大多数是廉价品。这正是中国人的打算，用这些东西从蒙古人那里换来成堆的羊皮和驼毛。

早晨，我散步去看喇嘛庙，发现中央部分是一座精致的庙宇，四周是奇形怪状的碑石和坟墓、粗陋的小木屋，几百名穿着单调的红色褂子的男孩聚集在一起看我，或者互相玩耍，和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互相推撞、欢笑。他们是送到庙里来学当喇嘛的。许多孩子衣衫褴褛、营养不良。这么多男孩，加上我们在其他戈壁滩上人烟稀少地区见到的那么多喇嘛，令人回忆记蒙古半数男子要当喇嘛的传闻。这些在寺庙内生活的一半人，正是落后的、劳苦的人民的寄生虫。经过庙宇时，我听到一阵金属乐器的回响声，这是在做早礼拜。庙外石级上，一名老年游方香客在念经。房屋之间，许多

凶猛的黑狗在吠叫，令人走路时提心吊胆。

这就是戈壁滩上我们所见到的人群——大喇嘛庙的和尚们无所事事，依靠信徒的施舍生活；分散的、色彩丰富的、辛勤劳动的牧人生活在帐篷中；中国商人干五六年活盼望发财，而超乎所有这一切之上的，是一股苏维埃影响的细流，表现在满怀希望的年青人身上，他们从莫斯科学习后回中国去……。

于是，我们开始走很长一段下坡路，开往乌兰巴托。离开喇嘛庙和中国商站后的那一整天，我们行驶很快，开过长着稀疏黄草的大砾石平原……又经过一座喇嘛庙，有一个小池塘，可取得饮水。就象一匹精疲力尽的马，越是快到家越跑得快，我们的汽车也一样，尽管超载、损坏，轮胎上到处是补钉，挡泥板断裂，却跑得更欢。无论是冲上丘顶还是溜向山谷，我们前后的车辆都可以望得见，那种在泥穴或沙丘上一停几小时，或因发生不测使车队一分离就是几天的情况不再发生了。草地越来越绿，地面越来越结实。整个黄昏，我们好象是从天而降，坠入蓝红相映的落日余辉之中，擦过草丛和石块，向暮色愈来愈浓的北面驶去。这就是我们快速下降的景象，看上去北边的星辰都在我们脚下，我们简直象腾云驾雾一样向这些星辰开去。最后，没有一丝月光的黑夜来临，我们怕迷路，既然已经快到旅行的终点，决定停下来，最后经历一次戈壁滩的酷寒。

天色一亮，我们就起身了。毛毯被霜冻硬，正在融化。我们知道，这是最后一次需要忍受的露营。整个上午，山上的羊群越来越多，还看到许多牛。偶尔可见一个野营帐篷，还有穿着鲜艳蓝、红色服装的蒙古骑手。高处出现松树，代替了常见的稀疏黄草。现时，我们正穿过一个小山口，下面就是城市，躺在一个巨大的圆形山谷中，在它的四周。有山溪环绕。在拥挤的、平庸的居民住房之

上高高矗立着壮丽的喇嘛庙，闪光的白色尖塔。我们驶近的平原点缀着成百的帐篷。它提醒我们，空旷的土地和游牧生活已经抛在后面了。但是，在我们头顶的空中，我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在帐篷之间，有一个无线电站和一个飞机场。这是从北方来的俄国文明渗透到此的第一个象征。我们知道，再向前四百英里就是西伯利亚洲际铁路。

我们开到海关，出示我们的护照。城市的前哨也就是蒙古的边防线。再向外，在大平原上就不再有人间政府的痕迹。然而我们已经回到了文明世界，充满政治上和有组织的社会中各种复杂性的文明世界。

九、革命党和活佛 为争夺蒙古而斗争

乌兰巴托市过去叫库伦，现在是革命政府重新命名的，意为“红色巨人”。它处在四面环山的盆地中，位置在一条山溪的两岸，风景优美。寺院的金顶在清湛的蓝天下与背后的山壁相切。即便靠近城市细看，其优美也丝毫不减色。尽管不整洁，野狗出没，到处是尘土和疾病，它仍然是迷人的。这是个两种文化、两种生活哲学交锋的地方。

在城市北面的山上，矗立着甘东（译音）的多层建筑。甘东是蒙古佛教经院中心。那里有一万名学生，要花半生时间攻读一种哲学和宗教。这种哲学和宗教教诲他们，尘世的一切是虚幻的。在城市南位于到处是灰尘的开阔平原上的是人民宫的绿色圆顶，象征牧民的圆形蒙古包。这是个巨型蒙古包，可容一千人，供革命党和政府召开大会之用，也给青年革命联盟当舞台演出剧目。这两股力量互相竞争，争夺蒙古人民的拥护。

我进城时所看到的那种对比，平原上散布着成百的

帐篷，其间矗立着飞机场和无线电站，实际上是这座城市不同生活面貌的写照。在既肮又乱的街道上奔驰着汽车和卡车，汽油箱上的标记说明来自苏联的石油辛迪加。汽车群中，又有蒙古牧人骑马而过。有的身穿全套桔红色袍子，胯下是紫色坐鞍，头上是白色帽子，腰佩黄绿色飘带。有的服装颜色则是鲜明的蓝、红或绿色。缓缓而行的是一长列牛车，由一名车夫带领，车之间由绳索联结。

人民宫所在的巨大的中心广场，两边面对面地展示出两种互相竞争的团社。一边是一长排转经筒，长约二百米。每个转经筒都置于一所风雨剥蚀的棚屋内。在一个不虔诚的美国人眼里，这种棚屋象个厕所。从棚屋里走进走出的是喇嘛们、和尚们。他们身穿深红的宽大外袍，因多年的风雨已经褪色，在破旧的小屋里转动那些转经筒，转了一个又转另一个。这就会象用深奥的古梵语和藏语背诵铭刻在那里的经文一样得福。这一排转经筒后面的小屋是定居的喇嘛和香客们住的。它们也是木头的。这一大片面积达数亩之多。在这些破烂不堪的小屋后面，矗立着萨尔素寺院的中央庙堂。线条优美的金顶闪闪发光，同周围的破旧形成鲜明对照。

越过这尘土飞扬的不整洁的巨大广场，另一个蒙古正在诞生。人民宫呈蒙古包形状，这表明新政府是由牧民来实行统治的。此时她正在为当天下午召开年度党代表大会作准备。新的蒙古国家银行在三年之中创建了稳定的国家通货，因此戈壁边远地区的牧民已经接受它发行的纸币，再不用原先那种使用时必须分成条块的银元宝了。它的屋顶上飘扬着一面红旗，与喇嘛的袈裟昂然对立。中心商店及在六年间逐渐完善起来的蒙古合作贸易公司的办事机构——具有一百多个分公司和五十多个分销亭每年交易额达一千万卢布——坐落于广场一角，设在一所完全欧式的灰色砖砌

房屋中，低矮而丑陋。星期六早市上正进行着城郊之间的贸易，使这里拥挤不堪。

然而，时不时有一位香客（或流浪汉）离开市场，蹒跚跚地走向转经筒，间或有梳着用胶粘起的大发髻戴着金银首饰的妇女离开合作贸易公司前的晨市贸易的人群，扑向地面，脸贴着通往寺庙的道路的尘土，以身量地，爬向庙中神坛，朝拜着，以求得安慰或者宽恕。一方面是银行、贸易公司、人民议会以及崭新的西方经济文化的其他一切代表，另一方面是红袍喇嘛、小修道院和转经筒，它们宣称进步与进化纯属虚幻，而人的尘世欲望是邪恶的。这两股力量正在争夺蒙古人的灵魂。

在市场和中国地界商店的后面，在斜坡之上的远处，耸立着第二个寺院——甘东，这是攻读佛教的最高学府。在那里，求知心切的蒙古青年要用二十二年时间来完成他们的哲学学习，然后可能学习密宗教义，而密宗又认为全部哲学都是徒托空言。在上述两所寺院中，尤其是在甘东，除了中央的菩萨像四周有放在大玻璃橱中的数千个神像外，还有人们天天在顶礼膜拜的现世活佛。散处在蒙古各地寺院中，约有六十名活佛。他们为了替人行善，抛弃天堂的极乐世界，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大地，因而驰名人间。仅仅三年前，他们在这个专制的神权国家中，不仅是世俗统治者，而且是精神统治者。他们的首领博格达汗是自神圣罗马帝国以来人世间最为至高无上的杰出统治者。他不仅是独裁者和宗教首脑，自身就是主宰臣民的神。而现在，这些占蒙古男性公民一半的活佛与其全体喇嘛，连参加投票的最起码政治权利都没有了。他们已被几乎全是由牧人组成的人民革命党剥夺了。前博格达汗的华丽冬宫现已成为国立博物馆，而夏宫则成为培训蒙古青年的政治学校。

蒙古面积有德国、法国和英国加在一起一样大，人口不到一百

万。无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因为是游牧人，隐瞒了户口、畜群的数字，不情愿受到查询。疾病的侵袭是如此之多，直到最近，科学家们才使他们免于在向文明进军之前就已灭绝。过去几年中，在革命政府领导下，开始培植起一种民族意识，促使他们向西方学习，以求生存。不仅西方物质文明和为世人唾弃的古老的佛教观点展开了竞争，西方医药也和藏医发生了冲突，西方的地理学和技术科学也开始打进学校之门。

那些认为俄国落后的人会惊奇地发现，在蒙古，俄国成了西方文化的体现者。地球是圆的，在显微镜下一滴水中含有密密麻麻的生物，这些是从俄国学来的。第一张世界地图，教室里的第一批简单的理化仪器，头一回学到的有关现代银行和工业的知识，是从俄国或通过俄国从德国来的。一个由许多专家组成的大型医疗先遣队，准备以一年时间向蒙古的三大疾病——兽疫、眼疾和霉毒开战，是由俄国的卫生人民委员会派来的。尽管这样，领导权仍然掌握在蒙古官员手中。培训蒙古青年成为专家的工作正在加速进行。他们不仅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伊尔库斯克，而且在法国和德国学习。

一天下午，我和一位俄国朋友一起到乌兰巴托部分地区去溜溜看看。城里约有八万居民，其中中国人约三万，俄国人四千，普通蒙古人三万，余下一万六千人是两所大寺院中的蒙古和尚。城里有一个俄国区，内有两家旅馆，既简陋又不卫生。中国区到处是廉价商品零售店。有许多条小溪穿过满是尘土的街道，所以在主要市场那里也有许多桥梁。

花一块中国银元，就得以参观甘东最神圣的庙堂，内中有一名穿红袍的低级喇嘛在看管。我们在暗淡的光线中，看到一尊巨大菩萨的形体，肯定有三十公尺高，安放在黄铜锻造、状如荷花的座

中，直径有十五公尺。菩萨有四条手臂，两眉之间镶有一块大如水桶的黄玉石。庙柱挂着五彩缤纷的许多丝织挂幡。金色、浅紫色、蓝灰色、猩红色以及绿色的都有。幡上面有许多淡金色的贴纸，写着神圣的祷文，这是虔诚的香客的贡奉。满插孔雀羽或绢制假花的奇异古瓶，以及珍奇的屏风，很明显地也是香客的施舍。数以千计的佛像画装在玻璃柜内遍布庙墙。人们告诉我，仅仅这个庙中就有六万以上这样的小神灵。

当我们走到庙外，向导指点给我看神山，这是一座很高的、圆形的山，耸立在城市上空。山顶长满黄落叶松和暗绿色的松树。他告诉我，这座山底部直径有二十公里，在蒙古，它被视为如此神圣，凡在看得见它的地方就不能杀生。即令在乌兰巴托被处死刑的罪犯也必须带到看不见神山的地方去行刑。山上的树林是各种野兽出没之处，不得猎取。

几天后，我到人民宫去参观人民革命党的议会，它在一切方面都和佛寺形成强烈对比。只有一点是例外，它同样喜爱鲜艳的颜色。在其他方面，这些牧民代表也许显得比较现代化，但他们的服装却仍然是色彩多样的蒙古服。在人民宫的走廊上，两位妇女代表在行走，一位是年青漂亮的姑娘，穿一件深玫瑰红色的袍子，佩带艳蓝色飘带，黑发上束着玫瑰色带子。另一位较年长的妇女，穿一件有黄色飘带的古铜色长袍。男人服装也同样色彩斑斓。一位梳短发髻（和老式的蒙古妇女梳的高发髻完全不同）、黄袍姑娘正和一名男子谈话。这位男子穿着一身鲜蓝的丝绒衣服，带绿色飘带。甚至可尊敬的教育部长巴托肯巴穿戴褐色服装和淡绿色飘带。而人民革命党的主席唐巴道奇微笑着走来，穿一身朴素浅灰色袍子，围着一条宽大的黄色腰带。

人民宫外边，一队蒙古士兵带着好多面鼓来欢迎代表们。绿色

大圆顶上，飘扬着标有蒙古国徽的大红旗。在大厅的代表人群中，竖着海报牌子，通告党代会后的几周里将放映些什么电影。都是美国电影，显得特别不调和。“炽热的心”讲的是好莱坞式爱情故事，和蒙古人的游牧生活是根本不相容的。即使是“沙漠骑手”，看起来似乎不合适，但海报上的画面却是一名美国牛仔从火车头奔驰的铁轨上，背下一个昏过去的姑娘。将要观看这部电影的蒙古青年中甚至很少有人见过火车头的，它对他们来说比之故事情节本身更有吸引力。

代表们并未把人民宫大圆厅坐满。他们身着紫色、玫瑰红、桔色、灰绿色、栗、淡紫色袍子，在大厅的昏暗光线中混成一种柔和的和谐调的色彩。三张大红桌分三面排列在台上，形成一面向观众的矩形的三个边。一位身穿栗色丝织长袍的代表提名斯大林为大会名誉主席。乐队奏起带蒙古味的国际歌，曲调比原作显得更有精神。在场的鲍罗廷和蒙古一布里亚特共和国的伊尔巴诺夫也被选为名誉主席。

共产国际代表首先致了贺辞，向牧民们讲解了国际形势、中国大革命发生的叛变和日本对满洲的阴谋。这是沉闷的演说。它只可能吸引那些头脑比较复杂的听众，而不是这些刚组成国家的牧民。他接着解释，为什么共产国际迄今认为在蒙古建立共产党是不够明智的，而这是许多干劲十足的蒙古人显然在盼望着的。他又解释，蒙古没有作为建党基础的无产阶级。共产国际，以劳动牧民为基础，可以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人民革命党，由它领导蒙古的劳动大众走向社会主义。看来，蒙古又将增加一个独一无二的特色；即它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国家，在这里共产国际不想建立共产党。

不管怎么说，即使没有党，共产国际依然有巨大影响。这里无

论是谁，一提到共产国际代表阿玛加叶夫，就认为他是蒙古革命最有权威的人。确实，正是他使我最全面地了解到蒙古国民革命的全貌，它的成长及面临的问题。他追溯到古代，从蒙古的伟大的往昔讲起，然后讲到在中国长期统治下所受压迫，再讲到二十年前开始的革命运动。

“在往昔，”阿玛加叶夫说，“蒙古形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八百年前，甚至入侵过欧洲。但最近几世纪，我们是在皇朝的统治下。满清蓄意要同代蒙古、和蒙古王公们结成姻亲。他们扶助佛教进入蒙古。他们建造这些大庙，将蒙古喇嘛的统治强加在人民头上。蒙古人民身负三重枷锁——满清的统治、蒙古王公的神权、中国商人的经济盘剥。普通牧人无任何权利可言。中国商人终于通过放债占有了蒙古全部财物及其牲畜的一半。

蒙古的习俗中，有两个条件促进了这种经济盘剥。首先是蒙古的王公们（在西方人的眼里，称之为酋长更恰当）享有无限的权力。按照部族的规矩，他们统治着所有人的土地。于是他们便以为，这种统治权意味着一切就是他们的私产，他们有权出售部族的土地去抵个人债务。每年他们都要去北京向皇帝进贡。在那里，狡黠的中国商人盛情款待请他们参加豪华的宴会，载回华丽的礼品。许多人回蒙古后就将部族的土地抵押给中国资本家，用以抵偿他们所购买的奢侈品。

第二项有利于中国商人盘剥我们的蒙古习俗，是老的部族规矩，群体中任何人欠债都由集体共同负责。任何一个蒙古人，受到中国商人的欺诈，他的债务就变成全体成员的负担。于是中国商人占了许多土地，再转售给中国移民。后者已占有了我们的原先领土的很大一部分。甚至在外蒙古，那里更适宜放牧牲畜而不适宜定居，中国商人通过放债已控制牲畜的一半。

“俄国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尤其是中国的一九一一年革命，独立自主的新思想传入蒙古。一九一三年，我们从软弱的中华民国手中争得了自治，这一自治受到中国、蒙古、俄国三方面的保证。这对普通牧人来说是毫无利益的。因为权力完全过渡到庙堂的王公手中，他们是宗教和国家的双重统治者。最高权力归博格达汗，他是约六十名活佛的首领。他反动透顶，对于按照西方那样建立现代学校的初步尝试也予以压制。这种探索在满清统治时期就开始了。他只需要庙宇学校。群众开始看清了，这些封建的僧侣王公根本无力为蒙古人民组织起经济生活。”

当世界大战和革命削弱了蒙古自治的保证人俄国后，一名中国冒险家，名叫“小徐”的将军，在安福系，可能还有日本的怂恿下侵入外蒙古，占领库伦，强迫政府的封建首脑签署宣言，废除蒙古自治。这在全国使博格达汗及其封建集团的威信扫地，因为他们全体人民面前暴露了自身面对中国侵略者时束手无策。

“中国的入侵者十分专横，”我的情况介绍人继续说，“他们的士兵每周要吃掉我们几千头牲畜。于是开始了真正的群众运动了，牧民的运动。它既反对中国入侵者，又反对蒙古的王公们。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小国应享有权利的观念也开始影响我们。很快，我们就建立起一支很大游击部队。我们决定求助于共产国际。后者一开始就帮助我们。宣布取消自治不到一年，我们就有了一支和中国作战的军队了。”

当时远处的俄国内战也影响到蒙古。俄国红军在远东击退谢米诺夫。这一胜利的后果之一是，打败了的君主主义者尤琴男爵进入库伦，自封为一个“为蒙古独立而战”的政党领袖。待到他打败徐将军，革命团体组织起来了，又反过来打败他，并清除掉形形色色的中国匪帮和俄国君主主义分子。

蒙古政府不是共产主义者，蒙古革命也和俄国根本不同。革命党深知佛教僧侣的势力，为了维护国内的统一战线，一开始就邀请博格达汗担任立宪君主。只是经过三年不断的密谋和反密谋的较量，其间博格达汗总是企图阻挠或破坏新政府的所有法令，新政府才撤消了他的办事机构。老博格达汗死了，新政府不想再任命另一名了。但蒙古政府不想废掉王公或没收其财产。新政府满足于征收分级所得税，认为这样做效益可能是相同的。过去，王公们是不交税的，相反他们视公共财物为私产，随心所欲地收税。现在，他们必须交税，还得为使用邮政和交通付钱。他们的权力正在迅速削弱，因为蒙古人财富就是他的全部牲畜，而它是随季节不同而变化的。

新政府通过了两项革命性法令，反映了全体人民的意愿。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王公们不得用作抵偿个人债务。取缔一切公私外债。作为一项国家策略，这是十分有利的。受牵涉的中国债权人只是北京少数大商店，在中国当今普遍的经济混乱中，他们的呼声无人注意。相反，负债累累、饥寒交迫的蒙古牧民拥有了自己的牲畜，不再欠中国商人的债了。不管牧民的宗教归属是什么，从经济上说，牧民们从这一时刻起就效忠于国民革命政府了。

蒙古革命党的又一项英明决策是不强迫单纯的牧民在他的宗教信仰和新政府之间作什么取舍。当取缔喇嘛对财产和教育的统治权时，他们并不攻击佛教信仰。事实上，绝大多数政府部长都是理论上的佛教徒。“为了振兴‘更纯洁的佛教’。我们不可能攻击佛教。我们的目标是削弱喇嘛的影响，办法是回溯佛教原旨。这些教导不承财产、寺庙以及喇嘛们搞起来的这一套象征仪式和权力的装饰物。我们剥夺喇嘛们的政治权利。他们不工作，就不给予选举权。我们还象对待其他公民那样向他们征税。”

“但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他补充道，“因为三百年来，尊敬喇嘛成了习俗，六年时间是改变不过来的。”

在经济事务中，蒙古新政府在它诞生后的最初几年来取得辉煌进展。它建立了一所国家银行，一所贸易合作社和许多工厂。遍布各地的兽医站开始进行牲畜保健工作，通过了新的婚姻法。开设了小学。这些成就将在后面的篇章进一步论述到。我在这里仅想提到的是，政府的政策首先是改善牛羊的育种繁殖。其次是建立以畜牧为基础的小工业诸如鞣革、毛织等。同时，通过实验田，调查弄清究竟有多少土地宜于定居进行农业生产。八百年前在成吉思汗率领下蒙古强大到了可以征服半个欧洲，但以后就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逐渐衰落。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复兴以及他们如何改造自己以适应现代世界。

在乌兰巴托的第一个周末，我们旅行队发生了不幸。由彼德罗夫和卡莱诺夫同志率领的骆驼行李队还远远地滞留在戈壁滩上。已从乌兰巴托派了几辆卡车去接应他们。他们掉在后边有一周的路程。正期待他们来到时，一辆小汽车昼夜不停地以最快速度开到这里，来报告发生了意外事件，同时接走一位医生。原来，派去的三辆汽车疾驰追猎黄羊。卡莱诺夫和其他一些人乘坐最后一辆汽车。在追踪一只黄羊时司机想要转弯，但方向盘失灵，翻了车，把卡莱诺夫压在底下拖了一段路，在医生赶到之前便死了。四个中国人受了伤，被送进乌兰巴托的医院。卡莱诺夫留下妻子儿女在法国。在这次旅途的所有同志中，他是最为强壮、快活和友好的一个。

乌兰巴托没有一家花店，只是在我们旅馆的小花园里有些盆栽花木，我们就从这儿弄来了一些花，做了一个花圈，为卡莱诺夫送葬。我们上午十一时离开旅馆，跟随着覆盖红布的灵棺。在我

们后面是一个蒙古乐队，由一个俄国人指挥，奏着革命葬礼进行曲。我想起六年前，在那受饥馑困扰的萨马拉城，为那些与瘟疫作斗争而牺牲的俄国同志举行葬礼时，第一次听到这支乐曲。在萨马拉和这儿，乐队同样地简陋，而且演奏拙劣。但奏起的乐曲是相同的。在莫斯科举行的盛大革命集会，都以它开始。是时，俄国的工农群众默然起立，追思那些在这广阔的大地上为革命献身的死者。在这些人中间，也有卡莱诺夫。

时不时地，风沙暴起，包围着我们，完全遮住了视界，看不见高山平地。我们这一小群人，连同我们的死者，顶风而行。然而，尘暴就会过去，我们又会看到蒙古的平原，高耸立、背衬蓝天的神山以及身后的乌兰巴托的塔群。偶尔有一位蒙古牧民被我们的送葬队吸引（因为蒙古没有这样的葬礼），来到近前，凝视一会儿，然后又驰过平原而去。

当我们走过坐落在乌兰巴托城外的苏联公使馆时，公使馆卫兵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很快就到达俄国人墓地。在遍布于地的坟地中，有一座倾圮的教堂，孑立在青空之下。塔卡诺夫同志代表苏俄、陈丕士代表中国人，致了悼词。俄国卫兵和远征队的同志们站立举手，以示致敬。然后，坟头上堆起土来，成了土墩，放上花圈。那花朵已经因太阳和尘土而枯萎了。葬礼真正是国际性的：一个法国的儿子将他的生命献给了中国，由俄国人和蒙古人将他葬在蒙古草原上。

十、光荣圣殿

蒙古有许多宗教圣地。甚至在我们所穿越的阿拉善和戈壁大沙漠中，市镇，村落甚至农舍都稀少，我们也见到过一些佛庙，挤满大人和孩子。乌兰巴托有两座大庙，一座供学习研究佛学用，一座供人进香和使用转经筒。但是，最为神圣的是光荣圣殿。这是一座深藏在与博格多乌拉山的斜坡相交的山谷中。博格多乌拉是座神山，俯视乌兰巴托。山上常举行一种叫禅舞的宗教活动，舞蹈者要穿全蒙古最古老的丝织服装。

这座寺庙保存着政治与宗教上最古老的传统。最近的佛教改革运动横扫布里亚特的寺庙，直到北部地区。但是，要对付那统治这座寺庙的老年活佛花岗岩般的保守思想时，就全然无效。在政治方面，传闻这里是反对革命政府分子的秘密集会地点，甚至说这里暗藏武器。不过，许多寺庙都有类似的传闻。

如果确实有人要将光荣圣殿用于此种世俗的阴谋，那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从乌兰巴托要翻山越岭步行或

骑马走约三十公里才能到此。道路是有好几条，但陌生人不大知道它们。按照蒙古习俗，这里禁止杀生，因而成为各种野兽的藏身之处。如果熟知道路，人们可以在夜间只用几个小时就秘密地迅速到达他们的掩护所。

金秋季节的某一天，有两个集会吸引了蒙古人民。一个是在乌兰巴托人民宫召开的人民革命党年会，一个是在光荣圣殿举行的叫作禅舞的宗教舞蹈活动。在党的会议上，人们不推崇圣教，而是推崇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他们推崇经济预算、学校、合作社和卫生运动。这些才是现代社会的神，它是经过俄国由欧洲传进来的。这是西方世界的成就，而西方所信仰的是进步、发明、繁荣，经济成就和技术进步带来的舒适。这和喇嘛们的宗教是对立的。后者瓮声瓮气地说，一切进步都是虚幻的，而进步、发明、经济繁荣等等不过是新的幻境，使人盲目地堕入轮回恶道之中。

就在人民宫门口，我遇见一位俄国同志。他是前来帮蒙古建立警察系统的，我们约定次日随他到光荣圣殿去观看禅舞。这件事本身就显示出蒙古的新旧生活是多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据说有两辆蒙古合作社的汽车要开了去。一辆载客十五人，另一辆十九人。蒙古司机特别好客，他把乘客往车上堆，踏脚板上、车门旁，甚至散热器上全站了人。内政部长的别克牌汽车也要去，并同意带着我们，但回程得由我们自己走。我们将在招待周到的蒙古包里过夜，那里会有几百顶这样的帐篷。有些帐篷的主人和我们中间的俄国人相识，可以要求提供住宿。在神山的尖坡间转来转去，穿过黄绿色的圆丘之间的一系列山谷，经过六十公里的行驶，到达了寺庙。斜坡上遍布晚秋开花的金黄色草地，偶尔瞥见左面山顶上有高高耸立的金黄色和绿色树林。这里没有修筑好的道路。我想，在全蒙古只有那条向北通向铁路的道路是真正的公路。但是，

许多汽车在硬结的地面上和低矮的草地上留下了车辙，只要沿这些车辙行驶，每小时可达四十到五十公里，只有在遇到水洼时才暂时减低速度。

一小时半后，经过一个岩石转弯处，突然看到寺庙就在面前。一座白色的层状体紧贴在峭壁的岩石上，峭壁直上博格多乌拉树木覆盖的山顶，约高二百米。屋顶上的蓝、金色彩同峭壁稍远处的孤立的白色神龛、小洞穴形成明快的对照。这些神龛和洞穴供单个祈祷者作修行之用，有从远处看不到的小道可通。

从这幅黄绿色的背景上，出现一名身穿猩红色服装的生气勃勃的骑手，向我们驰来。我们还以为是一位喇嘛前来阻止我们前进。但当他走近时，他叫喊说有一匹白马，我们是否见到。我们的回答令他失望。他走后，我们来到一群参加节日的香客中间，他们身穿淡紫、绿、桔和猩红等各色服装。妇女头戴宽阔的头饰，挂满巨大的、沉重的银器和假宝石。男子脚蹬五颜六色的靴子，靴尖翘起，离地有几英寸。

在他们后面的山谷中，是香客们的帐篷。镶着蓝色图案带顶盖的巨大白帐篷属于拥有五千头牲畜的富人。贫苦牧民一家人挤在一个邋遢的小帐篷里。此外，在圆形小丘山上还有安排得井井有条的精致的蓝色小帐篷。步行的香客们则向用马匹载着帐篷的香客那里租借住处。寺庙的台阶下系着几百匹马。从比较文明的乌兰巴托还来了三十多辆汽车的香客。政府中少数官员既忠于革命政府，又忠于佛教，动用最现代化的工具，前来古老的圣殿。

但是，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无法帮我们爬寺庙的陡峭台地。攀登了十五分钟后，我们混在拥挤于宽阔台地上的人群中爬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台地背倚着西藏式的一座白褐两色的建筑，有粗陋的白色阶梯和没有玻璃的窗子。阶梯顶部，在建筑物阴暗的深处

是一个有顶的阳台，那里坐着几十名喇嘛。男人和男孩穿袍。挤过人群，躲开一名从其脸部症状可以明显看出患开放性梅毒的妇女，我们看到，在寺庙脚下的台地上，禅舞正在进行中。

可怕的恶魔面具，色彩缤纷的丝织华丽服装，以及在一个有人小心守卫着的、用白粉笔画的圈子里，旋转不停令人头晕的高大形体——这些就是我对整个下午的禅舞的主要记忆。无休止而又毫无变化的动作，不断地重复着。形式古老的长号和鼓发出跳动的乐声使空气变得沉重。这种没有曲调而节奏单调的音乐，令人头昏。人群围着圈坐在地上，也有人站着和在石头或栅栏上蹲着。离中心最近的那些人，当情绪激动时，有时会双膝跪下，甚至扑向地面。而外圈的人群则又说又笑，卖弄他们的节日服装。

从列宁格勒来的一位俄国的印度语言文学教授在蒙古研究蒙古的佛教。他告诉我们说，禅是一种戏剧，反映不同精灵之间的斗争。有些可怕的面具，颈间还饰有死人骷髅，象征死神和他的随从。有时，舞蹈家挥舞起古老的匕首。有时，一位身穿黄袍的“善神”出来跳独舞。但是，连这位俄国教授也无法精确地告诉我们，这些究竟象征什么。他说，外界人很难搞清楚，即使人群中的普通蒙古人也不甚了了。不过，舞蹈中也有一些片断外行人也能看懂。开始，三名年迈喇嘛拄着拐杖绕着白粉画的圈子慢慢地转一圈，清出场地，然后便挡着挤过来的人群，以便舞蹈者活动。于是寺庙的首脑、身穿黄袍的活佛入场。他由喇嘛们用肩膀高高地抬进来，但他除了宣布开始之外，没有参与节日的其他活动。不久，他就在众人敬仰的目光下退场。对他的脸作短暂的一瞥，使人感到此人老于世故，与其说是个虔诚的神秘人物，不如说是个典型的善于利用传统习俗的组织者。

对一个外人来说，最吸引人的是位小活佛的入场，一名六岁

的孩子，也穿着圣洁的黄袍。按照蒙古信条，老活佛一死，他的灵魂就投入一位刚诞生的婴儿。人们到处寻找年龄和家系合适的男性婴儿，于是将他作为转世活佛接进寺庙。当小活佛经过人群时，人们虔诚地吻遍他的袍子和双手。我从没见过任何婴孩有如此悲惨的表情。不言不语，睁大两眼凝视着，神情有些恍惚，又好似有些意识到落到身上的可怕重担。从出生之日起，他就被剥夺了一切正常的游戏和伴侣，被迫记住他是神。

过了一会，我透过人群空隙开始细看那些跳舞的精灵们所穿的五彩缤纷的长袍，有白和蓝缎子长袍，绿色袍子，还有一些袍子由于旋转，令人眩晕，看不清什么是主要色彩。舞蹈者又长又尖的衣袖、从头部后面一拖到地的又长又扁的带子，也随着舞蹈而旋转，袍服上还绕着很大的象牙珠串，当舞蹈者旋转时，所有这种种色彩都在晃动着，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接着又转回来，但是舞蹈者始终在原地旋转。整个下午，尽管有过前面提到的事，却丝毫不影响舞蹈动作的极端单调。如果说以神灵中的善恶之争为内容的整个舞蹈是为了说明轮回之道是永恒不变的话，那的确是达到了目的。

人群本身比舞蹈者更为有趣。从难得见到一座蒙古包的荒芜的平原上来到底座寂静寺庙的有将近二千名蒙古人。都穿着节日盛装。有钱人穿缎子。穷人穿用厚棉布制成的桔色和猩红色衣服，虽因沾了尘土而又破又脏，但色彩仍然艳丽。有的男人头上戴有黑天鹅绒碟形饰物，碟状物的边缘镶着有松紧带的黄色丝条，还拖下一条猩红色飘带。一个婴儿穿着一件衬得暖和和的衣服，上有深浅不同的绿、粉红、黄、桔等各种色彩，还有三种色调的红与蓝。许多马匹的鞍子装饰华丽，用猩红或暗红色皮革制成，还有圆形的银质饰物，马身两边披着长长的绿色皮革制成的护块。

我特别记得一位衣着华丽的妇女。她身穿猩红色天鹅绒长袍，足蹬绿色和栗色皮革的长筒靴，巨大的发髻上也戴了大量的金首饰组成的。从颈项到胸部挂着四大串珍珠，每大串又是由三四十小串组成的，各长三十厘米。如果这些珍珠都是真货，她准是全蒙古最富裕的女子。从她那高傲的样子看，也许确是如此。天鹅绒和金色织锦的衣袖下垂有三十厘米，把她的手完全遮住了，下面的宽袖口则由蓝色织锦制成。猩红色长袍的外面，罩着一件丝织的无袖短上衣，蓝色，绣满了花。当虔诚的朝拜者扑向地面时，她根本不参与其事，而谨慎小心地走开。她的主要兴趣是展示她的精美服饰，并且不被弄脏。

在参加这一既是古代宗教习俗、又是盛大节日的人群内外，走动着一些比较微妙的人物。乌兰巴托政府各部门成员在欢迎他们的外国朋友时，带着一种眼神，意思是说，让他们来参观禅舞，与其说是看一次宗教活动，不如说是观光奇景。不过，他们在人群面前始终神态严肃。因为对群众来说，和国家工业部相比，禅舞更能激动人心。从政治上讲，政府部门的人是革命者，至少也是革命政府的雇员，但是他们仍然是正式的佛教徒，因此不敢有越轨行动，免得失去那些单纯而又落后的人民的信仰。

舞蹈结束时，天已全黑。舞蹈者退居到簇拥在寺庙白色阳台上身穿红袍的喇嘛那里去了。香客们下山回到各自的帐篷进晚餐。只有少数虔诚的朝拜者，其中多数是妇女，仍然在早先跳舞的空场上，仍然把面孔贴在地面上。乘汽车来的俄国人被邀请进大帐篷。他们可占用其一半。帐篷属于内政部一个官员。这位官员用另一半帐篷招待九名蒙古客人。帐篷的柱子是我们之间的分界线。靠近帐篷的入口处生了一堆火，烟都吹向我们的面孔。我们煮了茶，吃着面包、香肠和罐头食品，其中有从哈尔滨进口来的美

国沙丁鱼。

在这里，列宁格勒的那位教授又进一步讲述了很多关于佛教的情况，特别是蒙古人的信仰和习俗。他告诉我们，佛教有许多流派，但主要是两个。比较古老而正统的流派只宣讲涅槃的学说，主张人应清心寡欲无所追求才能拯救自己。按照这种早期观点，甚至行善也是邪恶的。后来善良的人们又创建另一种比较温和的流派，说那些在世上多行善，勤念经勤转经轮的人死后可以进天堂。后一种流派中也产生了当今的活佛。他被看作是可以自由进入涅槃之境的，仅仅是为了超度众生才一次又一次地重返人间。

他说，喇嘛们从理论上讲就是和尚。但实际上，已经约定俗成，他们可以有暂时性的妻室，在这方面有各种做法。下层喇嘛经常在庙外和妻子长住。这种结合并无合法手续。他们的孩子称爸爸为“喇嘛叔叔”。在此情况下，妇女是没有保障的。一旦喇嘛对妻室觉得厌倦，他可以宣布他不想用犯私通罪，从此就暂时或永久回到庙里。新的革命政府企图保护这类妇女，宣布这类情况下，男女双方的共有财产将全部留给女方和孩子，不得带进寺庙。

上层喇嘛，包括寺庙首领活佛，在宗教活动的某些特殊场合，有机会接触妇女，也可以搞到妇女，人们称之为妾。教授提到一位蒙古朋友对光荣圣殿的首领活佛的批评。“他是伟大而有教养的，”这位蒙古人说，“但为什么娶这样的女人，又抽鸦片，又放荡！”显然，并不是指责喇嘛搞妇女，而是指责他不该搞这样的女人。如果这女人信奉宗教，忠于寺庙，也就无人指责了。

列宁格勒的教授还告诉我们，蒙古北部的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是苏联的一部分，多年来一直在一名著名领袖的领导下搞一场“改革”。他到处宣传应该回到佛教的早期教义去，要信守独身和清贫的誓愿。喇嘛不得有私人财产。他说，过去佛门和尚没有任何

私人财产，寺庙虽有财产，但归庙中人共享。但后来，喇嘛们从信徒施舍中积聚了大量财富。这位改革者的主张在布里亚特共和国已在半数寺庙中导致分裂，但尚未影响到外蒙古。

蒙古山区的寒夜来临。在帐篷的这一半边，俄国人挤在一起，合盖两三条毛毯。另一半边，蒙古主人和他的客人，包括两名喇嘛一名妇女，并排睡着。那个妇女穿一件粉红色长袍，肩头翘起，袖子很长，拖到手的下面，她的发髻向左右各伸出二十厘米，挂满银子，珊瑚和绿松石饰物，头顶上还戴一顶银色小帽。她居然戴着所有这些东西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一丝不乱，真有她的！

起床后，帐篷外边严霜满地。我们到清澈的溪水边去洗涤，回来后脸和手都冻得发僵。现在，我们的蒙古主人向我们示范，如何在地面上设炉灶。他并排掘三个洞，约三分之一米深，底部由烟道联通。中央那个洞上，他放一只铜壶供烧煮。柴禾从另一个洞口塞进去，点上火，置于铜壶下面。另一边的小洞充当烟囱。这种炉灶火很旺，很有效。

“这是夏娃为亚当烧煮的炉灶，”一位俄国人说。

“不对，”另一位俄国人说，“夏娃没有铜壶。从夏娃到简单的炉灶，其间要经历一万年的人类进步。”

早餐又是吃面包、香肠和罐头食品。吃完后，我们向主人告别，开始了从神山到乌兰巴托的长途跋涉。上山经过喇嘛庙时，看到几个小男孩，他们是未来的喇嘛，正在上面的阳台上晾晒昨天跳舞时用的服装。穿红袍的一个小男孩，带着几瓶水，从一所房子走到另一所房子，一路上停下来，用某种仪式动作，从每个瓶中洒几滴水到地上。

“他是给神仙喝水，”列宁格勒的教授说。

禅舞已经结束，但一些比较虔诚的香客等待着庙里举行早拜。

我们大胆在庙门未开之前就挤了进去。外走廊里有许多古代绘画，尤其是一幅大画都是显示轮回之道的。统治现世的神在画的顶部，是个恶魔，相貌可憎。他张开血盆大口不断倾吐出一股水，构成环绕世界的大洋。大洋圈内，是人世间的各种生活景象，如打猎、造屋、争战、吃喝等。圈内底部是那些作了孽的鬼魂在地狱中备受煎熬。再往里，画在圈内顶部的是天堂的景象。

“这是一座古庙，信奉最正统的佛教，”我们的教授说。“甚至天堂里的欢乐也被看作是邪恶，因为它是轮回的一部分，而且是欲念的产物。”他还告诉我们，走廊里转经筒上的铭文是梵语，而不是藏语，正是这座寺庙古老与保守的又一明证。门上面是用四种文字——满、汉、蒙、藏书写的名称。最接近原意的译文便是：“光荣圣殿”。

中央大厅很阴暗，天花板上绘有彩色方块，带垫子的长条座位不是横放，而是从门口直着排到圣坛。圣坛不过是张普通桌子，涂着金绿两色。桌上放着红色和金黄色大箱子，里面可能放着经文。大厅的柱子上用彩绸裹着，已经大大褪色。人们告诉我们，早拜不过是用藏语朗诵经书，除了在寺庙里学习过的人外，香客中是没有能听懂的。尽管如此，他们双手合十，自始至终恭敬地听着。

这就是纯朴的蒙古牧民梦寐以求地把自己孩子从小就送去学当喇嘛的“光荣圣殿”。他们的一生就是坐在高处的洞穴中往下凝视着山谷，精神恍惚地修炼，企求忘却平原上垂死挣扎着的蒙古民族的人生。而这一民族在文明的进军中有灭绝之危。喇嘛们和活佛们对此是无动于衷的。管他们什么事！既然他们认为一切生存的欲望，不论是个人的还是种族的，都是邪恶。

但是在神山后面的乌兰巴托，在绿色圆顶的人民宫内，牧民代表们并不想忘却平原上的生活，而是要改造它。他们要从威胁着

蒙古的西方文化中吸取什么，设法拯救自己的种族免于灭绝。他们不再相信喇嘛们教导的轮回之道。转而寄希望于进步和繁荣。这中间，两种信仰发生冲突。尽管政治家们对两方面都效忠，但最终只有一种信仰可以存在。不是这一种，就是那一种必将赢得蒙古人的心。在一个国家里，不能同时有两种信仰。

当我们步行翻过神山时，明显地可以看出，即使是最虔诚的香客也决不相信人世的生活是邪恶的。衬着秋季的蔚蓝天空，是绿色和金黄色的松树。下面是羊肠小道铺满柔软的松针，旁边有条条小溪奔流。山顶附近，一块空地上，我们遇见一群欢乐的喇嘛在烧茶。他们请我们吃红色和蓝色的浆果，味道是酸的，吃得手指都染上色了。他们脱掉靴子，让双脚在柔软、潮湿的草地上凉快一下。他们象乔叟故事中修士一样快活，胖胖的乐呵呵的，有吃有喝。

我们遇到两个比较简朴的香客，是乌兰巴托的非熟练工人。他们是作为节日郊游去观看禅舞的，现在愉快地往回走。中午时分，我们请他们吃面包和香肠。作为回报，他们找到最好的泉水，为我们的杯子装满越桔。在石壁脚下，我们在阳光下睡觉。有一次，我们沿着岔路去寻找一处地下瀑布，石块滑动，跌了下去，险些出事。在这里还遇见从乌兰巴托寺的一群少先队员。他们出来远足，这时正在溪中洗澡。后晌，我们走出了树林，来到山谷下面柔软的黄色草地上。从这里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市，有甘东寺高高耸立的尖塔和萨索寺的金顶。

环绕城市的山溪流得很急，在有个地点分成五条支流，都浅得很，可以涉水而过。下水后，发现水很冷，流得很急。有一条河深达臀部，水花溅到腰际。其他几条河水深都在膝盖以下。河那边，一群穿红袍的喇嘛涉水过河。搞得精疲力尽，好奇地回过头来注

视着我们。到乌兰巴托只剩下三公里，我们混身哆嗦，走过海关、银行和俄国居住区的旅馆后，就看到落日余辉中闪闪发光的人民宫的绿色圆顶。即将闭幕的人民革命党会议将通过决议，建立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兽医站，为政府的新兴工业投入更多资金。一群牧民代表正在建设一个国家。我们往回看神山上树木葱葱的斜坡，在夕阳中已经显得暗淡而虚幻。我们涉水走过的五条河就象是冰冷的分界线，一边是今日的世界，另一边则是中世纪。

十一、新蒙古的建设者

我们在乌兰巴托耽搁了近两周，等候行李到来，同时再次维修汽车。鲍罗廷住在蒙古国家银行行长道奇曼同志的公寓里。经常有人来访问他，提供信息或打听信息，都是有关周围国家的问题。乌兰巴托是多条公路的天然枢纽，可通向北方、南方和东方。其他成员或者忙于访客，或者根据各自的不同口味采购物品。他们发现这里同样是交流货物的枢纽。各种羊毛制品，毛绒衫或针织服装，还有其他许多现代工业产品，都直接从哈尔滨免税进口，因而比在中国购买便宜，比到北方苏联境内购买就更便宜了。我们很快获悉，蒙古合作社所属各商店以服装经久耐用而出名，而且价格合理。

两周内，我拜访了许多政界和经济界的领导人。唐巴道奇是人民革命党主席，是位办事不慌不忙、十分干练的行政长官。他在党的会议召开的当天早晨就接见了我。雅吐巴是政府经济部的首脑，虽无特点，但精于贸易。那舍拉是个活泼的人，身穿线条分明的蓝色长袍，带

着桔色飘带，是蒙古合作社负责人。巴吐汗，教育部长，既快活又有点哲学家派头。他正努力把西方科学输进蒙古，以代替喇嘛学校的宗教哲学。除了这些新蒙古的建设者外，还有俄国人在从事重要的工作。道奇曼是国家银行行长。奥涅钦柯是“斯多蒙”的负责人，这是个联合协调在乌兰巴托的各种俄国贸易组织的机构。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新国家的全貌。这个国家在革命政府创建的最初几年就取得令人震惊的进步。

要到唐巴道奇主席家去，必须首先经过一长列转经筒，虔诚、耐心的喇嘛们不断地在转动它们，祈求来生的幸福。然后要走过绿色圆顶的人民宫。当天下午党的会议就要在此召开。还要穿过许多尘土飞扬的胡同，我终于到达他的住处。按照乌兰巴托的常规，是走后院进去的。后院外边连着许多小屋。住处比通常的房屋要干净和雅致，色彩与装修是中国式的。房屋居然有四间之多，这在乌兰巴托算是颇为体面的住家了。我坐在小巧雅洁的餐室里候见，地上铺有绿白色相间的漆布。洗刷得干干净净的木桶里栽着许多花草，使房间为之生色。门旁边挂着一件欧式的镶毛边的外套，但为我进茶的却是个中国女子，缠脚，身穿紫色长袍。

我怀着好奇心等着，想看看唐巴道奇本人的形象能否使东西方两股对立力量在这里的冲突有所调和。他穿的是蒙古式的衣服，灰颜色，带鲜绿飘带，但是他那坦率的微笑，直截了当的友好态度，与其说是中国式的，不如说是欧洲式的。应该说，超过了欧洲式，是美国西部和俄国乡村式的，是旷野平原上的那种坦率、亲切、友好的态度。我在蒙古经常遇到这种态度。它和世故的中国人不同，犹如大草原上的美国人或西伯利亚人同巴黎人或维也纳人之间的不同。

唐巴道奇想首先谈谈工人问题，当然目前他们人数不多。他

本人不仅是革命党主席，还是工会主席。一年半前，他开始组织工会，目前已有五千名会员，其中一千五百名是中国人，一千五百名是办公室职工和佣工，六百名妇女是裁缝工会的。这些数字有力地说明，蒙古差不多完全没有工业。如果从总数中扣除二百名卫生工作人员和四百名汽车司机，那么在普通工业单位中工作的就不足一千人了。这些人是建筑工人和公营新工厂里的，目前人数不多，但为新体制下的每个蒙古人所羡慕。建立这些适合一个畜牧业国家的首批小工厂，是为了使群众免受中国或其他外来商人的长期盘剥。

从一开始，工资标准就明显地高于边界外的中国工厂，几乎接近俄国标准。唐巴道奇说，工厂工人每月拿十二元到一百元。由工厂支付的社会保险基金相当于工资的百分之十二。八小时工作制，周末或节假日工作六小时。工作满一年的人，每年享受一个月假期，工资照发。工作满半年的，假期半个月。工厂还支付一笔职工文教经费基金相当于工资额百分之二，由当地商业委员会掌管。所有公营工厂都订立共同协议。这些新观念都是与新工业的建立同时直接从苏联引进来的。

由于蒙古只有为数不多的工人，我们之间的谈话很快就过渡到占人口大多数的牧民问题上去了。唐巴道奇认为牧民可能有一百万，虽然有一种估计是六十万以上。但唐巴道奇认为这些估计太低。他解释说：“人口普查时，他们瞒报，怕征税和征兵。几世纪来，人们已经习惯于瞒报人口。”

唐巴道奇告诉我，他正打算把“雇工牧民”组织起来，因为他们是这里最贫穷的阶层。“但是这很难”，他笑着说，“蒙古包以四五项为一群，群与群之间相隔有五十公里，怎么叫他们去开会呢？”

我问唐巴道奇，牧民的工资是多少。他笑了。“实际上没有工

资”，他说：“我们还生活在前工业化的体制之中。按金钱计算，他们一年挣不了十卢布。但是他们全家和主人家住在一起为主人干活。妻子为主人烧煮，孩子从六岁起就为主人看羊。主人管他们吃穿。”

“他们和主人家吃一样的吗？”我问。他又笑了。“全体蒙古人吃的都一样。”他说：“夏吃肉，冬喝奶，这就是我们的饮食。这方面，主仆之间没有区别，但是……”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在权力和自由方面确有很大区别。”他的话使我隐约瞥见了一种原始的家长制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奴隶制和家族关系还结合在一起。现代用语如“工资”等根本没有意义。这样的人民怎能组织起工会来呢？他们将要求什么呢？

“和组织工会一样，我们组建政府也有同样的困难”，唐巴道奇继续说，“人民如此分散，怎么投票选举呢？”他解释说，蒙古有五个省，九十四个乡，七百个集市。集市包括三百座蒙古包，圆顶帐篷就是蒙古人的家。按照蒙古革命议会的规定，最基层的选举单位是十家人家，再向上是五十家人家。五十家就具有地方政府的权力，并可选举代表参加集市议会。这是理论，但实际上，蒙古人不愿意为了去参加议会而费时花钱，因此上次选举，只有三万人参加。唐巴道奇就是这样说的，他不象其他政治家那样喜欢报喜不报忧。

唐巴道奇告诉我，革命党有党员一万三千八百九十六名，绝大多数是贫苦和中等牧民。有一千人出身于王公与头人家庭。约一千名是妇女。他说：“所谓贫苦家庭是指财产不足五十波多的人家。”

“什么叫波多？”我问道。

“波多是我们的财产单位。一波多是一匹马或一头牛或七只

羊或半头骆驼。按钱计算，平均值十八元。”

“难道说在蒙古一个人拥有五十匹马或牛，还算穷吗？”我问道。我以为是流浪与饥饿的蒙古人，衡量财富的标准竟是这样的，使我颇为吃惊。

“当然他算穷的，”唐巴道奇说，“除此之外他就一无所有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其他农产品。一年中牲畜所繁殖的，不足以养活全家。如果在繁殖之前就把牲畜吃了，他们就一无所有了……”唐巴道奇所作的解释令人吃惊，说明事物的价值决定于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是如何被使用的。正如对一个荒岛上的饥饿待毙的人来说，成堆的黄金一点用处也没有。五十匹马或牛，对任何一个俄国农民都是一笔巨大财富，因为它们一旦和犁、种子及农业知识相结合，就会发挥巨大作用。但是对牧民来说，牲畜是直接吃掉了，也就不值什么了。唐巴道奇告诉我，蒙古的中产阶级有五十到三百个波多，王公则有几千个波多。“不管怎么说，”他说，“我们完全是靠天吃饭。一二年功夫，天气或“曲马”（译音）病就可以叫富人变穷。我认识的一位王公，二年前拥有五千波多，但由于天气不好，牲畜挨饿，现在他只剩下一千了。

“这位王公感到非常沮丧。过去，他可以无偿使用群众的劳动力，任意征税来扩充自己的牲畜群。现在，他要向政府交税，为雇工支付工资。过去，他免费使用政府的运输系统。现在他要象普通人一样付费。过去，人们象对待神一样地向他祈祷，现在谁都不理会他了。”

这促使我们讨论起活佛和喇嘛的问题来了。唐巴道奇对我说，革命党无意反对宗教。“我们根本不可能这样做，”他坦然承认“蒙古人半数是喇嘛。其中一半住在庙里，一半到处化缘。从政治和经济的观点来看，有三种喇嘛。少数是上层的、富裕且有知识的

喇嘛，收受信徒的贡品数不清，生活奢侈。较多的是中层的，虽不富但靠寺庙维持某种生活。最后是贫苦喇嘛，既要乞食，也得象其他人一样干活。他们生活随俗，并不太遵守教规。

“我们针对宗教提出的口号是‘为了佛教的更加纯洁化！’。佛陀是不承认财产的，更不允许和尚靠施舍致富。他也不主张搞宗教仪式、寺庙或舞蹈。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公开宣扬这些事实，达到削弱喇嘛的影响的目的。同时，取消寺庙的一切特权。依靠这一进攻性的措施，使喇嘛的阻力发生分化。因为贫苦喇嘛本来就从寺庙那里得不到好处，和富有的、上层喇嘛相比，他们乐于把自己看成是更好的佛教徒。我们同样向寺庙征税。当然，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削弱整个喇嘛教的影响。但这一任务很艰巨。三四个世纪来，人们总是被教诲要尊敬喇嘛。在六年之内，转变不了他们。

“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让青年入学。全国从八岁到十六岁的学龄儿童有十三万五千二百四十五人。现在只有三千人进了公立学校。其余的一半在家，一半在寺庙里学习藏语经典。但是，通过青年组织的努力，年青人已开始变化。过去，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进寺庙去。现在许多人愿意进公立学校，学习现代知识。许多人已经离开寺庙，参加学习，甚至参加革命军。”

唐巴道奇还告诉我，革命政府颁布的新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必须自愿结合，婚姻才算合法。过去，婚姻由父母包办，年轻人无权自己选择。革命政府现在还不敢批准父母所反对的婚姻，但坚持要求青年人自愿结合。因不育、疾病、肆意浪费共同财产或“其他严重问题”，允许离婚。那些名义上应该独身的喇嘛，娶“临时”妻子，十分普遍，已不足为怪，但法律不予承认，因为他们没有登记过。但是法律认定抚养孩子是一种义务。要是那个喇嘛撒手跑回寺庙，“去从事更重要的工作”，家里的牛羊就留给妻子，以便抚养

孩子。

我突然想起这天下午将要召开党的年会，而唐巴道奇是主席，因此心中不安。我问他：“你很忙，和我谈得太久了罢？”“不，”他愉快地答道，“昨天我很忙。但昨晚在会议上我们把剩下的工作都交给别人了。所以今天下午我没有什么事。”肯定的，这位蒙古的新领导人很会授权办事。

为了了解蒙古的经济发展，我和国立工业部负责人雅吐巴，合作社负责人那舍拉，国家银行行长道奇曼，和俄国贸易机构“斯多蒙”负责人奥涅钦柯都谈了话。道奇曼同志告诉我说，世界大战之前，蒙古的银行业主要操纵在中国银行家手中。他们的业务主要是蒙古和中国之间的汇兑，收取佣金高达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一一年，沙皇俄国的银行取得特权，开设“蒙古国家银行”，而实际上它将是沙皇政府的财产。这家银行于一九一五年开办，不久就因发生革命而关闭。

一九二四年，蒙古宣布成立共和国时，不存在银行。革命新政府在苏联帮助下建立了一家银行，双方各投资一半，开始时为二十五万卢布，现为一百五十万卢布。银行的任务，首先是改革货币，其次是为各类国家工厂发放贷款。董事会由俄国人和蒙古人各三名组成，一名俄国人任董事长，但是代表会议和审计部门的成员主要是蒙古人。

直到最近，蒙古的贸易是通过物物交换进行的，价格单位是一头羊。革命时期，曾经使用过中国货币，三分之二的贸易通过它来进行，余下的仍然是物物交换。银子也不都是银币，而是很大的元宝，用多少剪多少。问题在于，必须用稳定的国家通货来改变如此混乱的局面。

蒙古国家银行和它在各地的七家分行在三年时间里发行了国

家货币，叫“图格里克”。一个图格里克价值相当于一卢布或中国的一元，尺寸则比二者稍小一些。它的储备金，部分是黄金，主要是银子和其他物资。目前进入流通的已超过八百万。连纸“图格里克”也已为各地乐于使用了。在遥远的沙漠地区，蒙古人也开始认识到，用纸币来进行贸易比用羊来计价要方便得多。银行的第一项任务，建立国家统一的通货，实际上已告完成。

于是，还剩下第二项任务，解决国家贸易和工业的资金问题。六百万图格里克已经贷出，主要给进出口贸易，也贷给政府的新建工厂。政府的实验田，其任务是向从来没有搞过农业的人民传授农业技术，得到三十万图格里克贷款，期限是九个月到四年，利率为百分之六。银行还资助正在修建房屋和工厂的国营公司。离乌兰巴托三十五公里的煤矿，还有毛织厂、砖厂、皮革厂也都得到帮助。它还从利息中提取三万五千图格里克来发展蒙古的文化事业，如助建人民宫、学校，组织赛马场。举行马赛的目的是发展育种工作，培育更好的马种。这就是蒙古国家银行三年来的工作情况。

奥涅钦柯向我介绍了蒙古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他说，进出口的年营业额是四千二百万图格里克，名叫“斯多蒙”的俄国联合企业占有一千五百万，蒙古合作社将近一千万，余下的是中国的私商。最近四年，由于中国发生战争，加上“斯多蒙”和蒙古合作社的竞争，中国人的营业额减去一半。现在，“斯多蒙”和蒙古合作社正在合作建立蒙古的国营贸易体系。

苏联对蒙古贸易始于一九二三年，最先进来的是“桑脱苏耶”公司，接着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高斯托”公司，后来是“休斯”公司。去年，它们全都在“斯多蒙”的名义下联合起来。它们在蒙古主要购买羊毛和牲口。羊毛属粗羊毛，供制作制服和毛毡。这里不产优质细羊毛是因为羊群终年生活在室外严寒中之故。驼毛也

出口到俄国去，用来制作卫生衫和围巾。蒙古牛羊群为伊尔库茨克和连那金矿提供肉食，价格比西伯利亚要便宜。也出口皮毛，但这是为了转口到纽约、伦敦和莱比锡。最大宗的皮毛是“塔巴干”，是一种生活在地洞里的动物，会传播可怕的“曲马”病。因此，二十年前，一张“塔巴干”皮只值一匣火柴的钱。自从发现它可以用来制作各种假皮毛后，现在以每张皮三卢布的价格，每年出口一百万张。

蒙古的进口物资是面粉、机制物品、金属、搪瓷制品、糖和来自中国的绿茶砖。根据奥涅钦柯的计算，营业额已接近战前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最高水平。现在已建起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点，目的是使新建的商业组织直接向群众供应货物，避免中国商人的中间剥削。“斯多蒙”拥有一百个固定的商店和五十个流动帐篷。蒙古合作社也拥有这么多。

我访问蒙古合作社主任那舍拉时，他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和高尔夫球袜。但是办公室里他的下级一色穿各种色彩的蒙古长袍。一位身穿鲜蓝锦缎服带着桔色飘带的人凑在他的办公桌上正向他请示问题。他告诉我，蒙古的合作社是与众不同的。他们花了三年时间研究了各种合作社形式，然后才建立自己的这一种。合作社社员共有一万零二百人，每百人选出一名代表参加乌兰巴托的年会，选举管理委员会。总社委派分社负责人。利润的百分之十用于建立学校，其余的归社员分配。雇用了几名俄国人和布里亚特人担任会计，但大多数雇员都是蒙古人。他告诉我说，蒙古合作社很受欢迎，因为和中国商人相比，它价廉物美。蒙古政府对合作社给予资助，银行贷款是低息的。

国家经济部负责人雅吐巴为我开列了一张该部属下的工厂名单。他说，已向蒙古国营工厂投资二百万图格里克。革命前，根本

不会有这等事。五十万用于组建两家皮革厂，其中一家是在一个小小的私营厂基础上扩建，另一家是全新的。蒙古的运输业获得三十万图格里克投资，拥有六十辆汽车和大群马匹和骆驼。雅吐巴属下的国营农场取得四十万图格里克。其他国营工厂如砖厂、锯木厂、酒精厂、毛织厂、铁匠工场、羊舱清洗所等还很小。这都是革命后就开始建设的，有的已投产，有的刚刚完成厂房基建。乌兰巴托的发电厂在革命前就已存在，现已大大扩建，为全城提供照明和动力。

“我们的主要产品是牲畜，而且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将如此，”雅吐巴说，“有些人已开始对耕作感兴趣，但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土地适宜于耕作。我们还有铁、金及其他矿藏有待开掘。但我们的下一代仍将主要依靠牲畜。我们的统计资料表明，蒙古共有七百二十万头牲畜。但由于人民不喜欢实报财产，因此实际数字还要大些。在这个数字中，羊占半数，马一百四十万匹，牛一百五十万头，骆驼五十万。牲畜的拥有量是很不均衡的。有的有一万；有的一无所有。我们的革命不主张没收财产，但想通过征税使财产均衡。我们还希望所有的工厂都掌握在政府手中。”

雅吐巴还告诉我，他的部为保护牲畜免受可怕的“曲马”病侵袭开展防疫工作，十个防治站已为七万头牲口接种了疫苗。这一工作刚开始，问题是严重的。“尽管如此”，他说，“革命后，我们牲畜每年都在增加。外国干涉期间，一百万头牲畜为部队掠去，因环境恶化而死的更多。但现在，蒙古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比战前好，比革命前夜更要好得多。”

从经济上以西方观点看，新政府完全名副其实。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喇嘛教的影响至今仍牢牢地控制着蒙古人的心灵，从喇嘛的立场看，这些不值一提，简直比不值一提还要糟。它们

是邪恶，是从魔鬼那里来的轮回之道的新的派生物而已。今日的蒙古，不仅必须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更重要的是必须在教育战线上取得胜利。为了了解教育方面的情况，我前去拜访教育部长巴吐汗。

巴吐汗身穿端庄的褐色长袍，系绿色飘带，同前四位搞经济贸易的活跃人物完全不同。也不同于那位和蔼的唐巴道奇和热心的阿美加耶夫。他具有宽厚的哲学家的风度，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任大学校长比美。他讲话时的那种温文尔雅的幽默简直叫人不相信他是一名战士。他告诉我，他本人的教育程度很低。“我只学过蒙文，懂一点俄文和德文。你知道，我们的学习用语是藏语。对蒙古人心目中的高深学问，我是一窍不通。”

他微笑着继续说：“你不要以为蒙古人是文盲。男性中有三分之一能读会写。不过，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读藏语，研究宗教哲学。对此，他们学得勤苦，功底很深。外蒙古有十所佛教经院，还有无数寺庙。四分之一的男孩在里面学习。三个世纪来，我们的人民习惯于进这种学校，男孩子都热望能进去。

“当然，我们政府的目标是建立欧洲式的现代学校，学习西方知识。但如果你对喇嘛说，男孩子们应该用蒙语来读写，他定会抗议。他们中少数高明的老师认识到这一需要，但是绝大多数死抓住藏语不放，因为这是他们的威望的唯一源泉。确实，寺庙中并非没有某种文化。大卷大卷的印度和中国文学著作就是在寺庙里翻译出来的。我们蒙古人虽然是游牧人，但颇能接受思想深刻的古人著作。”

“不过”他若有所思地说“这些知识在人世间一点用处也没有……”“与人无益，”他又说了一次。他知道，这种学说从来就不打算用于人世，因为它的鼓吹者们根本就藐视人世“和你们的中世纪

的经院哲学家有点象。”他笑着补充道。

“清末已开始办起几所半欧洲半中国式学校。但从一九一一年蒙古自治的最初几年，博格达汗是最高领袖，他取缔了这些学校，他只希望有寺庙学校。他周围的几百名王公，受过很好的亚洲教育，懂得孔子、佛家哲学和中蒙历史，但是对于欧洲知识的好处一无所知。少数王公到过彼得堡，见过西方学校，回来后想开办一个健身房，但是直到发生革命后博格达汗也还是不同意。

“我们新政府对采用欧洲教育方法很关注，但经费不足。最缺的是师资。既懂蒙语又懂西方教育方法的人很少。我们至今不能开办大学，因为没有教授。头上的两年，我们用于准备教材和教师。现在，我们已开办一百五十所小学，蒙古年轻人在学校里学习用蒙语读写。同时也学习地理课——你们欧洲人的地理学，由此他们就能象欧洲人那样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难道还有别种地理学吗？”我问道。

巴吐汉笑着答道“在甘东寺有。”他点点头，指向山上的大寺庙经院。“他们教的地理完全是另一种。”“我记得”他大笑道“我到莱比锡去订购首批球形世界地图并把它们译成蒙文时，遇见土耳其和巴勒斯坦的代表也在干同样的事。于是我想：我们蒙古毕竟并非最落后的国家。”

“但是，喇嘛们信不信地球是圆的？”我惊奇地问道。巴吐汗又一次大笑。

“有的教学生说地球是圆的，有的说是平的”“他答道，但他们都说，地球是什么形状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是虚幻的。他们教天文学，当然也讲地球和其他行星的关系。这也是虚幻的，也许更深一些。他们对月亮的盈亏更有兴趣，可以十分精确地测出月蚀。但是他们对蒙古和中国及俄国之间的关系却认为是小事一桩。”

“他们对待欧洲科学同样是态度冷淡。他们宣称爱因斯坦的理论古人早就预见到了。说什么：‘我们早就知道’人类的知识是相对的。如果欧洲和美国人说地球是圆的，那很好，很对。但如果别的人说地是平的，那也相对地是对的……”，他笑着对我说，“对这样的争论你有什么办法！”

他愉快地告诉我，即使在准备课本这件事上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在蒙古，印书很困难。很难弄到印刷机，找到印刷工人，也找不到能制版的人。在自然科学中，有一大堆名称上的问题。矿石的名称，应该用普通蒙古名称，还是西藏名称，还是拉丁名称呢？并非每种矿石都有蒙古或西藏名称，这样就搞不准了。不过，我们尽可能不用太生疏的名称。”

他告诉我关于开办学校的种种困难。“我们的人民经常流动，没有固定住处。但是孩子读书必须固定在一地。那就必须有宿舍，但代价太高。父母不愿为子女上学付膳费。他们为子女读书，愿意向喇嘛和寺庙交费，却不愿向政府交款。在文化事业上喇嘛的声誉仍占上风。再加上，家庭里还指望孩子从小就开始干活。男孩从七岁起就要看羊。十岁的女孩清早就得起床，生火、煮茶。十五岁的男孩就算成人了，已经会从马背上熟练地挥舞鞭子，狠抽狼的鼻子，捕杀它们，根本不用刀枪。既然子女可以象成人一样地干活，父母自然不愿让孩子上学了。

“不过，上学的兴趣仍在增长。一百五十所小学还不够用。许许多多未经登记的小学，只教读书和写字，雨后春笋一样地从帐篷里冒出来，去年，我们派出四十名学生到德国和法国去，派三十名到俄国去。他们将学会绘制地图，印刷书籍和鞣制皮革。还有的回来为蒙古创建新工厂。”

稍过一会，巴吐汗告诉我，蒙古人是多么尊师。“按照老规矩”，

他说，“我带儿子前来拜你为师，要送一件丝衣作为礼物。以后每年都得送礼。对于为他们打开知识之门的人，他们终身尊敬。但是，这种学习不是用大课堂的办法。寺庙里的办法是个别辅导。一个教师只带不多几个学生，一直跟着他学。一部分师生与另一部分师生常开展争论。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这是一种能使学生学得扎实的方法。学生能牢牢掌握他们所学过的东西。公立学校要有足够经费来办学，达到这么好的教学效果，还得过好长时间。”

他既然深知他的对立面的长处，我就冒昧地问他，为什么非得让蒙古人去学欧洲知识，为什么不能安于现状，去上喇嘛的学校？……“我们不愿意做——那本英文书叫什么来着——孤岛上的鲁滨逊。这样我们才能和世界上别的国家对话”，他说。

“再说”，他补充道，“即使我们不想与世界交往，也做不到。世界会置我们于不顾吗？不，它用军队、贸易和发明来迫使我们这样做。蒙古青年看到了美国的道奇汽车、德国的容克飞机和俄国的火车头。这些事物来到后，我们在群众中物色对机械和科学技术有爱好的人。送到德国去学习的就是这些热心的人。他们是好学生。他们在本地读完四年中学后，立即到德国读第五年。他们能很好跟上。人家说蒙古人懒，这仅是因为他们不会种地。其实，在严冬风雪中放牧就不是懒人能干的活。一旦蒙古人对某件事产生了兴趣，他会坚持到底。从前，他们步行到拉萨去，花二十年时间攻读学位。为学习欧洲知识，他们也会这样干。我们必须学习！”他说，语调突然严肃起来，“我们必须学习，否则就灭亡！”

“再说”当他拿起一架显微镜时，又笑了，“即使是纯粹从知识的角度看……你看，通过显微镜，我们懂得了一滴水中含有许多生物。喇嘛告诉我说，他们早就知道了，好几代以前，他们就推论出生命无处不在。不过，世上的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显微镜也并非

绝对，不过也许相对地准确些。”

他大笑着说：“我们的显微镜越来越受欢迎了。三年前，我们必须强迫儿童来上学。现在，学校不够用了。不过，要创建一种新的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说到这里，我告别了。他那种侃侃而谈的神态简直使人难以相信他竟是整个喇嘛教育制度的死敌，和那舍拉、雅吐巴、阿美加耶夫和唐巴道奇他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为使蒙古人的灵魂挣脱活佛的影响而展开不倦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前不久，这个民族似乎已注定要昏昏然地沉沦，走向灭亡。对于这一可怕的命运，活佛们是无动于衷、袖手旁观的。在全国已为民族命运而振奋起来，开始被诸如银行、资产负债表、工厂、兽医站、繁荣和进步等等的西方神灵所吸引了。

蒙古革命政府在短短几年中取得了坚实的成就。对一个刚刚脱离原始游牧生活的人民来说尤其令人瞩目。人们认为将要灭亡的蒙古民族，经过经济和教育改革后，有希望复兴，重新立足于世界。这就是这群革命者的抱负，他们组成了新政府的战斗核心。他们看到了西方文明，深知或者去吸收它，或者为它所摧毁。他们为民族的未来而战斗。这一民族本来是并不关心自己的未来的。他们企图用短短的十年在几千年来造成的文化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

十二、维尔克—武丁斯 克—瞥

从乌兰巴托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六百公里路程，可有许多旅行方式：骑马，乘船，坐汽车，或乘飞机。鲍罗廷和陈丕士坐了几小时的飞机到了维尔克—武丁斯克，在工人集会上向群众发表了一次演说，半夜里搭上了去莫斯科的快车。余下我们这些人用两天多一点时间乘汽车前去。

要是从俄国和西伯利亚的乡村出发进入蒙古，这六百公里路程无疑会显得单调、孤寂。但是，我们刚从原始沙漠中出来，每夜宿营，周围连一顶帐篷都见不到，这条路就显得是条文明之路了。早在乌兰巴托时，我们就已接触到无线电、电报和飞机了，这些都是象征北方文明的第一批事物。乘汽车走二三天对我们来说真是小事一桩，如同乘车回家一样，在整个旅程中不值一提。

以往在中国糟糕的道路上行车，平均每小时只走四公里，走十公里算是幸运的了。动辄陷进泥坑，一等就是多少小时，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我们翻过山

间的处女地，穿越谷地，以时速三十公里稳定地前进。这是在公路上行驶的合理时速。有一次，我们在山间遇到一场大冰雹，下坡时路面打滑，行驶艰难。有两辆汽车滑出路外到了山壁处，耽误了一个小时。的确也危险，但在大家看来也不算什么了。

土地虽然仍旧广阔、荒芜，但和戈壁相比，已初经开垦。树木出现了，路边偶有旅店，山谷里甚至看到一二处中国人或俄国人的农场。确实，房屋和旅店并不多，有时要走五十公里才看到一处。人口确是不稠密的。但是我们曾经走上一个星期都见不到一间农屋或旅店，现在一天看到三处也就觉得人烟稠密了。

有的路边旅店可以看到牛奶、牛油和鸡蛋，还可看到沸腾着的俄式茶炊，以往在中国或蒙古，不大能喝到新鲜牛奶，现在则可以一夸脱一夸脱地喝。但俄国旅店不够多，有些小困难仍不能解决。我们第一夜是在一位布里亚特人家里度过的，很暖和，但蟑螂很多。

第二天中午，到了边界，从远处就看到阿尔唐·布洛克白色的寺庙和教堂。翻译过来，阿尔唐·布洛克的意思是金钥匙。作为旧中国和它的北方帝国之间的前沿贸易站，这名字是很合适的。在这里，可以买到汽油。使我们回想起，在横跨中国、戈壁和乌兰巴托之间的两千多公里中，我们从来连一听汽油都买不到。现在，路途上的供应总算正常了。甚至还有一家俄国餐厅在镇上宣告就要开张了。经过蒙古和俄国海关，在住在附近的俄国领事的帮助下，我们翻过山脊，进入第一个俄国市镇托洛茨卡沙瓦斯克。

我记不起俄国人是如此有秩序、清洁和文明。事实上，应该说，我认为俄国人不是这样的。在波兰时，我曾多次从德国化的农村到俄罗斯化的农村。感到德国人真可说是将欧洲秩序和文化带进混乱的斯拉夫人中间的传递人。德国小镇的清洁和俄国乡村的

破烂无秩序形成鲜明对比。但现在经由蒙古进入俄国，翻过来和东方民族相比，俄国人成了将欧洲秩序和文明输入东方民族传递者了。离开蒙古之后，俄国的一切显得那么井井有条和文明。我们在托洛茨卡沙瓦斯克吃晚饭的那家旅馆，按莫斯科的标准来说是不大整洁的，但它是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用厚实的白色大汤盆供应“白菜汤”，有刀、叉和报纸。样样东西都给人以深刻印象。

从沙皇时代起，托洛茨卡沙瓦斯克就有砖砌房屋的大兵营，说明对于沙皇帝国来说，这是一条有战略重要性的公路。至今，它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前哨，但现在已成为向蒙古输入财经、电力、制革等方面专家的通道了。也是蒙古青年学生到俄国、德国学习贸易知识并带回到蒙古来的通路。我们在托洛茨旅馆吃晚饭时，听到一阵进行曲的乐声，赶到窗户去看，是一群新入伍的红军士兵走过，主要不是俄国人，而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因为苏联的这一地区是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

也许，俄国帮助蒙古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她的家门口建立这个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布里亚特蒙古人可以在这里学会如何用现代化方法自己管理自己，以及如何建立工会，成立妇女组织，使自己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前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路上；从远处就可以分辨出俄国村庄和布里亚特蒙古村庄之间的区别。布里亚特村庄是暗淡的，是些低矮、未经油漆的棚屋，只有高大的三层结构的塔状佛庙显得出色些。俄国村庄比较有生气，房屋经过油漆，修建较好，俄国教堂的彩色圆顶高高耸立。

文明的标志越来越多。第一次看到了围牲畜的栅栏。在蒙古，牲畜自由游荡，只由牧人看管。第一次出现了耕地。看到了第一个乡村邮政用的信箱。这就是原始游牧生活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具体的分界线。在直达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最后二百公里中，突然

令人惊奇地出现宽阔的公路。沿着公路，以公里计算的里程碑也出现了。我们终于知道我们确实回到了重视计算时间和距离的现代世界了。过河时，我们不必再推着汽车涉水，而是乘渡船。它由缆索牵引，按规定收费。

二年前我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曾经路过此地。当时维尔克—武丁斯克给我的印象象个旷野中最偏僻的地方。而现在，我感到它是一座漂亮的文明城市。经过对比，我才知道去欣赏那里的银行(可用美元兑换卢布)、众多的商店、两家旅馆、劳动宫和政府办事机构。镇上有一份报纸。在到达这里的两天之前，我们就读到过它。我还获悉，一批乌克兰舞蹈家今晚将在工会戏院演出。

我参观了劳动人民文化宫，遇到一些活跃、友好的书记。他们敦促我多留几天，见见共和国的主席和党的书记。“她是个女的”，他们自豪地说，“一位能力特强的布里亚特蒙古人。这就是革命带来的新的自由。”短短几年，在原始落后的人群就涌现出一位妇女，走上共和国最重要的岗位。

文化宫的书记告诉我，布里亚特共和国的人口中，百分之五十八是布里亚特人，百分之四十二是俄国人。我表示惊讶，双方人数均衡，怎能建立特殊的共和国。他答道，布里亚特人的习俗和文化十分独特。不建立特别的政府机构，就不能解决他们的教育和自治问题。他肯定地说，在政府机构中，俄国人和布里亚特人所占比例，和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相同。

在共和国的工业生活中，两个民族之间差别是显著的。这从行业工会会员的组成上，特别看得清楚。在需要熟练手艺的行业中，几乎没有布里亚特人。冶金业中也没有。皮革工人中只有一名。印刷工人中只有三人。布里亚特工人实际上只存在于三个行

业中：农业工人，教师和政府职员。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工业还很小，几乎全由外来的俄国工人进行管理。

确实值得在维尔克—武丁斯克多耽搁几天，研究如何在落后民族中组织自治政府的经验。但是，一见到铁路，就按捺不住想到莫斯科去，于是又考虑起时间表来，查看那个车次最快。我们发现，鲍罗廷前一晚已乘西伯利亚快车走了。我们当天下午乘一辆邮车离去，次晨将在伊尔库茨克换车。

文明的迹象令人惊奇地迅速增多。我们还没来得及看完在武丁斯克买来的报纸，伊尔库茨克大车站就到了。至少有二十份俄文日报在出售，还有三四份德文报和来自法国的《人道报》。火车站对面一个干净得出奇的小食品店是伊尔库茨克工人合作社联合的第八十五分店。干净的货架上小罐头摆得整整齐齐，包装好的货物和罐头花色品种极多。在伊尔库茨克街溜一圈，看到更多的合作社商店。我离开苏联才几年，合作社发展得很快，过去是各自为政的合作社组织，现在则是工人合作社联的上百的分店。自从四月份离开美国的联号商店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干净和高效率的商店。

西伯利亚比世界的任何地方更象美国的西部。广袤的大平原，一望无际的森林，都是相似的。人民充满活力，喜欢“吹牛”，对未来信心十足，这些也是相似的。当地的西伯利亚乘客一个又一个来到我坐的车厢，然后又下车去干自己的事。我在和他们谈话中，对苏联完善她的组织的速度之快，深为惊叹。

在森林深处一个站头，上来一位乘客。他告诉我，这一地区向莫斯科出口皮毛。他说，这里有一个猎人协会，低价向政府购买枪枝、弹药，集体向国营贸易组织出售皮毛。只要享有普通公民权，有打猎技术，就可以参加猎人协会。

另一位告诉我，去年西伯利亚生产了三百万普特黄油。他正在查看列车时间表，准备明年到塔什干、撒马尔罕、里海、高加索去旅行，犹如一个美国人计划到加利福尼亚去旅行一样……。他的工作是为新铁路筹集木料。新铁路修在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之间，是为了开拓几千公里的新地区，并用土耳其斯坦的棉花交换西伯利亚的小麦和木材。已修了三年，还要三年才能完成。

“接着再从塔什干修到宁夏”，我们中有人喊道，“下次我们到宁夏去，也许就不用横跨戈壁，而是从塔什干乘快车进入中国。”我回想起我们离宁夏以来的那段长路，觉得在现代，沙漠不再会是永久的障碍，第二个十年，俄国的铁路肯定会穿过戈壁，联结中国、土耳其斯坦和甘肃，然后直通北京。我想到，对比苏联的和平建设，中国当今是连绵不断的军阀混乱，工农群众受苦受难、斗争进展缓慢，显得差距多么大！

我们的车厢里又来了两个人，是运输工会的行业工会组织者，他们从这一地区的铁路中心开会回来；那里有四百人被解雇。“西伯利亚有季节性的工作”其中一人解释道“装卸收获的谷物和修铁路。这些工作不能在冬季进行。这一地区雇了三千人搞这些工作，十月一日要解雇三百人。大多数是农民，家在农村。工会正和铁路当局协商，设法照顾急需工作的人。”

“被解雇的人有保险金吗？”我问道。

“当然，”他回答，“每人每月得八到十四卢布。有家属的每人再增加百分之十五。由社会保险金中支付。如是工会会员，还可每月从工会获得十卢布。若工会会龄在六年以上，可得十五卢布。这就足以使你不会在西伯利亚挨饿。运输工人可以免费乘车前往可能找到工作的地方。”

当他讲话时，我想起了长沙码头上那些饥馑的运输苦力，他们

冒着生命危险，在船还没靠码头时就跳上来，为的是扛行李挣几个铜板。这种残酷的竞争场面，象恶梦一样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而这里，正好相反，连失业都是很文明的，有组织、有计划，来保护他们的成员。对失业者的保护可以说比发达的美国还要好。

我注意到火车上的人们的外表。任何地方都见不到丝织服装，这在美国火车上是到处可见的，但也没有衣衫褴褛的现象。都穿着暖和的长外套，式样不大讲究，但很舒服、耐穿。有做得很好的结实的长统皮靴。有橡胶套鞋，没有美国制造的那么时髦，但更结实。整个车上都是工人——吃饱穿暖的工人，谈论的都是关于修建铁路和工厂，关于黄油产品和皮毛协会的事。和美国西部火车上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是，在他们关于西伯利亚高速发展的高谈阔论中，无一人吹嘘如何置备个人产业或怎样投机取巧获得利益。他们夸耀的是国家的成长，是新工厂和新合作社的建立，完全不提个人利益。他们在说：“看到十字路口那个小站吗？五年后，它将变成一个市镇。……这就是西伯利亚！”

在诺沃西比尔斯克^①站，上来了二十名妇女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全苏妇女联合会大会。她们的非正式领导人是一位高大、和蔼的妇女，宁静的脸部已有皱纹，显现出西伯利亚农民长年劳动和耐心承受的痕迹。她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这一职务相当于美国的参议员。她穿一件暗红色的、没有式样的自制棉裙，灰白的头发上包着红色头巾。她告诉我，她来自离铁路二百公里的一个村庄。

“但是我过去到过莫斯科，”她微笑说，“是作为中央执委会成员去的。所以，车上的其他代表都指望我给指路。她们从来没有

① 即新西伯利亚。——译者注

离开过西伯利亚。有的人连诺沃西比尔斯克也没有去过，有两人没坐过火车。”她大笑着补充道：“十月革命后，我们妇女进了新天地。”

她告诉我，她参加政治活动之初，还是一个有年幼子女的寡妇，在村里的自助会里工作。后来被派去参加乡苏维埃的会议，由于她强烈指责本地区的条件恶劣，人们出乎意料地选她去参加省的会议。“你去好好讲一讲，我们这个乡的情况是何等恶劣。”慢慢地，她的职位上升了。而现在，她说：“我搞政治工作，组织妇女，不再做陶器活了。”我问安妮西阿·乌斯蒂波夫娜——这是她的名字——她是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她答道，丝毫不在意“我是广大的非党群众的代表。列宁说过，要吸收这些人参加政府工作。”

当我听她以自信的语调讲话时，想起了中国的妇女。那个吓坏了的姓汤的女子，害怕被订了亲的对方家庭绑走；姓周的年轻妻子，她的继母不准她用现代方法养育自己的亲生孩子；那位遭到羞辱的姓吴的女子，如果第二次被拒婚，就只好去死。我还想到中国其他一些女子，为革命而奋斗，努力学习，离家出走，惨遭杀戮。我又看到山西的小脚妇女，骑在驴背上，离家门几步路都不会走。她们和眼前这位自信、自由、生气勃勃管理着国家的女子之间，不是相去几千公里，而是相隔着整整一个世界。但是，实际上的差距，仅仅是十年的革命。

我和车上的其他妇女代表也都谈了。一位老年鞑靼女子，是本村苏维埃主席，她告诉我那里的渔民每年夏季要沿河航行几千公里，到法拉海去捕鱼。她们都在讨论需要建设更多学校、医院，更好的合作社。她们讲得很具体，劲头十足。她们绝大多数都是村苏维埃主席。她们颇感兴趣地说起当初妇女参政是何等困难。“去年”一人说“我们选了两位妇女参加村苏维埃。但很少人敢参

加，因为怕男人取笑。今年我们选了六名，现在她们任何会议都敢参加，男的也不敢取笑了。”

她们讲到，如何通过斗争在一个落后地区建立了一所学校，如何通过妇女们的努力，村里的土地重新作了划分，如何搞到灭火机，以及重修一座桥或医院。看过中国的混乱和蒙古的大沙漠，再来看这些妇女，就觉得她们象大地一样坚实。她们前进的力量是如此不可抗拒，好象地球一定会绕太阳转一样。然而，仅仅十年以前，她们同样是在黑暗世界中，既无望又无助。现在，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她们是地位平等的建设者和分享者，和男人一样，正在征服自然，创造文明。这是一种生命力异常巨大的文明，它将扩展到铁路的那边去，向北到达遥远的北极苔原，向南穿越中亚的沙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到达我们刚离不久的伟大的、然而又是昏暗的、混乱的中国。

过了乌拉尔山脉，又经过俄国北部那在秋天是寒冷而潮湿的农田，走向外部世界只称之为莫斯科的城市，但它在占地球面积六分之一的土地上那些分散的乡村居民中，又有了一个更为庄严的称呼，叫做“中央”。对于其他亿万人民——那些南亚和东亚的黄色和棕色人种，他们和他们的苏联兄弟农民既不相似，又很相似——来说，它会不会也成了“中心”呢？这正是世界史中当今最重要的问题。

第三卷 八年的历史

一、南京政权的衰落

一九三五年六月将尽，两条有关中国的新闻同时见报。引人注目的是，两条新闻都发自日本东京。

差不多就在八年前这时候，我离开已告分裂的武汉，途经贫瘠的陕西山区与蒙古沙漠，北去苏联。在那个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正开始企求实现其第一个五年计划。

其中的一条新闻，报道了日本对华发出最后通牒。日本人这种做法，如今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了。深入华北超过千英里，日军在察哈尔遭到了微弱的抵抗。该省的宋哲元将军（一度是冯的北线指挥官，我在固原的旧相识），由于其部属胆敢抵抗入侵者这种“挑衅”行动，自非表示歉意不可了。他已经答应将失职的第一百三十二师的长官撤职，且将给日军向亚洲腹地进军提供方便。然而，这并不能使日方满意，于是便向那号称是统治着中国的南京政府下了最后通牒。提出：宋的态度不能令人满意。由于对他的行为难以信任，日方尔后不再认为他是一省之

长，只当作有待南京政府惩办的匪徒来对待。

对于这一令人惊讶的无理要求，独裁者蒋介石作出卑屈的反应，向东京派去了一名私人信使。隨即便从东京宣布，今后，日本军部与财政部联合资助下的一家康采恩，将独家经营华北工商業。

即便如此也还不足。帝国主义是你喂得越多他胃口越大。随后就听到传闻，国民党在华北的机构将告撤销；又传说中国军队要撤出北平；而在那个故都发生骚乱之际，日本轰炸机竟从上空列队飞过。当年的中国皇上，前已在满洲登基，此时可能又在谋求重返故都，这已迫在眉睫了。其实还是日本人在傀儡的幕后策划。在这一切的背后，传出了更加鬼鬼祟祟的暗示：日本占领军要求“整个中国一元化”，并将国防力量交日本人掌管。

另一条新闻是关于中国主力红军到达四川的报道。红军横越四省，跋涉一千四百英里，胜利抵达预定的目的地。这支八万之众的大军，爬山越岭，走过了粤、黔、滇三省。他们通过了湘、黔边界的丛林沼泽，渡过激流，走出了西康荒芜人烟的地带。蒋介石的五十万大军没能拦堵住他们。一路上的地方军阀大多干脆躲开一旁。来到四川这个扼长江上游咽喉的极西省份之后，背靠康、黔山区，又有广大土地矿藏潜在资源，从战略上来看，红军是强有力的。

二十年来，四川的财富被两百多次内战搞得精光。有些地方提前征收了五十年的捐税。据一位传教士报道，仅在某个地区，就有万余农民于绝望之余弃田上山。几十万盐井工人中有百分之八十被解雇。据说二十年中人口从六千万降为四千万。这并非由于天灾，而是因为军阀的搜刮造成很多人饥饿而死。就在共产党还没入川之前，无效果的农民暴动已经常有发生。

四川的被剥削群众以暴动来迎接红军。全省大部分地区落在他们手里。主力红军终于同四川红军会师，后者建立的苏区已存在了约有两年。汇合起来的二十万红军，在四川省府以西七十英里之处严阵以待五十万蒋军。蒋军已经徒劳地尾随红军走了这么远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报纸认为，红军的会师是“红军的巨大胜利”，而莫斯科报纸则欢呼这个会师之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并认为，红军不止是胜利进行了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进军，还以自己的行程在广阔土地上深深地播种了革命。

三年来，中国红军一再呼吁，愿同任何一支抗日军队并肩战斗。三年来，每一个建议蒋先抗日、再剿共的人，也受到了更大的迫害。北京有几百个知识分子就在最近遭到处决。此外，至少还有一位爱国将领遭害。除了他们期望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挽救华北之外，别无罪状。如今在四川，蒋还是按其习惯的一套行事，他接见了从南京飞来的日本使节，接受帝国主义者的援助，用来镇压共产党，代价是签字画押，让日本控制华北，进入故都北平。

以上两条新闻排在一起，构成一幅画面，显示出今日中国的斗争特点。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现在愤起唾骂蒋是卖国贼。蒋的宣传员则竭力为他辩解，将一切归咎于红军，说什么蒋先要安内才能攘外。

看到这一情景，我不由得回想起八年前的那个明月夜。在陕西一所果园中，鲍罗廷对一位受冯玉祥压迫而出走的中国同志说：“从今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将比以往更凶狠。当着国民党依靠群众之时，他们赢得了无上权威。如今它镇压群众，帝国主义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但是不要泄气，中国革命并没有完结。”这番话勾画出这八年来的历史进程，预言了南京政权的衰落不可避免，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中国费了八年时光证明了这一分析

的正确。这是用流血与痛苦换来的教训。

一九二七年四月，长沙的普通工人听到了蒋镇压上海工人的消息。蒋所倚重的正是起义工人授予他去同资本家谈判的权力。长沙工人对此作了评论，说得既机敏又生动：“革命好比行进中的列车。每到一站，乘客有上有下。蒋介石已经下了车。”在工人看来，起变化的并非革命本身。农民要地，工人要改善生活。这种深刻的要求决定了革命性质。当了革命的敌人与叛徒的是蒋介石，而三个月之后又有武汉政府，其后还有别的人物。那些只看表面的人觉得革命事业似乎已所剩无几。有些农民逃上了山。铁军的部分军队已经消失于内地的暗影之中。有些工人藏身于上海的贫民窟。在南京的牢狱中，共产党人受着折磨。

从某一方面看起来，南京政府大获成功，正在登上一个世界强国的地位。蒋不但取得了上海资本家的财政援助，还冒取了北伐革命的光荣，并继续以此为资本，建设“尊严”的国家。原先对革命力量感到头疼的列强，发现蒋原来是一个可以谈交易的人，于是放了心，赶紧予以外交承认与借款。

在帝国主义舞台上登场比较晚，因而没有什么地盘的美国，更是看到了机不可失：通过那些受过美国教育而此刻在南京政府身居要职的人，美国可以公开进入中国了。

美国资本家提供贷款，指望得到加倍偿还。美国政治家派二流角色去当蒋的顾问。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欣然发现，南京政府里有许多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妇女，高兴地认为，新政府是以西方民主为楷模的，他们宽恕了早先中国人民的过激行为，既然那已令人满意地给镇压下去了。他们乐观地认为，原先群众斗争中提出的那些可怕的要求，南京政府将以某种虽说迟缓却更为得体的方式予以满足。

在一个时期内，大部分中国人也怀着同样的期望。这是因为，只要并非走投无路，老百姓与其寻求恐怖手段，总还是寄希望于政府的。革命成功的辉光依然映照着国民党，在内政外交中充当虚假的门面。靠着外国的承认与上海的税收，一九二八年春蒋得以再次北伐。这是一年之前由于他武装政变而中断了的。在冯、阎军援助下，当年六月攻下北京，更名为北平。十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十二月，满洲军阀张学良归附新政权，从而完成了统一。

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承认。不同意这样看问题的只是少数心怀不满的人。他们根本反对资产阶级国家，要求给予工农更多的权利。他们的痛苦呻吟——为维护现存秩序，确实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与处决——淹没于东、西方资产阶级与自由主义者同声祝愿之中。

所有此类祝愿忽视了一种事实：中国最基本的掌权者依然如旧。不管言词如何漂亮，革命并不存在。在南京的新门面后边，武人们尔虞我诈，同过去在北京的老门面后边一模一样。地主、高利贷者与武人们照旧沉重地压在人民头上。中外资本家仍然抱成一团，剥削人民大众。正如宋子文亲口对我讲过的那样：南京始终是“漂亮话掩盖着老腐败”。

改组以后的国民党，清除了共产党人，镇压了工农革命组织，选择了自身的社会基础：上海银行家、城市工商业资本家和农村地主。所有这些势力只在剥削压迫广大群众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由于分赃不匀又争战不休。国民党军队从一支所向无敌的革命力量蜕化为军阀的雇佣军。它不是顺着群众运动的潮流走向团结一致，而是注定要一边互相火并，一边残酷镇压反抗他们的工农。南京“爱国人士”的任何乐观言词与虔诚希望都改变不了这一命运。

宣告统一还不到半年，人们已经看出来，所谓统一，无非是形式而已。蒋本企图以解散杂牌保存嫡系达到“裁减军备”，反而引起了公开的战争。蒋先是同曾经导致武汉政府分裂的汉口军队打，继而同西北的冯、阎军打。张学良利用后一战事的机会攫取了平、津，同蒋分占了中国的大部。一九三一年，另一个广州政府崛起华南。国民党元老中有一半或一大半是其成员。过去，按古老宗法制度同地主、商人勾结一气的各地军阀，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表演过内哄与倒戈的把戏。如今在青天白日旗下，一切又在重演。蒋纵有美元撑腰，自封为全中国的统治者，并以此身价向美国人民推销。其实他也象当年江、浙军阀那样，真正能控制的只是几省而已。

不管他喊了多少现代化口号，实际上在国民党统治下，封建与军阀势力的压迫变本加厉。

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查尔斯·霍奇斯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号《亚细亚》杂志上作了如下报道：大地主以贫苦农民为牺牲，正在巩固本身的地位。政治上的瓦解使地主豪绅这两个狼狈为奸的剥削阶级有了可乘之机，去侵占公地与村社土地。在腐败的军事当局——此辈不惜出卖一切，包括几十年后的税收——纵容下，地主家族以贫农、中农为牺牲品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贫农与中农仅能勉强维持生计。一旦遭灾就面临彻底毁灭。“这一切，标志着全国性的农村破产。被盜匪、内战、水旱灾荒赶出家园的难民大军，便是中国濒于绝境的明显标志。当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得势之际，无家可归的人已超过荷兰人口。而到了一九三三年，这一数字达到了世界大战后德国的人口数，即六千五百万……农村中的两大瘟神——贪求无餍的地主与高利贷者，继续对群众进行季节性的掠夺。事实上是为所欲为。”

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却又面临世界经济危机。列强将危机转嫁于弱国。美国高抬银价，把中国内地的银元都榨干了，因而加深了人民大众的贫困化。上海则被强化为金融之都。美国从西藏向华西方向调动军队，还借钱给四川军阀以谋取特权。法国占领了加罗林群岛之一部，又开始资助云、桂军阀，作为在该地取得权益的伏笔。美、德两国一直在利用借款，军事顾问与飞机为饵哄骗南京政府，指望从长江流域的贸易特惠中取得报偿。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最大压力的日本，抓住时机对满洲与华北发动了策划已久行动——一场震惊世界的军事干涉。

南京政府早已把群众丢在一边，甘心走依靠金钱的道路。但却发现，即使是上海的财源也填不饱腐败军阀的肚子，应付不了日益激化的军阀混战的开支。然而除了愈来愈狂热地大借外债以求补助以外，它又能有什么作为？这种借款是以对方索取什么就得给什么为先决条件的。而南京政府所能办到的就是出卖。税收权也好，这一地区的控制权也好，卖给任何买主都无所谓。对方的条件却愈来愈苛刻了。

为了应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南京政府的政策是公然宣称不抵抗。张学良在满洲不仅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且有火药厂、迫击炮厂和世界最大最优良之一的军工厂。他急忙溜到南京去讨主意和求援。然后坐了蒋赠他的一架飞机回去了，去执行投降政策。从此就开始了四年来自日侵华的步步深入。唯一的反对者属于爱国的非嫡系军队。他们的爱国行动不仅得不到蒋的认可，而且受到不断加重的惩罚。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九三二年初日本入侵上海的事件。广东军十九路军，尽管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且遭到阻挠破坏，却英勇地

打了一仗，使日本在整个亚洲面前丢了脸。蒋在上海签订了停战协定，容许日方永久设防，加强了对上海的控制。

一年以后，又签订了塘沽协定，内容始终秘而不宣。但华北显然已被置于任凭日人摆布的境地。日本朝着控制华北这一目标步步进逼，每一步都得到蒋的帮忙。改组后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中，安插了对日“亲善”的人物。当这些人对日本的掠夺也渐感沮丧时，又被更加俯首贴耳的人取代。在日本银行家与亲日的华方董事共管之下，老的中国汇兑银行复业了。预期它会成为日益增强的日本金融活动的一项工具，尤其在“华北铁道”方面是如此。这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廿二日《纽约时报》的报道。通过提供贷款，日方企图控制平绥铁路。这条铁路沿正东方向通往内蒙。正如《中国每周评论报》不久后指出的，此举对于日本的反苏军事图谋将是重要的。

此后，南京政府批准一项关税新税则，对中国纱厂急需的原棉增税百分之四十三，而对日本出口同中国竞争的棉纱则降低了三十九种税率。这样就牺牲了中国企业的利益，帮了日本人的忙。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日，十七名日本工程师到达上海，在造船厂为中国建造一艘战舰。这等于把海军机密拱手交给了他们。同年十一月，蒋视察华北，就地再次改组地方政府，以方便正在迫近的侵略行动。他授权地方当局任用日本顾问。甚至在山海关这样一个满洲通向华北的战略要口，也安插了一名日本顾问。

由于北方军队对此类屈从日方的行事表示憎恶，蒋把其中的十四万五千人调往南方。从宋哲元所辖的察哈尔省抽调了双倍多的兵力。而该省正是日本策划进占的下一个目标。当所有这些勾当激化了人民的反日情绪时，蒋便动用蓝衣社来取缔抗日言行，下令大肆逮捕和处决抗日的知识分子。一九三三年曾从日军手中光

复了多伦的吉鸿昌将军，始终坚持抗日。他先是在咖啡店中遭到蓝衣社分子狙击，随后当他躺在医院中养伤时又被逮捕，以莫须有的罪名草草处决。

蒋对于日本侵略行动的退让——还不如说是帮忙，引起了不同的议论。坦率的人使用了一个简单而可憎的字眼——卖国，认为他为了维持自身的短暂统治，业已通过借外债把国家出卖了。另一些人比较客气，不赞成使用这样刺耳的字眼。其论据是，南京政府其实也是仇视日本的，只不过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取得援助以摧毁红军，只得屈从日本。这两种看法的分歧似乎可以归结为用词上的分寸不同或是对蒋的心理状态有不同分析。然而，难道因为一个卖国贼同收买他的一方存在矛盾，或者因为仅由于权力欲才出卖同胞，就可以认为他不那么坏了吗？

最宽容的解释者认为，面对日本武力，南京政府是束手无策的。南京政府自己也竭力制造这种假象，似乎自己是面对强敌无力抗拒。却也有一些论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问题毋宁在于领导不力与意志薄弱。他们说：“中国获得外籍军事顾问的内行指导已有四十年之久。张学良拥有世界上最优良的兵工厂之一。在外国军校留过学的中国军官有好几百人。日军通过热河时，只要任何一位中国指挥官有那么一点抵抗意图，那次战局就不会变成日军的一趟短途汽车旅游，而将是无路可通的隘口上的一场恶战。因为日军的摩托化装备在那种地形上毫无用武之地。”

所有这几种观点，短短一句话不就可以更完整地概括了吗？那就是八年前（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提出的：“只有将广大劳苦大众都包括在内的切实的斗争，才能形成一种力量，战胜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不仅依靠武器，还要依靠意志，靠亿万人民在自己国土上为热爱的国土而战的那种意志，才能够赶走侵略者。既然

八年之前蒋已不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了，那他从此就注定是要为弄到借款而去干剥削者最需要他去干的勾当。一开头是上海银行家向他收买到了对工人的镇压。然后是列强，蒋出让权益同它们大做交易。如今除了政府的批准权之外，已经再无可卖，而这种批准权也已一钱不值，只有最贪心而伪善的日本帝国主义才有胃口出价收买。

对民族的叛卖，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不仅是革命农民用那个简单而难看的字眼骂他，正如查尔斯·霍奇斯所云：哪怕是一个漫不经心的旅游者也处处可以感受到群众那种反对独裁统治存在下去的情绪。政府愈来愈露骨地对日妥协，同样遭到人民反对。十九路军的蔡将军近来在美国展开了反蒋宣传，声称：“我反对他是因为他同日本订立密约……其中究竟有些什么条款他不对我透露，可是对日本人予取予求。”

一九三四年八月，以孙夫人为首的三千位知名人士，发表了《要求武装抗日》声明，提出：“中国人民从自身的痛苦经验中懂得，不能指望国民政府去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手中拯救国家。”他们号召，全民奋起，向政府索取乃至夺取武器，迫使政府领导抗日。指出：中国有正规军三百万，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军队。没收日本在华企业即可充军费。这笔财产据估计有两亿元之巨。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愤怒正在高涨。人民需要有领导，但不要蒋和南京政府来领导。面对人民的不满，他们会更加公开地充当日本的代理人，除非日本感到此辈已无用处而甩掉他们。

迹象已经日益明显，日本甚至想抛弃蒋介石。日本人行事粗暴，已经不再替南京政府留点情面，而为了遮盖真相，此类交易是需要情面的。日本占领军竟要求取消国民党，并要蒋下台。这是因为，蒋在替帝国主义镇压人民这方面既然已告失败，是否已到了

换马之时？

对于失败者，历史是无情的。不管他们拿什么言词来粉饰自己的叛卖行径，以“力弱”或“内争”为借口，替自己的可耻行为辩解。正是标榜国民革命与爱国的南京政府，纵容帝国主义最彻底地进行了掠夺。不仅如此，它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样一个政府之必然以垮台载入史册，中国与世界人民对此还会有何疑问吗！

二、赤色地区的崛起

虽然蒋和武汉政府的领导者们接踵“下车”，革命列车继续前行。在众多军阀及其同伙地主、豪绅与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中国人民遍体鳞伤；但革命仍然在继续，这是因为，欲罢不能。工农大众要活命，不变革现存局面就活不下去。革命之所以继续也是由于革命者的自觉。在国民革命那一段短暂时期里，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获得了方法与组织工作上的经验，学到了如何将个别的暴动发展为真正的革命。

江西、湖南的农民领袖们分散开来藏进深山。上海、广州的工人领袖们也都隐蔽起来，不然要是被捕就会遭到苦刑与枪毙。铁军中的几千人从唐生智对蒋的个人争斗中分裂出来，夺路南下，以占领汕头一举震动世界，随后便消失于广阔内地的暗影之中。它们是以广大群众的要求为基础的生动力量，所以它们又慢慢地坚定地重行集聚起来，治好创伤，开始一场新的革命。

被搞得头昏眼花的农民，一上来只知道以“民权”的

名义去对付反动派军队，以保卫自己的民仓、民庭与民学，这都是人民在北伐的有利形势下创建起来的。随即大家便看清了，原来国民党本身已经落在反动军阀手心里，于是群众就以苏维埃的名义而战了。被迫转入地下的中共、中华总工会，在工厂和农村中组织了许多秘密支部。他们派出工人与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组织了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间席卷全国的暴动。起初，起义群众用来同新的压迫者作战的不过是大刀长矛与锄头棍棒。妇女也同男子并肩战斗。通过购买、缴获或是起义军队的加入，逐步拥有了步枪、手枪与手提机关枪。现在，他们自称为红军了。

一等到某个地方集聚了足够的革命力量，他们就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这也就形成了政权。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第一个这样的地方苏维埃政权建立于邻近广州的海陆丰。它就是海陆丰苏维埃。一个月之后，又有广州公社继之而起。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三时三十分，革命者的怒吼与枪声再一次震撼了国民革命的摇篮广州城。三千四百名政治犯出狱投入战斗。激战两小时，无产者占领了城区大部。同一天早晨，在五时与六时之间，举行了工农兵代表会议，有十七位代表参加。他们是暴动前夕从各个组织中推选出来的。会议发布了宣言，次日在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上通过。大会以如雷掌声宣告苏维埃在中国的诞生。

不到三天，广州公社淹没于血泊之中。从一开始，反动派军队就以六对一的优势超过革命一方，在中、外军舰支援下反扑过来。海陆丰农民援军未能如期赶到。挂着英国国旗的商船却运来了国民党军。英舰莫洛号与美国巡洋舰沙克拉曼托号也这样干了。日本海军登陆攻打红军，阻挠它攻取江边战略要点。类似这样的中外武装联合行动，在以后几个阶段又公然重演。

生命虽然短促，广州公社却打开了革命新局面。据估计，被镇压者——大多数在战事结束之后——约有五千至五千七百人。公社宣布的纲领广为传播，成为新的战斗号角。其中包括了在贫苦农民中平分大地主的田地，大工业收归国有，还有八小时工作制、社会保险、禁止人身奴役与雇用童工等一系列社会法令。后来，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在华中、华南各地以苏维埃名义举行的工农起义中，都曾提出这样的纲领。

一九二八年春，朱、毛红军会师湘赣边，组成湘赣边界苏维埃，包括了七个县的地区。建立了一所军校、一个兵工厂和几所医院等等。在边界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着手对现已称为红军的部队进行训练。到了一九三〇年，已建立苏维埃的省份超过十个。红军号称十万。国民党估计的数字为六万。一九三〇年夏，红军攻下了湖南首府长沙。这样也就进入了外国炮舰的火力范围。一如在广州那样，红军被舰炮击退。英、法、意、日都帮了国民党的忙。当地军阀何键又回来了。虽然红军已经撤退，他却为了报复在长沙屠杀了四五千人。

打下长沙一事使中外各方的注意力集中到中国苏维埃。外国政府要求蒋必须摧毁苏区，才认可其对全中国的统治。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南京政府发动了剿共的首次主要攻势。十万国军开进苏区。但进入苏区没多远就被包围，几乎全军覆没。一九三一年四月，南京政府国防部长指挥了第二次围剿。红军再次包围并击溃了敌军，缴枪数千，还缴获大量弹药、给养、银元与医疗用品。

几乎是立即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一九三一年夏，由蒋亲自出马。据称他这次带领了三十五万人马。他深入苏区夷平了好几百个村庄镇市。据官方消息说：“摧毁了共党政治中心东固镇上

的所有设施，包括银行、军校与机关。”但是——仍援引国民党承认的资料——“红军实行反击。国军必须转移，已获战果几乎全盘丧失”。我们从其他来源中了解到，十一月，南京方面的三十二路军共三万人投向共方，开创了国民党军起义的先例，尔后这种事便不断发生。

从一开始，国民党就害怕红军的宣传甚于子弹。连乔治·索柯尔斯基这样坚决反共的记者也写道：“靠军事力量的确消灭不了红军。因为红军一走，跟着就来了农民。蒋军打到前面去了，背后却出现了武装的农民。蒋军只得举手投降，而共党获得了武器弹药。每当蒋军精疲力尽地赶到朱、毛军队占领的某地时，往往发现，红军已经转移了。然而他们却已经成功地开展了活动，扩大宣传了打倒国民党、分田地、取消苛捐杂税等主张，甚至连蒋军也受到这种宣传的影响。因为这些兵士也是农家子弟。”

索柯尔斯基还在另一文中补充说：“红军通过分田地，创造了一个小小的自耕农阶级。这一阶级的和平人民对共产党抱欢迎态度。地主豪绅遭到清算。农民劳动者则感到日子比几十年来好过得多。”……红军何以受到欢迎，没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解释了。

至于那宣传鼓动的方式，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这位热诚能干的美国作家有过鲜明生动的描述。近年来她冒着莫大的危险在上海向地下党人搜集了第一手的材料。“大多数国民党士兵也是贫苦农民出身，在战斗间歇或是夜色朦胧中，苏区群众，包括男、女、少年们，便朝兵士喊话了：‘白军弟兄们，干吗替他们打仗呢？我们是穷苦的工农，是为了你们的利益才打仗的！土地分给农民和兵士！取消佃租，取消放债，取消捐税！弟兄们过来吧！拖枪过来，为革命打仗！’就是这种宣传鼓动，造成了整师整师的国民党军投向了红军。”

正当第三次围剿接近失败之时，日军开进了满洲。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蒋所作的抉择是宣布对日“不抵抗”。他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加上向列强借用的力量，同他早就公开宣布为最大危险的赤色地区作战。苏区随即发出了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呼吁。蒋对此置之不理。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江西中央苏区首都瑞金举行。大会宣布：一年半以前，也即一九三〇年五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地下群众组织的代表，曾在上海秘密举行会议，进行了规划，草拟了法令。本次大会原定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召开，由于蒋的三次围剿推迟了近一年之久。

六百多位代表来自各苏区。与会者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地下群众组织代表。建立了一个临时中央政府。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为军队首脑。通过了一部宪法和一系列法令。大会宣布自己的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其目标是摧毁一切封建残余，消灭军阀势力，统一全中国，有步骤地限制资本主义发展，建立国有经济，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发展组织，团结贫苦农民，以实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转变。苏维埃被赋予权力。其代表由全体劳动人民选出。只有约占总人口百分之四的地主、军阀、资本家被剥夺了此项权利。

新的土地法宣布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劳动法令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经济法规准许经营私人贸易与小型工厂，鼓励建立消费合作社，可以免税。财政法规取缔债券与人身抵押。制定了一项单一的累进税，对富有者课以重税。婚姻法禁止一夫多妻与强迫婚姻，把结婚年龄定为男二十女十八岁。以上所举，仅仅是这部进步的现代化法律的一个摘要。它的全部文字足足有一百个印张那么长。

与此同时，日本正在直接入侵上海，以此来试探南京“不抵抗”

到何种程度。十九路军英勇抵抗，却遭到蒋的破坏。蒋企图将国家分裂无法抗御外侵归罪于苏维埃。说什么“当务之急在于恢复国家之统一”。苏维埃立即再次提出结成统一战线的建议作为回答，表示愿与任何对日作战的力量联合抗日。这一宣言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如此广泛的影响，因此蒋威胁要处死任何胆敢主张要抗日不要剿共的人。自此以后，宣传抗日被列为宣传赤化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夏，国民党政府调动了百万大军，并非北上抗日而是南下攻打苏区。美制飞机参加中国内战，轰炸了乡村。第四次围剿毁灭了鄂豫皖边界的苏区。但那里的红军有半数向西进入四川。四川农民以起义迎接红军，于是建立了四川苏区。此后有两年半之久它是各苏区的中心。

一九三二年末，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华苏维埃的威力。李顿向国联的报告书中这样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已成为国民政府的真正对手。它有自己的法律、军队、政府，有自己活动的领域。

那时期，凡有关中华苏维埃的消息，差不多都是透过其敌方宣传才为世所知。没有一个外国人能通过南京政府的封锁进入苏区。史沫特莱从偶尔来到上海的革命战士那里辛勤搜集了苏区的情况——历史将感谢她的工作。除此之外，人们所知的仅仅是那些偶尔到过苏区的传教士，道听途说的片段情况。再就只有官方宣传了。但是从敌对方面评论的字里行间，苏区斗争的特点终于形成了一幅图画。

我们看到：“谷物都被征收，再按低得可笑的价格出售，以显示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倒霉的农夫受到掠夺，只准留足口粮与种子。为了压低米价，不准粮食出口。这一措施在城镇居民中是得人心的，但生产者感到吃亏而不满。赤区与国统区的粮价高低悬殊，共

党以此为口实攻击政府。”其实任何一个到过中国农村的人，哪怕只是匆匆一瞥，都明白所谓有利可得的“生产者”不过是极少数人。而广大农民对于“留足口粮与种子”倒是会大为满意的。

从同一作者的文章里，可以得知红军的战略战术。作者写到红军“善于伪装来对付空袭。他们头顶绿色大草环，安坐不动。从空中俯视，就象一片树林子。”又说，空军只知道红军大概就在这下面，于是便向树林投弹。作者还叙述了红军并不去攻打白区，而是等着敌人进入苏区再打。“他们动员农民工人和妇女开展对敌宣传，瓦解国军士气”。还“利用民众扰乱我军，在山头遍插红旗，或是大吹号角。共军执行命令是如此认真而又有效，因此很难去同他们争论……”透视所有这些说法，隐然出现了一幅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生动画面。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美国左翼刊物)《新民主》以引自“敌对方面的证词”为依据，给中国赤区勾画了一幅粗略的图画：“共产党人保持着一个稳定的政权，发行纸币的银行和军工厂。还有一套教育制度。它在推行普及教育方面有很大进展……国民党军队一到，这一切就都垮了。然而红军跑掉了！……外国记者被邀请参观曾被‘共匪盘踞之地’，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已遭入侵国军的蹂躏，苏区还是要比军阀治下的邻区繁荣得多。庄稼收获量要高些。捐税要轻些，甚至河堤也高得多。”

将近一九三三年时，蒋感到必须鼓起勇气打一场殊死的持久战。他聘请德国法西斯将领冯·塞克特与大约七十名其他德国军官当顾问，策划这一战役。他又从美国弄到一笔五千万美金的棉麦借款。其中一部分用来向日本买了枪炮。还向美国贷款四千万美元，用以建立现代化空军。如果他意在对付日本的入侵，此种准备也可说是够认真的了。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为了打一场决定性的

持久战，以图消灭战斗着的工农政权。为了对付苏维埃，蒋甘心求助于任何对中国不怀好意的帝国主义。

环绕赤区筑起一道漫长的封锁圈。任何物资不得通过。精锐部队缓慢然而逐步地向圈内渗透。前进道路已经预先修筑好了。采取一种所谓碉堡政策来巩固已占领的阵地。同时对占领区农民实行所谓“复兴”与“整肃”工作。这一切便是蒋所精心策划的。指挥这一切的大本营，设在江西省府南昌。

汤良礼（译音）想对外国人证明此次战役的重大，写道：“一九三三年约有二百多万军队通过南昌，大多数由汽车载运”。同样是为了夸耀，他还历数了其他成就：“一九三三年一月，八千共匪被歼于金溪。三月的一次激战中歼灭四千。十月又有七千被歼于资溪之役……”我想，在文章里用到“匪”这一字眼来叙述对几千人的大屠杀，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中国人从此更加把蒋看透了，因为他越发依赖外援了。南京政府的官方宣传公然表露出讨好外国主子的意向，简直令人惊讶！

凡是看过汤良礼《镇压赤匪》一书的，不可能看不出这是说给谁听的。它是想证明给帝国主义看：即使还说不上已经成功，南京的确是在卖力甚至是在拼命地反共。因为蒋只有证明了自己是项有用顶有效率的镇压工具，才可指望继续得到承认，拿到借款。

蒋指望列强赏识他那“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战役”的宏大计划：“集中了两万青年的训练营，特将山地作战列入训练科目。一所很大的南昌机场，辅以十二个前方站。向每个战区派设了中心电台。三十万大军。一百五十架飞机。所有必需的交通工具。红十字会医院，急救站。”唯恐如此卖力还遭到忽视，汤竟厚颜无耻地点出：“由于那种视外患重于内乱的倾向，外国观察家似曾以为，共党的威胁无足轻重，但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策的实行，消除了他们的

疑惑。”

汤还洋洋得意地描写了经济封锁是如何严密，赤区怎样因为缺盐而受困。缺粮、缺少军需物资使他们的情况恶化。棉衣也缺乏。然而他又描画了“复兴”占领区的那一套办法：“修筑公路，劳力由地方官吏从共俘营中取得补充。”这些人“每日津贴四毛作为工资”。换言之除了管饭别无所得。佃租由官吏重行规定。配合的措施是从空中摄影测量田地的四至，防止赤匪今后再将田契焚毁。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套监视与控制人民的保甲制。每户发个牌子，上有户长与男丁的名字。十户一甲，十甲一保。通过这一组织“按月清查户口，使不逞之徒难以混入。”

虽然披露了如此庞大的计划与兵力，一九三三年过去了，收效甚微，弄得南京政府更加丢脸。虽说也消灭了许多共军，但后者却不断从农民中得到补充。

中华苏维埃对苏区建设成就作了如下报道：“到一九三四年初为止，在击退五次围剿后苏维埃政权开始全面发展。苏区扩大了。苏区的经济与文化教育工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引起重视。春耕秋种进展顺利。合作社发展迅速。收成良好。严格执行了税收政策。币值稳定。这一切提高了苏维埃的威信。”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人们第一次获得了有关苏区情况的正式报道。

有关此次大会的报道是一份激动人心的文件。在敌军封锁线里面开会的人正是那些被诬为“共匪”的人。上午六时，中央广场举行了三个小时的阅兵式。朱、毛以苏区广大群众的名义向红军致以革命的敬意。会场布置了大红标语，上写着：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毛宣布大会开始，乐队奏乐。

七百多位代表同一千五百位来宾挤满了会场底层和月楼。代

表名单上开列着他们的成份：“贫农三百零三人，手工业工人二百四十四人，雇农一百二十二人，苦力五十三人，中农二十五人，产业工人八人，店员二人，小商六十四人，此外还有其他成份。”这是一幅比例均衡的中国农村断面图，排除在外的只有地主与大商人。

朱在掌声中做了报告。他说：“最近，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了三万支枪和各种军需品。这将使红军成为一支强大武装力量。”毛作了关于两年来斗争成就的报告，长达数小时。讨论进行了两天。在报告中毛谈到中华苏维埃同满洲、华北抗日义勇军之间的团结。大会为义勇军募集了基金。这些自身处在敌军封锁中的农民，还给上海正在罢工的工人送去捐款一万六千元。越过重围，他们的手同全国的反帝人民紧握在一起了！

接下来是一篇出色的报告，充满了具体的细节。指名表扬了模范乡而批评了落后乡。其中对某地区的尖锐批评引起了听众的注意。那里的干部将全部精力用在动员扩大红军上，却不关心满足群众生活中的需要。弄得群众不高兴来参加开会了。人们还注意到，毛谈到关于结婚年龄的一件事时代表们笑了起来。毛说：等二十年没关系，早婚对人不好。安心点！长工们往往干活到四五十岁还没希望讨老婆哩！

报告两年来斗争成就中提到：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的红军，现在都在中央统一指挥下行动……苏维埃选举不再放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先要公布全体选民名单，加以核对。选举工作组织得更好了。群众对代表也更了解。许多地方有百分之八十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好多地方妇女代表已占四分之一。他指出：水利、学校、卫生、分配军属土地等工作，由专门的委员会处理。这在大部分乡苏维埃已经实现，而且大量人员干的是义务工作。他指出，如此广泛发展的民主，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八小时工作制在整个苏区已经确立。毛认为这是另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就。所有城镇乡村都建立了劳动监督来贯彻执行这一法令。颁布了十二种职业的工资额，表明两年中工资已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徒工如今每月可得一元半至三元工资，而以往是学手艺要拿出钱来的。另一个有意义的细节是，长工同老板如今吃一样的饭食。

接下去毛讲了“查田运动”。过去大多数农民一年中有几个月饿肚皮。现在分了好地，税也减了，不再闹饥荒。人民的生活好过往年至少也有一倍。但土地分配必须由群众会议来审查……没收来的牲畜归贫苦农民，不得由苏维埃工作人员拿走。对此，他向违反者发出了警告。

提出了植树问题。还提出必须由集体购买马匹，分给百分之二十五的贫农，因为这些人一直没有自己的耕畜。也谈论了发展种烟与造纸原料的困难。这是由于国民党的封毁。因此，制订了规划，按苏区需要量来调整此类作物生产。为了发展国有工业生产，已成功地募集了三百万元公债。报告中还提及一千四百二十二个合作社的成绩。它们集股三万零五百五十五元。这种小额投资也是贫苦人民无声的贡献。

毛自豪地说起：“在三个省的两千九百三十二个村里共有小学三千零五十所，学生八万九千七百一十人。夜校六千四百零二所，有学生九万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另外有三万二千三百八十八个扫盲中心，参加人数为十五万五千六百七十一……妇女的求知欲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兴国县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个上夜校的人中，有一万零七百五十二人或者说百分之六十九是妇女。

由于边界常有变动，统计数字是不完整的。边界上的学校与合作社被入侵者破坏了，但过了六个月又得到恢复。就在毛向代

表们——七百个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这些代表关怀着水利、集体购买牲口、工资、学校这类群众生活问题——做这场朴素而精彩的报告之时，美造轰炸机一百五十多架正在集中，准备进行第六次围剿，作孤注一掷的最后努力，要将那些满怀信心开展革命斗争的工农从中国地面上斩尽杀绝！

三、帝国主义者

靠着美造轰炸机的威力，中国政局展现出新的局面，查尔斯·霍奇斯在《亚细亚》一九三四年五月号上说：

“这些飞机事实上成了反共军事的主心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着它们的支援蒋军才能打下去。”

斯图尔特·利利科在同年十月的《当代历史》上对此作了补充。威尔伯·伯顿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出版的《中国每周评论》上预言：“轰炸机将决定中华苏维埃的命运”。又在次年一月号《巴尔的摩太阳报》上说：“过去七年中使中国免于赤化的唯一巨大力量就是帝国主义。足以证明这一点的例子是，全国要地实际上无不处于外国的控制之下。沿海与内河主要航道，也由外国人警戒着。”

“同志们！”毛在大会上说：“苏维埃和红军对挽救中国的危亡肩负重任……国民党已经向帝国主义全面投降了。……但是苏维埃决心援助和领导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同志们都明白，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解放，而且是向着整个东方被压迫人

民的解放迈出一步……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阴谋在太平洋地区挑起帝国主义战争。我们的胜利对它将是一个致命打击……”

“不仅为了拯救中国，而且要从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中挽救世界人民”。这是中华苏维埃另一位代表的话。这些灾难深重，正在江西群山之中召开自己的国会的“赤匪”，认为这就是自己的主要任务。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争夺将直接导致世界大战。崛起的中国人民倘能摆脱帝国主义，就可以阻止大战于爆发之前。这便是这些身陷重围的工人农民的任务，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任务。这是他们的主席毛泽东宣布的。

帝国主义已经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日、英、美、法、意都来为国民党反共十字军帮忙。以反共这一神圣目标为借口，蒋继续从上海银行家手中拿钱。至于政府其他开支，他们是不肯出钱的。蒋从美国得到借款与飞机，从日本得到枪炮。全国共有九十九个师，七十六个师被调集去包围江西赤区。德国军事专家替他训练军队。美国教官为他设计空军基地，编制空袭计划。调动了二百门新式大炮，筑起了一个又一个碉堡。帝国主义竞相援蒋，乘此大捞一把。意大利飞行员想把美国人挤走。日本则施加压力要以本国人取代德国顾问。尽管它们在这些问题上吵架，要摧毁红军是完全一致的。

鉴于自己已被困于日益缩小的包围圈中，中国红军决定了一项果敢的策略。实际上两年前这一策略在另一苏区已获成功。他们的计划是突围向西到四川去同该地正在发展壮大中的苏区汇合。

四川这个省份，资源丰富，受到的掠夺也最严重。那里距离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沿海一带，要比江西远上一千四百英里，而同介于日苏间的未来战线则要近一千四百英里。英军已从西藏开向华西，一如日本之进入华北。这两个帝国主义正在慢慢靠拢，以图形

成一条隔绝中、苏的警戒线。红色的四川将在这条警戒线的正中打进一个楔子。

因此，入川既是为了摆脱困境，也是为了扩大革命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包围圈里是受到局限的；同时，又是出于对内对外策略的考虑。来到四川，可以建立更加稳固的根据地，并且可以从一个更有利的地位来团结全国反帝人民去对付日本。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六万之众的主力红军撤出了瑞金。为了准备撤退，曾多次进行佯攻，还派了几支小部队提前出发。至于有哪些行动是迫于紧急情况，哪些是出于出色的战略意图，那只有将来撰写历史的军事学家才能作出解释。当蒋军开进瑞金之时，红军已经全部撤走，只留下一座空空如也的都城。蒋的宣传家汤良礼也承认这是美中不足：“不幸，攻下作为苏维埃首都已有六载的瑞金，并不等于共军首领之影响已告消失。鉴于肃清江西共党影响中所遭遇之困难，歼除邻省共军可能为一令人疲惫之漫长行动。”“匪首有可能脱逃，并于别一地区利用农民不满情绪再事活动。”汤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写这番话时，并未料到，岂仅是“匪首”们，连主力红军也全部“脱逃”了。他也不可能了解“农民的不满情绪”是怎样帮助了红军的撤退，以及“令人疲惫的漫长行动”的的确确在恭候着国民党！一等到看清楚了红军的行动路线，蒋便急忙跟踪而来。他下令各省军阀来支援他。在湖南，已经有一部红军通过。蒋据此判断，主力将随后来到。于是对六个县实行坚壁清野，迁走全部居民，毁掉所有粮食，按古代兵法行事，把一片荒地留给敌方。然而主力红军移师南下，不上圈套。越过高山，通过洼地、激流，走了一千四百英里，红军来到了目的地四川，全军会合，共达二十万之众。

在这远离海岸线二千英里的中国最西省份，红军再一次号召

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抗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不仅为了“给挨饿的农民以土地”，让孩子们都能上学，工人有饭吃，也不仅是为了“民族独立”，而且是为了“拯救整个东方免遭帝国主义瓜分与世界大战的大屠杀！”

远在两千英里外的东三省，爱国农民的游击队仍在许多地区对敌人进行骚扰。据日方报道，一九三四年九——十一月三个月中，日军与义勇军接触不下一万八千次。义勇军宣布一项联合各阶级各民族的统一战线纲领。满、汉、朝、蒙各族都加入了共同事业的斗争。大家遵照一个“民族革命政府”的号令行动。隐蔽于深山之中的这个政府，宣布同遥远的中华苏维埃结成军事同盟。

从四川向东南方二千英里，在覆盖全中国的大三角的另一点上，以孙夫人为首，上海的三千位爱国人士早就签名于一篇“要求武装抗日”的宣言，并组成机构，立即在所有主要城市建立了分支。他们要求动员与武装群众，抗击侵略，没收共值两亿元的在华日本企业充作军费。

中共很早就指出，江浙财阀与经纪人是决不会对帝国主义作战的。“因为他们同帝国主义勾结一气，从中得利，”蒋既然把他们当靠山，也就逃不了要走上导致如今局面的绝路，甘当帝国主义代理人，进行反人民的血腥内战。

他扮演什么脚色，就是漫不经心的旁观者也看得愈来愈清楚。每一次对苏区的进攻都有公开的外援配合。当红军向四川转移时，《华北通报》报道说，在长江上阻截红军的有“五艘中国炮舰巡弋受到威胁的地区。与此同时，英舰瓢虫号、美舰帕耐号和一艘日舰也都开到了芜湖”。日、英、美又一次结成一伙来协助蒋围剿红军。然而即使它们联合起来干也未能奏效。

日军不仅进入北平，控制华北，还在上海建立军营，屯兵三千，

配备了许多坦克，在马路上进行演习。日本人还从工部局中撵走反对他侵犯租界土地的英、美人士。

英国觊觎中国与西藏接壤的地区，借款两千万给四川军阀刘湘。将来红军自然不会去归还此款。法国最近占了加罗林群岛的一部分，收买云、贵军阀，企图通过印度支那进入该地区。德国供给蒋军事顾问。意国动用庚子赔款买飞机给蒋。它的空军顾问开始取代美国人。

就连“国联”也来助一臂之力。在访问过剿共军事大本营南昌的要人中，不仅有迈尔斯爵士和前英联邦大臣兰普生——此人在宴会中祝蒋成功——还有国联技术专家鲍尔西斯与拉齐曼。他们准备“为收复区的重建工作拟订计划”。

美国又如何？美国资本家要求中国实行门户开放。这意味着它凭借其经济优势可以在竞争中占先。自由主义者则寄希望于蒋，以为他会回赠几片“民主”、“现代化”的遮羞布，也就是他们自己曾用来美化蒋的东西。美国的“爱国者”喊叫要提防“日本的威胁”，吹嘘美国“同别国不一样”……那么美国到底演的什么脚色呢？

一九三四年的一十一月中，南京政府的飞机有四分之三是美国提供的。用于对付共军的卡车，十分之九来自美国。对此还可加上杭州柯蒂兹—赖特厂生产的飞机，年产六十架。还有新辟的川滇航线，这是泛美航空公司与南京政府共同使用的。在迈阿密航空竞赛中展出了外形丑恶的低翼单翼机。“用于袭扰地面部队”，而在感兴趣的参观者中就有毛邦初将军及所率中国代表团……广州空军也是全盘美国化的……其指导与组织者是美国人……美国人在粤北为广东建造了飞机工厂与炸弹工厂”从其地理位置来看，只能是用之于内战的。

有个西方传教士发狂似地赶到广州报警：“红军要占领广西

的县城了！”不到两小时，美舰明安道号全速开向西江上游。美国总领事史密斯就在此舰上。明安道号一直呆到红军西进之后才走。（《华北通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报道。）

在纽约一次集会上，曾在美舰服役的一名海军人员站起来谈了自己长江上的见闻：“我们只待南京提出请求，就会沿江上驶，扫射江岸。据估计是去打共军，不过我们不清楚打谁。”

是美国的白银政策从中国内地大量吸收银元，再转到上海的投机家手中。是美国飞机轰炸了那些静坐不动犹如树林一般的红军。是美国用废铁支援了日本入侵满洲。据《铁的时代》报道，一九三四年美对日出口废铁计一百八十三万五千五百五十四吨，占其此项出口总额之半。而这种物资对于满洲战事的消耗是绝对不可少的补给。

支援日本强占满洲，支援南京政府镇压中国农民，支援广东军阀反蒋，支援历次中国内战中的屠杀，还派海军直接参与屠杀——美国真不愧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

但是，除了金融寡头、工业大王的美国，还有另一个美国。这就是孙夫人向其发出呼吁的那个美国：

“致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我热切呼吁你们发动一场强有力的运动，反对美国干涉中国……运送军火、飞机、炸弹、飞行员，借钱给腐败的南京政府。这昭然若揭地暴露了美帝同中国反动派是在通力合作，屠杀以百万计的工农，从而延长了中国内部的混乱，加剧了破坏。驻华美舰被用来支持南京对付革命群众已不止一次了。

面临日本的武力入侵，南京军队奉命，不得去打退帝国主义，反要以枪口对准英勇抗击侵略者的同胞。有外国军队、军火、外国参谋部、外国飞机与飞行员的帮助，南京摧毁了数以百计的城镇乡

村，轰炸男女老少平民，致使几百万人无家可归。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帮助……
瓜分的黑影威胁着我们，也将导致全球性的战祸。

中国·上海·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日”

签署这封信的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温和优雅的一位女性，但她又是最坚定沉毅的人——孙逸仙博士的遗孀，闻名全国的革命家。她在丈夫逝世以后跨入了革命的新时代。她就是宋庆龄。

这封信是写给那些认为劳动人民有权主宰自身的生活与道路的美国人的。同时它也是发出了警报：假如帝国主义把中国人民镇压下去，那也便为新的世界大战布置好了舞台！

我为什么七十二岁
来到中国

前 言

有人建议我写自己的生活经历，特别是《我转换世界》^① 所写的年代以后的经历。我那本书只写到了一九三四年，自那以后，已有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是我的生活最为活跃的时期，我今后大概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来把这些年的事情统统都写完。我在这个时期所做的事，包括西班牙内战时，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两次到西班牙去的旅行；这两次旅行的结果，使我写出了《战斗中的西班牙》^② 和《在西班牙的美国佬》^③ 两本书，后一本到现在还没有出版。我在这些年所做的事，也包括几次到中国的旅

① 《我转换世界》(“I Change Worlds; the Remaking of An American”),一九三七年出版，是斯特朗的自传，叙述一九三五年以前她在美国和在苏联的活动，以及历次访问其他各国革命情况的经历。——译者注

② 《战斗中的西班牙》(“Spain in Arms, 1937”),一九三七年出版。
——译者注

③ 《在西班牙的美国佬》(“The Yanks in Spain”),由于美国共产党的内部破坏活动，这本书一直没有能在美国出版。——译者注

行，这几次旅行大部分已经写进别的几本书里了。此外，还包括一九四〇年到立陶宛去的一次短期旅行，那时这个国家正在投票表决加入苏联（关于这，我写了一本小册子：《立陶宛的新道路》^①）。我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间，自莫斯科坐飞机到中国，路经阿拉木图，从那里飞越沙漠地带，到了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又从重庆飞过日本防线，到了香港。我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回到了美国，带着有关国共冲突的许多资料，准备到纽约后发表。

以后的三年：战争在太平洋上展开，我留在美国，到各地演讲，也到加拿大去演讲，这时这两个国家都卷入了世界大战；这期间，我在好莱坞执行了一个短期合同，为一部电影片的制作，担任了“俄国专家”；这以后我在帕洛阿尔托住了下来，写了关于苏联的三本书，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总结了我所见到的那个国家的情况。这些书就是：《苏联人民预料到了》^②，《多民族的苏联》^③和《澎湃的河流》^④。

再补充一点：我曾在一九三九年进行了一次横跨美国的汽车旅行，来调查美国那时执行“罗斯福新政”的情况；结果写成了《我的祖国》^⑤。我在那次旅行中，顺着一条曲折的路线，坐汽车从洛杉矶往北开到了西雅图，又往东顺着黄石公园和北达科他、衣阿华开到

① 《立陶宛的新道路》（“Lithuania's New Way”），一九四一年出版。
——译者注

② 《苏联人民预料到了》（“The Soviet Expected It”），一九四一年出版。本书主要是论述苏德关系和苏联的卫国战争。
——译者注

③ 《多民族的苏联》（“Peoples of the USSR”），一九四四年出版。本书主要是向美国人民介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情况。
——译者注

④ 《澎湃的河流》（“Wild River”），一九四三年出版。是用长篇小说体裁来描绘苏联人民的英雄业绩。
——译者注

⑤ 《我的祖国》（“My Native Land”），一九四〇年出版。
——译者注

了底特律；以后再经过田纳西流域行政区直下佛罗里达，然后又往北开到了东海岸。就是这次旅行的结果，罗斯福夫人邀请我到她的海德公园家里过了一夜。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丈夫^①来到了美国，主管一九三九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苏联馆的工作；我们同在佛乐欣住了几个月。

一九四四年，战争仍然封锁着大西洋和太平洋上从美国到莫斯科的交通线，但是美国国务院终于同意发给新闻记者的出国护照；我坐飞机从费尔班克斯起飞，经过阿拉斯加，越过北极，直到西伯利亚铁路。我发现德国人已经从明斯克撤退了；我停留在仍处于战争状态中的莫斯科，直至一九四五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是用在进入波兰的几次旅行上，在那里我写了波兰的新政府，它首先在卢布林建立了起来，后来到了罗兹，最后到了华沙。我写的《我看新波兰》一书^②，概括了这一时期的情况。后来我乘了一艘苏联货轮，从巴统出发，经过土耳其的达达尼尔，回到了美国，那时和平时期的交通还没有恢复。

一九四六年初夏，我在美国巡回演讲之后，从旧金山坐了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上海，这架飞机以高价出售机票，却没有舒适的座位。这次旅行决定了我后半生的生活方向。从上海飞到北京之后，我发现可以到延安和几个别的“解放区”去访问，这些地区已经在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统治之下，并为共产党所组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守卫。我在中国停留了九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在解放区。当

① 一九三二年左右，斯特朗在莫斯科同一个俄共党员乔尔·苏宾(Joel Chubin)结了婚，他是一位作家和编辑。——译者注

② 《我看新波兰》(“I Saw The New Poland”),一九四六年出版。——译者注

我在一九四七年三月最后离开延安时，我自己已经知道我还要回到中国来；如果可能，我愿意在中国度过我的后半生。这样做的理由，我已经在一些文章和书里说过了。

关于在这以后一个时期的经历，人们常常问我：“你是否曾经听说过为什么俄国人逮捕你，并把你叫作间谍？”我的答复是：我从未被告知逮捕我的原因，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关于此事的任何确实的说法。但是，关于此事，我已经想了很多。当我被捕的那一瞬间，我就开始想，一直连续想了好多年。我作过很多推测。我不怀疑的是，除非是由于某个低级官员的偶然错误，而这很不象，逮捕我的原因必定与我同中国的关系以及俄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有某种联系。当我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被捕时，在这两个国家间并没有出现公开的冲突。但是，现在回顾过去，我可以看出当时我没有觉察出来的许多矛盾。

所以我想，即使我没有时间来把三十年的经历全部写成回忆录，而只把我自一九四七年离开延安起，直到一九五八年最后又回到北京为止的全部事情，比较详细地分析一下，也是很有价值的。这不仅作为个人的回忆录来看是有价值的，而且这样来显示公开冲突发生前十年间的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也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将从我怎样离开延安写起，试把以后几个时期的全部有关情节统统写出来：即把我被捕以前的一个时期和我被捕期间以及不加说明地指控我是间谍，使我住在美国的那一更长得多的时期，直至莫斯科一九五五年为我平反，和我能够开始再在国际间旅行之时为止的所有情节，全部都写出来。

一、离开延安

在我离开延安之前的那天晚上，我被邀请去向毛泽东主席告别。他这时已经离开了他在延安的住所，因为城里的人正在疏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撤到不很远的山里了。事实上，这也是我要离去的原因；这时我住在“美国大院”，抗日战争时美国在那里设立了一个联络组，那里接待一切西方客人。

那天我接到周恩来的邀请，要我到杨家岭的礼堂去看戏。可是我知道他们已经走了。那天他们只是回来一晚，在这里演一场告别的戏。对于我来说，那天晚上不告诉院子里的美国军方人员，自己一个人走到剧场去并不很困难。我被引到前排的一个席位，看见我曾会见过的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也都坐在那里。夜晚非常冷，我们都穿着棉衣，有的还穿着皮衣，在一些放在头排观众和戏台之间地上的炭盆上暖手。

戏演完了以后，周恩来带着我进入山边一个窑洞，那里已经摆好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还有茶和花生。我在那

里最后一次和毛主席谈话。他肯定我不能随同共产党一起到山里去，并说，我已经知道了外界需要知道的关于他们所有地区的情况，我应该带着这些情况走向世界。“当我们再同外界取得联系时”——他认为这需要“大约两年”——我可以再回来。他说，我特别应该把这些情况带到美国去。他说，他不认为有必要让我把这些情况带到莫斯科。我不能回想出他说的确切字句，而且翻译也不一定准确。所以我不能说，毛主席是不是特别建议我不要到莫斯科去。我那时的印象是，他只不过是说美国人民需要知道这些情况，而莫斯科不需要。因此，我不应在莫斯科浪费时间，而应直接回到美国。两年以后，我在莫斯科的监狱里，又想起了毛主席的话。我想，就在那时，他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中苏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并且预先叫我不要去呢？

不管怎样，我是带着直接从上海飞回美国去的意图而离开延安的。我没有任何要在路上转到莫斯科去的打算。但是这个计划为美国共产党的态度推翻了。在到上海后，我给一个可能关心中国的左翼组织“远东政策民主委员会”发了个电报说，我有从延安和共产党领导的其它解放区得来的最新情况，要求他们尽快在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安排三次大型报告会，来弥补我从上海回来的飞机费用。但是，他们连给我回一个电报的费用也不肯浪费，他们只回了我一封航空信，说我想开有关中国的大型报告会简直是发痴：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丢掉了他们所有的大城市，人们对他们的兴趣已经一落千丈了，最多只能期待在冬季或许可以安排一次费用不大的巡回演讲。同时他们建议我从莫斯科回去，因为人们对苏联较有兴趣。我接到他们的回信时，正在上海百老汇大厦的一个房间里，忙于写着我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同时也忙于应付各种各样来找我的人，给他们所需要的情况资料。

我的计划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要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向世界各地传播，特别是要向美国传播，同时也不得不受限制于我所了解的技术条件。在美国举行演讲会的季节快要过去了。我并不是需要钱来旅行，而是需要能起重大作用的演讲。如果不是为了这个，那我还不如呆在上海写作，直到我能写完一本书为止。上海这时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个组织的中心，许多国家的代表都在这里。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来我的住地，询问中共情况。我知道我那些关于延安的情况资料，被人们急切地拿去了，正在送到印度，东南亚，菲律宾和日本，同样也正在送到欧洲。我觉得我到达了世界的许多地方，虽然还没有到达那个最关重要的国家。^① 不管怎样，除非我的书已经写了出来或者在美国找到了重要出路，否则我还是在上海呆着最好。特别是因为有好几个星期，还可以利用偶然来往的飞机，同中共的领导人互通消息。

于是，在上海期间，我把在中国解放区见到的情况，写成了一本书，书名《中国的黎明》。“救总”的一个印度代表，把一份稿子送回了印度，那里有两家出版社都想要，结果由印共的出版社印了出来。一个日本人要把这书的稿子送到日本去，我给了他一份原稿，但是结果如何，没有下文。我把原稿打了好几份，送给纽约和伦敦的我的著作代理人。这以后，夏天来到了，要想在美国来个大型演讲会，已经太晚了；我写完了几篇短文，寄给美国的出版社（从上海寄去的文章要比在纽约投送的稿件更能引起注意），并准备回美国去。

在上海写的文章中有一篇特别值得一说。文章的题目是《毛泽东的思想》。它不是根据毛泽东自己在延安同我的谈话，而是根

① 这里指美国。——译者注

据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告诉我的有关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来源等材料而写成的。这些同我谈话的人当中有刘少奇，他同我谈了一整天，在谈话中他论述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创造。我把这次谈话和其他谈话写在一起之后，就给了这样一个标题。在我最后离开中国之前，我曾把它送回到延安的领导人那里去修改，修改以后发表在纽约一家现在已经不能出版的左翼刊物《美亚》杂志上面。今天毛泽东思想已是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中国专家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不管怎么说，我那篇文章是世界上发表的第一篇论述“毛泽东的思想”的文章。我后来知道，中国的领袖们表示很高兴，别的友好作家，只不过描述了他们的成就，而我还注意写他们的理论。此外，我还认为，我的这篇文章以及它所引起的东欧某些国家的注意和重视，可能是我被捕的原因之一。

* * *

住在百老汇大厦时，我有相当多的机会可以看见处在国民党统治压力之下，以及几乎必须说是处在美国占领之下的上海生活的某些方面。很多美国军队，它在法律意义上是中国的抗日盟军，驻扎在上海。当我走向街头时，我可以看到美军对待市民们的傲慢行为。有一次一辆汽车，满载着美国兵，在街上高速行驶，突然间改变方向，窜到马路的另一边，以便在那边拐弯处停车。结果，给中国人造成了相当大的交通困难，使人力车和汽车挤到了一起，都不得不停下来，甚至还得倒退。我还想起来，有些学生大胆进入百老汇大厦来找我，想得到延安的情况。当时我对他们的安全是多么的不放心，因为他们很可能被蒋介石的警察所逮捕。我又清楚地回忆起来司徒雷登给我的印象，那时这位曾任北京燕京大学校长的美国驻华大使，在关心中国人民疾苦方面，还负有声誉。他叫人传信给我，他想同我谈谈延安。我很乐意地去看了他，因为象这样的神

话，那时还是存在的：说什么马歇尔将军来中国，目的在于平息国共之间的内战；还有说什么美国公众舆论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在政府这一级上也存在着一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品质的倾向。可是我吃惊地发现，司徒雷登对我所告诉他的关于延安的政策或人物的任何事情，一点点兴趣也没有。他只有一个问题：他如何能够与中共领导人取得联系，以便“谈判和平”。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已经离开了延安，消失在群山之中。美国大使没有办法去联系，这使他烦恼。他好象有这样的想法，由于我不久前在延安呆过，我可能会有联系的办法。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焦急，看来很不寻常。我问他为什么要同他们联系，他说他想讨论和平谈判。我建议他在报纸上宣布此事，他们大概是会得到这个消息的。可这完全不合他的意。我又问他：“什么样的谈判？你们谈判时还继续打不打仗？”他好象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最后他说，“在谈判时我会坚持停火的。”我指出这行不通。但他不懂为什么行不通。

我解释说，“看看当前的形势吧。整个华北，还有东北，蒋军据守着设防的城市。美国把他们空运到了那里。在他们周围的乡村里，农民们站在共产党的一边；蒋军出来抢东西时，他们就打它。现在你要停火。可是停火后蒋介石的军队还要不要吃饭？或者，在停火后他们可以不吃东西？如果他们要粮食，是美国空军运给他们，还是他们得从农民那里去搞？如果他们到农民那里去搞粮食，农民会给他们，还是要抗拒？在这样的形势下，就停止不了打仗。”

他看不到这个形势，因为他拒绝看。这时我想，象他这样一辈子住在中国的人，对于存在的事实这样无知，实在令人吃惊。

* * *

当我最后写完我那本关于中国的书和我必须写的其他文章时，已经是夏天了。我确实感觉到（一方面由于纽约来信，同时也

由于季节已晚)除了我的一个代理人为冬季演讲而进行着一些缓慢安排以外，在美国我不可能再安排什么演讲了。这时再也没有别的事情使我留在上海，我就决定不管怎样，我都得回到美国去，我预定了飞机票。但是使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苏联驻上海的领事来看我，并且说莫斯科来了指示，说我可以去访问北朝鲜。原来，早些时候我曾偶然在某处遇到过他，我曾表示我想去北朝鲜访问。他把这当作了正式申请，并办出了结果。不过他说，没有可以从中国直达北朝鲜的路线，我必须先坐船到海参崴，再坐几小时向北开的火车，然后才能坐上往平壤的飞机。他这样说，使我吃了一惊，不知如何是好。我已经忘了早先的申请，而且正在计划回美国了。

接着我想：关于中国的书，我已写完了，夏天又不可能安排演讲，并且所有美国朋友都要我去莫斯科，而北朝鲜自太平洋战争结束以来还没有任何外国作家访问过；我可以访问北朝鲜，然后再经过莫斯科，直接回到纽约。于是我不坐去旧金山的飞机，而改乘苏联船，到了海参崴，并访问了北朝鲜。

* * *

路过大连时船停下来，一些苏联乘客搭上了船。我在岸上盘桓了一些时候。苏军仍然占领着那里，但是地方上的市政府和区政府完全是中国人的了。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那里的市长和地区的官员，既不效忠于蒋介石，也不效忠于中共，而是热中于打听消息。当人们听说我到过延安，他们就要我讲延安的情况。自然，我就讲了。

* * *

在海参崴，我首先注意的事情是苏联报纸上关于中国的新闻。我急切地弄到了从莫斯科来的最新的中央报纸，从中寻找官方消

息。我弄到的不是《消息报》就是《红星报》，后者是军方机关报。我忘掉了找来的是那一种报纸了，但是我知道它有资格代表苏联在军事新闻方面的看法。那上面发表了一篇一位高级军官的长文章，讲的是“两年来的中国内战”。我仔细地读了它，开头是热切地读着，然后是震惊。因为文章是以中共的最后一座大城市延安的“不幸”撤退来结束的。很明显，这是一种失败的语气。作为共产党的报纸，剩下的假设是：有一天共产主义势力还是会在中国再度起来的；而现在，他们显然是失败了。很清楚，这篇文章作者对于我已经在解放区了解到的中共战略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他是以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战略来设想中国的内战的，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是寸土必争地牺牲了大量人力，中共的战略则不一样。他们痛痛快快地放弃土地以保持有生力量，来消灭敌军。我清楚，他们离开延安是为了更好地把蒋军陷入城市。

我决定一到莫斯科就得把这告诉俄国人。这时，我已得到了去北朝鲜的签证，到那里去的旅行在迅速地安排着。这次旅行已在两本小册子里描述过了。我在这里只想说一说的是，在平壤我所能讲的关于中国的每一件事情，都引起了很大的兴趣。他们表示想要出版我的书，可是没有时间来抄写稿子。我答应从莫斯科寄给他们一份。后来我照寄了。可是，他们是不是收到了，我没有听说过。

* * *

在莫斯科，我和我丈夫的两个姊妹共用的寓所那时还可以供我住宿。我立刻设法传播我在中国的见闻。我记得那时曾经给我认识的苏联外交部长写过信，说我不但访问过延安，而且还访问过许多别的中共解放区，并且说我愿意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他。但是我却没有得到回信。我走访了《真理报》和《消息报》，发现他们的国

外新闻编辑对我的材料很有兴趣，但是他们同总编辑讨论之后，却不要我的文章了。

我有点惊异的是，《文学报》的编辑忽然来找我，说他从《真理报》那里听说我有关于中国令人感兴趣的材料，他愿意谈谈这些文章。我有点失望，我回答说，我的材料他是不会有兴趣的。因为我不懂中文，我一点也不了解中国文学或中国作家，他们的报纸想必是专搞文学的，而我的材料是讲军事战略和经济的。他回答说，他知道这个，可是他愿意看看。结果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关于军事战略，一篇关于毛泽东。我后来听说，如果文章的内容两家主要官方报纸不愿发表，而他们又不愿让人看出这些文章被扣压下来，就常常让《文学报》来发表。几个星期以后，我在东欧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中国新华社的代表，他告诉我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看到了这些文章非常高兴。

我马上从莫斯科写信到纽约，安排在美国的定期演讲会；我发现我只能通过一个代理人，安排明年一月才能开始的一种普通巡回演讲。同时我又重新编打我那本关于中国的书，设法在莫斯科出版，也在东欧出版。在这方面，我在中国认识的迈克尔·鲍罗廷给了我一些帮助。他这时是苏联新闻局的一个副编辑，那个机构是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为了对外（特别是对东欧）发送宣传材料而创建起来的。他很有兴味地读了我的原稿，并且推荐给同在那个局里工作的一些人，同时也推荐给莫斯科一家在苏联国内发行俄文图书的出版社。

重打原稿时，我又把它重新组织了一下。印度已经接受的第一个稿本开始讲的是延安的一个中国农民。现在我想，在欧洲出版，它最好是先从中国革命的国际重要性讲起。于是材料就这样重新改组了。

同时在我家里，我开始从人们私下的议论中去了解当时莫斯科广泛流传的观点。一个在外交官学校学习的青年来找我丈夫前妻的女儿，她这时正在莫斯科看望我。在谈话过程中，他轻蔑地说中共“已经失败了”。我回答说，正相反，他们正在走向胜利。

“啊，不，”他说，“他们已经失掉了他们所有的大城市。”

“这是战略，”我断然地说。“他们将使蒋军在这些大城市里陷入困境，然后开始战胜它。”

他傲慢地微笑着说，“他们不会战胜的。他们没有工业，没有无产阶级。”

他走了以后，我丈夫前妻的女儿继续同我讨论这个问题。她说：“我很高兴听到你所说的中共情况。”她告诉我，在她熟悉的列宁格勒海军学校里，她所听到的说法同她那个青年朋友从外交官学校听来的说法一样，这些人对中国内战都有同样的看法。“糟糕的是，中共不能打赢，因为他们没有无产阶级。”看来，这显然象是官方的看法。

无论是莫斯科的出版社，还是苏联政府的新闻局，好象都不想出版我的书。我越来越不能安心下来，我亲自到东欧走了一趟，去安排我那本书的出版。我发现相当有人对这有兴趣。在布拉格，我被要求去参加一个包括有党的领导人在内的高级讨论会，讨论我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哥特瓦尔德没有到，但是许多别的领导人都出席了。如果我记得正确，讨论的题目是“毛泽东的思想”；捷克的领袖们表示希望得到一份抄本，让他们自己去出版。

我把我的那本关于中国的书安排到七八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去出版：安排到了布拉格，华沙，布达佩斯，巴黎，柏林，罗马和贝尔格莱德。我只访问了这些首都中的两个，其余都是通信安排的。东欧各国对中国的兴趣都很大，这时同南斯拉夫的分裂还没有发生，

我的书是另外一个首都的编辑为我在那里安排的。我自己的这一回忆有这样的事实根据：我必须另打一套副本 来满足这些需要。同时，我怀着一种胜利感回到了莫斯科，准备去美国。

在看到苏联新闻局显然不起作用后，我却能把我的书安排到那么多的欧洲国家去出版，我记不得鲍罗廷对于我的这一胜利是否曾经作过什么评论。但是我确实记得，我还去和莫斯科的出版社最后摊了牌。他曾不断表示对我的书有兴趣，而同时又要求修改原稿。他总是说要出版，但总不签合同。这时他又要求我作“一些更多的修改”。我失掉耐心地回答了他：

“我就要离开这里到美国去了，没有时间一再重写。假如我的书里有什么你不想发表，我允许你把它删掉。但是我不允许你对我说的话增加或者改变些什么。你喜欢那一部分，你就出版那一部分好了。”

这还不能满足他。他接着问：“你是不是能在你出版的其他版本中也作同样的改变？”

“这可实在办不到，”我这样回答了他。我说我愿同意他把想要删掉的部分通知所有其他国家出版社。我甚至可以自己把这些变动的清单送给这些出版单位，并且告诉他们这些是莫斯科出版社所作的变动，如果他们喜欢，他们也可以照着办。“但是我不能把你们的变动强加给其他出版单位，他们的版本可能已经排印了。”看来，我这样说，他是不满意的。

这就是一九四七年底我要离开莫斯科，准备回到美国去时的情况。

二、在莫斯科被捕

一九四七年底，我在莫斯科乘飞机飞回美国，中途在巴黎停了下来。

在巴黎，我遇到了三位中国代表：刘宁一，他是中国工会的代表；陈家康，中国青年组织的代表；还有陆璀，妇女组织的代表。这时中共还没有解放全中国，但是他们已经十分牢靠地占据了北满，就象我自己在一九四六年年底所见到的那样（那时我访问过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在巴黎的这三个中国人，正式代表着三个组织，也是中共在欧洲的主要代表。

一九四七年底的除夕夜晚，他们请我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饭后刘宁一正式向我说，在巴黎的全体中国代表的意见是，我可以马上回到中国去的时机已经到了。他说，“事情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他叫我到美国去把我的书安排给一家出版社，并作完我的演讲，然后就考虑从莫斯科到哈尔滨，回到中国去。他说，在满洲有很多可供写作的材料。以后我还可以随军南下。这是我们

之间的总的谅解。在此谅解之下，我在一九四八年初离开巴黎，回到美国。

关于那年冬天我在美国巡回演讲的细节，我回忆得起来的很少很少。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我在美国巡回演讲了那么许多次，要想把一次次都区别开来是困难的。我回忆得最清楚的是，一九四八年是这样的一年，在亨利·华莱士这个人的周围，很快地搞起了“进步党”这样一个联合战线，在这里美国共产党起了积极的作用，它在许多方面还起了左右一切的作用。那时我在帕洛阿尔托有一处住所，虽然我每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度过的，但我在当地还是为人们所熟悉的一个人。所以，我在进步党内起了积极的作用，被当作他们的代表去参加了那年春天举行的华莱士提名大会。

一九四八年又是这样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的妹妹同我断绝了关系，要我不再同她来往。她也住在帕洛阿尔托。自从父亲在西雅图死了以后，我就搬到了那里，为的是靠近她住。那时，自从我的丈夫在战争的年代里死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妹妹是我最亲近的人了。我没有察觉出，在她看来，我可不是同她最亲近的一个。她有丈夫，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些孙子孙女。对于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比我亲。她同我说，她怕我的激进的名声有害于她丈夫的职业。很清楚，这只是部分原因，因为她的丈夫是当地一个学校的校长，就要领取养老金退休了。我的推测是，政治气候变了，以前我那个妹妹向朋友们介绍我是一位有名的旅行家和作家时，是感到相当骄傲的，这时却担心我的名声对她自己不但不再有利，而且要有损害了。早些时候，她很高兴地利用我在莫斯科的住处，让她的两个最大的孩子在从高中进到大学之前，都在那里住上一年，“以获得外国教育”。这时，这已不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了，因为，冷战

日益加深，而在美国的阶级斗争也尖锐起来了。

我们那里的进步党的办事程序，在比较严肃认真的外国党看来，可能显得很随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选我作代表的那次会议，主席首先提问，有没有那一位出席的人有计划要到东部去，这样他或她就能够自费去参加进步党的大会。我说我正在计划到东部去，很容易去参加大会。但是不能答应回来作报告。因为我要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到中国去。如果我作为他们的代表去参加大会，我可以从东部写回一个书面报告来。这看来象是足够满足需要的了。于是全体一致选我作了代表。我又回想起，当我在进步党大会的会场上站起来说几句简短的话，象每个讲话的人都被那样要求的一样，要求来作自我介绍时，我一说出自己的名字来，就引起了一阵不寻常的鼓掌。这时我才觉出来，由于我写文章，大多数进步党党员是知道我的，但是都没有见过我，当我在会场上站起来时，他们还不认识我呢。很清楚的是，他们见到我和他们在一起是很高兴的，我自己在那里也很高兴。

我是不是应该留在美国，参加竞选运动，它将直至十一月才能结束，而这将着实推迟我回到中国去。我同美共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说，假如我在竞选中作为一个演说家或作为一个作家对他们有用的话，我就自愿留下来。他们说，他们很高兴把我作为一位演说家来使用。于是我就停留了几个月，直到我发现他们并不真正在使用我。

我耽搁在美国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还没有找到一家出版社来出版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最后，一位中国朋友说，我难于找到一家出版社的原因是，美国共产党对中国没有兴趣。他已经注意到，一年多来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没有一篇社论提到过中国革命。他没有再加什么推论，可是我一下子就推测到，这现象说明美共反

映了我已经在苏联注意到的那种对中国的冷淡态度。

于是我就去找一位党代表头头，直截了当地说：“我就要回中国去了。我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亲自叫我特别要把中国的革命情况带到美国来。我是不是不得不去对他说，我已经把我写好的关于中国的书安排到七八个国家去出版了，但是唯独在美国却找不到一家出版社？”这个问题提得尖锐到足以引起行动。商量的结果，他们不能出版我的全书，但是愿意出版一本比原书薄得多的书，假如我肯把我的材料缩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的话。缩写所费的时间比写一本新书少不了多少。结果写成后定名为《明天的中国》，由“远东政策民主委员会”出版。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很费时间的。所以直到九月我才又在巴黎遇到了刘宁一，告诉他我将去中国，问他对于这次旅行有什么建议。我已经得到了去莫斯科的签证，但是纽约的苏联领事不给我去中国的过境签证，说这得在我得到中国的入境许可后再去莫斯科办。刘宁一好象对这很满意。他告诉我到莫斯科去要一张进入满洲的火车票。他说，中共还不签发正式签证，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全国政府，但是他可以给我开介绍信给满洲的政府机关，这足以使我进入边境并能去到哈尔滨。“满洲边境苏联海关一检查完毕，你就可以拿出这些信来，叫他们打电话到那一边的海关。他们会让你过去的。”他并且补充说，“你可以把这些信给任何苏方管事的官员看。”他给了我两封信，都是用中文和英文写的。当刘同志向我告别时，他说，不久之后他自己也要到哈尔滨去，但是第一个到那里的大概是我。

* * *

我带着这些证件，到了莫斯科外交部的新闻司，说明这次我来不是要他们给我办居住许可，而是要一个到满洲去的过境签证，

因为我是路过这里到中国去的。新闻司的头头好象吃了一惊。他竭力主张我应该至少呆到十一月苏联国庆节。他说，那时我会被邀请出席莫洛托夫的招待会，而我一定是想要去的。他还向我保证，“然后你的出境签证会很快地在三两天内办好。”

他问我是不是已经得到中国的签证了。我知道莫斯科仍是承认蒋介石的，我就笑着说，“你的意思是问我是不是从蒋介石的大使馆得到了签证？你以为在满洲那对我有用吗？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看满洲主管当局签发的去哈尔滨的证件。”我打开我的皮夹子，准备拿出这些证件来。

他摇摇手，笑着说：“请不要……”，意思是告诉我，他看中共发的证件是不合适的。我也笑了笑，表示我懂得外交礼节方面的规矩。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他了。当我以后再去要求他办已经答应了的“三两天就可以办好的出境签证”时，据说他病了，我接触的都是新闻司职位较低，态度较粗鲁的下属人员，他们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拖延我的出境签证，但从不直截了当地拒绝我。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了。起初好象不过是办事拖拉。有一次我被告知，出境签证就要办好，可以去买下个星期的火车票了。我就预订了车票，把行李基本上打好，并准备了旅途上的食物。但是在答应好了的日期，签证还是没有下来。他们说，“这个星期不行了。”当我问什么时候可以办好时，他们又说不出来。“你能告诉我办不好的原因吗？”我这样问，可并不期待他们回答，因为拒绝的理由是很少说出来的。但使我奇怪的是，这次居然有答复了。我被告知，“满洲当局声明，满洲铁路上有土匪破坏，不准外国记者去。”奇怪，有土匪？不准去？后来经过我多方了解，我完全清楚了。当另一次他们又说满洲当局仍然说铁路上有“匪”情时，我立即回敬了他们：“什么满洲当局，你们是同蒋介石在西伯利亚的领事们

商量的吗？”这使他们很恼火。我也一样。事实上，根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我是说到节骨眼上了。因为他们仍然正式承认着蒋介石，所有在苏联远东的中国领事馆，从伊尔库茨克到伯力和海参崴，都是被蒋介石任命的人所掌管。这些人向蒋帮报告说，满洲铁路被“匪”所占，外宾不准来。对于苏联外交部，这就成为“官方的”了。

* * *

我听说一个国际妇女大会将在布达佩斯召开，美国的一些组织想要我去参加；为了这，他们寄给我出席证书。我就告诉苏联新闻司说，除非他们能够答应很快给我办好去满洲的出境签证，否则我想去布达佩斯。我这样做，是有几种原因的。这次大会的价值是部分原因，还有部分原因是想看看我在莫斯科的名望是不是已经垮掉了，我是不是还能得到去欧洲的签证礼遇。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觉得中国妇女一定会派代表来的，我可以同她们接上头。我这一尝试是成功了。看来，外交部新闻司确实很高兴给我签证，而且还是呱呱叫的好签证，连去带回，都给签了。

我同一大群友好的中国妇女相会了，她们之中的一些人，过去我曾在延安或者别的解放区见到过。她们对我非常热情，邀请我同她们一起回到哈尔滨去；她们说，“我们通过苏联边境后，将有一列专车进入中国。”

我在匈牙利干了一件有生以来最轻率的事情。中国妇女邀请我同坐她们的专车以后，我连忙去打电话，接通了国际线路，要到了苏联外交部的新闻司，告诉他们现在可以赶快办理到满洲的签证了。我说，中国妇女邀请我同她们一起去，她们在满洲有一列专车，用不着再担心“土匪”了。大会一结束，我就回到了莫斯科，没有参加任何一项匈牙利方面提供的游览，因为我要赶在中国妇女到来时能及时做好一切必要的安排。自然，这毫无用处。以后，中国

妇女经过莫斯科走了，我在民族饭店的餐厅里见到了她们，向她们祝贺，向她们告别。苏联的出境签证就是没有给我。以后苏联新闻司就只好越来越被我所烦扰。

* * *

秋天以来，中共胜利的消息早就开始在世界各地报纸的头条新闻中传播了。我每天在屋子里，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发布的中共胜利的消息。当我在城里走动，遇到记者拿着巴黎版的纽约报纸时，这些报纸也登着关于中共的，横跨八栏的大字标题新闻。

苏联的报上却一点也看不出来。我热切地想从它上面看到什么消息。我注意到，十一月初在《真理报》最后一版“塔斯社通告”的标题下，出现了一条四五行字的消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称打下了沈阳。这意味着他们占领了整个东北。我寻找社论，可是没有。我继续认真不倦地注意看报纸。直到十二月六日，在第四版的塔斯社通告栏下，出现了一条略长的六行新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长江以北国民党最坚固的设防城市徐州被攻占。”

华北已被中共所攻占！在莫斯科的报纸上依然没有社论出现！

在外国记者和外交界人士当中，流传着种种疑问。苏联报纸在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面前这样沉默是什么意思？他们通常的论调是斯大林好象不喜欢看见中共胜利。这个观点我不能接受。我从我丈夫家里的人那里知道，莫斯科工厂里的工人是懂得打下徐州的意义的。他们在工厂集会上庆祝这个胜利。我向俄国朋友们询问，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给了最能使我接受的解释：“我想是由于我们对中国形势的分析，正在高级领导层中重新审议，所以在此期间，报纸保持沉默。”

这时我不断接到世界各地的来信，督促我向着到中国去的目

标加速前进。纽约美共的一位党员来了一封信，我看出它反映了美共的正式意见。信是这样写的：“我们觉得这是你的不幸，也是我们大家的不幸，你被阻在莫斯科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希望你马上就到中国去。”另外一封从布拉格捷共新闻处的头头来的信里说：“把你从中国写来的文章副本给我一份，我将把它在捷克报纸上发表。”上年我从中国回来后，伦敦路透社曾发表过我的一些文章，这时又要我从中国前线给他写连载文章。到处都承认世界上最重要的新闻正来自中国。我的中国朋友邀请我去采访，但是我却坐在莫斯科，从收音机里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我觉得我辜负了世界上那么多的地方对我的要求。我继续不断地向苏联外交部新闻司以及其他我认为或许可以有所帮助的机构提出要求，但是都毫无用处。

我回忆起这个时期有两件事或许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关。我这时仍然向莫斯科的出版社施加压力，它曾经同意出版我关于中国的书，但是它却仍然犹豫不定。一天，迈克尔·鲍罗廷在我的面前给他们打电话，他为了我同他们争论。我突然听他说，“他们正在打胜仗，不是吗？这不证明他们的理论是对的吗？”这话使我吃惊，直到这时我简直还没有想到过，会有共产党人当真地认为中国的“理论”错了。另外一件事发生在首都大旅馆的客厅里。这时我的处境困难，在莫斯科的外国人当中，简直是众所周知的事。一个知道我的处境的外国记者告诉我，俄国人可能把我看成了一个铁托分子了。在上一年里，苏共和铁托间的争吵发展得很尖锐。我认真地听了这条意见，想了又想，回答他说，“不，我不认为我可以被叫作一个铁托分子。我自己并不怎么懂理论，我曾经认为双方在处理争端上都有错误。不过，在我看来，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上，南斯拉夫是可以牺牲的，而俄国人则不能。所以我紧靠着俄国人。假

如一旦要在他们和中国人之间来选择，答案可能就不同了。”这是我后来关进牢里想起来的一段话。那是一间大概很容易装有录音设备的屋子。

最后，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的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天津和北京，苏联报纸打破了长期以来对中共胜利的沉默，对于中国内战，发表了长篇社论，而中共的胜利这时已经继续了三个多月了。这时我再一次希望得到批准我去中国的出境签证，我再一次面对着一场顽强的斗争，它从来不是断然的拒绝，而总是无止境的拖延。

* * *

最后，二月里的一天，我去访问曾对莫斯科报纸长期沉默作了最好解释的那一位俄国友人，他告诉我：世界工会联合会已决定下次会议要在今年五月的某个时候在北京召开。我在大大激动之下，问他是在哪里看到这个消息的。他回答说，这消息曾在《劳动报》上登载过；他告诉我登载的日期。显然，这消息并没有出现在《消息报》或者《真理报》等官方大报上。

当天我拿到了我自己的那份《劳动报》，并仔细地读了它。这个通告是很清楚的。世界工联下次会议，将于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我仔细考虑了这有什么意义。首先，它说明中国工会将准备接待经西伯利亚铁路从欧洲来的大批代表，路过哈尔滨，直到北京，这表示那里的铁路不仅不怕任何所谓的“土匪”，而且已经可以提供舒适宜人的旅行便利了；其次，它表示，作为中国工会代表驻在巴黎的刘宁一，一定就要到莫斯科来安排大批代表的运送和签证；最后，由于刘宁一曾经邀请我回中国，而我又有关美国“劳工联合新闻社”的证件，刘宁一将会有充足的理由为我安排签证的。

我经过仔细考虑，并查对了世界工联在巴黎会议的闭幕日期，确定刘宁一很快就可以到莫斯科了。于是我就去中国代表以前曾

在那里住过的民族饭店，尽可能随便地问了一下房间管理员：刘宁一同志是不是已经从巴黎到了这里。因为在我这方面，不能显露出丝毫缺少把握的神态，否则旅馆就会拒绝透露旅客的情况。我这样问了以后，给我的答复来得同样随便：“昨天晚上我们等他来的，但是从布拉格来的飞机没有到。今晚可能会来。”我回到家，对于我猜对了这一点很得意，并考虑下一步如何能最巧妙地见到刘宁一。他毫无疑问一定会忙于同苏方官员安排即将来临的旅行细节。我决定直接去到他的房间，但是并不期待他能接见我，因为他很可能忙着别的事情。所以我得留一封信。我非常仔细地写了这封信。我告诉他，我等待苏联的出境签证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由于他曾建议我去中国，所以我仍然在等着，仍然在催问苏联的出境签证。不过，我觉得在莫斯科是浪费时间，在这里中国的消息一点也没有。也许借北京即将召开世界工联会议这一机会，他可能帮我弄到签证。如果不能，我认为我应该回到伦敦，或者也许美国，在那里至少我可以在我过去访问的基础上，根据一般世界新闻来写关于中国的文章。

我拿着信回到民族饭店，问了刘宁一住的房间号码，直接到了那里敲门。他的一个同事开了门，我看见刘本人在屋子里正同一个俄国人讲话。他的视线和我碰到了一起，他先是微笑了一下表示欢迎，然后关切地看着我，我理解它的含义是他不想被人打断。我晃了一下我的信，递给了开门的那个人。刘对这赞同地笑了笑，门就关上了。几个钟头之后，刘宁一的译员打来电话，为我约定了去见刘的时间。

这时，我觉得很轻松，并相信只要和刘宁一谈一谈，就可以确定我这样做还是那样做，我准备离开莫斯科了。也许刘能帮我去到中国，或者我得回到伦敦，也许回到美国，然后再走别的路线到

中国去。

第二天，我到外交部新闻司，要他们给我办随同筹备开会的世界工联人员去北京的出境签证；而且说，我已约好刘宁一次日上午见面详谈一切。后来我觉得至少我说这些话的胜利的语气是不合适的，而且很可能还促使他们迅速采取行动。

* * *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晚饭后我马上就上床睡觉了，感觉很疲倦，也很轻松。当几下重重的敲击落在我的卧室门上时，我已入睡了。我以为是哪一个朋友来了，门敲得这么狠，大概是对我的早睡表示善意的抗议吧。我披上了一件晨衣，走向房门，半睡半醒地把门打开。

两个穿着制服，带着随身武器的人，大踏步地走了进来说：“马上走，你被捕了。”

我开始一半迷糊，一半清醒地抗议着，说他们一定是走错地方了。他们却说，“赶快”，指着我应该穿上衣服。我一边穿衣服，一边还继续争辩着。他们告诉我，要带着换穿的内衣和其他日用必需品。我简直不能相信夜间就得离去。我觉得只要我一接触到任何一个当权者，他马上就会放了我，因为捕错了。我在糊里糊涂当中搜集起来的一些衣服，都是不适宜于穿用的。不过我倒是拿了我的钱包，里面已经装着我的护照和外币，并扔进去一些我一向吃的维生素药丸。当我走过住房的前厅时，从餐室开着的门望进去，看见我丈夫的姐妹用围裙掩着脸。在另一头，在厨房里，我看不见第三个警察看管着电话，防止这座楼房同外界沟通消息。

我想这一定是什么匪徒在进行绑架。这些人不象是苏联警察。可我又看见了黑色的大汽车，那是莫斯科高级官员，特别是保安警察所特有的汽车。他们开了车门，我进到车子里去。他们不用手

铐，只要我服从命令，他们连用手碰我都不碰。不过很清楚，假如我抗拒，他们是要强迫我的。这样，我们就来到卢比扬卡中央监狱，我认出了这是苏联保安警察的可怕的监牢。

三、监狱里的五天

我期待着一到监狱，就会面对着一个掌权者，他会知道我为什么被捕，说不定还会立即承认是弄错了。但是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监狱里的例行手续使我不再这样想了。这我本来是没有经历过的，但是在侦探小说里读到过，很快就看出来这是例行手续。我被引到一间小屋子里，那里一位女医生吩咐我脱光来一个彻底检查，这并不是要检查我的健康状况，而是要检查我有没有可能携带着隐藏起来的文件，武器或者什么准备在审讯受刑吃不消时用来自杀的致命药丸。这不仅包括检查体表，而且还要检查有洞的地方，以防里面藏着什么极小的东西。那位医生，在彻底检查中考虑得很周到，要不然就是过分挑剔。她很少用手碰到我，而是吩咐我自己用手指弄开她想用眼睛检查的地方。同样，去掉鞋带（这大概是防止犯人自己勒死的例行做法），之后她又仔细地望着我，象是觉得我还不会干出那种绝望的行动，她把鞋带还了我，说：“系上鞋带你会感觉得舒服一些的！”我穿上了鞋子，

系上了鞋带，果然觉得好一些。我马上问那个医生，为什么把我弄到那里来，但是很显然，她是不知道的。

接着我又被带到一间房子里去，那里有位官员坐在办公桌后面，象是很有地位似的。我问：“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他只是挥手要我坐到椅子上。我很快看了出来，他大概是个什么监狱管理员，负责安排我的牢房，但是对于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的健康状况。这使我怕了起来，怕会不会要我干什么重体力劳动，也许会把我弄到北方森林里的集中营里去。于是我小心谨慎地回答说，根据我的年龄来看，我的身体还算是好的。他问我需要不需要什么特种饮食。起初，我作了否定的回答，后来我想起来有一次休假，在一个苏联的疗养所里，他们让我吃一种所谓“牛奶—蔬菜食谱”，我把这告诉了他。他又问我需要什么特别药物？我回答说，我吃多种维生素，并不经常吃别的药。他要知道吃的是什么维生素。我说我带来了我自己吃的维生素，那是混合起来的多种维生素。我特别需要复合维生素B，它对我的神经有好处；我知道我将会神经紧张。所有这些问题使我很意外。

然后我被带进一间狭窄的房间，好象是在监狱的四楼上。前进的道路使我心慌意乱，长长的楼梯都是那样覆盖着重重铁丝网，如果有犯人想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他只会滑下铁丝网，在底端被截住，也许会受伤，但是肯定死不了。这种景象是会使人神经不安的。不过我被带进的那间屋子，更象是一间便宜的地方旅馆里的房间，而不象是牢房。有一个真的帆布床，很窄，不很舒服。不过，高高的窗户上面装着铁栏杆，显示这确实是牢房，而且天花板上装有总是亮着的，可由牢房外边控制的灯光，使卫兵能够日夜随时从房门上的小洞看到我的一举一动。由于已经过了午夜，我很快就进入乏透了的熟睡之中。

第二天早晨，我的早餐来了，我意外地看到其中有我吃不了的大量奶制品，不仅一大玻璃缸牛奶，还有一大份奶酪。这是一顿我远远吃不下去的早餐，但是它缺少我最想要吃的咖啡。我开口要了，结果给了我一杯很淡的咖啡。然后我又来了第二杯。送饭的人又拿上来另外一个杯子，放在我的桌子上，骄傲地说，“维生素”。从那芳香的气味来看，它象是用松针做的维生素C；我曾听说过，这种维生素的重要性，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曾被人们所了解；当时许多人死于缺乏蛋白质的饥饿，但是却没有缺乏过维生素C因而受苦；在那里这种维生素是用公园里的松树做的。我一直没有得到我要的维生素B。他们也不退给我自己储备的那种维生素，大概那些胶囊里装着的东西，照例是要被怀疑的。不过，我还是由于这些维生素C而精神恢复了起来，特别是由于它所显示出来的对我的照顾。

我的精神也为牢房门后面印着的字句所影响而振作了起来。其中一条劝告犯人“要对警卫有礼貌，假如他们也要警卫有礼貌地对待他们”。这显示出残暴并不是监狱里日常必不可少的东西。另外一条告诉我，犯人有权利每天在屋顶上散步一次，只要天气允许，他可以敲门叫警卫来让他出去散步。我享受了这一许可的好处。我很快就知道了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屋顶，被用高墙分隔成好几部分，在每一部分一次只许一个犯人去散步。我什么时候都看不见别的犯人；别的犯人也看不见我。带武器的警卫站在更高的地方，从那里他们可以看见每一个人。在从过道到屋顶我所要走的一路上，也都得遵守这样的规矩：如果我们遇到另外一个被警卫跟着的犯人，只要一发觉他们要来了，我们就退进一个边道里。很清楚，这是卢比扬卡监狱里的一项狱规：犯人不得相互看见。

直到第二天，我没有遇到一个知道我的案情的人。已是夜间

很晚了，一个卫兵来告诉我：“政委要你去。”我被带到楼上的一连三间的大办公室，各有一两个下属人员坐在外面两间屋子里，我们经过那两间屋子，进到一间放有一张长会议桌的屋子里，在会议桌的一头，坐着一位神色严厉的官员，另有一位显然职位较低的人，坐在桌子的一边，手旁有一堆纸张，显然是准备作记录的。

我马上提出来问：“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那个“政委”（他的确切职位和姓名我一直都没有听说过），不理睬我的问题，指着一张椅子，叫我坐在正面对着他的桌子的另一端。“我要来提问题，”他说。

他开始问一些照例要问的问题，如我的姓名、国籍、职业等等。很清楚的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他还怀疑我的国籍，拒绝相信我所说的我的职业是个作家。他说：“不，你不是。”我坚持着说：“是，我是。”他再一次肯定地说：“不。”

“那么是什么？”我问。

他回答说：“是个记者。”

我解释我既是好几个通讯社的记者，又是一个写书的作家。目前我主要是在写书。

“把它记下来，她是个记者，”他命令着。我同意了。我的心沉了一下，因为我知道，在莫斯科共产党人的理论中，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记者，特别是为外国资产阶级报纸写新闻的记者，则被认为是“二等间谍”。这样说，也许有点道理，因为记者往往揭露当局要掩盖的事实。不过，这样的含义是不能使我愉快的。

审问者继续问我在苏联的旅行，我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的，我来访问过多少次，我到过哪些地方等等。我回答说：我记不清我来过多少次了；因为我是一九二一年第一次来的，把莫斯科当作我的家已将近三十年了。我不断往返美国去演讲和写书，并且

来去走了很多不同的路线。我列举着我一次一次的旅行，他越听越惊骇起来。苏联外交部允许我看了那么多的地方，显然把他吓坏了。我在他的身上觉察出麦卡锡的气质，他毫无疑问地认为我是有罪的，他很得意地证明了苏联外交部如此疏忽大意，它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制止过我，这正象麦卡锡想办法要证明美国国务院的疏忽大意一样。

我回答的这些话都说得很自然，我希望有机会能回问一些问题。但是没有允许。关于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这个问题，我没有再问他他就回答了。那个“政委”站了起来，显然是为了要突出他的判决的重要性，他大声地说了一些话，以期把我压垮。但我只是用询问的眼光看着他，他恼怒地说：“你懂我说的是什么吗？”

我说，“我懂得你说我是间谍，可是我不是。此外，别的话我都不懂。”

他再说了一遍，用了一句专用语，意思是我不仅要“被送出这个国家”，而且要“被驱逐出境”，以示有罪。直到这时，我一直期待着某种审判或者至少是某种正式讯问，不仅提出指控，还允许我反驳。但这很显然是不准许的了。不过他说，我可以提出愿意在何处边境被驱逐。一刹那间，我心里以为他们终于让我去中国了，于是我就要求到满洲边境。但是我被粗暴地告知：只许在一个西部边境。当我选择华沙或者布拉格时，他们感到很意外。后来我想到他们是企图要发现“间谍”所选择的路线的，预料我会选择芬兰，因为它对苏联不友好。那时我心里想的是，华沙和布拉格的党政领袖我都很熟悉，只要我一能行动自由，不再被警察拘留，我就在这两个“友好国家”之一停下来，立刻打电报给斯大林解释并要求申诉，甚至再试图通过苏联到中国去……这时我甚至还使自己相信，审查我的人一定已经发现我没有犯罪，他们只想把我摆脱

掉，甚至连我的被捕也还没有向世界宣布呢。可是，到了华沙我才知道，我的这些想法错到了什么地步。

我在监狱里一共呆了五天。时期显得很长。长得使我过多地思索我被捕的可能原因，长得使我过多地想象拘留我的意图。在那种同所有的报纸和外界联系都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建立起完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而只有逻辑结构的纯粹空想。

这些天他们到我的住处，拿来一些没有经过很好挑选的内衣和其他衣服，并从我的文件卷宗里拿来一大批信件和笔记。在最后两天，每天晚上我都被带上楼，花费好几个小时来辨认我那文件卷宗里的材料，并一件件签字认定。各种各样的信件和笔记一点次序也没有地传给了我，可是我对这些记忆犹新，因为我已经花了好几个星期来整理我的文卷，以便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运往中国。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文件的选择一点道理也没有。我本来还希望我的文卷真能全面地被检查一遍，这不仅会显示我无罪，而且还可以看出我花费了几十年的工夫，写出了很多关于苏联的好材料。这时我在许多我原先为《莫斯科新闻》到苏联各地采访用的，早已忘记了的旧笔记簿上写上了“我写的，属于我的”等字样，并签了名，写上日期。其初我这样写着，我还认为这些东西的确可以证明我为苏联的一个报纸做过很好的工作。可是这种自信很快就被一件小事情给打消了。他们拿来一封我本来早已忘记了的信，那是美共一个党员写给《真理报》的，告发我犯了某种罪行。《真理报》把信转给了迈克尔·鲍罗廷，他是《莫斯科新闻》的总编，那时我在为这个报纸工作，于是他就来处理这件事情。我回忆起来我被指控的是在某一城市作过一次演讲，粗野地攻击了苏联。实际上我并没有去那个城市，而且那时我已经离开了美国，那个城市请去演讲的是另外一个人，当地报纸把他的话栽到了我的头上。这些情节都是很

容易证明的。我已经满足了鲍罗廷和《真理报》的要求。我清楚地记得，几个星期前整理我的文卷时，我找到了控告信和答复它的文件，并把它们别在一起，来表明原控告是美国报纸上的谎言。这时我发现他们只取来了给《真理报》的原控告信，却抽掉了所有否定它的证件。这样我就知道了，没有疑问的是，我的文件并没有被老老实实地检查过，检查文件的人只是为了要在文件里找出可以作为我犯罪的证据。从这一点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即使是我那些为《莫斯科新闻》而去斯大林格勒和库茨涅兹采访用的笔记本，也是可以不顾写作的日期和当时的情况而被用来证明我的间谍罪行的。因为斯大林格勒和库茨涅兹已经成了充满秘密的国防工业中心了，但我访问的时候，它们正在建设中，是很愿意被当作社会主义成就的榜样而由报纸公诸于众的。

于是我的希望破灭了。不象有什么公正的意图。只有那些可以歪曲地来证明某种罪行的材料才被找了来。

即使是这样，苏联的作法，就我所感到的，并不制造任何证据，他们只不过是寻求可以用来显示犯罪的东西，并把任何可以作为反证的证据清除掉。我注意到这一点以后，就开始在签名承认我的文件时，同时加注在什么时候或者给谁写的等等说明。这使得“政委”很恼火，因为，举例来说，如果注明我收集的关于斯大林格勒的资料是老早在战前收集到的，就使得用它来作为犯罪证据变得无效的了。于是，他就只许我写“是我写的，是属于我的”这些字样，以及我签字的日期。不过，他并不能完全如愿以偿，因为他并不是总呆在屋子里的。

第二个管事的人，他被我叫做“秘书”的，象是和气得多。我知道，这类机关的通常作法是并用两种人，一个粗暴，另一个和气，来诱使罪犯把拒绝告诉粗暴人的事情告诉和气的人。即使我对这已

经完全清楚，这种方法也还是会很有效的，因为对于在监狱里被剥夺掉同外界一切联系的人，即使是一点点宽慰，也可以成为不可抗拒的诱引吐露真情的力量。可是，我没有什么间谍活动可以交代，我只是利用“秘书”在场的时候来编排我的文件，使得它在形式上可能显示的罪行要比“政委”所想望的轻一些。这样做，即使当时没有什么效果，也许以后可以被那些重新审查这案件的人看见，也许多少年以后，可以成为平反的一个因素。

* * *

在第五夜里，我在文件上签了好几个小时的字，已经疲劳不堪，政委突然宣布我要立刻被驱逐出境了。我被告知“赶快把衣服装好”，连一个小时也不让我睡，我就得走了。我抗议我整夜没有睡，一连几夜也很少睡。可是，管我的人很执拗。他们说，“医生会检查你的身体的，并且会决定你是不是适宜于旅行的。”我知道监狱里的医生是怎样处理问题的，我很少希望她能给我一点休息。我到狱里来时对我很和气的那位女医生，这时肯定地说我“适宜于旅行”。他们给我送来了两只大衣箱，那是警察从我的住处装了来的，我连重新装一装的时间都没有。

我被告知，我可以带着我的美国货币走，但是所有苏联货币和在苏联的财产都必须留下来。我可以指定任何我挑选的苏联公民来承受这些金钱和财产。于是我就开始为这来开名单。接着我感到，我的任何赠与都会牵连接受的人，所以我只说，我的银行存款应该转移给那些当我不在时有权收款的人。许多年后，我听说这些人拒绝接受我的钱，那些存款依然在我的名下，没有动过。

在最后的时刻，当我单独和那个我叫作“秘书”的、比较和气的人在一起时，我求他可不可以给华沙打个电报，为我在外国人常住的旅馆里预定个房间。我提醒他，我在监狱里睡觉很少，已经精疲

力尽，这时去华沙，又要走很长一段不能睡觉的路，而华沙那里的旅馆又非常挤。他说他可以问问看能不能做到，但是他不给我任何允诺。

在早晨走过莫斯科的街道，清爽的空气扑在脸上，上升的太阳照耀着克里姆林宫的塔顶，这使我感觉精神在恢复，甚至于使我振奋起来。我一边向着那些尖塔挥手，一边想着：我是会光荣地回来的。

四、被驱逐出境

我由卫兵陪着，汽车飞快地向着莫斯科机场驶去。在机场，让我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吃早餐。很显然，我看不见别的旅客，也不能被别的旅客所看见。我们乘的是一架小飞机，只能坐八到十名旅客，机上的人都是卫兵或他们的家属，他们对我一点也不注意。坐这样的小飞机上下颠簸，我觉得很不舒服，但还想稍为打个盹儿，因为已经疲乏到了极点。最后我们降落在一个开阔的地面上，在那里我被换上了汽车，后来又换乘一辆小吉普车，里面有一个司机和两个卫兵。这样，我终于到了波兰边境。那是一处荒凉的边境，在那里两国被一条小河隔开，河上有一座破桥，桥又倾斜，又不稳，吉普很难过得去，只有步行还可以。

在一个哨所前面下了车，两个卫兵提着我那很重的箱子走到桥中央，放在那里，我跟在后面。他们把我的护照和装有我的美国货币的皮夹子递给了我，然后离开了我。一个相当困惑不解的哨兵从对岸向我走来。我急忙打开

护照，发现里面有波兰的签证。当他来到时，我就给他看。他拿了护照，用俄语对我说，他得拿给他的上级去看。接着他就走回波兰的哨岗。等了一会儿，他同一个他的上级军官一起走了过来，问我我要到哪里去。我回答：“华沙”。然后我被告知，去华沙的火车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要从不远的一个车站开走，他们可以用给他们装煤的卡车把我送到那个车站去。

那是一个小小的火车站，没有兑换外币的机构，不过他们接受了我的美元来付车票，并找给了我一些波兰钱，我用其中一部分付给了卡车司机。海关人员里里外外搜查了我的行李和我的全身，他们对于我这样古怪地来到这里好象迷惑不解。这使我更相信我在监狱里已经形成的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推测，我相信苏联当局已经知道他们是搞错了，逮捕了我使他们很不好意思，他们是不会把这事宣布出去的。这很好，我也对此保持沉默。不过，我的遭遇还是使我很紧张，很神经过敏，忐忑不安，我发愁会不会由于我没有正常地将美元兑换成波兰钱而使我坐进波兰的监牢。

当我到达华沙时，天色已经很晚了。我坐了一辆出租汽车到旅馆。拿出我的护照，我问旅馆的管理员是不是给我预定了一个房间。他查了他的记录，要我在两个房间中选择一个。我不知道这是机会碰巧，还是莫斯科给我预定的。我太累了，顾不了这些，我只想睡觉。不过，房间管理员已经使我不能安定下来，他告诉我，我的波兰签证是个过境签证，第二天就要到期。

我不想马上就离开波兰，我想停一停，同政府的头头们联系一下，不几年以前，当他们的政府在卢布林形成时，我同他们很熟识。不过，第二天是星期天，所有机关都关门。我不知道可以找到谁来帮助我。我想起了“电讯新闻社”的头头，那是一位嫁给了一个波兰共产党员的英国妇女。这时，“电讯社”是一家进步的国际新闻

社，我也为它写作。几个月前我路过华沙时，我们曾互相拜访，我并且留给她一些不能带出国的波兰货币。我知道她的住处，也不怀疑我可以在星期天的早晨在她的家里找到她，她是马上就可以给我帮助的。

当第二天早晨她开门时（我早在八点钟左右就去找她了），她一看到我就满脸吃惊和害怕的样子，使我立刻意识到莫斯科已经宣布我是个间谍了。“快进来”，她说，“快告诉我。”她向周围的街上看了看，看见视线里没有人，她表现得轻松了一些。她告诉我，她将让我小心地走出去，而且我不应该再回来。

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补充说，我仍然不知道逮捕我的原因，因为审问我的官员好象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并且拒绝承认我是个作家，却谴责我是个间谍。我又说，我肯定这是搞错了，我要在波兰停下来去见当局，并打电报给斯大林，把情况搞清楚，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到中国去。她回答说，这显然是办不到的。我本来从她的神态中，已经开始对我原来的想法怀疑起来了，而她这样一说，更使得事情格外清楚了。

“你在东欧的声誉，完全是来自你以前在莫斯科的声誉。波兰或东欧的任何一个国家，是都不会有人能够或者肯定为你的这个案件帮一点点忙的。只有美国共产党，在四十年以前你还没有去莫斯科时，他们就了解你，有权利也有义务来处理你这个案件。但是美共又是那么奴性十足，你是没有什么指望的。”

她的分析是那么清楚，我立刻接受了她关于东欧的那些说法。但是我又反对她那关于美共的说法。事实上，当我知道了莫斯科已向全世界公布我已被当作一个间谍驱逐出境时，我就必须立刻回到美国去告诉美共我所发生的事情。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同时也是为了他们。我们可以共同商量该怎么办。

“我不认为美国党象你说的那么奴性十足，”我回答说。“我承认美共不论是谁，都会接受莫斯科警察当局所说的反对我的话的。但是，如果我告诉他们审查我的官员拒绝承认我是个作家，他们从我的卷宗中搜集起来的所谓证据包括了我在苏联的所有旅行和我的全部著作，我想他们至少应该同斯大林一同来查看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管怎么说，我同意我的首要任务是向美国党报告，越快越好。

我的女主人说，她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同波兰同志联系，并提出我的处境，看他们是不是愿意做点什么。她要我这时呆在里面的那间卧室里，不管谁来敲门，都不要答应。后来她回来报告说，她去找的波兰同志肯定了她已经说过的那些话。她要我不但不再找她，而且也不要同任何在欧洲的“电讯社”记者接触。“我们是一个新组织，还有待证明我们是个进步新闻社的价值。和你的联系会连累我们全体。”

我实在是疲劳不堪，又加上离开波兰的种种技术困难，不过它们本身并不紧要，它们起源于我的签证有效期只有一天，而这一天又是星期天。当我试图延长签证时，我发现这需要一个高级机关的介绍，可是所有机关星期天都不办公。现在，我回忆起来那时我坐等几个小时打电话，好不容易才接通了某个重要人物，并让我绝望地说：“如果你愿意，就把我关到监狱里去吧，但是得给我一个在夜间到什么地方去睡觉的机会。”对于这，我得到了心平气和的答复：“我们不愿意把你关到牢里去，因为你没有破坏波兰的法律。我们要帮你离开这个国家，因为这也是我们的愿望。”于是我的签证得以延长了一天，并在到巴黎去的飞机上预定了一个座位。同时也使我想起，在这些国家里，从前我曾是极受欢迎的作家，而这时我却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避难者了。我利用在华沙的机会，重新整

理了我的行李，装了许多书，很沉。我不可能带着这些上飞机，于是我就把这些书留给了一家以前欢迎登我文章的报社，要求他们给我寄到美国去，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寄来。

* * *

我直接飞到了巴黎，听说去纽约的飞机几个小时之内就要起飞了，这时我的眼睛牢牢地盯着纽约。因为我曾被警告不要同“电讯社”或者任何别的友好组织接触，同时我也想要回避任何地方的美国大使馆，或许它正在注意我的到来。如果同它接触，不正好证明我是一个间谍的罪状了吗？我在靠近飞机场的一家旅馆里休息了几个小时，没有进城。买飞机票时，我要求保证不公布我的名字。售票员答应了，但是我的名字却很快就传了出去。我们在纽芬兰的甘德^①停了一下，这时流传说我就在这架飞机上。

一九四九年大西洋公司的飞机不象今天那样的快。这时坏运气还是跟着我。一阵风暴远远地把我们赶出了航线。在精疲力竭的飞行之后，当我们到达甘德之前，我们几乎飞到了亚速尔^②。飞机上的女服务员，看见我疲劳得实在不行了，为我安排了一个双人座位，使我可以躺下来。在到达甘德前，我问她可不可能让我停下来睡一夜，然后乘下一班飞机继续飞。她回答说，能够这样安排。在甘德，我见到了两个新闻社的电报，要我给他们回个他们付费的电话。我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我很小心地给他们写了同样的答复，我说，“不要利用我的被捕作为冷战材料。我不知道为什么被捕，或者为什么他们不公正地把我叫作间谍。不论哪个国家的警察都

① 甘德：横跨大西洋飞行的一个起落站，在加拿大东海岸外大西洋里的纽芬兰。——译者注

② 亚速尔：在大西洋里属于葡萄牙的一群岛屿。——译者注

会犯错误。”

在一个公共电话间里，我对着电话念了这一段电文。电话间的门猛被拉了开来，闯进来了一个人。他说他是赫斯特国际新闻社的记者。为了向我采访，他特地从纽约赶来甘德。我除了准备的那段电文之外，拒绝再说什么。我决定，除非我知道了外界关于我已经在说些什么，或者最好是我已经同朋友们商量了，在这之前我什么也不说。可是这个人是那样莽撞，而且那样执拗，很明显，如果我在甘德过夜，他甚至不会让我一个人在床上的。我要变成了赫斯特的‘独家新闻’了。我厌倦地走出电话间，上了飞机，向女服务员解释了我的处境，继续飞行。赫斯特记者同我一起飞。他利用了我那双人座位，坐在我的旁边，于是我就再也不能休息了。我离开了他，又向服务员要了一个座位，那里更挤，但是他不能再坐到我的旁边。这之后，他还是把身体倾斜过来，想法子继续讲话。这样，我们就在那第二个不眠之夜的午夜以后，到达了纽约。

当别的旅客下飞机的时候，服务员要我等着，我还以为她大概是照顾我，给我一个单独离开飞机的机会。我的幻想马上破灭了，当我一下飞机的梯子，就遇到了两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把一张传票塞进我的手里。那是要我在十点半去见大陪审团，如果不到就要受罚的传票。过了午夜，同时就是早晨，这时已经是凌晨了。接着我被带到移民局的官员那里去，他们扣住我的护照，用冗长的讯问企图证明我已经不是一个美国公民。他们的这个意图失败了，因为我一向是很小心的，许多美国人在苏联的选举中投票，我可从来没有干过。我从来没有对任何外国政府发誓效忠，我从来没有担任过只有另一国家的公民担任才合格的职务。总之，他们要证明的事情没有成功。

我最后被领到机场大厅里时，已是早晨四点钟了，那里有一百

多个新闻记者和电影、电视摄制人员，不耐烦地在那里等着采访，已经等了一夜。当时我说了一些什么，我大部分都忘记了，不过有些小事情还记得很清楚。我首先问他们是不是已经看见了我从甘德发出的声明。他们回说，已经看到了。我就向他们保证，除此之外我没有再对任何别的记者作过别的声明。对于这，赫斯特记者叫了起来，“那是说谎。从甘德来到这里，我同你谈了一路。”我回答：“你想要同我谈，纠缠着我，不让我休息。但是我没有告诉你什么。”

他叫着说，“在监狱里他们不是待你很坏？”我激动地回答：“没有象你（们）在这里这样待我的一半坏。”一个在我背后的妇女低声告诫我：“不是我们全体，请不要说我们全体。”我吃了一惊，我要把美国整个新闻界当作敌人攻击起来了。于是我回答：“不是你们全体，我只是指从甘德来的那个不让我休息的人。”这以后我听见赛卓克·贝弗莱吉在我的旁边说话了（他是《国民前卫报》的编辑，我也在为这家报纸工作）。他向我肯定地说：“等这里完了以后，我带你到纽约的一个私人家里，那里没有人会打扰你。”这以后，我尽力来回答好问题，我说没有被粗暴地对待过，但是被不公正地控告了，我认为那是一个错误。这样的错误不论在哪个地方都是同样被“冷战”的气氛所鼓舞。

这是我那时的观点，我现在仍然基本上保持这个观点。这并不妨碍我想要知道我被捕的真正原因，而这原因我还一直不知道。

* * *

当我们到达《国民前卫报》的一个支持者的家里时，已经快要破晓了。我精疲力竭，而又过于兴奋得不能睡觉。我被命令于十点半去见大陪审团，目的何在，又不清楚。因为我从赛卓克那里听来，这就是最近控告美共一群高级领导人的那个大陪审团，看来他们

显然是要利用我来找到美共与莫斯科有联系的新证据，或者，如果我倔强不屈的话，就提出什么来控告我。我觉得我至少应该先同美共联系上，再到大陪审团那里去，以便能够听到正在建议中的方针：例如，是否运用“第五修正条款”^① 所给予的权利，使自己不至于在证词中陷入法网。

我决定打电话给我通常总是通过他来和党打交道的那位美共党员，特别是在我到中国旅行期间，我是通过他来与党联系的，就是他，曾经急切地写信对我说，“我们觉得这是你的不幸，也是我们大家的不幸，你被阻在莫斯科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希望你马上就到中国去。”我设想这个人的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都是会被窃听的，但是我相信，如果早晨八点钟打电话到他家里，并且不说我的名字，被窃听去的危险要小一些。

于是 I 要求在略为休息后，早晨八点钟就把我叫起来。我打电话接通了在家里的这个人，他立刻就听出了我的口音。我说，“你大概知道今天上午十点半我有个紧急约会。”他回答说他知道。我说我去以前必须同朋友们商量商量。我问是不是可以立刻到他家里来。他回答说不行，他要到我所在的地方来。赛卓克给了他住址和电话号码，他答应在九点半以前来。我们等着，可是他一直没有来。到了十点半，我已经可以扣上“藐视法庭”的罪名了，而且再加上这样的事实：前一夜我曾经告诉过联邦调查局我想去住的旅馆的名字，可是我并没有去，这就可能被认为是回避，或者是要逃跑的真实企图了。“现在你显然需要一个律师了，”赛卓克这样说，我也同意。在赛卓克的建议之下（据说那位没有按时而来的美

① “第五修正条款”(The Fifth Amendment)：美国宪法的第五修正条款规定，在刑事案件中不得迫使任何人成为他自己犯罪的见证人。——译者注

共党员后来也同意），我们决定去找奥·约翰·罗杰。他是前些时曾到大陪审团受审的那些美共领导人的律师，所以他对于他们所采取的立场和使用的方法都应该很清楚。

当我在约定时间去罗杰先生的事务所时，我已经请一位医生检查了身体，他看到我的状况很震惊，对于我让自己搞到那样疲惫不堪的境地，好好教训了我一顿。当他听到我的处境时，就给我写了一张证明书，说我们必须卧床休息，完全不得外出。这对大陪审团是有用的，但是还不能阻止我去找我的律师的事务所。我为罗杰先生的一位同事所接见。他说明在罗杰先生见我之前，我必须同意预付一千美元的费用。当我犹豫地说，我不知道如何能立刻弄到这么多的钱时，他回答说，象他们这样有名望的律师事务所，这是最低的费用了。不过人们并不都总是能够照付的，例如，史沫特莱，她同意付，但是没有能够付成。如果我付不了，我是不会受到逼迫的。我考虑，既然共产党曾推荐罗杰，而他的规定也是必须接受的，所以我得付他这笔钱。我还被告知，这笔费用不只限于大陪审团，而且还包括由于我在莫斯科被捕而引起的，美国政府所要进行的其他检查都在内。

我把医生开给我的健康状况证明书交给罗杰先生看时，他说把这交给大陪审团，作为我第一次不能应传出庭的证件很有用。不过，他们大概曾等着我去，而我的缺席可能使他们很恼火。所以我很难拒绝出一下庭，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说，他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有什么特殊原因必须召见我，“你现在很出名，地方检察官可能想使你出庭，利用你的名声来搞到什么好处。”在他的极力主张之下，我同意他可以在第二天安排我去见大陪审团，并设法借口我的健康不好，使我出庭的时间很短。他说，只要我这次出庭使他们得到满足，无疑地，他们会让我请假休息一些天的。至于我应该说些

什么，罗杰先生实际上什么主意也没有给我出。如果我回忆得正确的话，他建议我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而且警告我，我将在宣誓之下回答问题，所以任何虚假都可构成伪证罪。他又告诉我说，他自己要同我一起去那开庭的地方，但是他得留在外面，因为律师是不准在大陪审团面前陪着他的当事人的。

一千块钱所得到的意见好象太少了。不过，更为重要得多的是，当我坐在罗杰先生的事务所里时，我进行了两次重要联系。第一次是通过电话同我的朋友皮尔逊医生联系，她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克伦威尔。当我一听到罗杰先生说，次日下午同大陪审团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之后，我可能有希望被放下一个时期，我就马上打电话给皮尔逊医生，并问她我可不可以在这之后立刻到她家里去休息。她热情地问候我，并要我一有可能就马上来，我愿意在她那里呆多久都可以。

第二次是在罗杰先生事务所里同一位美共领导人会见，他说他是美共中央委员会派来看我的。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向我问候，并且说：“唔，安娜，你使自己陷进很大的麻烦当中了。”我回答说，我知道，并且我好象也给党造成了某种问题。我说，我从这一经历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没有作过间谍，我也不知道我曾经做错过什么事情，但是我确实在企图到中国去的这件事情上，曾经纠缠住一些苏联官方人员。这事一定激怒了很多人。我不很清楚我是怎样，并且为何会激怒了他们，但是我确实知道了苏联在我的工作计划上不是帮助我的一位老大哥，而是有他自己主张的国家政权，而且是非常粗暴地对待我的计划的国家政权。我好象在某些地方使它的目的受到了挫折。我希望美国党能够使这事得到解释。

当我那位朋友听到我的这些话时，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说：

“你愿意到全国各地，在听众面前这样来说说吗？不是在党的听众面前，而是在党的帮助之下去说。”

“我能吗？”我问，“这是你给我的希望；我可以从困境中挽回一点什么来了。我很高兴这样做。”

在这点上，他使自己遇到了难题，他说：“我什么也不能答应。我只能回去报告。我不知道他们将怎样决定。”他又补充说，他要马上离开城里去干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一个星期之内他能让我知道结果。我叫他打电话到皮尔逊医生那里找我。当他离去时，我感到我的希望很大。

* * *

大陪审团第一次开庭，没有发生明显的意外事故。我赶上了下一班到康涅狄格车站的火车，爱米莱^①来接我，开着车子接我到克伦威尔她的家。她把我安顿到床上，检查了我的身体，告诉我她要把医生证明书送给大陪审团，证明我必须在克伦威尔最少卧床休息两个星期。她把病单念给我听，听起来是怪严重的。不过她再一次向我肯定地说：“没有疑问的是，象我在证明书里说的那样，你严重脱水，并且使你的心脏紧张到了极度。但是不要担心。象你这样大的年纪和体重，象你经受过了这样多的事情，这种情况一点也不意外。我一定要使你呆在这里，直到我把你的体重减下来，同时补足你身体中的水分。只要仔细照顾好饮食，并且彻底卧床休息，这是可以办得到的。”

① 爱米莱，即皮尔逊医生。——译者注

五、在美国东部

在皮尔逊医生的护理下，我恢复了过来。在这几个星期中，我继续想办法同美共联系，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已经逐渐成为我在美国从事活动所依靠的主要咨询来源以及我的大部分定期演讲会的主要赞助者，而且因为我相信他们是这样的渠道，通过它我可以最后使莫斯科相信我并没有他们所指控的罪行。这种指控的后果已经很快地毁掉了我在世界各地共产党中的声誉，特别是使得那些原已同意出版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的欧洲国家，统统都撤销了出版合同。

在那时，这是莫斯科指控最严重的后果了。虽然我把我的关于中国的材料仅仅是部分成功地在美国印了出来，不过我觉得它在欧洲六七个家中的出版，弥补了美国之不足。可是在这许多国家中，实际上只有法国在我被捕之前就把它出版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对所有已经接受了我写的关于中国书的国家的出版单位，统统都写了信，告诉他们这本书里的材料比我的名誉更重

要，如果莫斯科对我的指控（我说它是完全错误的）使它不可能在我的名下出版的话，我允许他们可以使用我的材料，而不必说明作者的名字；甚至可以和别的作者的书合并在一起。我记得法国的出版社简直是以外交家那样的冷静来回答了我，他们在信里对莫斯科的指控连提都没有提，而只是说书已经出版了，而且已经出售了。如果我记得正确的话，他们甚至还寄给了我的代理人一些版税。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本书后来怎样了。我想它大概是不声不响地被抛弃掉了。

这时在美国左翼书店出售的我的一些书，很快就不在出售了。这些书就是《明天的中国》，这是关于我所目睹的中国情况的那本较大的书的缩写本，还有一本小册子《在北朝鲜》，这本小册子约有五十页，美共出版社一九四九年一月出版，二月我被捕以后就很快不再发行了。幸运的是，通常送给作者的六本样本，已经寄到加利福尼亚我的家里。几个月后，我去到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发现了它。所以，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开始后，我能够重印了这个材料；它是朝鲜战争前西方作家所写的关于北朝鲜形势的唯一的报告。如果不是由于我的被捕，这个材料可能已经广为美国的进步分子所知道，而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情况，来反对美国侵略。

我有时常常这样想，莫斯科当局会不会曾经想要破坏掉我那些关于中国的报道，而且这是不是就是逮捕我的一个原因？关于这，我没有办法知道，但是这些著作的大规模遭到破坏，则是实际的结果。今天我认为，因为我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当中共早年只是采取外国的意见时，他们遭到了许多失败，而只是在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定出了政策以后，才最后成功了——很可能莫斯科当局对于我所写的东西比我懂得的更多，以至于用实际行动来阻止它的出版。这至少是他们那时行动的结果。

我很快察觉到我那要联系上美共的希望已经破灭了。曾在罗杰先生事务所见到我并且告诉我他要去向中央委员会报告的那位对我很友好的代表，没有再见我。我最后向他的城外寓所打电话，才找到了他。他告诉我他要进城同另一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去讨论这件事。他要我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他说，倘若他取得了什么成果，他自己会打电话给我的。这很清楚地表明，大多数人是反对我的。

我试图恢复老关系的努力失败了，而纽约所有的报纸、新闻社都想方设法要同我建立起联系来。皮尔逊医生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使记者进不到寓所里来。有一次，一个赫斯特的记者确实爬到了一棵树上，向着窗户窥探我的卧室，以证明我的确就在里面，电话机也不间断地响，这大概也使得皮尔逊医生不能正常工作。我来到了克伦威尔的消息很快就在这个小城里传开来，而这确实打扰了我的女主人，使她不得安宁。她用那默不作声的英雄主义来保护我和护理我的病，我对她永远感激不尽。

有个著作代理人很快就给我来了信，他介绍自己是一个进步党党员，他说他愿意处理我的公众联系事务。他建议我把我的被捕写成多篇连续性文章。我曾问过罗杰先生他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他说他确实是个进步党党员，并且曾为罗杰先生做过一些事情，做得还能令人满意。于是，我自己就一下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人不仅代表进步党，而且还代表共产党，在那个时候，进步党和共产党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我想：“他们不敢公开地接近我，于是就采取了这种方式来同我接近。”

于是我就连续写了六篇文章，尽可能客观地描写了被捕和被关进监狱的整个经历。我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自己来分析这一经历，同时也是为了向我的同志们作一篇忠实的报告。我把这六篇文章

送给那个著作代理人，并要他把这些文章转给愿意读它的“某些进步党负责同志”，特别是给其中某些领导同志看。我很快就接到了答复说，《纽约先驱论坛报》接受了这些文章，并准备为这六篇文章付出五千元。我用电话回答了他：“我是叫你先给进步党的负责同志看的，”他回答说：“我可以把它送给你提出的任何进步党党员看。”从他的谈话当中，很快就弄清楚了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著作代理人，主要兴趣在于挣钱；他同进步党的仅有联系不过是他曾为罗杰先生个人的竞选活动做过一些宣传工作。他不懂我反对的意思，不过他说，他愿意把原稿给亨利·华莱士看看，而华莱士不久前曾是进步党的总统候选人，对我来讲，他应该完全算得上是个权威。

我为了掌握我自己的文章而同这个代理人和《纽约先驱论坛报》进行了为时十天的斗争，这十天如果和在莫斯科监狱里的五天相比，则是一场更大的恶梦。正式说起来，我这时还是“卧病在床”，不能应召到大陪审团那里去，也不能同纽约打长途电话。我的文章，本来是作为机密报告写给我的进步党和共产党的朋友们看的；如果可以发表的话，也是想在《国民前卫报》上刊登出来的，而它现在却在纽约一家为首的资产阶级报纸的手里了。我一点也不能从我的左翼朋友们那里得到处理这个问题的主意。罗杰先生，这时我还把他当作一个进步党党员，而且由于他是某些共产党领导人的律师而信任他，他这时只不过告诉我说，避免同大陪审团发生什么麻烦的最好办法是由我自己来公布全部事实经过。他说，“地方检察官只不过是想利用你的名声来捞点什么油水，而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则是打破他的计划的最好办法。”他还告诉我，“亨利·华莱士看过了我的那些文章，认为写得好。”

* * *

当我的医生最后允许我从病床上起来应召到纽约大陪审团那

里时 我记得我的健康状况仍然不好，走路都很困难。我从大中央车站沿着四十二号街走到“远东政策民主委员会”的所在地，爬上了楼梯很陡的四层楼，直到办公室。他们很意外，但不是很高兴地看到了我，可我还是一屁股坐到了一把椅子上，直等到最负责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我说，“我是到一个著作代理人的办公室那里去而路过这里的，他等着我去签一份将在《先驱论坛报》上登的六篇文章的合同。他告诉我，如果我不签字，他们也要发表，不过将作为是我写的但我却又要压下来不发表的东西而发表出来。如果我签字，或许我还能控制文章的版权。往常我依靠出主意的那些朋友们现在谁也找不到。请建议我应该怎么办才好。”他们拒绝给我建议，但是据我回忆，他们最后还是接受了我为此而准备的文章副本，同意把它们送给某些“负责同志”。我要求有什么意见，可送到罗杰先生处交给我——那时罗杰先生建议我呆在他的寓所里，直到大陪审团开庭完毕。这既回避了记者，而又便于商量事情——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这个委员会或哪一位别的“负责同志”有什么回音。

* * *

应付大陪审团并不很困难。据我所知，大陪审团的成员多数是由上层社会选拔出来的普通公民所组成。我现在回忆了起来，这个大陪审团的主席是个“图书俱乐部”的头头。图书俱乐部的主要任务是介绍书籍给它的会员去阅读。他在法庭上宣布说，他们都应很欣慰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向一个访问过许多国家，写过很多书的作家来提问题。他提的问题以及其他人提的一些问题，同我往常在演讲会上所回答的问题一样，都是些爱穷根究底而全无敌意的问题。虽然大部分讯问实际上简直可以说是愉快的，不过小心提防圈套，还是必要的。因为大陪审团是由地方检察官来指挥的，

他的职业就是抓罪犯，他成功的大小是用他所处罚的罪犯数目之多少来衡量的。

地方检察官这个人，特别是他的一些助手，总是在注意找机会来诱陷我。例如，他会带着讥讽的口吻这样说，“文学谈够了，让我们回到间谍角度上来吧。”一次，他介绍纽约发生的一桩“煽动叛乱”一类的案件的判决名单，他逐个念着长名单上的名字，看我是不是认得他们。当我一个接着一个单调地拒绝认识他们时；他突然插进一个另外的名字，叫这个名字的人我曾经在罗杰先生的事務所里遇到过。我一下子感觉到他预料我将继续否认，如果我这样，他就能够判我以伪证罪。我不但承认了我认得这个人，而且我还承认我老早就认得他，当他同一群年轻的美国农民带着拖拉机来救济俄国灾荒时，我曾在苏联遇到过他。这就是设下的陷阱的一种。我还记了起来，那个助理地方检察官问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问题，我回答说，我不认为我是个马克思主义专家。对于这一点，他公开地讥讽我，好象由于我长期住在苏联，我就一定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专家。我仅仅这样作了回答：“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认为我在研究新闻事件方面可以说得上是个专家，但是我却从来就不善于搞理论。”

* * *

就是这次去纽约，我也同时第一次去会见了那个著作代理人。我已了解到他同进步运动的关系只不过是很普通的关系，他主要是为罗杰先生的竞选活动搞一些宣传工作。对于在《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我的文章会使我感到犹豫，他一点也不同情。我记得他总是说我那些文章将会得到五千块钱，说的次数之多使我很厌烦。于是我就给他写了个书面通知，说明这些文章可能收到的钱都不应交给我本人，而必须作为一笔特殊基金交给罗杰先生，首先应该付

清我回到美国来的费用以及罗杰先生自己的一千元的费用，这之后的剩余应该送给将由我指定的各种宗旨善良的事业。

“从此以后”，我说，“我要求你停止谈论这五千元钱。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谈论你自己的百分之十的五百元佣金。但是要闭口不谈给我什么钱的问题，并把注意力放在这样的政治问题上：在《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这些文章是不是一件好事。”

这以后，他就开始比较严肃地讨论问题。他承认如果我反对，没有我的签名《先驱论坛报》就“不能合法地”发表这些文章。但是他们能够从中取出全部事实，甚至引用很多我所用的字句，并把这些当作我曾拿出来而又撤了回去的东西来发表。他说，如果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我就一点保护也没有了。不过，如果我允许用我的签字来“合作”，我应有权变动我的文章。

在接着的一些日子里，我和《先驱论坛报》之间的斗争继续着。我要作一些变动。他们要作另一些变动。他们反对我的变动，我反对他们的变动。代理人和我的律师罗杰先生，不是支持《先驱论坛报》，就是觉得我太小题大作了。我赢得了一些分数，但是整个看来，我是输了。《先驱论坛报》在最后的时刻，欺骗地印出了我在校样上曾经删去的东西。这时我极度地精疲力尽，拿不准我的判断。我多年来依靠同朋友们商量来形成我的判断，但是这种商量这时已被剥夺殆尽了。只有很少的进步朋友我还能联系上，例如皮尔逊医生，他们觉得这些文章是值得发表的。最后我也同意了。

这六篇文章发表的结果有好有坏。美共本来是一直避着我的，这时找到了理由公开指责我。他们不敢指控我在莫斯科是个间谍，因为在美国很少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他们这时攻击我“给资产阶级报纸写文章”，甚至可以宣称我的文章是“攻击苏联”的坏文章。事实上，我的文章并没有攻击苏联。

至于我身体上所受到的实际伤害还不很严重。对于我，伤害是在精神上。这是由于我多年来对苏联的信仰以及由于我多年来的社会联系缩小到极左派当中，而现在，这些联系都断了。我不知道逮捕我的准确原因，我从来不曾知道过。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来自某些地方官员，他们被我坚持要求到中国去这件事所惹恼，或者来自更高的当权者，他们为了要粉碎我高度估价中国胜利所产生的影响而逮捕了我。我觉得我有理由否认对我的指控，但是很少有理由去怨恨它。如果他们认为中共和中国必须先得到他们的认可才能获得世界声誉，而不能通过一个美国记者这样来获得，则我的坚持的确使得苏联新闻司很厌烦，而我发表了中国走向胜利的自力更生的道路和“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也的确可能惊动了俄国人。

皮尔逊医生告诉我说，她参加了进步党的一次会议，在会议中讨论了我在《论坛报》上登的文章，这时我觉得心里宽舒了好多。出席的共产党员指摘这些文章，但是非共产党的进步党党员则称赞它们。我心里感到宽舒的是，由于这些文章发表，起了我要它起的作用。这些文章指出苏联不是一个邪恶的国家，但是可能犯错误。这使所有普通进步党党员都安下心来，但却既激怒了右派，也激怒了共产党左派，既激怒了那些宣称苏联是极端邪恶的人们，同时也激怒了那些宣称苏联是极端善良的人们。

没有想到的是，《论坛报》上登了我的文章以后，“德波戴出版公司”表示愿意出版我那本关于中国的书。这个公司的头头，肯·麦克考米克，到纽约的旅馆里来访问我，表示他对于我论述被捕经过的态度客观，印象极深。他要知道我是不是有计划要出版一本书。我回答说，关于我所目睹的中国情况，我已经写好了一本书，但其中的一部分业已用小册子的形式在美国出版了，书名是《明天的中国》。他回答说，这没关系，他要看一看原稿。他看了以后说，

如果我将书里的材料重新组织一下，并一直写到最近的情况，他愿意接受它。我起初犹豫了一下，怕他要求作某些政治方面的改变。事实上，“德波戴”从来没有要求政治方面的改变。他们要求把书全部重写成一种能够回答他们所考虑的基本问题的体裁，这些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人？他们是怎样起来掌权的？他们的政治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经济政策？他们的军事战略？于是我就把材料重新组织了一下，集中回答这些问题。书就出版了。

我非常高兴的是，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会得到这样满意的结果。在我看来，我在莫斯科被捕这一完全不幸的事件，甚至于已经被这一事实变成了一个好的结局：我最后还是成功地把中共要求我向全世界，特别是向美国公布的材料发表出来了。不过，从书的销数看，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它没有象“德波戴”预期的那样好销路。根据他们的计算，他们须卖掉近六千本才能补偿他们花费了的基本成本。他们没有完全办到这一点。他们把我的名声也算进了提升销数的因素；同时也将以前卖过我的书的全部左翼书店的正常销数都计算在内，然后再加上他们自己的销售额。而且这本书出版时，正当中共在巩固他们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相信它一定会很畅销。我特别希望美共会发现，这本书正好给了他们所需要知道的有关中国的一切，并且开始再接受我。

相反的事情发生了。这本书确实包含着美共最需要知道的有关中国的东西，但是美国没有一家左翼书店愿卖这本书，因为它写着我的名字。剥夺了共产党控制的书店的销路，“德波戴”仅仅收回了生产成本。为了促进发行，我从他们那里买来版型，获得版权，并把版型给了坎萨斯州的一家专卖廉价书的知名书商，“郝德曼—朱利厄斯”，他们发行了一种平装本，获得了一些成就。

在一九四九年的暮春时节，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访问了美

国的几个地区。莱蒙·罗宾斯上校邀请我到佛罗里达他那里去访问。我在那个愉快的环境里，度过了几个星期来写书。我在纽约还参加了进步组织的许多集会，寻求我能够想得出来的方式，来同美共接触，并向他们证明我还是一個进步分子，象支持中共那样我也支持苏联。每一个企图都失败了。越来越明显的是：我能够参加进步组织的集会，凡是那些不是共产党的人都欢迎我，但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拒绝同我讲话。我在一些演讲里仍然以友好的态度论及苏联，美共的一般党员开头还对这个事实表示欢迎，可是后来，他们组织里的上层当权者把他们统统搞到一起来反对我了。

共产党第一次对我公开攻击是发生在当我试图给美共领袖的辩护工作赠送一笔钱的时候。《先驱论坛报》的五千块钱已经按我的指示存入罗杰先生事务所的信托基金帐户里，从这笔钱里面，他已经支出他自己的一千元费用和代理人的五百元的佣金。我指示他送一千元给“福来方场辩护案”^①（他就是这个案子的辩护律师之一）；我还补充说，他送钱时要附一题词，写上“一个在冷战中牺牲的伙伴赠送”。几天之后，共产党的最高当局指责我“企图贿赂他们”，把钱退了回来。拒绝我的赠款的新闻在世界各地发布了。那时在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我的一个侄子听到了，给我来信说，如果我有被拒绝的多余的钱，他可以在青年会里使用。后来我到

① “福来方场辩护案”(Foley Square Defense)：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美国共产党中央十二名领导人，包括美共主席福斯特，总书记丹尼斯等，被控鼓吹暴力推翻美国政府而被捕入狱。后来福斯特由于年老心脏患病，从十二名当中被提出单独审判，其他十一名作为一个案子在福来方场联邦法院审判。这一案件自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开始，一直审问到同年十月十四日，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罪案”审判。十月二十一日宣判，十一人每人被判处罚款一万元，其中十人监禁五年，一人三年。——译者注

了罗杰先生的事务所，他把送去而被拒绝的支票退给我，我震惊地看到他把“一个在冷战中牺牲的伙伴赠送”这一行字打在支票后面通常签字的地方。这样，美共就得在这行字的下面签字了。我立即责怪罗杰先生说：“是你使他们拒绝这笔赠款的。他们不能被要求去签这样一张支票，来承认我是在冷战中被牺牲的他们的一个同伙。”罗杰先生道歉说，这是事务所的一个秘书的粗心，他说我的“题词”误解为在支票上写一题词。我非常生气，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一直不知道这究竟是无意做错了，还是有意挑拨。

威廉姆·潘特生是“公民权利大会”的书记，共产党通过它来处理这方面的法律事务。罗杰先生告诉我，当潘特生退回支票时，好象心里很难过。如果我不要求任何重要的共产党员签字，他或许是愿意接受这种赠款的。我建议可把这笔钱赠给潘特生，为“特伦敦六人案”^①使用，这是一桩黑人被控犯罪，但是“公民权利大会”为他们辩护，认为他们是被诬陷。我就把赠款给“公民权利大会”，钱马上就被接受了。我了解到，如果他们可以不签字承认收到，共产党还是愿意接受赠款的。我也了解到罗杰先生就是“特伦敦六人案”的律师，他用这个方式来保证他将来的部分收入。

从此以后，我形成了一种习惯，每当参加一些进步运动的集会或宴会时，如果当场募集捐款，我就捐赠较大的数额。在这样的大多数情况下，凡赠款超过二十元，有时只要超过十元，主席就会宣布赠送者的姓名。有几次在这样的集会上，我赠送了一百元，同时注意主席宣读赠款名单。这时，当他念到我的赠款时，突然为难起

① “特伦敦六人案”(The Trenton Six)：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成了一些残暴陷害案件的受害者。“特伦敦六人”就是这许多陷害案件之一。当时特伦敦有六个黑人被诬告杀死了一个白人，在全国范围的群众斗争之下，六个人中有四人最后获释，其他二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译者注

来，接着宣称：“一百元……一位友人赠送。”这仅仅是连续不断出现的美共抵制我的少数事例。

我决定回到加利福尼亚去，那里还有一所房子，是我的家。在走之前，我最后一次尝试接近美共的上层。这时我住在罗杰先生的寓所。他问我特别想要会见谁。我说，如果他，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辩护律师，能为我安排同其中任何一位谈一次话，我将很感谢。他建议由罗杰夫人邀请威廉姆·潘特生和他的夫人吃饭，“潘特生曾经接受了你的赠款……”我插进来说，我在莫斯科曾会见过潘特生，这时很愿意再见到他。罗杰夫人发出了邀请，还说明斯特朗女士将在座。潘特生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我也很高兴，因为障碍似乎打开了缺口。可是，当我进到吃饭的屋子时，我从潘特生的神色中可以看出来，他见了我很吃惊。我后来说，那天上午他是在一个很嘈杂的房间里接到邀请他的电话的，他将在罗杰先生家里参加一次社交活动使他非常高兴，高兴得使他没有注意听其他客人的名字。

接着的晚餐是我记忆中的最奇怪的一次晚餐了。围着一张小桌子只坐着我们六个人：罗杰夫妇和他们从大学回来的儿子，以及潘特生夫妇和我。在这样的小圈子里，罗杰和潘特生在“个人思想”与“集体思想”的比较这个问题上争论了起来。罗杰先生说，“个人思想”是最自由的，是最好的；潘特生则为“集体思想”辩护，说它多半可能最正确。我支持潘特生，反对罗杰。我的论点打动了罗杰。但是潘特生看来好象始终没有我这个人在场似的。他一句话也不对我说，他一眼也不看我，好象我根本不在场，而我和他不过只有三尺远。饭后，我们进到一间大一些的休息室里，别的客人也都进来了。我看到潘特生就要离去了。我同罗杰说，“如果你能办得到，给我十分钟单独同那个人谈一谈。”他点了点头。他退到

前厅里，把潘特生叫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回到休息室里来叫我。他说，“在前门对面那间小屋子里你会看到他。”

潘特生僵直地站在那里，同他说话很困难。我说，“我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同一位共产党的负责人说话。我要求你告诉他们，我没有从事过莫斯科所说的间谍罪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指控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究竟是为什么。在监狱里审问我的那个人好象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而且不肯承认我是一个作家。我曾经希望美共，他们知道我为什么去莫斯科的，也许可以帮助我把事情弄清楚。特别要告诉他们，自从我回到纽约以后，我受到了很多压力，我费尽心思来应付，也许犯了很多错误。现在我还是处在很多压力之下，要我演讲，要我在其他社会活动中出面。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告诉他们，即使处境多么坏，没有什么处境不能被好的建议所改善，或者被坏的建议搞得更糟；我除了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建议外，我不愿再从什么别的地方得到建议了。”

潘特生一直听我说完，没有任何表示。然后他回答：“我一定告诉他们。”接着又补说：“今晚”。

我说：“已经十一点钟了。没有必要在今晚。”

他说：“不，有必要。”

我说：“你的意思是，由于是被迫同我接触，你就必须在睡觉之前报告这件事情？”

他僵硬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一个字。

这是我在美国东部试图同美共上层联系的最后一次。

六、回到西海岸

在返回西海岸我的家时，我已下定决心来恢复我同太平洋沿岸工人阶级的基层联系，我觉得这样做是时候了。我要这样做理由很多。我的早期革命活动开始于西雅图劳工运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雅图总罢工。三十多年过去了，大部分时间是在苏联度过的，同时也消磨在访问别的国家的革命和回美国演讲的往返旅行当中。我自问，同本乡本土的革命运动的直接联系脱离太久了。我确定，我同西海岸运动的活跃联系必须恢复起来，那里的人们还是记得我同他们过去共处的岁月。我还想，这么长期间的离去，可能已经使我在性格上或者在态度上有些变质了，这甚至可能导致我在莫斯科的被捕。

很好吆，我对自己说，我要证明下自帕洛阿尔托的基层小组，上至斯大林，民主集中制都是有效地在起着作用。帕洛阿尔托的进步党派我当代表去参加进步党的全国大会，在那次大会上提名亨利·华莱士为总统候选人，这只不过是一年多前的事。我要首先使自己立足于这个

进步党的小小的地方组织，从事任何对帕洛阿尔托社会有益的普通日常工作，并且在进步党中不断扩大的活动圈子里，逐渐重建我是一个诚实的进步分子的好声誉；然后再扩大到同进步党联系着的共产党，并且最后取得必要的帮助，来推翻莫斯科说我是个间谍的控告。同时地方工作也是很有益处的。

起初，我的计划象是进行得很顺利。我在旧金山短暂地停了一下，去参加劳工学院举办的一次集会。参加这样大的集会而用不着自己讲话，在相当长的期间这还是头一回，我从这当中也找到了一些轻松和乐趣。集会之后，许多听众过来欢迎我，并表示希望我长期留在加利福尼亚。我认出他们是旧金山的工人，我以前曾经遇到过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大概还是共产党的普通党员。主持会议的委员会没有同我讲话，而且，我的出席好象使他们有些困窘。这并没有使我不安。对那些来到我跟前，问我要在加利福尼亚呆多久的人，我微笑着回答说，这要看他们了，要看加利福尼亚的朋友们要我呆多久。他们肯定地向我说，这一定会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回到帕洛阿尔托，那里我有一所房子，我就在那里安置了一个家。在累积成堆的邮件中，我发现了我写的关于北朝鲜的小册子。我很高兴，当纽约共产党的出版社撤销这本书时，至少有这六本被保存下来了。我去同当地进步党的书记联系，他本人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全县范围的野餐。我去了，对我的招待很不坏。许多参加野餐的共产党员不同我讲话，但是我没有必要去打扰他们。因为还有许多好的进步党党员，我能同他们进行友好的谈话。我断定我的计划是正确的，我能够同普通进步党党员建立起友好关系，并且能够逐渐扩大这种关系。

当我往南到了“洛杉矶第一唯一神教会”（也就是斯蒂芬·弗

里奇曼牧师的教会)去演讲时,我发现这个教会的“社会正义团契”的确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抗议我的被捕。我并没有让他们那样做,他们那样做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美国的进步运动。他们给了我这封信的副本。这封信提出了一个强烈而庄严的请求。它是以这样的陈述开始的:“社会正义团契”一直支持苏联,在早期为承认新的苏维埃政府而工作,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支持苏联的政策。这赋予他们以权利和义务来反对苏联造成的错误。他们说:由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指控是个间谍而被捕并被驱逐出境,“使美国进步分子极度沮丧”,甚至影响他们对苏联本身的看法。美国进步分子的大多数不相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个间谍。他们看着她工作了那么多年。如果苏联真有什么反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事实,他们要求把这些事实公布出来,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个机会来答辩。如果苏联没有这样的事实,他们就应该公开宣称关于间谍活动的指控,是个错误。

这封信,由苏联大使馆转送斯大林。这是我所知道的为抗议我被捕所采取行动的唯一的一个组织。这坚定了我的决心,要在太平洋沿岸的进步势力中,发展我的联系。

几天之后,我回到帕洛阿尔托,我听说在当地的进步党组织中关于我的争论已经开始了。那些不是共产党的进步党人士,对于我的回来表示高兴,建议利用我的名声举行集会,在会上请我来讲中国。这个主意被所有的共产党员所坚决反对,有人甚至要求把我开除出进步党。不过,进步党的县委书记,她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说没有人有权力把我从进步党开除出去,因为我不是通过那一个地方组织参加了进步党的,而是在上一次选举中,我在投票记录上把我的名字写作一个进步党员而进入了进步党的。根据法定手续不能开除我。我的对手们就想方设法来指责我。最后,帕洛阿

尔托组织开会，以这样的折衷决议来保持统一：进步党本身不得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举行任何集会，但是个别的进步党党员如愿意召集这样的集会，则不予反对。

在帕洛阿尔托，立刻就有一些进步党的主要党员要求我出来主持关于中国的讨论会。我从南边回来时就面临着这个请求。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请求。我沮丧地听说，我的来到已经在帕洛阿尔托组织里引起了意见分歧。但是我相信，经过举办中国讨论会这样平凡而有益的工作，我会使帕洛阿尔托的进步党人觉得我还是有用处的。这个讨论会是在一个私人家里召开，大约只有二十来个人参加。我为每周集会所花费的准备时间，要比我过去为大得多的演讲会所花费的准备时间还要多。举行了四次这样的集会，每一次参加的人都比上一次增加。第四次集会时，进步党的县委书记开车来参加，会后跟着我的车子到了我的家，来同我谈话。她没有进我的家，这并没有使我惊异，因为我知道她是个共产党秘密党员，党的纪律不允许她走得那么远。可是她告诉我：“在这次讨论会中你干得很好。W教授曾经报告说，他抱着很大的怀疑来参加这个讨论会，以为你要宣讲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好”。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 W 教授大概是大学里的一个秘密共产党员，他在讨论会上提的问题，表明他是一个明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觉得我是在稳步地走向被接纳的胜利的道路上。

下一个星期，在她家里举行讨论会的那个妇女，上午打电话告诉我：那天晚上的会议不能举行了。她好象有点为难地说，“也许我们在这个星期的晚些时候可以举行。”她告诉我有七个参加者来电话说他们另有约会，而她不愿意叫我为缩小了那么多的讨论会“浪费我的时间”。

我回答说，即使讨论会缩小很多，我也愿意花费时间，但是这个星期的晚些时候我不能来，因为我要到洛杉矶去，我必须到那里去演讲。

她仍然很为难地建议下次会议也许可以在我从洛杉矶回来以后举行。我回答：“我想我不回来了”。她吃了一惊，问我为什么不回来。我反问她那七个有“别的约会”的人的名字，她说他们中的一两个，然后停住了。

我说，“很清楚，从你说的名字看来，讨论会就此结束了。很清楚，我呆在帕洛阿尔托，将使这里的进步党分裂。我早就想，也许最好是搬到洛杉矶去，讨论会的这次事件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我这次去洛杉矶，要为我将来的家作些安排。”

她伤心地回答：“我想你是对的。”

我后来听到了帕洛阿尔托发生的事情的详细情节。共产党的州委派来一位代表，告诉帕洛阿尔托的共产党员说，“一窝铁托分子突然出现在这里，必须扑灭它。”指的就是我的中国讨论会。帕洛阿尔托的主要马克思主义者，W 教授，前一个星期还说了那样称赞的话。可是，当地的判断不能影响州委的决定，我的讨论会必须停止。那些“另有约会”的人们，就是背离他们自己的判断而接受州委命令的人们。我如果再停留在帕洛阿尔托，明显地会分裂这个地方的进步党的弱小组织，甚至还会分裂整个县的进步党。

几天后，当我在洛杉矶演讲完了以后，我要求同弗里奇曼谈一次话，我告诉他我的处境，并且说：“帕洛阿尔托和圣克拉拉县的进步运动太弱小了，吃不消那种不论我到那里去，美共都要发动反对我的那种争论的。我想搬到洛杉矶来，已经这样想了一些时候了。洛杉矶是个很大的地方，能吸收并使用各种各样的人。我对一个人孤立地工作没有信心，我要参加进某些进步运动的组织里去。如

果我申请参加你的教会，我会有用还是会造磨擦？”

弗里奇曼先生同我谈了一个小时，问了很多关于我在苏联被捕的问题，以及我对苏联的态度和对美共的态度，然后他回答：“我们将很高兴吸收你为教会会员。我认为你在这里很有用处。在我们教会里你会遇到一些人，他们是教会会员或者是在这里的服务人员，而同时你也会认出他们又是共产党员。在教会里他们会对你说客气，虽然在外面他们也许不同你讲话。”

这些话显示出“洛杉矶第一唯一神教会”的性质，以及为什么我要参加它的原因。虽然它叫“教会”，无疑的，它是加利福尼亚南部最强大的进步力量，比当地美共支部还要强大。这个教会中有个组织是世界上唯一直接上书斯大林，表白我无辜的一个组织，这个事实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我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来搬家。我卖掉了我在帕洛阿尔托的那所房子，把大部分家具都处理掉了。我在洛杉矶郊外拉克利森塔买了一所小房子，成了休·哈代曼的邻居，他也是唯一神教会和其他许多进步运动的成员。他待我很好，并反对莫斯科诬陷我的人们中的一个。除了哈代曼一家之外，我的新居是一所孤立的房子，面对着一条山景宜人的崎岖峡谷。不过，哈代曼寓所是许多进步集会的中心，同他们在一起，我还可以参加洛杉矶和帕西登纳进步分子的其他集会。对于休·哈代曼和他的夫人苏珊帮助我再一次恢复社会生活，我永远怀着感激不尽的心情回忆他们。

同时，新的活动路子开始出现。在一九五〇年初夏，当我最后定居在拉克利森塔不久，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个“宗教自由主义者”（唯一神教徒和宇宙神教徒）的夏令营，在离洛杉矶不远的圣贝纳迪诺山里宣告成立。因为我总是喜欢在山上扎营，并且还想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进步分子中间开展交际活动，我就到夏令营去了。

于是我就到山里去散步，并在朝鲜战争开始后，参加了露天集会。我们是从收音机里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弗里奇曼先生，他是夏令营的发起人之一，要我在最后某次“火边漫谈”中作一次关于朝鲜的演讲。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访问过北朝鲜的唯一的美国作家。我高兴地照办了。有趣的是，后来我听说，听过我讲话的人回到家里去报告，他们的邻居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并且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很明显是斯大林派到美国来组织反对朝鲜战争的，所以莫斯科对我的控告“只不过是一种计策”。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愚蠢的谣言了，但是在冷战的气氛中，愚蠢的谣言总是流行的。

不过，我在山里作的关于北朝鲜的演讲，是我自己的生活的一个转折点。我一回到城里，唯一神教会就要求我作同样题目的演讲。青年组织首先提出了这个要求。当我一答应，教会的几个别的组织也都要求参加。可是理事会里也有人起来反对，因为美国已经深陷入了战争，有些人怕我的话会被看作是叛国。后来集会还是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六日在教会的大厅里举行了。斯蒂芬·弗里奇曼牧师亲自在他的暑假里回来当会议的主席，以便稳定理事们的心。

我以前准备演讲从来没有象那次一样。过去我一般只靠少数几页笔记，从来不事先写好演讲词的。这次我知道，任何对朝鲜战争的反对，都可能被当局认为是叛国。我甚至可能直接从讲台上被抓到监狱里。我决定把我的整个演讲词都写下来，并严格按照写的讲。如果被捕，对于我讲了些什么，可以有准确的证据。我的演讲攻击美国出兵朝鲜，是建立在确切的事实之上的。我很高兴的是，我的小册子《在北朝鲜》有六本被保存了下来，它就作了我的材料来源，因为所有我的原始记录已在莫斯科被没收掉了。

在最后的两三天里，我决定把演讲词油印出来分发给听众。教会有一架油印机，但是不借给我，因为理事会里对我的演讲有争论，同时也因为他们说，他们的油印机太旧了，必须非常小心使用才行。我为此买了一架便宜的油印机，在尽义务的年轻人的帮助下，印出了九百份十二页的文件。我原来计划要印一千多份的，但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印坏了很多，结果只印出了九百份。最后我定了价格，十分钱一份，一块钱二十份。

这次在教会里开的演讲会，同那里开过的任何一次大的集会都一样大，不但礼堂的主厅坐满了人，旁边一些装有扩音器的屋子也都满座了。起初，气氛很紧张，因为听众在等待着有什么言词会被认为是叛国，而且他们也拿不准究竟应该如何反应才好。我按照一九四七年在北朝鲜的三个星期中所见到的情况来讲朝鲜战争的背景，听众越听越被我讲得相信美国军队没有必要在朝鲜作战。演讲之后，许多人要把我的演讲稿送给朋友；因为我已经在它们上面标明了一元二十份，许多人就扔下一元钞票，拿走二十份讲稿。那天晚上卖掉了一千多份，这比我们印的多，于是就记下了姓名，然后增印补发。增加的份数是用照相胶印方法来重印的，结果发出了五千多份。

一星期之后，我接到从美国各地的来信，他们从朋友那里收到一份我的演讲词，而他们还需要更多的份数。自我被捕从莫斯科回来以后，除了我的护照以外，别的文件我什么也没有。即使是我的防疫证书也没有带来，我的通讯录也丢掉了。函索朝鲜演讲词的来信很快就给我搞出来一份新的邮寄名单，它涉及美国的各州，加拿大的各省，甚至还有几个其他国家的地方。我在唯一神教会所作的演讲，是暴露朝鲜战争背景事实的第一次公共集会。美共反对这个战争，可是他们缺乏用来反对它的事实，因为他们把我发表

的那本小册子给毁掉了。如果那本小册子被允许流传，虽然不会制止美帝的行动，但是却能够给美国进步分子以知识的武装。需要这种知识的成千成百的人，现在给我写信了。

在一九五〇年剩下的日子里，我继续写着关于朝鲜的文章，我重印了我的那本小册子《在北朝鲜》，并补充进最新的情况，把书名改作《北朝鲜情况实录》。到了夏末，某个学院的一位教授来了一封信，开来一张问题清单。他问：“我对学生们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这对我好象是个好机会，不仅来回答那个学院的学生，而且还能回答已经在我那邮寄名单上的好几百人。我就仔细准备好我的回信，并把它们油印出来，寄给所有给我写过信的人们。我想这样可以使我少写许多很长的个人信件。结果是人们来信索要这些“问题解答”的副本，并且开始给我寄钱付费。在十一月里，我写了第二封油印信；在十二月写了第三封。由于人们继续不断来信要求我发表对于朝鲜和其他有关情况的意见，并且由于人们继续主动给我寄钱索要这些油印材料，我就从一九五一年一月开始出版一种油印的月刊，刊名《今天》。

一位有绘画才能的朋友，为《今天》设计了一幅画有升起的太阳的刊名报头。我在上面说明了我的宗旨：“《今天》是关于我观察时事的通讯。如果你需要，请把你的姓名和地址寄来。如果你要付费，就寄来一元。如果你要提供帮助，就多寄一些。《今天》不论付费或不付，函索即寄。”

我决定不同许多经常需要金钱资助的进步出版物争要捐款。除了预定户愿意寄钱帮助以外，我要用我自己的钱来出版。事实上，我们的钱总够用。我们的开支很低，因为我自己工作不要钱，而那位答复信件，整理材料的秘书只要比她到我家来的汽车费略多一点点的钱。干邮寄工作的是一群义务劳动者，他们到我家来

工作，我总是供给一顿简便午餐。所以，我们的主要开支是纸张以及现在是由专业人员来干的油印工作，还有，我们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刊物而打了折扣的邮费。大多数读者为了弥补成本，都寄来一块钱，还有相当一些人，寄来的钱更多。

在我发行《今天》的这个期间，我的交际和活动的方面开展得很宽，但是同美国共产党总是没有接触。我后来听说，他们仔细阅读《今天》的每一期，企图从中找出我的罪行迹象，或者最少是我对苏联的敌意。但是，他们找不出来。逐渐地我在洛杉矶的交往活动发展到了那样的程度，我得放弃我在拉克利森塔的寓所，而在城里买了一所房子。同时我外出旅行多次，其中最重要的是去危地马拉旅行，我是在阿本斯当总统的时期去的。所有这些旅行，我都用来作为《今天》的写作材料……

七、美共对我的抵制和打击

从莫斯科被驱逐回来以后，我很快就知道了，我在任何进步人士中的出现，都是一种“酸性试验”，可以验出在场的人们中间哪些人是共产党员，哪些人不是共产党员。普通进步人士总是友好地向我致意，并且对我很满意，因为我虽然在莫斯科被捕，可我没有说过任何反苏的话。共产党员则避开我，特别是党的干部。确实如此，一般党员常常倾向于相信我的善意，但是一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就马上被上面直接来的命令所制止。象我在帕洛阿尔托举办中国问题讨论会所发生的类似情况，在别的地方继续一再发生。即使是到危地马拉旅行，我找总统阿本斯和他的政府高级官员谈话，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但是那里的一家共产党小报却指责我，并公布我在莫斯科被当作间谍而被捕的事实。这使我得到了额外的证据，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证明阿本斯政府完全不象人们在美国听说的那样，是在“共产党控制”之下的。

我对莫斯科逮捕我这一行动的态度，从我在监狱里

度过的那头几天以来，一直变化不大。我一直不知道被捕的原因，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上层发下来了命令才被捕的，还是由于被我打扰的下级官员的错误所造成的。当我去刘宁一房间送信的时候，从门外望进去，见到的那位俄国官员很明显地带着生气的神色看着我，他可能怀疑我是用不正当的方法打听到刘宁一的到来。外交部新闻司对于我那样纠缠着要他们给我办进入满洲的出境签证，以及我对他们把中共控制的满洲铁路说成是“铁路上有土匪”所说的挖苦话，是有足够的理由恼火的。当中国妇女代表团从布达佩斯会议返回哈尔滨秘密经过莫斯科时，我突然闯进了民族饭店的餐厅去向她们祝贺，也可能被什么苏联官员看到了，引起了怀疑。总之，我可以举出我的不少行动，虽然完全没有恶意，却会使下级官员恼火或引起什么疑问的。有时我觉得这中间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足以使我被捕。我以为，不论对谁，这都是很有用的自我分析，不妨停下来考虑考虑，在上两个星期中自己做了多少事，可能使过分热心的警察找到逮捕的理由。下面这个事实加强了我的这个观点：在狱中审问我的那个人，我只知道他是“政委”，他很显然认为他是抓到了一个严重的罪犯，我在苏联近三十年的所有旅行，在他看来都是用意不善的。

我也感觉到，如果我确曾引起了什么怀疑，苏联当局给我的待遇并不怎样恶劣。我仅仅不过是在条件符合人道情理的监狱里被扣留了五天而已；我吃着颇为不坏的伙食，还被允许在屋顶平台上活动身体，然后就是驱逐出境到波兰。在今天的世界上，人们被捕并被驱逐出边境线，是很平常的事情，特别是新闻记者，在今天的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冷战和热战，他们搜集新闻材料，很容易受到怀疑。除我之外，还有几个新闻记者曾经被苏联驱逐，他们都被控有间谍活动，有时是由于在限制照相的地方拍了一张照片而引起的。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对他们的职业并无损害。他们回到新闻社，再被委任到别的国家去工作。在一般公众看来，“间谍”这个字眼含义很不好，可是对新闻机构来说，却很稀松平常，它可以加在只要是报道某个政府想要隐瞒的什么事情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上。所以，对于资本主义新闻界的一般记者说来，“间谍”罪只不过成了日常谈话中随便说说的话题而已。

可是，对我的后果却严重得多。由于我在生活中用写作和到美国演讲的方式来宣传苏联将近三十年之久。在这些年代里，我在美国的大多数朋友都已逐渐变成需要并且提倡亲苏演讲的人了。这些人即使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员，也是属于通常所谓的“共产主义阵线”的。所以，莫斯科的指控几乎破坏了我同所有朋友的关系，他们大多数甚至不同我再讲话了。

我也考虑到，我在莫斯科的被捕，可能是在上面的当权者所指使的。我问自己，会不会有什么原因，甚至使斯大林也愿意我信誉扫地。这样因素，不难找到。苏联政府那时还没有承认中国新政府，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在北京成立。我的被捕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发生的，那时中共已经打下了北京和天津，但是还没有建立起他们的全国政府，而全国政府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才建立了起来的。苏联在中国的大使馆实际上随着蒋介石一同退到了广州，承认它的统治比别国的政府为时更长更彻底。

同时，象我这样的一个美国作家，却已经写了那么多关于新中国的文章和一本书，不仅在莫斯科散布它，而且还相当成功地传遍了东欧。如果斯大林，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这时想要中共等待着莫斯科来承认，而不要由一个美国非官方的新闻记者来为新中国预作宣传，难道会令人奇怪吗？我还考虑到，这时我在东欧各国大力传播“毛泽东思想”以及他的成功事迹，而这个地区

这时正为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斗争所撕裂。我自己虽然从来不是铁托分子，也从来没有说过中国人有“铁托的想法”，但我可的确强调过下述事实：中国革命照抄外国想法和外国模式时，总是不断失败，而只当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的领导，革命才得以开始成功。的确，这么说在东欧可能已经使人感到象是在宣扬一种独立性了，而这看起来可能同他们所谓的铁托主义同样危险。

这些考虑，使我感到不管我怎样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间谍，而苏联政府，甚至高级领导层，也会找到足够的理由要来制止出版所有我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最少在那个时期是要制止的。特别是要制止即将在布拉格，华沙，柏林，贝尔格莱德等半打以上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首都，以及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出版社出版我那本关于新中国的书。因为我已经安排好，要在所有这些首都出版我的那本书了。事实证明，我被捕的主要结果就是制止了它在每个国家的出版，只有法国外，因为它在那里已经印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苏联控告我是“间谍”是不公正的，而我同时却不想责怪苏联政府。如果是由于下层人员的怀疑和恼怒而这样干的，我觉得我自己在冷战形势下的行动是可以引起这种怀疑和恼怒的；如果是在最上层人物的指示下干的，从东欧的强权政治和苏中关系来看，我觉得不论什么政府是都会有理由要毁掉我的名誉和我的书。

我对美国共产党的看法要严厉一些。我认为自从西雅图劳工运动和它那次总罢工的年代以来，在美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共产党之前，他们就熟悉我的工作，这已经四十多年了。我在苏联居住了将近三十年，但是我的实际写作工作并不表现在苏联，而是表现在

我为在美国出版而写作，为美国而写苏联革命和其他各国的革命。所以，我认为美共是比莫斯科更能够判断我一生的活动的。他们知道我是在去中国的路上到莫斯科的，而且还是他们促使我去的。所以，我认为他们可以对我在莫斯科陷入困境给以严厉的批评，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应该看到需要进行一些调查，来弄清我的问题，使我可以再从事一些有益的工作。

起初可能会这样的。当我刚回到纽约时，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到罗杰先生事务所来看我，说到我给自己造成了“麻烦”时，我回答说，我懂得了不少事情。“我懂得了苏联不是在我们的许多计划中帮助我们的老大哥，而是一个国家，是一个粗暴对待我们工作计划的国家政权。”我还补充说，这样的国家政权，仔细注意它自己的事情是必要的，这是一件好事。我的这些话引起了党派来的那位同志的重视，他要知道我愿意不愿意在国内各地可能安排的集会上出面来说一说这些话。我回答说，他给了我希望。后来的两个星期中，这个意见好象确实被考虑了，但是考虑我的问题的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同意这样办。美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的意见是不经调查就接受莫斯科的指控，并且拒绝再见我。他们就象“电讯社”在波兰的代表警告我的“那样的奴性十足，没有指望。”

假如党的领袖们同意和我讨论一次那时的处境，即使他们不赞成让我来一次巡回演讲，也是可能找到某些对待那时恶劣境遇的好办法。那时我所要求的不过是寻求一些可以让我在进步运动中工作，而又不致引起冲突的方法。但是，由于党的领袖们连一次会议都拒绝开，更不愿意对我的案子进行半点审查，他们很快就使自己走得更远，试图捏造事实来证明莫斯科的指控正确。所以会这样，不仅是因为一般进步人士，而且很多共产党的一般党员，都不相信我是个间谍。

使我认识清楚这点的，是我回到美国将近一年时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时我在东部巡回演讲，当时我的演讲代理人还能够安排足够多的演讲会，来偿付所需要的旅费。那时我在纽约，是在《美亚》杂志的办公室里。我以前曾为它写过几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在纽约我还利用它那很不坏的图书馆，研究我为德波戴公司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我突然觉得我到东部已经快一年了，我荒唐地以为，有什么妨碍我直接走到共产党总部去谈一次话。我一定是让他们含有敌意的行动在我心里造成了某种心理障碍了，其实不过是拿起电话来告诉他们，我将去看他们。我刚回来时使他们发生的震动一定已经过去了。于是，我就拿起了电话，拨了《工人日报》的号码，接着问：“这是《工人日报》社吗？”

《美亚》杂志社的秘书马上倾过身子碰断了我的电话。她说：“不要以为我想干涉你。在你打电话之前，你必须先看看今天的《工人日报》，否则你是要走进他们圈套中去的。”

我拿起她给我的《工人日报》来，在里面的一页上找到了这样的通栏标题：“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自供状”^①。我看了这篇文章，同时也看清楚了想要同能够发表这样文章的人去接近，是行不通的。那是从十几种来源拼凑起来的谎话和半谎话，总起来要证明我不仅仅恰好是个间谍，而且还是个托派，是个铁托分子，以及半打以上其他相互矛盾的坏东西。我后来听说，这篇文章是在旧金山拼凑起来的，首先发表在《人民世界》上，《工人日报》是从那里弄来的。几年以后，在莫斯科宣布给我平反后，我接到一个女人从旧金山来的一封可怜的信，她为当年允许用她的名字来搞出这

① 它是用读者来信的形式登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五日纽约《工人日报》上，几乎占满了第八版的整个版面。——译者注

篇文章道歉。我不准备公开她的姓名了。她没有写这篇文章，但是在它上面却签了字。那是一群美共党员编写的，企图以诬蔑我的谎言来帮助莫斯科。这就是由于他们连真实情况都不愿讨论和分析，结果就迫使一个党和它的报纸以及它的党员都落到了这样一种境地。

在美共党里有一两个党员曾表示过一些愿望，想弄清我的案情，并帮我回到进步运动中，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们全都因此而受到了迫害。允许我在帕洛阿尔托举办中国讨论会的那位进步党的县委书记，她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后来被开除出党，她对我的宽大即为其罪状之一。海伦和沃威克·唐普金斯都是美共党员，当我刚回到美国，还在东部住在爱米莱·皮尔逊医生的住处时，他们就从洛杉矶写信给我。海伦首先给我写信说，她开始时完全相信莫斯科对我的指控，但是她是一个专业心理学家，她后来得出的结论是，控告我的罪名不可能是真实的。她说，“一个人在苏联搞间谍活动，并且用谎言掩盖它是可能的，但是不管是谁，象你多年来那样激励别人来热爱苏联，而她自己却一点也感觉不到那样的爱，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就问我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写了回信。于是，我们之间就开始通起信来，不久她的丈夫沃威克也参加了进来。后来，我搬到洛杉矶以后，我遇到了他们，他们成了我的朋友。

尤其是沃威克，他在所有政治运动中都是一个党的积极分子，他同旧金山的州党委很熟识，他特别觉得必须要求他们听听我的申诉或者对我的案子进行一些审查。

他的企图失败以后，我建议他不要再进行了。“你帮我是不会成功的”，我警告他，“你只会使自己陷入困境。”我知道他是非常珍视党籍的，我不愿意看到他丢掉。

“我不是为了帮助你才这样干的”，沃威克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党的统一完整。”我告诉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再劝阻他了。我也感觉到，对于反对一个党员的案子拒不研究，的确涉及到党的统一存在问题。

沃威克和海伦都因为敢于提出我的问题而被开除了。当党的监察委员会问他们是不是认为苏联做错了时，他们回答说，苏联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就立刻被指控为“反苏的叛徒”。

不管美共对我的排斥是怎样冷酷难受，我一直三年没有承认同它的关系的破裂。许多年来我一直是个秘密党员。我不是一个完全正式的党员，因为我从来没有被准许参加一个组织，也从来没有享受同别的党员一起讨论问题的权利。这是因为党觉得我的最好的工作是继续在苏联生活，并以莫斯科为基地，访问世界各地的革命，同时主要为美国而写作。他们也不要我为党报写作，因为它已有够多的写作者。但是却要我在进步报纸上尽可能获得最广泛的读者。因此，我的党籍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我每隔一两年到纽约来一次，到党的总部直接把党费交给司库。

过去这种作法促使我在洛杉矶采取了一种行动。我认为我所处的地位是没有任何机构或党的委员会有权力不听我的申诉，就撤销我的党籍。我就决定交付应交的党费以及通常外加的捐献，并从他们取得收据。我是怀着这样一种念头的：如果一旦给我平反了，并接纳我到党内来，我就能够证明我一直是一个党员。我是通过为党的法律案件工作的一个非党律师来交付党费的。他为我从党的地区组织人员那里取得一张“一位友人”交付的一笔钱的收据。我这样做了两次，第一次付了两年的党费，第二次付了一年。后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无益的，象是有意做作的姿态，而且如果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拒绝同我讲话，我是没有理由一定要同他们讲

话的。

这时，我已经在进步运动中得到了新朋友和一项不断扩大的新工作。

在那些年代里，关于我同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如果不再加一件事情，就不够完整。在纽约的一年里，我试图同陈翰笙通信，我以前认识陈，知道他能提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可靠情况。以前我写《明天的中国》时，他曾帮过我的忙，我为德波戴公司写《中国人征服中国》时，那是一本更大的书，我再一次需要他的帮助。他住在费城，好象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常到波士顿去。他和任何一个美共党员一样，很难同他讲话。如果我提出要在费城见他，他就会不在费城而在波士顿。不过，我知道如果我为了写中国的书需要他的帮助的话，他一定会答复我，假如急需回答，打电报都行。我欣赏他的这种微妙的态度。由于他极力避免见到我，我不用问就知道：由于莫斯科的控告，要想访问中国是没有希望的。同时我也知道，不论我的什么工作，只要同中国有关，他都愿意帮助我。我非常欣赏这种态度。

* * *

在从莫斯科回来以后的六年中，我坚定地使自己适应美国的生活，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南部的生活。我没有放弃最后回到中国去的希望，但是我知道，只要莫斯科的控告继续存在，那就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抱怨苏联，因为我已经推想出有许多事情是可以促使苏联那样干的，而我在想要得到莫斯科的允许来通过他们的国家进入满洲这件事情上，那样的轻率，甚至惹人恼火的态度，也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我甚至也不埋怨美国共产党，但是当我一再试图同他们联系，并想得到他们的帮助来弄清我的问题，而在三年中连一个简单的答复都没有得到以后，我不再寄希望于他们了。

同时，我找到了有益的工作，并且通过工作得到了新的朋友。假如说我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生活，不完全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但也不是不愉快的，也不能说是没有成就的。

回顾过去，我在这个期间的主要收获，看来是：我有了一种新的自力更生的精神。我首先是在写作方面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过去，我的工作主要是一个记者。虽然好的报道总是有创造性的，因为记者要自行选择所要描述的事物，和阐明事件的方式，不过我报道的都是莫斯科表示的观点，或者是别的国家领袖们的看法，而不是我自己的看法。我选择去延安，并写文章讲“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说，在整体上支持我所描述的观点。不论在哪个国家里，我的作品都不曾被什么正式检查制度搞走了样。单就过去的这个事实来看，我可以说是一个自由作家。

可是，在现在发行我的小型油印刊物《今天》时，我每个月得自己来研究整个世界的新闻全貌，而且要问的不是苏联人或者中国人想的什么，应该传达给美国读者，而是得问我自己什么重要东西是应该传达的。这比我过去报道多少同意的别人的论述更费心思。同时，我并不忽视莫斯科或者中国在说些什么，也注意美共在他们的刊物上说些什么。他们的观点我都重视，但是却不再受他们的限制。《今天》上所写的东西，都要由我一个人来负责。

我回想起有一次我去旁听审判西海岸某些共产党领袖的案件。我不是坐在记者席上，而是坐在后面很远的听众席上。那时我早已使自己适应了这样的情况：在这种集会上有些人会同我说话，但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则不同我说话。我已经完全接受了这种处境，所以报道这次审判时，我不仅能够对于法官的不公正的态度感到相当愤慨，而且对于那位从加利福尼亚北部来的女共产党员那样的勇敢与说明全部共产党案情的口齿清晰，感到真诚的钦

佩。而且，我同时对于这位妇女感到一种强烈的羡慕，因为她即使是要受到坐牢的判决，她也远远不象我那样的孤独。她为一群同志们所拥护，而这些人体现着我仍然认为最终必定胜利的世界观。一年多以后，当这位曾经是共产党发言人的妇女，由于某种我从未见到清楚说明的原因而离开了党，这却把我搞糊涂了。不过，我也已经觉察到我自己所写的文章，虽然从未攻击过美共，可是在评论世界大事方面，已经开始不时地离开了他们的看法。

在经济方面我也越来越自力更生起来。我本来一直能够用我的演讲和写作使我自己过得很快乐。但是这样的机会突然没有了。在纽约和波士顿，用大力安排定期演讲会来支付我到东部去的旅费，还是有可能的，但是除了旅费以外，我在演讲方面实在是搞不到什么收入的。至于写作，自从德波戴公司出版了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由于共产党控制的书店的抵制，没有能使出版社挣到钱以后，没有人再要出版我的书了。我初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国民前卫报》支持我在他们的报上发表文章，后来也曾建议我再给他们写些文章；可是，这一努力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前卫报》抗不过美共的严重反对；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自己寻找写作材料很困难。

没有作家能在真空里写作，特别是记者，确实如此。我记得《前卫报》要我写一些关于加利福尼亚山谷地区的农业季节工的事情，听说那里的孩子们饿死在沟边帐篷里。我开着我自己的小汽车，开过群山到了贝克斯菲尔德和弗雷斯诺，在城里和在那个山谷的农业地区辛苦地工作了好几天，却没有写成功。我感到所有我过去的作品，都是依靠同熟知情况的当地人谈话才写成的。为了写农业季节工，要想取得写作材料的正常方法应该是先同当地劳工领袖和为帮助季节工人而进行组织工作的当地共产党员去谈话。可是这些人是不愿意同我讲话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是不可

能写出什么《前卫报》能够接受的东西的。

职业写作和演讲不能维持我的生活，我就有时能做别的工作。并不只是我有这样的问题。在美国很少有革命的作家能够专靠写作来生活的。有几个人以重建和改装房屋来补充他们的收入，我就采取了这个办法。可我从来不是一个熟练的木工，不象小鲍威尔那样。他从中国回来时，发现他在上海长期作编辑的经验不能使他在美国找到一个职业，他买下了一座又一座的小房子，他一面住在里面一面改造它，他这样来生活并养活他的妻子和小孩。他可以用自己的手来增加几间屋子。我缺乏这种技能，但是我很快发现我有本领去找到那样的旧房屋，由于建筑上的缺陷或者由于房屋安排上的不合适而卖不掉，只能廉价出售。我就买进这种房子，并住在里面，我能重新改造，使我最后能以相当高的价钱卖掉。在这方面我不久就发现了那些年代里美国经济方面持续的通货膨胀帮了我的忙，这就是说，在房屋交易上，加利福尼亚的房地产价格，用美元计算起来，总是在上升的。

我从来没有整天干这一行业。很早以前，在大学的最后几年，我就是自己一面学习一面工作过来的。那时我就明确地认识到，如果学生们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教育上，而同时又能以临时职业来维持生活，但在毕业之后，他们却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营生上，那是非常愚蠢的。之后我就确定将来我一定要选择一种我愿意做的工作，而不管我能不能以此为生。假如有必要，我就以副业来维持生活。我又受到卡雷顿·比尔斯的一种说法的影响，当他在墨西哥呆了很久，回来对我说：“我发现不论在哪个国家，一个聪明人实际上不会因缺少工作而饿肚子的，同样也不会挣大钱的。”于是，我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买进和改造房屋方面，而是放在写作《今天》期刊上，以及作为写作材料的旅行上面（例如到危地马拉的旅

行)。买卖房屋是一种副业;在这方面我很快就确立了一条原则:除非是我个人愿意住的房子,否则我不买;同时,除非便宜、合算,否则我也不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从帕洛阿尔托到洛杉矶,由于种种原因我搬了好几次家。我总是买进我要住的,而且要比付房租便宜的房子。我学习了一些房屋修建方面的小手艺,我能够自己来油漆屋内,有时甚至屋外。我发现我从事这一副业的那些年里,改善我住的房屋,不仅能挣出维持我的生活费用,而且我在银行的存款也增加了。

八、意外的平反

我从莫斯科被驱逐出境六年以后，莫斯科当局撤销了对我的控告。象我从来不知道被捕的原因一样，我也从来不知道给我平反的原因。我只知道事情发生的过程。

我坐在洛杉矶城里家中书房里，正写着下一期《今天》要用的笔记。电话响了，电话里的声音介绍他自己是赫斯特某一家晚报，这立刻使我警觉了起来。

电话里的声音问道：“你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吗？”我回答说，是。“你就是几年前在莫斯科作为间谍被捕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吗？”我肯定地说，没有错。

“你听说莫斯科撤销了对你的控告，说你是无罪的吗？”我说我还没有听到。

电话继续问：“你对这有什么话要说？”

我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太好了。”

电话里的声音解释说，消息来自他们的伦敦分社，他们要知道我的反应。我除了说如果能够得到证实，我很

欢迎这个消息之外，拒绝再说更多的话。

我刚刚放下电话它又响了。这次是从纽约来的长途电话，说话的声音介绍他是哈利·曲沃尔茨。我想，《纽约时报》这么远打来电话，一定有点什么是真的了。所以当曲沃尔茨继续说下去时，我已经作了思想准备。他说：“我想你知道我为什么打电话。”

我回答说，我刚刚听到一项惊人消息，正在想它是不是真的。曲沃尔茨告诉我，这消息是由莫斯科无线电台发出，再由《纽约时报》伦敦分社转播来的，它说一九四九年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控告是贝利亚搞的，控告的罪名已被发觉是不真实的。曲沃尔茨问我：“你有什么想法？”我回答说，我认为这消息很好。

曲沃尔茨继续问：“你满意了吗？”我回答说，我不仅满意，而且非常高兴。

曲沃尔茨继续说：“我的意思是，你对于贝利亚应受谴责这一点满意吗？”

“我怎么能知道？他们在莫斯科是应该知道的。贝利亚是管监狱部门的头头，我想他大概有责任。”后来我听纽约的朋友们说，我给了“很好的答复”。他们说，曲沃尔茨很明显是想诱使我说一些可以转为反对苏联的话的。我在那时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过根据长期以来在演讲时回答容易引起情绪激动的问题所形成的经验，就半自发地作了这样的回答。

接着，过多的要求谈话，要求在电视上露面和为电影拍照而使我不胜其烦。在这许多谈话和在电视上出现中间，我终于想起我还完全没有接到莫斯科或者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的正式通知。我同时也想起来苏联大使我是认得的，我曾在莫斯科我的家里招待过他，他和我已经去世的俄国丈夫曾在一九三九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共同主持过苏联的展览馆。

于是我就给苏联大使写了信，告诉他我已经得到了苏联政府给我平反的消息，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因为许多家报纸都发表了这个消息。不过由于我本人不断地被问到这件事情，并且已经三次在电视节目里出面来回答问题，我很想得到关于确实情况的某种正式说明。这封信，大使自己没有给我答复，大使馆的参赞答复了我，说大使指示他给我寄来《真理报》的剪报。他寄来的剪报只有几行长，它是那样短，我还能记得它。除了“记事”一词以外，这条剪报没有别的标题。它说在一九四九年二月，新闻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国家保安部门的官员（贝利亚——阿巴库莫夫）所逮捕，并被指控为间谍而驱逐出境。苏联的检察机关调查了这一控告，发现控告没有根据。所以该项控告应予撤销。

我仔细地把剪报读了好几遍。我反复地把它想了好几天。扼要地说，它是清楚的和令人满意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它透露的情况太少了。它没有说贝利亚是“错误地”或者是“恶意地”干了那件事，或者是“根据上级指示”那样做的。它一点也没有说到为什么要那样指控我。同样它也一点没有说到由于什么原因，以及在什么时候，检察机关审查了这个案子，并发现控告“没有根据”。六年已经过去了；检察人员可以在六年前就注意到了这件事，或者是一个月以前注意到的。一点也没有说到，由于什么使他注意到了这件事。是不是他主动要复查贝利亚经手过的全部事情，还是由于我在美国的朋友们写信去的压力，引起了他的关心？我知道有些信在不同的时间里写到了莫斯科。我特别注意到“唯一神教会社会正义团契”所写的抗议信，那是迄今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个要求莫斯科重新考虑它的指控的组织，我还听说过有一两起个人发去的类似的抗议信。《真理报》的声明一点也看不出这些抗议是不是

收到了，并且经过了考虑。

我越考虑这条剪报，越发现更多的不足之处。我接着开始感觉到这一声明纯粹是消极的东西。虽然莫斯科撤销了我是间谍的控告，可是它并没有声称我是苏联的忠诚的朋友，象我三十年来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它没有说我现在能够得到返回苏联的签证，或者经过苏联回到中国去的签证，而这是我所需要知道的正面的东西。

尽管如此，这一声明有其足够的的重要性。于是我就很快地行动了起来。从《中国建设》这家刊物上得知，陈翰笙是它的成员之一。我回忆起当我被指控为间谍时，他虽然不见我，可是他还是愿意从远处帮我改正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于是我就给他写信，提出我想回到中国的问题，说早在延安时，我曾被邀请再回中国来，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想回来，但不知这一邀请是否仍然有效？最后我接到了一封友好的回信，邀请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客人再回到中国来。并且说，在我愿意停留在中国的不论多长的期间里，他们将提供作为一个作家进行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方便条件。

我当即根据这封回信来开始计划我的未来。

* * *

我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申请一张美国护照。我的申请被拒绝了。虽然事实上我曾持有一张美国护照达三十多年之久，而我也从来没有不正当地使用过它，但是国务院在发护照给共产党人或者任何“亲苏的赤色分子”的问题上，它的政策变得很僵硬。美国的许多知名人士，如保罗·罗伯逊，^① 罗克威尔·肯特^② 和其他许多

^① Paul Robeson, 美国著名黑人演唱家。——译者注

^② Rockwell Kent, 美国著名美术家。——译者注

人，都被拒绝发给护照，他们已经为取得护照而进行诉讼了。这时我也参加进了这一行列。听说进行诉讼，需要找一个准许在华盛顿特区法院执业的律师，我就去找莱因·福来尔，这是一家已经接办这类案件的律师事务所，他们也接办了我这个案件。福来尔向我解释说，为了护照打官司，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过，好在别人打这种官司已经好几年了，我可以利用正要对他们作出的判决。

为护照而打官司，需要经过好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需要相当的时间和不断增加的费用。第一次拒绝是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护照处。第一次申诉就必须先找这个护照处。然后开一次讯问会，申请人必须亲自到华盛顿去面对着护照处官员组成的委员会。经过了好几个星期，我被允许举行这么一次讯问会，会议是在有关官员空闲的时候举行的。我必须从加利福尼亚到华盛顿。我面见护照处的官员们是由福来尔先生陪着的。这些官员们查问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活动。他们要证明我在美国的活动，显示出允许我到国外去旅行是不符合美国政府政策的利益。他们的问题，很多都是平常的细小事情，也有一些则是意外的严重，常常是一些我简直都已记不得的事情，但是美国国务院却有材料来自在国内外的特务人员。所有他们问我的事情，都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知道美国国务院是怎样来解释我的这些活动的，而我自己原来的看法则同他们的很不一样。

例如，他们问我在一九四三年是不是乘了一架苏联的“军用飞机”从阿拉斯加飞往莫斯科的。在有些惊异之后我回答说，我确曾坐过一架我认为是美国的飞机，从费尔班克斯飞往苏联，我坐这架飞机是得到了美国军方同意的，而这架飞机是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对德、日作战中，根据“租借法”援助盟友的一个项目交给苏联的。也许这架飞机经过某种转移就变成苏联的军用飞机了。它是

在哪里转移的，我自己确实不知道，我甚至没有注意到在哪个地点它的驾驶员不再是美国人，而变成一个俄国人了；也许是在西伯利亚着陆以后，也许是在诺姆。我自己认为它是一架美国“租借法案”飞机。

他们又问我，一九四七年我是不是坐在一艘苏联海军运输舰上，从那时苏联还占领着的大连港去到海参崴的。这再一次使我惊异了。我回答说，我坐的是从上海到海参崴的普通苏联船，它对持有签证，准许进入苏联的任何旅客都卖票。这条船在大连停了一下，搭上了很多看来象是俄国人的旅客。是不是在这里它变成了“一艘海军运输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是从上海开出的普通船。我还被问到我曾在大连作过的一次演讲，那次演讲非常偶然，我早已忘掉了。那时连船要在大连停靠我都不知道。当我知道它要停不只一天时，我就决定上岸了。我发现我受到了当地中国人的欢迎。他们显然是掌管着当地的政府，他们急切地想知道我在延安看到了什么。据我所见，他们既不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也不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他们象是自己组织了一个地方政府。我确实没有说过护照当局所引述的那些话，很显然那些话是他们的某些特务人员送给他们的。不过，也不难看出来，我对美国军事援助蒋介石是会说些话的，这些话由于翻译的不高明，和特务们为了要证明他们所说的情况而有意夸大，结果就变成了主管护照的官员们证明我对美国政府的批评了。

我又被问是不是曾经在某一天到过克利夫兰，在很晚的夜间参加了一群共产党的集会，去传达从莫斯科来的指示。这是最愚蠢的指控中的一条。我回答说，我记得大约在他们说的那个时候，在克利夫兰有过一次演讲会。这次演讲会也象其他演讲会一样，是由一个代理人给安排，并在报纸上登广告宣传的。在这些演讲

会之后，我通常多半被带到主席或者赞助人委员会的某个人的家里，在那里我会吃一些点心，回答一些客人提出的问题。我不记得在克利夫兰是不是有过这么一次集会，但是通常是会有的。我从来没有传递过什么秘密指示，也从来没有以为那种集会上的客人是一群什么秘密人物。

在这一类琐细的问题中间，护照处的官员们突然象扔出一颗炸弹似的问我，是不是有一年，我从莫斯科回到美国，担负着为苏联搞间谍活动的任务。圣路易斯某报的记者曾写过文章说，托洛茨基逃亡在墨西哥时，他的一个秘书曾经这样告诉过他。我当然要愤怒地否认了这种最荒唐无稽的谣言。不过，我觉察到我面对着的官老爷们，他们并不对事实有兴趣，而是对编造一个什么报告来证明一个人的罪名有兴趣。

所以，我对于护照部门决定再一次拒绝发给我护照，一点也不奇怪。我感到奇怪的不是决定的本身，而是他们经过了好几个星期才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且，他们在我回到加利福尼亚以后给我的正式文件里，把他们提出过的大部分问题都罗列了出来，简直是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地搅混在一起。我通过一个代理人在克利夫兰安排一项演讲，是一项很普通的例行活动，而他们却把关于这项活动的指控，和我曾正式为苏联雇为间谍的指控，等量齐观。后一罪名如果属实，是严重得足以作出坐牢多年的判决的。护照部门的官老爷们为拒绝发护照而编排理由的愚蠢，使我想起了莫斯科监狱里审查我的那个官员的同样愚蠢，他把我为《莫斯科每日新闻》访问苏联建设事业所写的笔记本都摆出来，作为我曾经作了多年“间谍”的证据。

福来尔先生安慰我说：“这只是第一次讯问，我们现在知道了他们将采取的方针和方法了。”我开始了解到为什么这些诉讼活动

要花那么多的钱。全部诉讼过程都是由一个高工资的速记员记录下来的。为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的律师必须获得第一次讯问的全部记录资料经过签证的正式副本，在此基础上进行法律研究，并准备将来如何答辩。因为整个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是由敌对的当权者确定的，一个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护照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就得破费好几千元，还得花上五年以上的时间。

至于我这个案子，福来尔先生确信地说，则不需要花这么多的钱和这么长的时间。事实是我只花了三年。我回到华盛顿去进行第二个阶段的诉讼，这次是向国务院直接进行申诉。在这个阶段，护照处把它反对我的案卷送给国务院由其他部门的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这里的判决，象每个人所想象到的那样，也是否定性的。虽然如此，这个阶段还是非经过不行。国务院的最后拒绝，在论调上同护照处第一次那种半通不通的报告可大不一样。这第二次的判决文件是由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亲自签署的。文件经过精心撰写，配得上这么高位人物的签字。

这次没有把各种各样的行动和罪名愚蠢地搅混在一起。这个文件，把我在莫斯科被捕以前以及被控告的六年当中和平反以后的一个阶段中我的全部行为，都进行了精细的分析，我的公开行动更为《工人日报》对我的评论增加了声色。把这些言行串连起来，美国国务院正式作出结论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自始至终都一贯是“献身于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一分子”，因此，必须拒绝发给美国护照。

这是一份值得当作鉴定书保存起来的文件。事实上，当我把这份文件给平反后来找我的洛杉矶美共的两位领导人看时，其中一位说，“看来，杜勒斯先生对于你的活动比我们还要清楚”。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接近一九五七年末的某个时候，

福来尔先生问我要不要他为我的护照采取诉讼的下一步骤，因为国务院已经最后在最高一级上正式拒绝了我，这大约已花费了我两年时间。我现在可以通过我的律师，向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起诉，要它迫使国务院发给我护照了，这是我的权利。但这将是一项很费钱的诉讼程序，因为必须备好前几次讯问会的诉讼记录和国务院的答复等文件副本，而这些东西都必需是经过正式签证的文本，连同我的律师的答辩文件，都得送呈法院。所有这一切，包括我的律师的出庭费用，差不多将会花费一千元。但是目前就要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因为除非最高法院对于已经摆在它面前的案件作出了对我有利的判决，否则法官是不能作出有助于我的判决的。所以，要福来尔先生强使法官这时作出判决是不明智的。不过，最高法院已经同意在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处理罗克威尔·肯特的案件以及其他一些案件，这意味着那些案件可能在四一五月间开庭，六月里作出判决。福来尔先生解释说，这项判决有三种可能：其中之一是受到否决，在这种情形下，即在已经否决了一件类似的案件之后，我得决定还要不要再上诉最高法院。其次，这项判决也可能是同意了罗克威尔·肯特的护照要求，但其理由却不适用于我，在这种情况下，它对我就没有什么帮助了。

不过，如果这项判决同意发护照给肯特，其理由可以适用于我，也适用于其他千百件同类的案件，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同意给他护照的理由和我们起诉的理由相同，即国务院无权根据政治信仰的原因来拒发护照，那么，我的上诉一案，就可以利用它了。情况如果真是这样，福来尔先生就可以立即到法官那里，要求发出一道法院的命令给国务院，要它在最高法院刚作出的判决的基础上，把护照立即发给我。

我很感谢福来尔先生把可能的抉择说得那么清楚，我就告诉

他继续进行下去，把案子送往特区法院。我要准备好在一九五八年六月里迅速行动。我说，让我们假定最高法院的判决将会对我们有利吧。同时我也下定决心，但我没有告诉福来尔先生，不管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否有利，我在六月里一定要到中国去，即使没有护照也要去，莫斯科和国务院造成的拖延，已经使我等了十年多了。这已经够长了。

* * *

在一九五八年六月里，福来尔先生把我的护照送了来。他正确地预见到了最高法院的判决要在那个时候作出来。他并且能够把我的护照也搞了来，虽然我的护照须在罗克威尔·肯特案件的基础上才能搞到，而最高法院判决后，肯特先生还得等上好几个星期，因为按法律规定，国务院有权利在这期间作一次申诉。但在最高法院判决后的那一天，福来尔先生就去到华盛顿特区法院，要求他们指示国务院发护照给我。他们就在罗克威尔·肯特案件的判决基础上这样做了。于是，护照连同苏联的签证很快就送到洛杉矶，交给了我。

* * *

在国务院一直拒绝发给我护照的那三年里，我并不是闲着没事干。我不只一次从加利福尼亚去到东海岸，进行巡回演讲。我尽可能使这项活动同到国务院去申诉的时间一致起来。莫斯科的平反，撤掉了美共为反对我的活动而对我进行了六年的抵制，使我在各地的演讲重新成为可能。党本身过去没有直接给我安排过演讲，这时也没有这样做，但是他们的抵制和他们的赞助之间的区别，各地的共产党员，根据《工人日报》报道和我的演讲态度之不同，是很容易推断出来的。他们的赞助或他们的反对是足以影响各地大多数进步组织的。这些组织都知道资助进步演讲的困难之

复杂性。有些较大的组织，例如纽约和波士顿的社团教会，他们有公开讲坛，强大得可以忽视共产党的态度，可是这样的组织不多，而且也不容易负担横跨国境的旅行费用。但是，资本主义世界报纸广为登载的莫斯科为我平反这一事实的积极作用，再一次使广泛分散而活动积极的各地共产党员能够促使当地某些组织，例如他们是某个大学的学生，或者他们是某个讲坛的会员，来推选我为演讲会的主讲人。

我在美国还有好些工作必须做完，其中之一就是我的书《斯大林时代》的写作。当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攻击斯大林时，我正在东海岸巡回演讲。当天上午那震动人心的揭露在《纽约时报》上出现时，我正好要在同一天晚上作一次关于苏联的演讲。我知道，那天晚上的听众是一定同我一样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的，他们会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些解释，希望我能提供给他们一些思想上的支持。我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来准备那次演讲，想着我应该说些什么。很清楚的是，赫鲁晓夫的演说攻击的不仅是斯大林，而且是可以称之为“斯大林时代”的整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苏联建设了社会主义。这是历史上若干最伟大的生机勃勃的时代之一，它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世界的生活。它不仅建设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建设起了遏制希特勒的力量。它又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发生了千万件残暴的不公正和粗野的压迫事件。这就是赫鲁晓夫在片面攻击中所列举出来的，并且全部归罪于斯大林一人身上的事情。这样的片面攻击威胁着苏联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

因为我自己是在斯大林时期生活过来的，而且在相对小的程度上也经受了它的不公正，我觉得我必须对赫鲁晓夫演说的消极内容进行一些答辩。那个时代的坏事情，来自多方面的原因——

来自俄国过去的习性，来自敌对包围圈的压力，来自希特勒的第五纵队，同时也部分来自领导人的性格。但是我清楚，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所有坏事，不管是来自客观的必然，还是来自错误和罪恶，比起使苏联人民吃尽苦头的西方世界蓄意进行的干涉战争和希特勒的侵略所产生的坏事要轻微得多；甚至比美国推迟已经答应了的“第二战场”的开辟，致使苏联人民遭受到的更多的痛苦，也要轻微。即使我们不把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看作是斯大林时代的成就之一，难道我们能忘掉一九四〇年法国军队是怎样在十一天之内在希特勒面前垮掉的？以及欧洲是如何恐惧着一个新的千年黑暗世纪的来临？难道我们能忘掉“主宰世界的种族”的宣扬者对整个人类的袭击，以及这一袭击如何为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儿女们所粉碎？在我看来，今天世界人民得大大感谢斯大林时代才对。

在那天晚上以及以后的几次演讲里，我讲了这样一些话。当时旧金山劳工学院的院长郝兰·罗伯兹对我说：“我认为你应该写一本关于斯大林时代的书”。我同意了。这样的一本书看来是需要的，而我是最适合写这样的书的一个人；我在许多书中已经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而这些书的大部分都已绝版了。那年夏天，我就带着一个秘书，住到洛杉矶附近一座山上的房子里，从过去写的许多关于斯大林时期的书里摘引材料出来。然后我又摘引了十二大页赫鲁晓夫反对这一时代的话，同我自己所见到的情况相互比较。就在这个基础上，我把书写了出来，并于一九五六年由两家出版社出版，其中一家是美共在纽约的出版社，另一家是“今天出版社”。地址在加利福尼亚，阿勒台登纳，也就是出版我的刊物《今天》的那一家。

这是“今天出版社”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也是《今天》的最后

一种出版物。

* * *

郝兰·罗伯兹从帕洛阿尔托打电话给我：“你应该立刻去参加斯德哥尔摩的和平会议。你能够很容易得到一张出席会议的证件。你可以从洛杉矶坐飞机飞过北极到那里去”。当我问他为什么我应该去斯德哥尔摩时，他回答说：“因为那是你能够遇到多年来你一直想要见到的人们的最好的地方”。

我听懂了他的意思，我就打电话给航空公司预定了去斯德哥尔摩的飞机票。然后我打电话给克伦威尔的皮尔逊医生，我知道她多年来想到中国去，但是好几次都错过了机会。其中一次还是由于她帮助了我的原故。当她早在童年时期，有一位从中国来的传教士住在她父亲的家里，说起中国来总是称赞那里人民的品德，这就使她开始对中国发生了兴趣。后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和“长征”的新闻，中国，在政治上对所有的进步人士就变得重要起来。一九三七年，皮尔逊医生作为“美苏友好协会”的委员，参加了一次莫斯科大会，得到了一张穿过西伯利亚并经过中国的回程火车票。她在火车上时，正巧日本人侵占了芦沟桥，把战争向南扩展，于是，火车就带着它的全体旅客，经过朝鲜，转往日本了。

她最近一次没有去成中国，是发生在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要在中国开会的时候。多年来皮尔逊医生就是参加这个国际组织的“美国妇女大会”的积极分子，她常被选为参加国际会议的代表，部分原因是她能付得起她自己的旅费。当一九五〇年初，大会宣布要在新德里召开时，她带着她的养女自费去了印度，花了不少的钱。在她到达印度之前，会议由于尼赫鲁不准在印度举行而改到布达佩斯去开。由于“美国妇女大会”的疏忽，这一变动没有通知皮尔逊医生，她就在知道会议不在那里举行之前，一直到了印度。

当她最后回到纽约时，“美国妇女大会”的人员对她表示歉意，并肯定地答应她下次召开国际会议时，她们一定派她为代表去参加。

下次会议是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的。那是一次特别为亚洲人开的会议，但是其他国家的友好代表也都邀请了。“美国妇女大会”被允许派三名代表去参加。这次大会，当解放后不久的最初几年中在北京召开，是皮尔逊医生最想要参加的一次大会了。可是，她虽然是“美国妇女大会”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但是有这么一次国际大会，连通知她都没有通知，直到两位代表已经离开美国去中国后，不再有足够长的时间可以让第三个人去时，她才知道这件事。这个花招是特别为阻挠她而安排的，因为去的两位代表同她很熟，却特别受到嘱咐不准告诉她。

事后委员会的主席告诉她：“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派你去？就是因为你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要好”。这是我所知道的美共惩罚人的最严重的表现——皮尔逊医生是好几个进步组织多年以来的长期成员，不是由于她自己的过错，而单单是由于我从莫斯科回来病倒了，而她帮助过我，就受到了这样的惩罚。我听到了以后曾对她说：“爱米莱，我一有机会去中国，就请你同我一起去”。

所以这时我打了长途电话给皮尔逊医生说：“我在几天之内将飞往斯德哥尔摩，计划还要走得更远。你最好同我一起去”。她回答说，她得不到护照，由于她同美共过去有联系，她被拒发护照。我就告诉她：“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在他们再一次改变法律之前，赶快搞一张护照吧。给我在华盛顿的律师打个电话，他立刻就能给你搞到一张”。

几天之后，爱米莱打电话说，她将在斯德哥尔摩和我碰头。后来，我们一起在斯德哥尔摩同中国来的代表会面了，并同他们安排我们东去的旅行。

九、重游莫斯科

关于斯德哥尔摩会议，我的记忆很混乱。我没有正常地参加会议，因为我的身体很不好。我为安排离开洛杉矶，弄得精疲力尽。我本来想在走以前在山里休息一个月的，就是由于郝兰·罗伯兹的提醒，说斯德哥尔摩是会见中国朋友最好的地方，我才改变了计划。我拄着拐杖旅行，因为我的一条腿有毛病，越来越疼起来。于是我就打算在安排好去中国的事情以后，并在继续旅行之前，先在瑞典的一个什么疗养地方休息一个月。

我很快就同中国代表团联系上了，在他们中间找到了廖承志，我的一位老相识。我告诉他我想安排到中国去的旅行，他对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并且说我已经被等待了好些年了。带着皮尔逊医生一同去，也没有困难，她只想旅行几个星期。至于我自己，我还不能肯定我要呆多久。自从我一九四七年离开延安以来，中国一直是我最想要写的地方，中国在我看来，对世界有最关重要的启示。自从在延安的那些日子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

已经变老了。我在延安认识的那些领导人，已经在掌管一个包括四分之一人类的大国了。他们肯定不会再有那么多的时间，象在延安时那样，为我解释事情了。所以，我完全不能肯定我如何使自己适应新中国的生活。我清楚的是，我要去，并在中国写它两年——我计划两年，是因为这是护照的期限。可能的是，也许象我以前常常从莫斯科回到美国去作关于苏联的演讲那样，到时我也从中国回去作关于中国的演讲。另一方面，也许我发现在中国的生活是那样满意，以致使我再也不想回去了。

这些话，没有必要同我的中国朋友们说；我想他们是都理解的。不管怎样，我在洛杉矶就是这样来安排我的事情的，使我可以不定期地呆在外面，如果我想要的话，我也可以回来。我对中国朋友们说，我极度疲劳，我想先找一个凉爽的休养地去休息一个月。我知道北京夏天很热，最好是夏天过了以后再到达那里。他们同意了。

可是，我没有在瑞典过夏。并不是只有中国朋友邀请我。苏联代表团也邀请了我。当我解释在继续旅行之前，我需要休息一下时，他们回答说，从斯德哥尔摩到莫斯科的旅行并不长，而且同苏联代表团一起去，一路上他们可以安排所有手续，这对我将更方便些。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在莫斯科附近休息一个月。他们说的好象很有道理，而且也符合皮尔逊医生的愿望。于是我们就同意了先到莫斯科去度过大部分的夏天。在莫斯科我也有想会晤的老朋友，包括我丈夫的亲戚。

我们在莫斯科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苏联作家协会的负责人阿历克西·苏尔科夫几乎是马上就来见我，并且告诉我说，由于苏联当局曾经根据现已查明是虚假的罪名而采取反对我的措施，我有权要求赔偿物质上所遭受的损失。如果我曾经有钱存在苏联银行

里，或者曾经在莫斯科有所房子，我有权把钱要回来，并得到一所类似的房子。因为个人来处理这些事情不容易，苏尔科夫先生认为帮助我是苏联作家协会的义务。如果我把存款的银行名字以及我曾经有过怎样一种房子告诉他们，他们愿为我处理这些问题。因为这些事情需要花费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作家协会建议我在这期间作为他们的客人，或者到苏联境内我想要去的地方旅行，或者停留在一个休养所里休息。

我马上选择了休养所这个建议，在作家协会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舒适的休养所里，我度过了一个月。它提供了优良的设备，丰富的伙食和在树林里散步的机会。那里的建筑风格使我以為那是作家协会接收了的沙皇时代贵族住的房子。可是，我却惊奇地听到这是在革命以后才建造起来的。不仅它们的建筑风格，而且内部陈设也都适合于一个过去的年代。

我特别记得清楚的是，卧室虽然大，而且陈设得很漂亮，可是不仅没有私用浴室，而且盥洗盆没有装自来水龙头。在我的卧室里，代替这个的是装了一个既大而又非常精致的“弥沃尔尼克”，那是一种盥洗盆，它装有大理石浴盆面和一个由女仆每天装水进去的暗柜，当我适当地按一下那里的龙头，水就流进盥洗盆，漏到一个装在下面的大桶里去；那个大水桶也是用漂亮的嵌板隐蔽起来的。女仆必须经常弄空水桶，否则它就会溢出水来。可是在大厅过去不远的地方，就有几个公用浴室，里面有全套盥洗设备，包括冷热自来水。我奇怪的是，为什么这里的卧室就不能装上接有水管的盥洗盆。那些笨重的大理石“弥沃尔尼克”看来是明显的浪费，既浪费物料，又经常不断地浪费着人的劳动，更适合于封建时代，而不应存在于任何现代的休养所里。这仅仅是浪费的一个事例。

在这个休养所里的客人，大多数是作家。他们大多数都是很有

礼貌的。不过，其中一位曾借机攻击我，因为我写了一本关于《斯大林时代》的书。她碰巧在餐厅里坐在我的旁边，轻蔑地对我说，“看来你是赞成斯大林的了，你得更懂事一点才好。”我问她有没有读过我的书，她说没有。于是，我只告诉她我并没有完全赞同斯大林的全部行为，但是，虽然在他那个时期存在一些坏的方面，可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经济，并且打败了希特勒的军队。我说，所有这些成就，对人类都是重要的。她轻蔑地哼了一声就走开了。

除了这些小的烦扰之外，我从作家休养所里的休息中获益匪浅，我很感谢苏尔科夫先生对我的殷勤。

* * *

我住在莫斯科城内和郊外有限的几个星期里，曾不只一次地去看望靠近库尔斯克火车站，位于宽阔大街上我以前的那个家。我自己住的两间房子早已被外人占去了，但其他两间，原先指定给我丈夫的，他死后就给了他的两个寡居的姊妹，我同她们曾经合住在一起，这时这两间房子仍然属于我丈夫的这两个姊妹。她们欢迎我，请我去吃饭，并把其他几个住在莫斯科别处的苏宾兄弟姊妹们都找了来。在这期间，我丈夫前妻的女儿杜西雅也到莫斯科来访问亲友，她同她的丈夫和孩子那时是住在列宁格勒的。同他们接触后我才知道，我的被捕对于苏宾一家则是一场比对我自己还要更大的灾难。看来，任何不公正的行为的后果，其涉及的方面要比直接受害者的遭遇大得多。

杜西雅的丈夫住在列宁格勒，他很少来莫斯科，我更难得看到他，就是由于我的缘故，使他在海军学院失掉了教授职位。据说，“作为武装部队的人员，他应该具有更高的警惕”来发现我是个间谍。他被指责没有尽到职责。失掉工作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因

为在苏联，通常是容易找到工作的。但是他在海军学院的工作连带的使他有权利享有四间一套的漂亮寓所，在这样的房子里，他不仅使妻子和孩子们得到了住处，还有年老的母亲和一个姊妹也都住到了一起。而这些人这时一下子就都被抛到街头上了，结果只能在简陋的民房里住下来，这是一座住了一百多个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大建筑，他们只能围着床，用布幕互相隔成一个个小天地。等了好几年之后，杜西雅同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在城外一个较远的地方得到了一所小寓所，使她的丈夫每天不得不在路上来回花上好几个小时。杜西雅自己则由于有孩子，不能走那么远，只得在一所小学里找到她讨厌做的教书工作。

我另外一位朋友讲的和杜西雅自己讲的不一样，我的这个朋友是从来就不喜欢杜西雅的。她认为杜西雅的丈夫不是因为我的被捕而被革职的，而是因为他当教师不称职，而且特别是由于他是一个犹太人，而犹太人“在部队里是不怎么吃香的”。这也许对，也许不对。不过，不管实情如何，她丈夫同我的关系确实是被提了出来作为革掉他的职务的理由的，虽然他很少看见我，他同我的关系是那样间接。苏宾一家都相信这是革职的确实原因。他们觉得我给他们全体带来了不幸。

虽然如此，他们并不责备我。特别是这时莫斯科当局宣布了我无罪。他们清楚了我是不应该受到责备的。过去的事已经不能挽回，需要的是将来不要受到毒害。他们亲热地把我当作他们的亲属，关心地问我在美国的生活。当他们听到我在美国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好几个侄子、外甥和侄女、外甥女，而我不是同他们住在一起，而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孤独地生活时，他们坦率地表示震惊。

苏宾的一个兄弟说，“你不应该那样生活，最好还是回到莫斯

科来吧。你这里有的是亲属。我们的寡嫂在这里绝不会没有一个家和家属的。

这些家属间的关心的话使我很受感动。我切实考虑了他的建议。我在洛杉矶虽然有那么多的朋友，可确实是常常很孤独。我的朋友们分散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必须坐汽车才能见到。我常常是疲劳得开不动我的车子，更不能把它开到更拥挤的“快车道”上去；我知道越来越老了以后，我会更孤独起来的。非常肯定的是，我的视力越来越坏了，下次申请开车执照时，他们会拒绝我的。那时我确实会被孤立起来。所以家属的感情，确实使我很受感动。但是我真的想同苏宾家的什么人住在一起吗？答案是：我不要。我需要容易相处的亲友，可我也需要自己的私生活和我的自由。

我在莫斯科还有别的朋友。有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也许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了。他很早以前就认识列宁，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到了美国，一九一七年又回到俄国。他和他的美国夫人是我最喜欢同他们谈话的人。他们是我所知道的世界大事和苏联大事最正确的解释者。不过这时他们的健康状况都不好，特别是那个男的，卧床不起。我不能希望他们来看我，今后同他们会面，只会是我这方面所要努力做的事情。

我还有另一个朋友，当我和她都还没有结婚时，曾经同住在一所房子里，而今她在莫斯科大学教书，她有一所漂亮的寓所。我去看她，并闲谈了很长的时间。我听说她写教科书挣了很多钱。因为她从工作中能够知道缺少那一种教科书，并且因为书的作者是根据书的销售量得到报酬的，她可以由此得到大量的版税。我记得好象她在近年来大约已经得到了近三十万卢布了。当我向她表示惊讶时，她补充说，“当然不是全部都到了我的手里。”我问她是什么意思，她避而不答，只是说：“那不是一个很好听的故事。”所以，

我想那大概是在某种不完全诚实的基础上，把钱瓜分掉了。同时，我又注意到她原先那种心平气和，自然流畅的批评已经变成玩世不恭的冷言冷语了。我离开她的住所时，我们一同坐出租汽车到我的旅馆，她叫司机顺着大街走最近的路。可是司机却趁我们在后排座位上忙着谈话时，来了一个向左去的急转弯。当我们注意到时，发现已经向着大学开去，不能再退回来，除非绕很远的路。我的朋友责备司机，而他只是说，“我以为你的外国朋友喜欢看看大学的建筑物呢。”我的女主人只是笑着对我说，“他这样只是为了额外的收入。他们都是这个样子。”我自己也注意到出租汽车司机和旅馆的服务员要小费，脸皮都变得非常厚了。可是我吃惊的是，我的这位老朋友却把这些事情看得无所谓。

她同样笑着告诉我说，大学里有些学生，他们的父亲在苏联政府中占着很高的职位，他们会威胁老师说：“你如果不在考试中给我好分数，我的父亲就要革掉你。”她坚持说她自己可不惧怕这种威胁，也不对他们屈服。可是，不管怎么说，她已经把这些当作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了。

* * *

我从作家休养所回到莫斯科时，听说我的存款将要退给我，大约要给我三四十“新卢布”，这比我想的多。我被告知，这笔钱不仅包括将近十年的普通银行利息，而且还包括我的一些家具的赔款，例如我的电气冰箱和一台高级收音机，这些东西在莫斯科还是不容易得到的。至于房子问题，作家协会从房屋主管部门得到了一份许可证，分配给我一套内有浴室的两间屋子的寓所，房子的所在地区，还可以由我挑选。莫斯科的情况我是清楚的，我知道这所房屋的分配比退回几千卢布还更重要，更难得。

苏尔科夫先生愿意立刻派人陪着我到我挑选的地区去看房

子。我向他致谢，但却拒绝了他的这一番好意。我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要一所靠近苏宾一家的房子呢，还是要一所靠近我那经常患病的老布尔什维克朋友的房子？还是靠近那位聪明而幻想破灭了的大学教授？这三家住得互相距离好多里，而莫斯科是一个那么广阔的城市。不管我住在莫斯科的什么地方，在莫斯科走动都是问题，问题包括雇出租汽车和坐公共汽车。看来，我自己得一切从头开始来建立一个家了。我是不是真的已经准备好了要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莫斯科在我心目中是不是这样一个地方？

这时我只对苏尔科夫拖延着说：“让我们等到从中国回来以后再说吧。”我已经希望不从中国回来了。但是我还没有把握。

* * *

我们从斯德哥尔摩到达莫斯科时，很快就有两家俄国刊物来向我要文章了，那就是《新时代》和《莫斯科新闻》；后者并不是早在一九三〇年我曾协助组织的那家《莫斯科新闻》，而是另一个不同的刊物，它是在早先那家停刊了一个时期以后才开办起来的。这两家刊物很快就付给我稿费。我在银行里开了一个他们给我卢布的帐户。当他们听说我计划去中国时，他们要求我从中国寄稿子给他们。后来我寄去一篇文章，分析在台湾海峡金门岛方面掀起的冲突，以及中国在这一敌对形势中的战略。这以后，我为莫斯科刊物写文章的事停了下来，这是由于我忙着别的事情，而《新时代》对我提供的材料也不再发生什么兴趣了。

* * *

我在莫斯科遇到了好几位前《莫斯科新闻》的同事，大约是在我被捕的同时，他们都曾被捕过，包括总编辑迈克尔·鲍罗廷在内。他们大部分都很快就被释放了，但是鲍罗廷曾被流放到一个劳动集中营里，并死在那里。这些事实，可能同原先在我心里对被

捕的推测发生冲突。我认为我的被捕或者是由于一个较小的官员的错误，或者是由于我在莫斯科还没有承认中国革命的时期，就奋力去单方面地宣扬它，以致使他们那样逮捕了我。可是《莫斯科新闻》全体人员，包括鲍罗廷在内的被捕，和我的被捕接连发生，显示出二者之间好象有某种联系似的。如果有联系的话，我从来就不知道是怎么一种联系。我甚至不能想象，究竟是我的被捕是由于我同《莫斯科新闻》有联系的缘故呢，还是他们的被捕是由于他们同我有联系的缘故。

我知道鲍罗廷是爱中国的，同许多别的曾经在中国住过的外国人一样，他常常想念这个国家，而且希望能有一天回来。在别的和他同一等级的苏联官员们得到了莫斯科郊外的避暑别墅之后的许多年里，鲍罗廷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别墅，即使给他，他也不要。有一次他同我说：“也许有一天中国人会在庐山给我一座避暑别墅，供我老年时使用。也许他们认为我做过的工作是配得上的。”

前《莫斯科新闻》的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个是很快乐的。他们的确缺乏他们以前曾经表现出来的那种满怀希望的气概。事实上，莫斯科很少有什么能诱使我留在那里了。鼓舞着我去组织早年的一家《莫斯科新闻》的那种世界使命的思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单单是由于我年纪更老了的缘故吗？我怀疑。还是，所有的革命都要衰退？

无论如何，有些事情我还是想问问苏尔科夫的。我将动身去中国之前，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接受一大堆文件，这是十年前当作“罪证”从我的寓所拿走的大批文件和笔记，我在卢比杨卡监狱里曾最后看见过，多年来被保存在国家保安机关的档案里，这时要退还给我。凡国家保安部门挑选去的东西都被保存下来了。我高兴地发现，在这些文件里还包括有许多我早年参加登山运动的

旧照片，那是在美国太平洋西北部胡德山和雷尼尔山上照的。我想象不出这些照片有什么“颠覆性”。我很庆幸它们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否则它们是会全部丢掉了。

我问苏尔科夫：“由于你同主管部门有那么好的关系，能够得到这些文件，也许你也能了解到为什么九年前他们把我抓了起来？”

苏尔科夫摇摇头说，“能够告诉你的人们可能已经不在了。”

他继续谈了一会儿过去的历史。他说，在斯大林的晚年，那么多的人被捕，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其他许多苏联的中心地区。那个时期的全部案件都已在重新审查当中。例如，在乌克兰，好几千人的案件已经审查过了，他们大部分最后发现无罪，并“恢复了名誉”。当然，这时他们大多数已经死了。不过这样的档案记载对于他们的家属还是很重要的。

苏尔科夫说，“贝利亚确实是个坏蛋。斯大林信任他，因为他是一个格鲁吉亚人，早年就认识斯大林。斯大林老年时对俄国人猜疑起来，对贝利亚则更加信任，地方党主席来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他们地方上的情况，有时他们那里的情况很糟糕，贝利亚就站在斯大林的身后，来的人可以望得见他。如果来人开始要诉说什么情况，贝利亚就严厉地怒视着他，以致使他怕了起来。斯大林晚年时并不真正清楚国内的情况，以及苏联农业中存在的困难，因为贝利亚干涉别人的汇报。”

我从苏尔科夫得来的这幅景象，说明了苏联发生的许多事情。这再也激不起我在莫斯科生活的意向了。我那时想，倘若一种制度是这样组织的，在上面的人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而手下一两个坏蛋就能够使他不了解人民的疾苦和要求，那就一定有什么东西非常错误。